



从“垮掉的一代”  
到嬉皮士的全球化

CONG "KUADIAO DE YIDAI" DAO XIPISHI DE QUANQIU HUA

王维倩◎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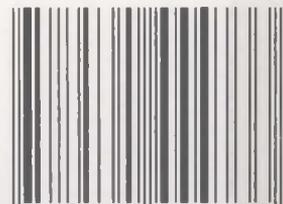
四川大学出版社



# “KUADIAO DE YIDAI” CONG DAO XIPISHI DE QUANQIU HUA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充满了躁动和喧嚣。这个时期的美国，刚刚经历过前一个世纪的工业现代化发展，强大的经济力量已经位居世界之首，但二战结束后的创伤体验还没有消散，同时民权运动伴着冷战和越战接踵而来，意识形态的修复和重建怎么也赶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于是精神的空虚和迷惘让美国的年轻人越来越怀疑世界，虚无、叛逆、自我否定和对自由的向往成了他们的精神印记……

ISBN 978-7-5614-4473-3



9 787561 444733 >

定价：20.00元

CONG『KUADIAO DE YIDAI』

从『垮掉的一代』

DAO XIPISHI DE

QUANQIU HUA

嬉皮士的全球化

王维倩◎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特约编辑:周婕舒  
责任编辑:吴雨时  
责任校对:冯 昀  
封面设计:原谋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 平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垮掉的一代”到嬉皮士的全球化 / 王维倩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5614-4473-3

I. 从… II. 王… III. 青年—文化—研究—美国 IV. D771. 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0001 号

### 书名 从“垮掉的一代”到嬉皮士的全球化

---

著 者 王维倩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473-3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8  
字 数 199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话: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目 录

|                                  |         |
|----------------------------------|---------|
| 引言 .....                         | ( 1 )   |
| <b>第一章 垮掉的不仅仅是一代</b> .....       | ( 4 )   |
| 一、“垮掉的一代”的含义 .....               | ( 4 )   |
| 二、“垮掉的一代”与嬉皮士 .....              | ( 5 )   |
| 三、民权运动与青年亚文化 .....               | ( 9 )   |
| 四、反传统与青年文化革命 .....               | ( 12 )  |
| <b>第二章 新教伦理的衰落</b> .....         | ( 16 )  |
| 一、战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 .....               | ( 16 )  |
| 二、新教伦理的衰落 .....                  | ( 21 )  |
| 三、中国青年劳动伦理的转变 .....              | ( 37 )  |
| <b>第三章 从“垮掉的一代”到嬉皮士</b> .....    | ( 45 )  |
| 一、政治风气的转变 .....                  | ( 49 )  |
| 二、文化革命 .....                     | ( 62 )  |
| 三、性的问题 .....                     | ( 90 )  |
| 四、先锋艺术：“垮掉的一代”与嬉皮士之间的桥梁<br>..... | ( 100 ) |
| 五、“垮掉的一代”与嬉皮士 .....              | ( 107 ) |
| 六、生育高峰期的一代 .....                 | ( 119 ) |
| 七、黑人青年的暴力问题 .....                | ( 143 ) |
| 八、青年亚文化 .....                    | ( 150 ) |

|                                  |       |
|----------------------------------|-------|
| 小结·····                          | (170) |
| <b>第四章 法国和英国的文化革命</b> ·····      | (173) |
| 一、法国“五月风暴”·····                  | (173) |
| 二、英国的文化革命·····                   | (178) |
| <b>第五章 “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的共同点</b> ····· | (181) |
| 一、禅宗·····                        | (181) |
| 二、致幻剂·····                       | (195) |
| 三、摇滚乐·····                       | (202) |
| 四、性解放·····                       | (213) |
| 五、对弱者的同情和对第三世界无产阶级领袖的崇拜 ···      | (228) |
| 小结·····                          | (230) |
| <b>第六章 六十年代的创痛</b> ·····         | (232) |
| 一、女权主义运动·····                    | (232) |
| 二、种族问题·····                      | (238) |
| 三、犯罪问题·····                      | (243) |
| <b>结语</b> ·····                  | (246) |
| <b>参考文献</b> ·····                | (249) |



## 引 言

我开始关注美国“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的最初原因，是由于在生活中出现了太多的“另类”青年。人们也许已经习惯了年轻人花花绿绿的头发和各种奇怪的音乐，然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性观念仍然让上一辈人吃惊不已。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风气是逐渐变化的，不过“80后”以及“90后”的一些先锋青年与上一辈人之间还是有令人惊讶的差异，存在着明显的代际断裂。哈韩族的脚下时常有一副滑轮板，许多十三四岁的少女喜欢养小老鼠、小蟑螂以及小蜥蜴、无毒的小蛇，她们把小蛇温情脉脉地缠绕在手腕上。今天到某某小店喝一种怪味汤，明天又到某某粥总汇吃粥，后天再到某间面馆吃一种特别的饼。他们流行在自己身上打洞，然后再像原始部落那样挂满小圈，甚至一些年轻的教师也穿鼻环。这一切都让人感到很奇怪。令我感兴趣的是，是什么原因产生了这种惊世骇俗的青年特征变化？

原来这些特征属于国际上流行的“嘻哈风格”，发源于西方的嬉皮士。随着嬉皮服饰的发展，由此而衍生的嘻哈服饰成为时尚流行的街头服饰之一。“嘻哈”最早是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属于黑人街头说唱文化——Hip-Hop文化，中文译为“嘻哈”或“街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登陆亚洲，流行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地。紧接着，哈韩、哈日等嘻哈风潮迅速得到了国内年轻人的响应。夸张怪诞的服饰、MD随身听、滑板车以及即兴脱口的说唱街舞表演，是嘻哈一族必备的行

头。大T恤、垮裤、板裤、刷白宽板牛仔裤、破球鞋、胖头鞋、头巾、彩色头发，佩戴各式各样的鼻环、耳环、粗手环，穿着粗项链衬衫、大头靴和渔夫帽等，都是嬉哈青年们显著的服饰特征。如今，我国一些发达城市的大街小巷，有很多青年在秀街舞，成群的几岁小孩在滑轮滑。

中国先锋青年的那些特点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放眼望去，日本、韩国、欧洲、美国、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大都市的时髦青年都是这样。而且这些标新立异的年轻人的诞生也是由于和传统的决裂。怎么会在全球出现具有相同特点的时尚青年？这种和传统的决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进一步地阅读和思考还能发现，这种和保守传统的决裂在西方已经经历了几个世纪，它是一个浩浩荡荡的、由精英阶层策划然后又扩展到全欧洲的行动，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以及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政治革命。这些行动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如洪水般把不愿进入现代化进程的个人、精神以及前现代的民族毫无商量地卷入进去，荡涤了以家庭或家族为核心的传统生活方式。随着宗教力量的衰微，经济和科学的发展，各种先锋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上述诸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西方传统逐渐瓦解。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主流精神开始经历从“神义论”到“人义论”的转变历程，人的欲望越来越不受宗教的束缚。不过直到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大动荡和资产阶级革命对传统摧枯拉朽地破坏以后，世俗力量对宗教的斗争才取得了较为完全的胜利。在这个基础上，美国率先产生了放浪形骸的“垮掉的一代”，而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种青年类型在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被大量复制，并且有全球普及的倾向，这就是嬉皮士青年。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并不知道，今天他们所享有的无拘无束的性爱自由，红头发绿眉毛的毛色自由，很大程度上直接受益于“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发起的激进文化革命。



下面将在对“垮掉的一代”全球化表现的综述的基础上，详细分析“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兴起的原因以及从“垮掉的一代”到嬉皮士的继承关系，他们的共同特征和该运动的后果。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本书作者认同历史学家西奥多·罗斯扎克的想法，力图把由“垮掉的一代”开先河而引发的这种新文化看做是一个整体，尤其是把美国的“垮掉的一代”和随后的民权解放运动、言论自由运动、反战运动、嬉皮士、性解放运动、禅宗、妇女解放运动、同性恋抗议活动、反文化运动都看做是精神气质相通的，这当中也包括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士文化及神秘主义和自我主义复兴等方面的文化革命。也会把各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相同文化现象看做是一个整体。通常，人们把那些激进青年学生主张的用激进手段进行的社会政治改革运动称为“新左派运动”，而把那些长期以吸毒、放纵等方式进行的文化反叛，称为“嬉皮士运动”。这两种运动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sup>①</sup>后半期汇合了，其契合点就是反正统文化。在时间的界定上，这里所说的“六十年代”是不同于平常时间定义上的从1960—1969年这一个十年，作者倾向于把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看做是一个联系非常紧密的时段。

---

<sup>①</sup> 本书后面提及的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如无特别注明，均表示二十世纪的这些年代。

## 第一章 垮掉的不仅仅是一代

### 一、“垮掉的一代”的含义

“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于美国的一群年轻诗人和作家的松散集合体。这一名称最早是由作家杰克·凯鲁亚克于1948年前后提出的。在英语中，形容词“beat”有“疲惫”或“潦倒”之意，而凯鲁亚克赋予其新的含义——“欢腾”或“幸福”，和音乐中“节拍”的概念联结在一起。此后，“垮掉的一代”的称谓借助各种媒体流传开去。“垮掉的一代”实际上是“迷惘的一代”的对照。之所以将这样一小群潦倒的作家和吸毒者当做“一代”，是因为这一人群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西方文学领域，“垮掉的一代”被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之一。“垮掉的一代”的成员们大多是玩世不恭的浪荡公子，他们笃信自由主义理念。他们的文学创作往往是自发的，有时甚至非常混乱。“垮掉的一代”的作家们创作的作品通常广受争议，因为这些作品时常不遵守传统创作的常规，结构和形式上往往杂乱无章，语言粗糙甚至粗鄙。“垮掉的一代”对后世的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被文化研究者们看做是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亚文化”。“垮掉的一代”的主要文学作品包括杰克·凯鲁亚克（1922—



1969年)的《在路上》、艾伦·金斯伯格(1926—1997年)的《嚎叫》和威廉·巴勒斯(1914—1997年)的《赤裸的午餐》等。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开始逐渐发生变化,活跃于四十至六十年代的垮掉派开始被更加活跃的六十年代的反主流文化群体所替代,这一族群的名称也被改为“嬉皮士”。

## 二、“垮掉的一代”与嬉皮士

为什么美国“垮掉的一代”的精神气质会传遍全球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应该归因于,一个社会只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就会产生类似的青年亚文化。美国五十年代的消费浪潮通过马歇尔计划传到欧洲,六十年代到达日本和太平洋地区,这些地区的青年文化和运动便产生了与美国青年相同的特点,这应该不是巧合。法国出现了“茄克族”,意大利出现了“国会族”,英国出现了“库兹族”,日本出现了“太阳族”。当美国的伯克利大学处于动乱中,哥伦比亚大学发生大规模学生运动的时候,英国、意大利、德国、荷兰、瑞典、西班牙、比利时的大学校园也都火山似的爆发了起来。五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初,一场史无前例的“反文化”风暴席卷了英伦三岛,给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强烈震荡和巨大变动,打破了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一直主宰英国的社会结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被认为是英国现代史上的一场“文化革命”。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也完成了法国的文化转型。1966年,联邦德国、法国、英国出现反对越战的学生运动。1967年,意大利爆发了学潮,学生和警察发生冲突。1968年2月,西柏林和法兰克福的学生也与警察交火。同年3~10月,意大利的学生和工人运动掀起高潮,出现了“火热的秋天”。1968—1969年,北爱尔兰学生要求民主,引发了内战。当嬉皮士聚居点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洛杉

矶、亚特兰大等地兴旺起来时，墨西哥、加拿大、伦敦、罗马、东京也都建立起了嬉皮士飞地。

在远东地区，美军占领了投降后的日本，为了彻底根除残留的军国主义土壤，1947年3月，27名美国教育家组成“美国教育使节团”来到日本，调查了日本的教育情况，对其教育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被全部吸收到了后来制定的《学校教育法》中。美国此举的目的在于向军国主义和集体主义较为浓厚的日本灌输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在此之前，美军就已着手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国家机器进行强行拆毁。日本建立议会，培育市场经济，通过和平宪法，仿效美国，建立了一套西方民主式的社会制度。<sup>①</sup>1946年元旦，在美国的敦促下，日本天皇被迫向全国发布《人间宣言》，宣称“把天皇看做‘现御神’、把日本民族看成高于其他民族、进而负有统治全世界的使命的空想概念是不对的。”从此之后，天皇不再是民族内聚力和传统文化的力量源泉，曾经的“神域”——宫城前的广场也成了野妓、醉鬼和年轻恋人们私会的场所。

1956—1973年，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进入了以赶超先进工业国家为目标、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工业平均增长率则达13.6%。这种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极为罕见。在这一时期，日本工业生产增长8.6倍，对外贸易从1965年开始出现顺差。从此，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经济大国。当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实现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时候，七十年代就产生了类似于美国“垮掉的一代”、嬉皮士这样的时髦青年，他们甚至更加放浪形骸，更虚无，是真正轻

---

<sup>①</sup> 何培忠：《中日青年生活观比较》，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浮、贪玩、嘻嘻哈哈的一代。这无疑是跟美国教育理念以及美国式的民主自由进入日本有关的。

伴随着日本由工业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型的是日本新一代性格结构的巨大变化。在当代的日本青年中，“有独立性”“有创造性”“认真”“内省”“勤奋”“学习好”的人最不受欢迎，而“善于搞笑的人”则威望最高。只有 3.5% 的人认可“有正义感的人”，而“违反校规的人”都受到 5.4% 的人欢迎。<sup>①</sup> 日本青年不愿再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心甘情愿做累死在机器旁的“猛烈人”，他们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下了班马上就要跑去过夜生活。公司只要强迫他们加班，他们就辞职，认为自己的命运和企业血脉相连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追赶时尚、享受生活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头等要事。

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情况也很相似。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日本人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里面讲的那种没有理念斗争的“历史终结”了的地方，都是资本主义的含义得到了完整体现的地方，都是美国的民主模式。这些地方的状况，看一看满街的韩剧、日剧、台剧及韩版服饰便知。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大长今》在韩国、香港以及欧美等地都曾创下令人瞩目的收视神话，如今再度风行中国内地，带动了各城市的韩国料理，使学做韩国菜成为时尚，甚至有旅行团到韩国去体验宫女生涯。《大长今》在中国内地的播出成为许多在华韩国企业的转折点，它们借助“文化东风”在中国市场崛起。三星 200C 手机、三星 mp3 随身听、三星数码“yeep”旋风强势登陆中国。这些新的数码产品定位于时尚年轻人，是潮流的标志。“韩流”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种的美国文化，并不是真正的韩国传统文化。它的

---

<sup>①</sup> 千石保：《“认真”的崩溃——新日本人论》，何培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第 204 页。

模式是给全球化的后现代文化装饰上韩国文化的碎片。

亚洲文明被美国同化，欧洲文明也未能幸免。欧洲有着悠久而深厚的文化积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竟然会大规模地接受美国“垮掉的一代”的文学，从欧洲的悠久文化传统和欧美文化关系史的角度来看是不可思议的。一直以来，美国文化在高深的欧洲文化面前几乎没有发言权，欧洲人甚至从不承认美国有文学和哲学。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真正美国本土的文学“垮掉的一代”诞生了，它摆脱了长期以来欧洲传统对美国的影响。金斯伯格和凯鲁亚克的作品在学术传统严谨的德国大行其道，一向以严肃学问为目标的德国大学也开设了“垮掉的一代”的文学课程。这也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对德国占领的后果，他们用民主、自由、米老鼠、唐老鸭、牛仔裤、迪斯科、摇滚乐、可口可乐来消除纳粹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的传统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帝国纷纷衰落。而战后又是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压倒一切的时代，如果没有美国的鼎力相助，连国家安全都不能保证的欧洲又从何谈起经济的强盛。当时欧洲只有仰仗美国才能保存自由主义的制度，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开始发挥显著的作用。欧洲的年轻人趁机抛掉本国悠久的传统，转过身欢快地迎接抛弃了原罪的美国快餐文化，得到的就是战后美国最流行的“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文化，这种文化在欧洲扎稳了根后，便在六十年代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中开花结果，并最终成为欧洲的主流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都被美国的流行文化所制服。战火对欧洲传统文化的毁灭是致命的，欧洲文明已经衰落到了怎样的程度！正如欧洲移民作家纳博科夫展示的那样，年少的美国“洛丽塔”在诱惑衰老的欧洲。



### 三、民权运动与青年亚文化

根据 1968 年美国 and 欧洲的学生运动以及日本的“新新人类”来看，是否一个社会具备了某些条件就会产生美国、法国和日本那样的“垮掉青年”？这类青年刚开始往往出现在经济较为发达、政治半开放的社会中。在这种社会里，人们能够较为安全地寻求到肉体的解放。反之，在很富裕而又信仰伊斯兰教的沙特阿拉伯，就无法产生“垮掉青年”。纳博科夫笔下的像林妖一样的“小美女”洛丽塔在极地周围的爱斯基摩人中就不会有，在远离城市的农村也不会有，她只会生长于繁华的大都市，产生于后工业社会而不是农业社会。当时的社会环境是，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其军事力量强大，起义和革命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政治氛围仍然很压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 and 欧洲都不可能真的要打一场像巴黎公社那样的街垒战，在高科技时代，手拿砖头的人民肯定不是装备精良的海军陆战队的对手。当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革命性质本来就和巴黎公社的阶级革命性质不一样，也不用再来一次真刀真枪的街垒战。这样的国家缺乏真正有效的精神理念和政治凝聚力，物质生产过剩，第三产业发达，消费是发展经济的首要因素，年轻人和父辈之间持有不可沟通的看法，传统道德是青年新生活的阻碍。市场经济文化提倡个人主义，年轻人越来越不关心政治，他们以自己的选择品味来显示自己的个性，仅喜欢娱乐和体育而已。主流教育与青年格格不入，当青年们的迫切期望超过了现实的改变速度时，往往就会把颓废绝望的情绪以堕落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习俗、道德、性的变革，最终达到改变社会的目的。

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等，也会在一些繁荣的大都市率先出现时髦一族。值得关注的

是，他们仅仅是偶然出现的异类，还是即将出现的某种大规模的反传统的青年群体的先知？金斯伯格高兴地预言，从布拉格到加尔各答，从新奥尔良到利物浦，整个世界都将风行曾经被苏格拉底严厉谴责、新近被尼采召回的音乐精神和祭神仪式，迷幻药、禅宗、瑜伽、萨满教将统治年轻的一代。甚至“铁幕”的两端——苏联和美国，大麻和放荡不羁的音乐精神都在慢慢地渗透……<sup>①</sup>

金斯伯格此言并非虚妄，可以对照 1968 年欧洲学生运动的另一种模式——东欧的模式来看。1968 年 3 月，群众性抗议运动首先在波兰首都华沙的学生中爆发，继而遍及全国。虽然波兰的学生运动与西欧和美国的学生运动大抵发生在同一时间，但是性质是不一样的。波兰学生追求的民主自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从小就有的，现在西欧已经在要求不受限制的性自由和言论自由，并且肃清旧道德旧宗教的残余，而波兰的学生还在要求“人性的”改革及言论、集会和游行的自由，打出的口号还是“报纸要讲真话”“不要对我们的父亲、工人和农民撒谎”。二者的差异是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不同。波兰学生的抗议成功后，也会有像美国和西欧那样的更进一步抗议。但是不排除的是，由于时代的大环境，又都是年轻人，东欧、西欧仅一墙之隔，波兰学生也可能直接把追求基础民主与追求无限制的性自由和言论自由同时结合在一场运动之中。

1996 年，捷克首都布拉格树立起了一座 10 米高的迈克尔·杰克逊的雕像，而这个雕像所用的底座上面曾是斯大林的雕像。1955 年，一座 14000 吨重、98 英尺高的斯大林花岗岩雕像建成，这座雕像于 1962 年被炸毁，保留了这个方形底座作为纪念。很

---

<sup>①</sup> 比尔·摩根编：《金斯伯格文选——深思熟虑的散文》，文楚安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00 页。



少有人能预料到，这个底座会用来树立歌星迈克尔·杰克逊的雕像，而斯大林和杰克逊，气质相差实在是太远。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的伦理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一些前苏联国家普遍存在着这样的情况，革命前悠久的文化传统被推翻，而又没有成功地建立新的深入人心的文化。一旦政治意识形态有所松动，人民就争先恐后地涌向“柏林墙”的另外一边——享乐的、喝着可乐的世界。

在已经实行民主制度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不需要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改变颜色的革命，甚至不需要改朝换代，仅仅只需要来一次资本主义体制内部的文化革命就行了，即抛掉资本主义文化过于沉重的历史积淀，创造一种基于肉体、充满闲暇和欢乐的后工业社会的文化。1968年的造反学生也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社员们一样，成立公社，筑起街垒，手挽手高唱国际歌。但1968年的街垒仅为这场文化革命平添了一些浪漫气氛。他们的武器不过是脏话、口号、砖块、棍棒和自制燃烧瓶，也并不打算来一场真枪实弹的血腥巷战。能够体验一下街垒战的气氛、闻闻催泪瓦斯就够了，就像他们体验过大麻、静坐和滥交一样。<sup>①</sup>

捷克和美国在迈克尔·杰克逊那里，在后现代文化的交汇处神使鬼差地走到了一起。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共同的工业技术基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切文化的基石。也许在意识形态终结的时代，人们将不再为“理念”浴血奋战。

在塔利班掌权时期的阿富汗，妇女是不能穿高跟鞋的，不可以没有男性亲属陪伴的情况下上街，上街时必须戴面纱，否则就会被警察鞭打。妇女要是通奸，则会被处死。美军占领阿富汗后，可以预料，在不久的将来，阿富汗的妇女就可以穿超短裙上街了。

---

<sup>①</sup> 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0页。

日本青年学家千石保曾预言中国将在 2007 年左右出现“新新人类”，这批青年将不再信奉勤俭节约的劳动伦理。<sup>①</sup> 2007 年的新青年大概是“90 后”，十七岁，正是少女作家春树的年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几十年前曾很有把握地宣称：我们的希望在中国的第三、四代的孩子们身上。第三、四代孩子，算起来也就是“90 后”的孩子们。当然，杜勒斯的如意算盘很有可能会落空，因为我们的民族传统和其他民族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方的“和平渗透”是不会成功的。

美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从以农业和农村为主导的社会转向工业和城市化的社会，在这个转型期，文化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兴起了轰轰烈烈的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第二次转变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由工业和城市化的社会向后现代和后城市化的社会转变，和第一次转变一样，也发生了相应的文化转型。原来适应于工业社会的价值和文要让位于后现代文化，这次转变就通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来完成。可见，美国和西欧的青年运动并不是传统的青年运动类型。而欧美国家的“老左派们”还是以马克思主义式的期望来指望那些大学生们会和已经拥有汽车和洋房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自然看走了眼，很失落。比如说马尔库塞，甚至还有更睿智的丹尼尔·贝尔。

## 四、反传统与青年文化革命

六十年代的青年亚文化运动，不管是以暴动、民权运动、反战示威还是以革命、吸毒、摇滚乐、禅宗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宗

---

<sup>①</sup> 千石保：《“认真”的崩溃——新日本人论·中文版前言（3）》，何培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



旨都有意无意地反对残留的旧道德、宗教、等级制和精英文化，要把没有限制的享乐从几个休假日扩散到每一天。琼·露琪·戈达德的影片《周末》这样告诉大家：“人们整天都在作践自己——干着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推销着自己并不喜欢的东西，而这一切又为的是什么呢？去买辆车到海边度假去吧。”在青年们看来，工作不能与玩耍截然分开来，必须是边玩边工作，在玩的时候顺便工作，在工作的时候同时能获得欲望的满足。劳动不是为了将来的幸福，而是为了此刻的快乐。因此，意大利的学生喊出了“我们什么都要，现在就要！”的口号，表明这是一场及时享乐、不要压抑的文化革命。这场革命不再像以往的任何一场革命那样，强调以今天的流血牺牲去换取未来的幸福，这场革命只追求立刻的、马上享受、满足、陶醉和性自由。以后的清洁工都会一边跳舞一边打扫卫生，现在迪斯尼乐园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在后现代社会，艺术、工作和游戏必须是一组同义词，而不是反义词。

摇滚歌星约翰·列侬的名曲《革命》就充分昭示了六十年代的学生革命不是传统革命，而是文化革命：

噢，你知道，  
我们都想改变世界。  
但当你谈论破坏，  
你可能不知道你得把我排除在外。  
你说你将把宪法更换，  
噢，你知道，  
我们都想让你的头脑改变。  
你告诉我说你要改变的是制度，  
噢，你知道，  
你最好让你的心灵无拘无束。

这首歌曲整个都像是一个“新左派”在对一个“老左派”说话，老左派要改变世界，要破坏，要变换国旗的颜色，要彻底改变制度，老左派考虑的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严肃问题。而这些新左派则不会真正参与暴力革命——“你得把我排除在外”。他们只是致力于变革人的思想结构，毁灭传统道德和宗教，追求无拘无束的自由。以前有谁听说过一场不要破坏的革命？不要破坏不要暴力的革命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六十年代造反运动的风头过去以后，经济和政治依然如旧，但文化和生活方式却完全变了。虽然在学生的气头上，列侬不得不改变那句“你可能不知道你得把我排除在外”，但是暴力仍然只是六十年代的一个特点而已，并不是学生运动的主流。专门搞恐怖主义的“气象员组织”“黑豹党”毕竟只有极少数人参加。

在青年学生革命运动的领袖马尔库塞看来，“垮掉的一代”就是资本主义的真正典型。“垮掉的一代”及其后来者创造了席卷全球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真正相匹配。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循规蹈矩的基督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六十年代在全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文化革命真正完成了资产阶级把文化领导权从贵族、神学家那里夺取过来的任务。在这以前，他们早就完成了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建立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依靠科技进步的经济制度和三权分立的议会政治体制。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才是资产阶级真正的文化，这是唯一一种不会让人感到难堪的文化，而在此之前，国家的文化话语权都让贵族和左派牢牢地把持着，资产阶级饱受诟病。资产阶级在文化上的与其政治、经济相匹配的形象，就是“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亚当·斯密的理想“自由放任”终于从经济和政治领域扩展到了道德、文化和私生活。法国大革命的各种潜在理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全地、穷尽最后深度地实现了，强调个人的自由主义和享乐主义本来就是资本主义应有



的题中之意，“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不过是帮助先辈们完成了对贵族传统和宗教的最后一击。以前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都是不彻底的，使人不得开心颜，使欢乐之泉变得苦涩的。后现代社会的人们不再受传统的羁绊，发达资本主义打开了经济和政治的潘多拉盒子，而想把文化和生活的潘多拉魔盒永远紧紧关上，那是做不到的。

## 第二章 新教伦理的衰落

美国就像被糖果包起来的一个不可爱的小孩。上帝不再爱我们。他爱俄国。他爱乌干达……我们已经从优雅开始走向堕落。

——厄普代克《夫妇们》

### 一、战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国处于“麦卡锡主义”流行的政治高压期。美国人听信麦卡锡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冷战，苏联在1949年也拥有了原子弹，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威胁，1951—1953年的朝鲜战争使美国一度处于很不利的境地，“麦卡锡主义”就是这种严酷和恐慌在国内的歪曲反映。当时流行的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乐于揭示世界被核战争完全毁灭的图景。五十年代的美国城市常常进行核战争的防空演习，刚入学的小孩通过图片和宣传资料也知道原子弹的厉害，一听到尖利的警报声，老师大喊“隐蔽”孩子们就立刻蹲下身子，趴在小课桌下，双手抱头，身体缩成一团。在课桌下，在走廊里，造就了一批幼小的“存在主义者”。难道抱着头缩在课桌下就可以不被原子弹炸成虚空？一方面是无止境的消费和富裕，琳琅满目的商品；另一方面是核战争的阴影。原子弹掌握在比美国人更不怕死、更鲁莽的苏联人手里，还有谁能对这个世界的持存有信心？人类第一次面临着世界

也许有一天会在一阵闪光和炽热中结束的厄运。不可避免的幻灭感。一旦爆发核战争，就算不立即成为尘埃，也会遭受更为恐怖的核辐射。这个时候，萨特和加缪的小说在美国更加流行了，不过加缪的《鼠疫》也不能穷尽美国人的恐慌。<sup>①</sup> 为了防止核辐射，许多家庭都在自己的房子下面挖防空洞，里面配备手提发报机、鼓风机、上发条的时钟、急救箱、取暖炉、防护服、汽油发电机等等。铅箔胸罩和白铁皮帽也开始在社会上流行，据说这些东西能够防止核辐射。对蘑菇云的恐慌使“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的公众中更有市场，即使明知麦卡锡是一个卑劣的政客，人们还是要支持他，因为习惯了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美国公民把共产主义的威胁看做是比麦卡锡更为恐怖的敌人。而确实有可靠的证据说明，苏联试验成功的那颗原子弹，就和苏联间谍盗取了美国的原子弹技术有关。<sup>②</sup>

许多美国人都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大萧条会卷土重来，因为军用品对生产的刺激将会结束。不过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忽视了胡佛时代的美国与杜鲁门时代的美国之间的区别。1932年的时候，人们是不敢到商店里去的，因为口袋里没钱，那时的人们认为存点钱是最重要的。参战以后，美国人的工资增长了一倍，但是大萧条的阴影使他们不敢乱花钱，特殊时期也没有多少商品可买，所以美国人不是买自由公债，就是把钱存到银行里。战争年代积累的储蓄以及自大萧条开始就一直受到压抑的巨大消费需求刺激了美国经济的蓬勃发展。1947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大约占了世界的一半：钢产量占57%，电力占43%，石油占62%，拥有全球25%的汽车。美国人在战争后又回到了

---

① 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96~100页。

② 阿瑟·林克、威廉·卡顿：《一九〇〇年以后的美国史》，刘绪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15~419页。

一个安乐的岛屿上，回到了一个赚钱和消费的世界里。战争与和平的交替重新演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在战争中人民的欲望和消费受到抑制，精神持续保持相当的紧张强度，许多人死于无情的战火中，好男儿上前线，妇女顶替平时男人干的工作，纷纷进入工厂。战争刚结束后，女人们又回到家中重新当起了家庭妇女，复员回来的战士和她们结婚，人口大量增加，伴随着狂热的消费文化。在战争期间，不会存在失业问题，国民收入已经从1933年的396亿美元上升到了1828亿美元，有的是大量的储蓄。战争结束后，大家都抢购脱销产品，住房和汽车都缺少。这种需求极大地刺激了汽车和住房的生产，在1946年到1955年间，全美生产的汽车以每年高出原来四倍的数量增长。复员军人用低廉的房屋贷款买房，而冷战的不断升级又导致了国防开支的扩大。每天有一万一千名婴儿出生在美国，使住房、食品、服装、玩具和学校的需要激增，尿布的产额从1947年的3200万美元增至1957年的5000万美元，1953年婴儿食品的销量为15亿罐，玩具和自行车都是供销两旺。到1956年，81%的家庭都拥有了电视机，96%的家庭有了电冰箱，67%的家庭拥有真空吸尘器，89%的家庭有洗衣机。<sup>①</sup>这是一个“勤恳求富裕，顺从求安宁”的时代，人民在尽情享受这多年难得的安乐。

迪克斯坦这样评论五十年代的政治和经济：“五十年代的人们为家庭、赚钱和消费，以及培植自己的花园而终日忙碌。这一切都反映在当时的作品中。但是这一时期的代言人也称之为一个焦虑的时代；在它的物质发展后面回旋着一种无声的绝望感，其象征就是核弹和人们记忆犹新的死亡营，以及一种甚至在考夫曼

---

<sup>①</sup> 安德烈·莫鲁瓦：《美国史——从威尔逊到肯尼迪》，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324页。兰登·琼斯：《美国坎珂的一代——生育高潮后的美国社会》，贾蔼美、纪胆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



法官之流骇人听闻的言词中都不失其真实感的对世界末日的恐惧。但这种焦虑是高度抽象、与世隔绝的，是封闭在自身之中的：核弹唤起的是绝望而不是愤怒或反抗。”<sup>①</sup> 是的，终日忙碌……但在它的物质发展后面回旋着一种无声的绝望感，一种“断言人性和人类环境冷酷无情的宿命论”。政治的不开放和精神上的恐慌与经济繁荣结合起来，就形成一种很奇怪的局面，即“只准乱吃不准乱说”的观念在引导着人民的思想 and 生活方式。新一代的年轻人就是在富裕消费与其对立面——失落、毁灭和失败的恐惧之间，在极端扭曲紧张的处境中长大的。这就是本书在前言中提到的那种政治半开放的国家，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丰裕与严酷就属于这种情况。当然，应该看到，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的。经济的繁荣使人民的选择能力大为提高，这本身就会给人带来一种好像是自由的感觉，也会使因政治和道德原因对自由的限制更加敏感和不能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不断拓宽人民的自由，甚至需要人民狂嫖滥赌，饮酒无度。历史已经证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禁酒运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来说，简直就是清教徒和不愿丈夫喝酒的妇女们在联合起来胡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形态，根本不可能离开酒精和红灯区。

战后“婴儿潮”一代的父母经历过 1933 年的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对以前的艰苦岁月还记忆犹新。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像自己一样节俭和勤劳，不过他们又创造出各种充满诱惑力的商品来鼓励人们无节制地消费以扩大内需，还通过广告、电视节目和娱乐刊物，塑造人们不断推陈出新的消费幻想。因为他们认为经济的发展就是要依靠不断拓展人的各方面的欲望，让人

---

<sup>①</sup> 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方晓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5 页。



们疯狂消费各种产品，以求扩大再生产。如果不尽情消费，经济就搞不走。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就是因为缩手缩脚不消费引起的。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能力创造足够的商品来满足他的人民，剩下来的事就是找到足够的人去消费这些东西。现在，许多人把消费当做是一种爱国的表现，节约风气一抬头，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就都感到不安。<sup>①</sup> 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就相当于资本主义早期勤俭储蓄的新教伦理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因此说“消费就是爱国”并不夸张。由于残留的清教伦理，许多商人不会鼓励自己的女人和孩子大吃大喝。这些商人会辩解说，我只是鼓励别人的孩子和女人尽情消费。不过别的商人也会鼓励他的孩子和女人。这样说来，是思想还没有完全跟上自身经济消费理论的父辈在诱惑子女骄奢淫逸。他们恐怕也多少知道一点，如果自己的儿女整日只是大吃大喝，在道德感觉上还是不太好吧。

现在为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要做的就是，必须在理论和文化理念上表明，疯狂消费和无止境地享乐是可以被接受的，而且最好是让人感到是愉快的、崇高的。一个经济学家很准确地认识到了这点：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让普通美国人感到即使他是在嬉笑调情、或者是总在花钱而没有存钱、更或者是一年休两次假、买了第二辆或者是第三辆车时，他也是符合道德的。我们现在社会繁荣的一个基本要题是让人们有足够理由享用这种繁荣，并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应该得到支持，我们要表明的是享乐主义生活态度是道德的，而不是非道德的。要允许消费者自由自在地享受其

---

<sup>①</sup> 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87~88页。



生活，要表明他拥有众多的商品这样的行为是对的，这些东西会丰富他的生活，给他带来快乐。这种做法必须要成为每一个广告展示、每一个促销计划的主题之一。<sup>①</sup>

## 二、新教伦理的衰落

在欧美国家，要鼓励全民的大吃大喝，有一个障碍，就是基督教的禁欲伦理，这种禁欲伦理是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和犹太教都坚持的。二十世纪的美国在经济发展与禁欲伦理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却是从美洲版的“新教伦理”自身演化出来的。

美国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创造出如此巨大的财富，马克斯·韦伯在1904年访美时阐释的“新教伦理”功不可没。新教伦理在刚开始的时候并不一定提倡经济建设，反而宣扬禁欲苦行，强调人皆有原罪而应终身忏悔，并严加惩戒奢华懒惰淫荡的风气。十七世纪清教徒来到北美这片新大陆，他们怀着建立体现上帝意志的新世界的宗教愿望，坚信上帝拣选他们并带领他们来到肥沃的新土地，赋予了他们建立由上帝统治的新耶路撒冷的使命，这是清教徒与上帝之间的契约。基督徒具有两种职业：一个是某项具体的工作，另一个则是一项总的职业，即为耶稣基督效劳。前者是上帝对人的特殊感召，即要求每个人都要尽职地完成上帝对每个人的角色要求，比如说木匠、商人，或者妻子、丈夫的角色；后者是上帝对人的普适感召，是上帝对每个人共同的要

---

<sup>①</sup> 转引自金衡山：《厄普代克与当代美国社会——厄普代克十部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求。具体的工作也不仅是简单的谋生手段，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宗教意义，是人在道德上获得完善的一个渠道。工作是为了响应上帝的号召，为救赎做好准备。后来新英格兰地区的移民出于开发新大陆所需的进取和团结的实际需要，将上述教义作了修改。他们将苦行僧式的辛勤劳作和克己赎罪与上帝选民重建理想世界的神圣天职结合了起来，强调通过勤俭致富来达到灵魂拯救。这样，财富就不再是罪恶。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也构成了早期美国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乐观精神和把宗教使命与世俗使命相结合的态度。商人赚到钱后，按照新教的工作伦理，就不会把财富挥霍浪费和用于感官享乐，必然扩大投资，从而产生更大的利润，这和马克思的看法是一致的。这种不断扩大投资的理想状态下的良性循环，极大地促进了早期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过资本主义精神也有贪婪的一面，它表现在挺进新边疆、征服大自然的冒险精神和浮士德式的骚动，基于霍布斯对人的贪得无厌的揭示和承认。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这两种精神是相互制约的。这两种精神也体现在早期的两位著名人物身上：乔纳森·爱德华兹和本杰明·富兰克林。

前者坚持人的原罪，笃信上帝，认为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容，世间万物都是上帝自身的体现。爱德华兹的代表作《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使他名声大噪，成为无可争议的新教领袖。这篇布道词充满了“人是堕落的”加尔文主义思想。富兰克林很讲实用，近乎一种唯利是图的精神。在十八世纪的美国，新教思想虽然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从欧洲传入的启蒙思想开始对正统清教思想产生冲击，年青的美国更需要一种革命的、实干的、奋进的世俗精神来为新兴的国家提供前进的动力。这一时期的思想与文学也就不可避免地打上深深的世俗烙印。而新教主义自身蕴含的开拓进取、乐观向上以及自由主义等世俗精神开始在文学中得到张



显。富兰克林这位新英格兰子民用他的《自传》树立了这一时期文学的典型。作为美国启蒙主义思想的代表，富兰克林抛开传统的神权至上理论，尽力追求物质成功，造福社会和人类。在其代表作《自传》中，富兰克林记载了自己从印刷所的穷学徒工变成富有的企业家和蜚声欧美大陆的科学家、政治家的奋斗过程，而他的成功正是奋发努力的结果。《自传》中的富兰克林，十分强调以正当手段追求个人物质利益。富兰克林的精神是新教主义传统中务实以奉上帝的代表，是十七世纪北美移民开拓精神的继续和“美国梦”的集中体现。富兰克林的作品还表达了对人类最真诚的服务就是对上帝最佳的效劳的理论观点，因而实践的美德精神在他看来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这样说，此时的新教思想已经刻上了物质和功利的痕迹。爱德华兹和富兰克林这两位人物都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精神。

后来，追求自我发展和物质利益的实用主义以及十九世纪初传入美国的浪漫主义则渐渐地偏离了新教思想的传统，人们开始放弃苦行，质疑新教戒律与原罪学说。美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兴盛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内战爆发的时期，该时期的各位作家中最能反映新教思想地位变化的当属爱默生。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摒弃了在十七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加尔文教派的“原罪说”“上帝主权说”以及在十九世纪随着工业化进展而日益增长的拜金主义。超验主义提倡远离物质社会的非人生活，远离现代工具的诱惑，回归自然，获得最高的精神体验。爱默生深信，人是具有神性的，人的发展潜力无可限量，可以通过修行成为完人，推动世界的进步。爱默生虽然强调个人的神性，但其学说却多少保留了新教思想在道德上的严肃认真性，他丝毫不企图证实上帝的存在，他要的是把正统的基督教义对人性的解释抛到一边，确定人性本身的善。后来美国的文化巨匠杜威和惠特曼都致力于把新教的互助、友爱同来世、不朽、天意以及原罪等超

自然观念区分开来，抛弃后者，保留前者。他们不希望美国屈从于任何非人类的权威，即使是上帝也不行。他们要把美国局限于有限的、人的和历史的范围内。

到了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宗教精神已经被经济的贪婪和世界大战冲垮了，经济发展要求摆脱苦行禁欲的束缚，以前的道德束缚以及在早期征服过程中对奢华风气严加压制的传统也一去不复返了，清教徒的酒被掀翻之后，酒香变成了爱默生式的超验主义，酒汁变成了商业主义。丹尼尔·贝尔以美国清教徒传统和小城镇心理为例，说明了它的衰竭：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和节制被世俗法治社会碾去了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超验纽带，最后，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粉碎了道德伦理基础，资本主义也丧失了超验道德观，传统新教徒式的“先劳后享”被引向超支购买、及时行乐、寅吃卯粮的消费心理。与企业资本主义有关的新教伦理和文化渐渐衰落了。以前宗教所起到的作用，现在已由生产、消费和利润来承担，传统的价值观落在了经济发展和技术的后面。新教伦理在美国衰落了，美国的宗教事业落到拨个电话听听祷词的地步。<sup>①</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诞生了以海明威、沃尔夫和菲茨杰拉德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由于他们的行为偏离传统，因而也被称作“反叛的一代”。“迷惘的一代”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垮掉的一代”具有许多精神上的相似点，不过后者更激进、也更疯狂。“迷惘的一代”所反对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温文尔雅以及那些自鸣得意的中产阶级市侩气。这代人的成长正处于新旧时代的交替期，资本主义发展正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阶段。这一

---

<sup>①</sup>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译本序》，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2~14页。



时期的重大事件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激烈动荡的战争年代常常是人们的思想发生激变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结束。这不仅仅是因为维多利亚女皇的谢世，更主要的是以她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伦理、道德观遭到了年青一代的挑战，而且从此再也没有振作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年轻的爱国志士受狂热的爱国主义精神鼓动，先于政府在外国的战旗下参加了战斗。当年轻人真正尝到战争的滋味，领略到了战争的残酷之后方才明白战争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凡是战争就是残酷和嗜血的。更重要的是战争结束时的凡尔赛和会及会后所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战争不过是帝国主义为了重新瓜分世界的一种手段。于是产生了严重的幻灭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多数美国人充分享受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他们带来的物质财富。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和娱乐，国家经济文化生活模式开始发生改变。二十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也是信仰危机加剧的年代。一场社会变革在发生，原有的道德伦理观念以及传统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动摇。昔日人们从神话和幻想中得知生活的意义，到了现在科学发达的时代，神话已经消失，幻想已破灭，现代人已经不能接受那些无法令人相信的东西了。于是，迷惘、失望便成了笼罩整个二十年代的情绪。这一时期，反传统的知识青年大都聚集在纽约等大都市中，在这里他们感受到强烈的现代意识的冲击。他们认定，古老的清教主义是一切旧文化的根源，清教主义就这样成了象征性的替罪羊，代表思想保守、道德伪善、功利主义等诸多方面。虽已进化了的清教主义价值体系在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眼里仍是保守和反动的象征。一时间，传统的清教思想成为众矢之的，成为年轻人泄愤并群起而攻之的靶子。年轻的知识分子们的叛逆最初表现为逃避现实，漠视法律和社会习俗。在禁酒的上个世纪二三十

年代，一些年轻人带着酒瓶四处游荡，生活放荡不羁，放纵情欲，过的是典型的波希米亚式的生活，年轻的知识分子们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很快就成了一种时尚。富有的乡村俱乐部将青年知识分子们的生活方式视为他们行为的标准，此后，那些不那么富有的人也争相仿效。波希米亚生活方式在教会的谴责声中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和认同，也引来了更多人的追随。电影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银幕上将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方式描绘得绘声绘色。商业广告的鼓动与诱惑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分期付款已经开始兴起了。

罗斯福的新政标志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时代的结束，国家逐渐控制了经济的宏观运行，私人垄断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取代。国家不再和以前一样，只是维持市场经济的基本秩序，它现在通过预算、税收、财政补贴等手段操控经济生活。国家职能的扩大也使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并在战后以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形式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艾森豪威尔在离职演说中就提醒美国人民要提防这一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整个美国显示出了这样的特点，植根于资本积累、储蓄、自力更生等基础之上的自由市场及个人竞争的模式已经被建立在分配、消费、科层管理、大型组织之上的模式所取代了，竞争的、企业型的资本主义被合作型的资本主义所替代，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进一步扩大。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了美国企业史上第三次合并高潮，五百家最大的公司吞并了 3404 家小公司。资产在 10 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从 12 个增加到了 27 个。1955 年，美国五十家最大的制造业公司的销售额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1961 年，美国的对外投资比 1938 年增长了 5.5 倍。以美国 187 家制造业跨国公司为例，海外子公司在 1945 年为 615 家，1955 年为 1003 家，1960 年增长到了 1789 家。在六十年代以前，说到跨国公司的扩展，就等同于美国跨国公司的扩展。因为其他国家都受到了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重创，国内经济捉襟见肘，根本没有闲钱来投资海外。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经理和技术专家所控制的大公司比例从1929年的44%上升到了1963年的84.5%，而由个人和家族控制的比例则从55%下降到了15%。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sup>①</sup> 随着这种变化而来的是，产生了大量的如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白领》里面论述的那种没有财产的“新中产阶级”。以往的企业家、实业家和商人这些老中产阶级都是一些拥有财产、自我雇佣的人，他们为自己干活，很有竞争的活力，是典型的勤劳禁欲的新教伦理。而现在生产组织的社会化使绝大部分美国人供职于大公司、大企业、大银行、大农场，严格按公司规矩办事，像计算机程序一样听人指挥，唯唯诺诺、安分守己已成为人的特性，没有了主动性，生活也没有了明确的目标和中心，工作原有的快乐没有了，因为新白领不能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更没有自由来调整工作计划，在工作中成了一个被控制和被操作的人。随着勇猛异常的工业巨头、土地自由投机商和农场主让位于办公室的职员们，自由、自律、自立、创造精神、责任感这些传统优秀品德也随之流失，以前的新教伦理没有了立足的土壤。众多的古老价值和人情味被市场逻辑、工具理性和形形色色的科层组织耗尽了能量。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是个人却只能局限在狭小的工作和生活空间，对周围的世界越来越感到无能为力。这些新式白领们在美国作家斯隆·威尔逊五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穿灰法兰绒西服的人》中，个个穿着灰色的法兰绒西服，机械地扮演着社会强加于他们的角色。

“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杰克·凯鲁亚克满怀希望地开始

---

<sup>①</sup> 刘绪贻主编：《战后美国史——1945—1986》，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0~133页。

了西部之旅，希望能像十九世纪的西部大开发那样找到那种自由自在的精神，也可以逃离东部的城市和工业，还有陈规陋习。但是西部和东部之间的差距已经非常小了，西部之旅的结局是自由自在的美国西部梦的幻灭。二十世纪中叶的旧金山、丹佛早已不是十九世纪拓荒时期的那个淘金之地。正如后来凯鲁亚克本人反思到的：“而今，美国的流浪汉进入一个艰难的流浪时刻，因为越来越多的警察开始监视出现在高速公路、铁路停车场、海滩、河床、堤坝和夜晚藏身的第一千零一个工业洞穴的流浪者……与昔日的淘金热同时代的沙漠老鼠差不多都消失了，他们过去曾心怀希望地行走着，穿越西部城镇去奋斗，那些城镇现在已经太繁华了而不再需要旧式流浪汉。”<sup>①</sup> 条件最艰苦的西部都建设好了，新教的勤俭禁欲就再也没有用武之地，广大的西部，剩下的事情只是消费而不是拓荒。一切都很安稳，都在固定的轨道上运行，不需要冒险，西部也不需要自由的打工者。

莫里斯·迪克斯坦认为，《在路上》如此走红的原因之一是，凯鲁亚克把青年人的躁动不安与关于道路的美国经典神话结合起来。这些流浪汉抛弃了婚姻、家庭和工作，代表了想从家庭生活和职业中逃脱出去的愿望。他们向五十年代的城市郊区和大公司提出了挑战，激烈地反对美国清教徒把工作当做天职的传统，他们不能忍受像父辈一样，一生都干一个工作，也不能忍受这个工作仅仅是为了赚钱，而与兴趣无关。作品中的路代表了开朗奔放、无拘无束的美国精神。美国对于路的传统理解是与北美大陆的广袤、拓荒者不断的迁徙有关的。当初首批殖民者也是横渡大洋，通过西向运动来到新大陆的。在《圣经》和基督教的意向中，西向运动总是具有天启意义的，标志着新生活和新开端。约

---

<sup>①</sup> 杰克·凯鲁亚克：《孤独旅者》，赵元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就描写了一家人从俄克拉荷马州出发，历尽千辛万苦，如同《圣经》记载的那样，穿过沙漠来到绿树成荫、充满希望的福地。凯鲁亚克的东部代表了一种陈腐、僵化的文明，一种全是高楼大厦和钢铁怪物、不自然不清新的室内文明，窒息人的灵魂呼吸，只有西部才是冒险的乐园。<sup>①</sup> 凯鲁亚克继承了以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为代表的深厚的流浪文学传统，向往自由自在地上路，摆脱乏味生活的羁绊。不过，凯鲁亚克的流浪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新教徒的那种“开疆拓土”的精神，他是怀着极度颓废绝望的心情去的，而不是如同过去的拓荒者那样，抱怀着希望与梦想。他去西部所追求的内容也不同于以往的开拓者，垮掉派是专门破坏新教伦理的。这些都说明新教伦理已经衰落了。

二十世纪美国从追求平等的进步主义观念出发，逐步把美国变成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传统工业社会的福利国家，福利国家的概念与美国传统的新教劳动伦理和强烈的个人主义精神都是格格不入的。人民不用再劳动就可以坐享其成，长此以往，只会滋生懒惰，艰苦朴素、自力更生反而受到嘲笑。

以原子能、电子技术、空间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是其迅猛发展的时期，六十年代进入高潮。这次革命率先发生于美国，大为削减了传统工业的优先地位。工人逐渐脱离了工业生产，工业反而成了副业。农业工人、农场主的数量还不到人口的十分之一。演员、好莱坞明星、电视上的滑稽演员倒成了全国的英雄。<sup>②</sup> 工业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移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相当规模的享乐人群，消费偶像必然

---

<sup>①</sup> 萨克文·伯科维奇：《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七卷），孙宏主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177页。

<sup>②</sup> 安德烈·莫鲁瓦：《美国史——从威尔逊到肯尼迪》，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3页。

代替生产偶像。以前的艰苦朴素道德有一种有劲使不出来的感觉，主要是因为国家农业和工业的基础已经很牢靠，大的建设已经基本完成。原有的工具、机械技术、企业管理等的革新已经趋于稳定，生产的持续增长已经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常规轨道，成为社会体制的副产品。农业和老工业远没有新兴的第三产业那么赚钱。国家经济的中心从工业、农业的大规模建设转到了第三产业和消费上来。美国已经富裕得来不再需要再提倡储蓄、延迟享受和节欲的过时要求，人民被引导来全方位地开发自己的享乐欲望，流行的是凯恩斯主义“消费至上”的观念。分期付款制度和信用卡的大行其道说明了消费经济学的出现。1952到1956年，美国消费者债务从274亿美元增长到了425亿美元，分期付款的赊欠增加了63%，购买汽车的款项几乎增加百分之百。高薪的年轻人银行里几乎没有多少积蓄。<sup>①</sup>“我想自己才25岁，多年轻，像一张高额信用卡，一切可以先使用着，帐到时再结。”这是中国“新人类”作家卫慧的豪言，也是那些潇洒的青年人用钱的逻辑，享乐和消费是第一位的，而劳动和工作则没那么重要，这些都是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实际上，要推动商品生产的繁荣，就必须靠故意安排更多的债务来实现，也就要引诱消费者全面开发自己的欲望，因而分期付款很有必要。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往往会给子女造成一种备受宠爱的感觉，不断地给孩子买东西。虽然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都期望子女上进、成功、能够通过自己的奋斗努力达到目的，这曾经是他们教育孩子的法宝。这种宠爱削弱了孩子们的自我锻炼、节约和勤劳的意识，永久的经济安全感使得勤劳失去了不少动机的力量和道德意义。这些孩子六十年代长大后形成一种视金钱如粪土的豪迈观念，把浪费当做是

---

<sup>①</sup>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第三册），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89页。



高雅精神、是不被金钱力量所羁绊的表现。

然而，五十年代的政治家、教师、牧师仍然宣传着在经济贫乏时代才会被民众所接受的新教伦理。一方面是大众传播工具在鼓吹着享乐、消费和奢侈，满足情欲；另一方面学校和教会还死死抓住旧道德不放。这样在经济与道德之间就存在着一条还没有协调的裂缝。一方面，公司要求职员勤恳工作，忠诚守信；另一方面，产品和广告却助长纵欲、享乐的风气。生产领域遵循新教伦理，而消费领域却崇尚享乐主义。在生产与工作的组织中，要求有远见的行为，勤奋与自制，献身于事业和成功；在消费领域，它培养及时行乐的态度，挥霍浪费和炫耀，寻欢作乐。这种脱节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青年身上，学校按照旧的价值体系教育他们，而社会又鼓励他们消费，提供给他们许多诸如摇滚乐唱片等为正统教育所排斥的商品。在反主流文化运动和经济发展的新需要与宗教道德的斗争中，后者自然不是对手，与企业资本主义有关的新教伦理和文化渐渐衰落了。经过六十年代的冲击，七十年代传统的工作伦理就更不受欢迎了，认为工作是为了实现个人愿望的工人数字比六十年代又减少了一半，认为“辛勤劳动总会得到报偿”的人数也大为下降。<sup>①</sup>这样一来，享乐主义就必然会代替先劳后享、保持清醒、注重节俭、顽强勤劳的新教伦理成为社会的主导观念。

从当代工业的技术上说也不需要新教伦理培养出来的适合于工业时代的耐心、细致和兢兢业业的精神。电子时代的大批量复制的到来使得手工制作失去了大部分经济上的意义。以钟表制作为例，以前的挂钟和手表都是发条式的。只有依靠手工劳动精确组装齿轮和零部件，需要反复调试，避免任何差错，才能制造出

---

<sup>①</sup> 兰登·琼斯：《美国坎坷的一代——生育高潮后的美国社会》，贾嵩美、纪胆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34页。

走时准确的高级表。但是电子表这一高科技产品问世后，基本上不需要工匠的介入，即使是闷头睡大觉，机器自动完成的电子表依然走时准确，如果人介入了，反而会干扰机器的正常工作，产生不合格的表。因此，勤劳、耐心的老工匠的传世手艺，都失去了原来的伟大意义。都后现代了，哪有时间和精力来做手工手表？手表价格的区别就不再是走时准确与否的问题，而是要看手表的商品符号价值。简言之，设计新颖、引领时尚的就贵，外观老土的就便宜。钟表变成了时装的一部分，既可起到项链的作用，也可当手镯，为了与每天的衣服相配，还可以把表壳换成任何颜色。总之，这些时尚都不是勤劳和仔细可以解决的。手表的例子，<sup>①</sup> 在各种传统的手工艺领域都有这样的情况，年轻人都不再花十年以上的时间去学习那些老工匠传下的手艺以及伴随着手工艺流传下来的勤劳和兢兢业业的工匠精神，他们需要的是花费也许是用更长的时间去拿一个文凭，然后在办公室操纵文件和电脑。

现在，成功商人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午餐、喝咖啡、开会或者其他与娱乐和交际兼顾的活动中。他们办公的大部分时间也在进行社交活动。而那些传统的老一辈商人如果还坚持原来的经营理念，只知埋头辛勤劳动，用落伍的新教伦理来严格要求自己和他人的工作与生活，看不惯年轻人的轻浮作风和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就容易与他人产生摩擦，整日陷于烦恼之中。哪个人再这样兢兢业业地工作、没头没脑地学习、不顾同伴们的感受而疯狂竞争的话，可能就会受到众人的非议。

但是在五十年代的美国，新教伦理实际上还是存在于中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小城镇，它是前现代的、保守的、禁欲的，五十年

---

<sup>①</sup> 参见千石保：《“认真”的崩溃——新日本人论》，何培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7~159页。



代初兴盛的“麦卡锡主义”就是这股保守思潮的拙劣的代表，而五十年代的“垮掉的一代”和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对传统文化发起的攻势则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东西海岸大城市的、纵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对早期资本主义的、中西部和南部小城镇的、禁欲主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发起的反击。值得注意的是，“麦卡锡主义”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而且还反对同性恋和性解放，充分说明了它的保守派立场。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把美国二十年代的禁酒法案和麦卡锡主义联系在了一起。禁酒时代同时也是种族隔离的时代和实施反淫秽物品法的时代，这些道德法律的核心就是新教伦理。支持禁酒运动的人也会支持麦卡锡主义，而支持禁酒和麦卡锡主义的州往往是共和党占主导地位，反对的则是民主党占上风的州。<sup>①</sup>八十年代里根执政时期的宗教复兴运动和保守主义的回潮也发生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的“落后闭塞”地区——“圣经”地带，“愚昧”的人民紧紧抓住这最后的救命草，妄图回到十九世纪老的秩序，他们害怕混乱无章，对未知事物和新科学信念心存畏惧，畏惧未知之神的天启，拒绝跨进未来空间。

麦卡锡主义的浩大声势不过是代表着保守力量的新教伦理的一次回光返照。经历了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恐怖的两次世界大战的资产阶级父辈始终保持着新教伦理战战兢兢的享乐罪恶感，而他们的孩子们就是要反对这个，六十年代文化革命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让青年生活永远摆脱严厉的宗教道德的束缚。

公允地说，美国人对新教的改造是很成问题的，即把创造世俗财富完全等同于荣耀上帝的手段。这两者之间最多存在微弱的联系。把它们等同起来的后果是，很可能把以前的宗教冲动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而纯粹的宗教热情被挪用，日益枯竭，商

---

<sup>①</sup> 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5、76页。

人们建设美好上帝花园的宗教动机渐渐地就变成了祈求上帝保佑他们多赚钱的迷信行为。以前基督教所提防的金钱魔力也被合法化了，人们深信对金钱的追求是符合神意的，还是成为上帝选民的一个重要条件，这就摧毁了宗教伦理对盈利的蔑视态度。美国人对新教伦理的改造形成了美国人不断竞争、不断进取的精神，而这种进取精神在根本上是没有文化、缺乏反思、没有崇高目标和极度空虚的。这种转换也促使了美国人不择手段地追求经济增长，开拓边疆。经济繁荣有它不受制于宗教的独特规律，如果发展经济与荣耀上帝成正比，只会加速现代经济按照自身规律来独立发展，早日摆脱宗教的束缚。二十世纪美国进入发达资本主义阶段，新教伦理的勤俭节约这种只适合于物质贫乏时期的伦理就成为了经济的绊脚石。以经济发展来评论宗教虔诚的看法非常荒谬。美国的新教徒大搞化学工业，岂不是污染了上帝的河流和土地？《花花公子》可以说就是发展经济最成功的范例，能把它说成是荣耀上帝吗？它和《阁楼》竞争市场，就是比哪个更色情，暴露得更多，拍出了更多的下流表情和动作，哪个对审查制度的挑战更大胆。这可是完全符合市场规律的，事实也是，哪个暴露得多，哪个就赚的钱就更多。短短十年时间，创始人赫夫纳就拥有了包括花花公子出版社、印刷厂、购物中心、俱乐部的“花花公子帝国”。在芝加哥，花花公子大厦高达37层，令旁边的教堂相形见绌。按照美国版的新教伦理，岂不是花花公子更加荣耀上帝？

传统社会中宗教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把人对暴死的恐惧引向祈祷，引向礼拜仪式，引向圣礼，引向教堂，引向宗教艺术。传统宗教衰落以后，人类从此处于远离基督时代的对暴死的恐惧之中，而这种恐惧被霍布斯称为是人世间最大的恐惧。从此，非理性的狂热暴力和残酷必将大行其道。因为宗教不再能够转移由狂热的恐惧而产生的政治行为与未经反思的群众情绪，人们只能把



这种狂热的情绪投入到政治实践或者是无节制的纵欲狂欢中。六十年代最流行的暴力破坏情绪、致幻剂、无节制的性、疯狂的摇滚乐、禅宗和巫术，都和传统基督教的衰落有着重要而直接的关系。

《独立宣言》是美国除新教伦理之外的另一重要传统。然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建国时期的“独立宣言”传统受到了广泛的攻击，卡尔·贝克尔于1922年写成的《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以历史主义的观点把《独立宣言》的指导思想理解成十八世纪的神话，并且以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理解天赋权利。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把历史看做是现代进步的障碍。查尔斯·比尔德在1913年出版的《宪法的经济注释》以马克思式的观点来分析开国元勋的动机，认为他们并无公益精神，仅是关心个人财产。南方的历史学家和作家，认为北方抱有卑劣动机，并不是真心为了解放黑奴。美国精神的口碑越来越差。新教伦理瓦解之后，美国的传统精神主要就剩下严重变味的启蒙主义和边疆的开拓精神了，主流是建立在自由和平等基础之上的个人主义，边疆的开拓精神演化成了“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的流浪道德，后来这两种精神也合流了。1966年10月6日，地下刊物《神谕》杂志在金门公园附近组织了一次名为“爱之露天集会”的活动。宣读了《独立宣言预言书》的声明：“我们相信有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我们某些不可让步的权利，其中包括：身体的自由、快乐的追求以及意识的扩展……”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独立宣言》就真的应该这样理解了。

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下，《独立宣言》的消极方面飞快地膨胀起来，并且形成一种只顾满足低级趣味的享乐主义。而这种享乐主义在吸毒和性解放的诱惑下，很快就成为文化上的虚无主义，这个国家最起码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也被冲垮。六七十年代的情形就是这样。军队吸毒，嫖妓成风，战斗力很差，国内流行着

换妻和群居，未婚母亲泛滥，学校因大学生动乱无法正常上课，到处都是黑人的骚乱，暴乱的黑人聚居区如果再加上些稻田，就很像是越南战场了。而这个时期正是美国失去宗教束缚的阶段。如果不是持续的冷战和越战还需要继续提高警惕和浴血奋战的话，这个国家肯定会完全垮掉。如果全球都是民主国家，美国找不到敌人，对它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对于一般的美国人来说，没有了冷战，做一个美国人还有什么意义？冷战是他们早上不睡懒觉的原因。已经习惯了冷战，长期以冷战来界定国家和个人身份的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会很无聊，就像厄普代克的小说《兔子富了》和《兔子歇了》里面的“兔子”一样，很富裕，也很空虚，沉溺于垃圾食品和无休止的性享乐之中。

在六十年代后期以前，日本的国家目标是超英赶美，那时的伦理是努力、忍耐和自我牺牲，劳动在日本一直都被看做是一种修行，用于磨炼自我意志。传统的日本人认为工作场所是心灵的归巢，是修炼的场地，工作中自有宝贵的人生价值。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就是为了工作，因此需要克制自我，全力奉献。这种工作精神是奋斗型的，支撑这种工作精神的是启蒙型、教育型、锤炼型的文化。这是无神的新教工作伦理的版本。正是由于这种精神的鼓舞，日本人亡命地发展经济，日本的经济才能在战后迅速腾飞。

但是经济发达后，这些思想就没有用了。日本迅速地转变为了消费王国，青年是最先适应这种变化的群体。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次奥运会可以说是日本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象征。那时正是披头士的火红岁月，日本的男孩也开始留披头士那样的长头发，取代了以往象征监狱、军队和运动的坚韧精神的短发，那是属于工业时代的发型。美国五十年代主流男青年也是留的平头，而六十年代是摇滚时代，男孩留长发象征着自由和放荡不羁。仿佛是自然的亚当式的男子和多

才多艺的男子身上的那种女性的温柔再现于长发和艳装之中。拒斥男性暴力的代表——士兵式的短平头，反对战争，抗拒关于整洁、合体的社会规范的说教，以外表上的一种阴性（女性）装扮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就像佩花嬉皮士的“权力归花儿运动”，它所指的是母性权威、女性、地球母亲、脆弱本身、地球的脆弱以及永恒的力量，一种代表绿色、成长和生态的力量。以东京奥运会为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受重视的体育运动开始由考验毅力的项目转为休闲趣味型的项目，由田径、游泳、举重转为网球、高尔夫球。那些体现毅力的项目被讥笑为“饥饿时期的体育”“枯燥无味的军国主义竞技”。由市川昆导演的奥运官方影片《东京奥运会》对铅球、步枪射击和竞走运动员的刻画简直是讽刺。这部影片没有体现出传统的奥运精神，整个风格很滑稽，充满后现代的视觉效果。日本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要晚于美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而日本则面临着战后重建的艰巨任务，直到六七十年代，日本才迎来社会转型的成熟时机。因而日本的青年文化要来得稍微晚些。1967年，日本终于赶上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步伐，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嬉皮士运动。仅在东京的原宿和御幸街一带，就常有数千名嬉皮士活动，他们又被称为“狂人”。1967—1968年间，大麻、致幻剂LSD也开始在日本流行开来。

### 三、中国青年劳动伦理的转变

前面已经谈过日本的传统劳动精神被嬉皮士的嬉玩戏耍所替代，中国是否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呢？和美国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一样，中国青年也处于一个经济空前增长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他们的父母都吃了许多苦，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父母，他们的头脑里还有勤俭节约的意识。经济的繁荣也是使中国的垮掉派类

似于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九十年代的经济是自1949年以来最发达的，不发达地区（比如说农村和城市贫民家庭）的青少年即使是垮掉，所表现出来的形式也和有钱的“垮掉派”迥然不同，不会像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大学生。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劳动的动机已经不再是“左”倾的革命理想，而是要根据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来决定的。以前的革命劳动伦理和新教劳动伦理有共同之处，都提倡先劳后享，勤俭禁欲，为了将来的宏伟目标而牺牲此刻的享乐，而现在再也没有人是单纯出于“超英赶美”而劳动。因为中国激发劳动的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老一辈面临这样的情况有些失落，就像是美国和日本的老一辈那样。“80后”这一批人在长大成人之后，大多不会为纯粹的理想而劳动的。他们都习惯于衡量劳动的经济价值，如果不划算他们就绝不会去做。而他们的父母在以前是不会考虑劳动的经济价值的。

八十年代前半期出生的孩子成天为生存而担忧，他们中间还有大部分没有摆脱“铁饭碗”的观念，一门心思想找一个“风不打头雨不打脸”的工作，图的就是一个稳定。他们想得更多的还是买房子和结婚、生孩子，而这三者又是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房价太高，甚至比欧美国家都还要高，就算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要买一套房子都很困难，再加上国家经济鼓励消费，他们纷纷以“月供”的方式买房，情况常常是这样，有着固定工作的“80后”夫妻要还一辈子才能把房子的欠款还清。而他们一般都需要父母含辛茹苦存下的钱给他们付个“首付”。农村的“80后”谁也不想再在农村，纷纷跑进城，也要找工作和买房子，就算买不到房子他们也不会回去，在大城市，一般的打工仔不管怎么辛勤劳动都是一辈子都买不起房子的。这种情况就使得“80后”没有美国五十年代的新中产阶级那么惬意，在欢乐中仍带有些苦涩。在政治上，“80后”也是保守和沉闷的，就像美国的五十年



代的新中产阶级一样，他们也是一些公务员、小教师和公司职员。而且，他们找到钱之后都是出于完全的个人目的而消费，基本上倾向于物质生活。在他们儿时学校灌输给他们的理想和他们长大后面面对的现实相差太远，小学时老师教导他们要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当科学家和作家，在作文里只有这样写才能得到高分。这是他们儿时的梦想，可是长大以后，社会现实使他们再也不谈理想。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城市高校学生的四大消费热点是：电脑、手机、考证和旅游。就消费水平而言，以手机为例，高校学生手机消费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追求名牌。在校园内出现最多的手机品牌是：诺基亚、阿尔卡特、摩托罗拉。许多“80后”的大学生大学四年就为了考证，考证是一个既辛苦又实用的投资，很能说明“80后”大学生的处境，目标完全是经济上的，过程却是辛苦的。他们洒了许多汗水才进入大学，但一进入大学就似乎没有了除找工作和谈恋爱之外的其他目标，社会上无处不弥漫着享乐的氛围。他们处于勤劳禁欲与享乐消费两种思想激烈斗争的社会转型期。“80后”的矛盾在于，一方面他们要面临极大的竞争和生活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要承受社会上的享乐主义主流。卡拉OK、桑拿、足浴、推拿、按摩、一夜情，都是伴随着“80后”的成长先后兴起的。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在“80后”的小时候，经济并不宽裕，从小伴随着残酷的考试，生下来就要与人竞争，艰苦朴素的道理自然知道，他们还没有“90后”那样消费起来没心没肝。他们是很没有理想的，“考证”和“考研”也许能够把两种情况结合起来。中国日渐进入学历社会，要找到公职，必将通过艰苦的奋斗才能够获得较高的文凭。然而学生们只想以尽可能少的努力获得尽可能多的享乐。

渐渐地，大学生连证也难得去考了。及时享乐很盛行，“前半学期下馆子后半学期吃泡面”。开学刚过一个月，有的学生已

经把从家里带来的一学期的生活费花掉了，有的甚至必须提前做好“借款计划”。也有把四年的学费先存起来，不缴给学校，用这笔钱来做生意的，毕业时如果拿得到毕业证就把钱交给学校，否则就继续做生意。“80后”已经比上一代人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在偷偷地、或者是公开地在享受性的禁果。他们挑大学大多不会选农、林、矿打头的，专业要财、经、法，找工作先看薪水而不考虑自己的爱好与兴趣。

在很多大学生的词典里，“university”（大学）的谐音是“由你玩四年”，很多大学校园里流行着这样一首打油诗：“大学生活整四年，吃喝嫖赌都干全，临别留下一句话，人不风光枉少年。”而大学生的负面报道几乎是铺天盖地。“南京师大女生陪舞事件”“北京交大女研究生性贿赂事件”以及近些年来有关女大学生卖淫的爆炸性新闻不绝于耳，还有类似“杭州女大学生卖淫案调查：卖身钱多被挥霍”“暗访调查重庆女大学生的性交易”“武汉高校女大学生卖淫实录”等报道，不胜枚举。大家都可以看到，每到周末，很多高校的门口排满了各种高档小汽车，稍有些姿色的女生大摇大摆地钻进里面。2006年3月30日，新华网以《女大学生网上“待售” 一夜千元卖掉啥》为题报道了浙江省杭州市公安机关破获的一起通过网络组织介绍卖淫的特大犯罪团伙的事件。被抓的卖淫女中有半数竟然是在校的女大学生。其中的组织者是大学生，参与者也是大学生。这些女大学生在被审讯时十分坦然，在她们眼中没有钱买高档服装和化妆品似乎更令她们难堪。这些女大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都不差，基本生活费、学费都不缺，她们是为了支持自己的高消费才去从事性交易的。现在工作不好找，一些女大学生整天往婚介所里跑，也在大学生征婚网和其他网站上发帖为自己征婚。多数人开出的征婚条件是“年龄不限，经济条件好”。“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嫁得好还得要趁早”“找老公比找工作重要”的观念几乎成了不容辩驳的“金



玉良言”。在大学生征婚网上看到，在注册要求栏里很多都注明了男士要有10万以上资产或年薪5万以上，要么是公务员，要么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大学生中，尚未毕业就征婚的行为被戏称为“曲线就业”，“四有”新人（即有钱、有房、有车、有型）成为女大学生征婚的首要条件。“四有”青年含义的变化已经是天翻地覆了，“80后”从小所受的教育每天灌输给他们是成为“有理想、有道德”等优良品质的青年。

2006年被称之为大学生“自杀高发年”。据统计，自杀，已取代突发疾病和交通意外，成为大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大原因。大学生暴力案件也很猖獗，诸如马加爵杀人碎尸案以及清华大学学生硫酸伤熊案等，都相当令人震惊。2007年2月5日央视国际以《好赌大学生抢耕牛 推老人下井》为题报道了一名就读于全国重点大学的大三学生因欠下赌债，伙同他人将放牛老翁推下井使其溺水身亡，然后牵着耕牛销赃的新闻。大学生、甚至中学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出名，据悉，2005年的“超女”选秀，仅成都赛区的报名人数就超过了1万人。当地媒体报道，2005年5月14日报名首日，成都赛区报名点排起了1公里的长队，造成周围各路段交通堵塞。几天后，《成都超级女声选秀，万人逃学报名》的新闻报道了这一盛况。许多学生都染上了严重的网瘾，以“CS”（“反恐精英”的简称）“传奇”“魔兽”为代表的网络游戏在大学校园中十分盛行。一篇让人哭笑不得的报道《大学生“下榻”网吧半年 称自己只为“杀魔”》，于2005年12月9日讲述了一位被称作“游戏狂人”大学生连续六个月坐守同一家网吧，吃在里面，睡在里面，几个月不洗澡，几个月不换衣服的故事。“盘踞”在网吧半年多，脸色苍白，头发裹着灰疯长着，脸颊上也长出了胡子，衣服上面的污垢可量出厚度，手指细如鸡爪，下半身裹条毛毯日夜不离身。据说，他的目标只是为了杀死网络游戏中的“魔鬼”。许多大学生虽然没有他那么夸张，但也

很类似。当下，很多人都称大学已经进入“逃课时代”。2005年底，外经贸大学公布的一项对550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72.6%的学生认为“逃掉没有兴趣的课，去参加有兴味的学生活动或讲座”不算违纪行为。在许多大学中，很多学生仅仅因为有点饿就会不上最后一节课，跑去食堂打饭。老师点名时，一个同学可能顶替十多个同学答到。鲁迅读书时在自己的课桌上刻下“早”字。而今，课桌上全是性文字、打油诗、仿诗词、歌词、对白、影视台词、人名、名言警句、各类公式、定律、演算草稿、考试答案、英语单词、交友信息、广告词、自我介绍、黄色小段子、爱情表白与郁积、人生感悟、讽古论今等内容。

大学生是这样，职高生和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就更加自由和享受，他们的性开放与暴力倾向比大学生更严重。“90后”更精明，更会娱乐和消费，经济条件好的你拿钱给他，他也不想劳动，而选择整天打游戏。“省吃俭用”“节衣缩食”这种传统的消费观念在他们那里已成为历史。“享受生活”成为指导消费的全新观念。2008年是中国读书读得早的“90后”进入大学的第一年，在大学的报名现场，她们穿着超短裙和露背装，由父母的私家车送去，以至于许多学校的交通都堵塞了。电子四大件（手机、电脑、MP4、数码相机）是“90后”入学的典型标志，特别是电脑，几乎人手一部。这一代从小“百事可乐”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他们喜欢看日本漫画与韩国肥皂剧，崇拜周杰伦、陈冠希和超女。他们对于“朝九晚五”持极端的鄙视态度，他们坚信：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照样可以宝马香车！瞧不起“80后”的“能加班也是福气啊，多少同龄人待业在家，比我们更惨”的可怜心态。网上频现“90后”炫富女的视频，攻击“80后”：“不管你们怎么说、怎么想、怎么骂，20年后你们就会明白的。请问你们，现在还天天上班等着每个月发那点工资养家所谓的白领们：你有资格吗？你银行卡上的钱还没我手上的多吧？你们慢慢



奋斗吧！你们每天6点起床、手里拿着俩韭菜大饼、挤着人山人海的公交车、忍受着老板的毒骂和虚伪的同事的笑声、生一个比你还自私的小孩，你们一辈子这样慢慢地过下去吧！”文字倒是很痛快，不过有违勤俭节约的劳动伦理。其实“90后”比“80后”更是“啃老族”，而他们的父母往往是做大生意的或者是公共管理者。许多“80后”即使是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早起坐公交车，没有骨气地活，也还是买不起房子，因此只得当“啃老族”，自己生的孩子让父母养，每天到父母家里去混饭，让父母出钱给自己办豪华婚礼。“90后”的“炫富女”则直接就从父母和亲戚那里得到巨额的零花钱，拿到小汽车。

占据社会显赫地位的中年父母们，其中的大多数并不真正懂得爱子女应该主要是精神上的给予，他们也是手上刚刚阔起来的，倾向于在物质上无限度地满足孩子。现在中国的部分青年的消费水平可能会让美国的玩家也大吃一惊。

翻开卫慧的《上海宝贝》，故事中的倪可和她的朋友们去最豪华的大酒店进餐，到高级百货公司购物，抽“七星”香烟，喝“苏格兰威士忌酒”，喷的是“CK香水”，穿“Chanel衣裙”，系“ZOI牌领带”。倪可的男朋友天天的母亲随时从西班牙给他汇钱来。《愈夜愈美丽》记录了一个女孩一天的生活：清晨6点献上每分钟12.4元人民币的电话给德国的情人，中午醒来后享受浴缸的舒适和电子音乐的轰鸣，下午走在美丽的淮海路上，接着在她的崇拜者Luke的带领下来到一家模仿三十年代格调的咖啡馆，随后是去溜冰，直到黄昏晚餐后在沙发上昏睡过去。醒来后即被电话拉到GROOVE的Party，纵情狂舞到凌晨一点。棉棉的《糖》中的主人公傍晚购物，夜间喝酒、吸毒，用完了钱就向在日本的母亲要。《盐酸情人》里的“我”、奇异果、苹果也总是在喝咖啡，在酒店喝酒，吃湖南菜，去97俱乐部消耗精力。朱文颖的“高跟鞋”本身已经成为欲望的象征，高跟鞋是品味、身

份与经济实力的隐喻。她们沉浸在迪厅、咖啡屋、派对、摇滚乐、西餐厅、高级商场、酒吧、性、吸毒和自杀中。<sup>①</sup>这还是“70后”的作家，不知道以后“90后”的孩子会怎么玩。当然，这些“70后”的美女作家是走在前面的领路者，具有领先于时代的天赋。

---

<sup>①</sup> 冯芬：《精神生态视域下的“70年后”女性写作》，《宜宾学院学报》2007年11期，第28页。



## 第三章 从“垮掉的一代”到嬉皮士

五十年代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艾森豪威尔总统声称把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放在首位，要实现“一种祥和安宁和相互信任的氛围”。实际上他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标新立异的年青人和一些立场偏左的知识分子就不满意了，诺曼·梅勒抱怨五十年代是随大流和消沉的时代，在美国的繁荣之下，在郊区居民的洋洋得意之中，似乎有一股恐惧的臭气从美国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中冒出来。到处是一种随波逐流带来的缓慢死亡，使一切创造和反叛的才能窒息。五十年代前期盛行的是：黑名单和工会清洗，冷战，恫吓持不同政见者和囚禁涉嫌的共产党人，杜勒斯的武力威慑和大规模报复政策，对核毁灭兴致勃勃地做准备和防备工作。所以，在五十年代初，年轻人大都明哲保身，少说为妙。他们愿意在衣着、语言、信仰、择友、头发长度以及思想方面服从社会的要求。自四十年代起，将人文科学放在首位的热情开始衰退，热门的是工商管理，到1955年，主修工商业的学生成了学生中最大的团体，职业培训也很火爆。人们对大规模组织持信任态度，相信大企业要比小企业更负责任、更开明、更可能照顾公众利益。大企业不易破产，生活更有保障。小企业主则更有可能思想狭隘、贪得无厌，西门·马丁·李普赛特这样称赞大规模组织，“大规模机构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提供新的源源不断的自由和更多的创新机会是非常重要的。”而C·赖特·米尔斯和怀特的对

大规模组织的批判尚不是主流。<sup>①</sup> 五十年代的电视节目中充斥着以中产阶级家庭为背景的肥皂剧，如《老爸最理解》和《勤快的人》等，这些连续剧对全国的轻松享乐风气起到了一种提倡认同作用，1950年，B·克鲁克的《烹调图说》被列为畅销书排行榜的首位。1955年由玛丽莲·梦露主演的影片《七年之痒》成了五十年代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一种写照，她的个人形象成为美国梦的象征。梦露出现在旷日持久的战争结束、物质开始繁荣的时代转折点上，经过了长期惨烈战争的人们需要一个代表他们最直接的欲望的女神。五十年代的主流是唯恐与众不同，这种恐慌是与麦卡锡造成的政治恐惧融合在一起的，而享乐主义是主流。“沉默的一代”已经表现为理想的失落和对美国传统的背离，他们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他们的享乐主义和反理智主义表现在他们已抛弃了清教徒的光荣传统。他们与后来的激进主义的共同因素就是反理智，所针对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理性，而是理性本身。

并且，五十年代的人们已经处在性革命的前夜了，金赛于1948年出版了《男性的性行为》，1953年又出版了《女性的性行为》，第一次系统地对美国人的性行为进行了调查。美国男子中86%有婚前性行为，70%嫖过妓，40%有婚外性行为。37%的男人至少有一次同性恋行为，十个男人九个手淫。女性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50%的妇女、60%的女大学生有婚前性行为，25%的已婚妇女热衷于婚外情，一半以上妇女手淫。<sup>②</sup> 不过，五十年代的人对于性却是羞于启齿的，不会像六十年代的人那么明目张胆和理直气壮。这一方面可以解释为五十年代的人很虚伪，另一方

---

<sup>①</sup> 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周端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页。

<sup>②</sup> 罗素·米勒：《男人王国的兴衰——记世界第一色情杂志〈花花公子〉内幕》，海天译，沈阳：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面也可以解释为新教伦理和旧的道德规范仍然羁绊着人们的思想意识，人们还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样的行为可能是不好的，是和传统的宗教伦理相冲突的。“虚伪”有时还代表着一种理想主义。金赛的数据难免会给人以这样的看法，美国的性都解放到这样的程度了，还能怎么解放？当时的舆论惊呼：“看了它，你认为人还有什么秘密，还有什么可羞耻之事吗？”<sup>①</sup> 性革命的下一个阶段将会不断地挑战禁忌，穷尽所有的可能，打破宗教传统对性的任何限制以及消灭人们固有的羞耻感。六十年代的青年和他们父母之间在性的变革上可称为是翻天覆地的巨变，在两代人之间性伦理发生了如此巨变，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现在回顾六七十年代的性革命，可以明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场巨变的方向就是挑战任何禁忌和任何羞耻感，这根本是直奔宗教伦理而去的。这场性革命在四五十年代就已经有了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再往后走就是大规模的换妻、群交、虐恋这些无法再继续走下去的性行为了。六七十年代的性解放恰恰就是往这个方向走的。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在公共场合中性表达的公开程度上，六十年代，“真诚”（也可以说是缺乏羞耻感）似乎变成了最高的价值标准，任何性问题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讨论。战后出生的“电视一代”长大之后，深信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示的，也没有什么是令人敬畏的，性成了娱乐界和商业界的主要运行手段，从一个隐秘深奥的迷变成了一个人人谈论的产品。

五十年代的许多“老左派”不是受到压制而噤若寒蝉就是自己从内心改变了原来的信念。五十年代东欧的大清洗运动和柏林的封锁，尤其是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那些一度向往苏联并信奉过马克思主义的“老左派”知识

---

<sup>①</sup> 马休斯编译：《X级革命——美国“性解放”浪潮内幕纪实》，86，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

分子，在认为自己受到欺骗之后走上了反苏反共的道路。这些知识分子在比较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斯大林的恐怖政策后，就认为资本主义的毛病是可以忍受的了。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哲学家西德尼·胡克和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是其典型代表。最初由共产党控制的文化季刊《党派评论》，逐渐转变为了反共刊物。胡克、丹尼尔·贝尔、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文艺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等骨干成员于1950年在西柏林成立了争取文化自由大会，这是一个反共知识分子的国际组织。<sup>①</sup>英国的波普尔和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也开始激烈地批判共产主义，一时间，欧美思想界掀起了反共反苏的浪潮。五十年代，被丹尼尔·贝尔看做是“意识形态终结的时代”，其中一层意思就是说，他经过深思熟虑，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糟糕，这个问题就不必要再讨论了。不可否认的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和激进的政治革命已经不能在西方知识分子中引起普遍的热情。贝尔没有料到的是，如果大家在政治上稳定了下来，就会把批判的锋芒转向文化层面，搞文化革命。“老左派”衰落了，“新左派”又成长起来了。

麦卡锡主义的高峰并没有延续多久，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和斯大林的去世，美国人对红色政权再没有那么提心吊胆以至于听信麦卡锡的无中生有了，不可一世的麦卡锡也在1954年的12月受到了参议院的广泛谴责。阿瑟·米勒的《炼狱》（1953）和唐·西格尔的《绑架者的入侵》（1956）标志着自由派开始向麦卡锡主义反击。1956年随着“麦卡锡主义”的终结，消费享乐主义顺应时代潮流，成为都市、特别是东部海岸大城市的文化主流。1957年麦卡锡狼狈地死于酒精中毒。艾森豪威尔与斯大林

---

<sup>①</sup> 刘绪贻：《战后美国史——1945—1986》，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141页。



接班人赫鲁晓夫的会晤，表明剑拔弩张的气氛有了一点缓和。到了1960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不再承认冷战所依据的种种假设。在六十年代初期，“怕被指责为激进分子、左派分子、颠覆分子的恐怖心理似乎已经消失殆尽”。<sup>①</sup>在局势松动之后，社会的异议分子开始蠢蠢欲动，“垮掉的一代”这股地下文化潮流将率先在薄弱的文化领域冲开出口。

## 一、政治风气的转变

美国六十年代的联邦最高法院也和大学校园、街道一样充满了自由的精神，许多限制言论自由和有种族歧视倾向的立法都被法官们裁定为违宪。那时的最高法院是由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和大法官威廉·布伦南控制的，被称为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最自由、最激进的“沃伦法庭”。他们对宪法权利法案进行了自由主义的解释，常以“违反宪法精神”驳回地方检察官的起诉。街道等公共场所作为公共论坛的权利被扩大为作为民权抗议示威地点的权利；对公共官员和社会著名人物的批评不再属于诽谤；以修正案第一条保障的“言论自由”使淫秽类的和伤风败俗的书刊得到了更多的出版机会，以同样的名义使焚烧国旗者、发表煽动性演讲的人免于司法追究。<sup>②</sup>对于美国这样的法治国家，时代的变革在和平时期就需要法院精神首先发生变化，否则就不能启动其他方面从保守到激进的变革。无论是言论自由，还是性解放、女权运动、民权运动，没有法院的支持，它们的声势都不会发展到像六十年代那么大。

---

<sup>①</sup>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下），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0页。

<sup>②</sup> 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74、378页。

系统法学家、纽约大学法学教授罗纳德·德沃金发展出了一套很有影响力的系统法学。这套法学认为，在解释宪法时，不应过多拘泥于宪法制定者的想法，而应该启发现代的美国人按照新时代的精神重新去理解这些法则。<sup>①</sup> 因为时代不同了，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就会产生变化。这也是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在法学领域的运用，这种思维的默认前提是，现代人比先辈更先进，不用理会他们过时的意思，一切法律应为我所用。德沃金的系统法学暗示，宪法完全是按照法官们的意愿或偏见来行事的，根本就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指导他的法学解释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年龄段的精神共享的道德观”，这个道德观具体地说就是完美地体现在约翰·罗尔斯的“穷人”理论中，即要用穷人的地位来定义法律，而无需过多考虑其他因素。这样，把穷人看做是社会道德的标准和被有产阶级压迫的受害者的想法就在最高法院登堂入室，法官们把“文化革命”和受害者理论与宪法结合在了一起。

1957年针对金斯伯格的《嚎叫》的诉讼，金斯伯格和城市之光书店的劳伦斯·弗林盖蒂最终胜诉。从法官克莱顿·W·霍思的宣判决书就可以看出，当时法院的左倾思想有多么严重！

我不相信《嚎叫》丝毫没有社会救赎的重要性，《嚎叫》的第一部分展示了一个噩梦般的世界；第二部分对现代社会摧毁人性中最好品质的种种因素进行了控诉。在作者看来，这些因素最主要的是物质主义、循规蹈矩和导致战争的机器化运动；第三部分描写了一个个体的形象，他是作者所感受到的社会环境的具体体现……诗的最后呼吁人们去过一种神圣的生活……至于诗

---

<sup>①</sup> 麦隆·马格尼特：《梦想与梦魇——六十年代给下层阶级留下的遗产》，北京：天津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页。



中所被指控的“淫秽”内容，最好记住这样的一句格言，“思想邪恶者最邪恶”。<sup>①</sup>

这份用“新左派”的口吻写成的判决书简直不像是出自担任公共职能的法官之手，金斯伯格也被吹捧成了文化英雄。法官的判决书就是《嚎叫》最好的广告，到审判结束的时候，《嚎叫》就已经卖了一万多册。1957年《常青评论》也出版了“旧金山”专号，“垮掉的一代”的声望达到了鼎盛。五十年代末，垮掉派的文学已经在美国文化生活中盛行了。多年积压的小说稿本变成了出版商和杂志编辑部的抢手货。

一方面是法官们的自由主义左派政策，另一方面的律师们作为六十年代精神的代表。六十年代最著名的女律师之一费依·施坦德常常能够钻法律的漏眼而使犯下重罪的黑人无罪释放。她遵照“新左派”流行的看法，不分好人和坏人，只区分黑人和白人，不管黑人犯下怎样骇人听闻的罪行，她都说这是神圣的反抗。而监狱仅仅是作为国家暴力的象征和统治阶级进行种族和阶级压迫的工具。她模糊了监狱的社会公共职能和阶级职能，或者说，她天真地认为，只要把罪犯都释放出来，他们就会自动变得善良。她组织委员会，从那些同情黑人的中产阶级那里募得了大量资金，她自己也成为监狱黑帮老大的情妇。

她塑造的无辜黑人圣徒乔治·杰克逊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三次犯重罪，在狱中组织了一个名为“狼帮”的黑帮，经营着监狱的赌博，曾为了十元赌资试图割断黑人囚徒的咽喉，打算出狱后给自己的家乡——芝加哥的水系投毒。<sup>②</sup>更具有讽刺意味的

---

<sup>①</sup> 转引自张国庆《“垮掉的一代”与中国当代文学》，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sup>②</sup> 彼得·科利尔、戴维·霍洛维茨：《破坏性的一代——对六十年代的再思考》，北京：文津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是，费依·施坦德后来由于不能完全跟上黑人们的激进措施，她的生命也时常处于威胁中。由于对黑人男性暴力的极端恐惧，费依转向女权主义，变成了同性恋。试想，连费依自己都害怕的“黑豹党”暴徒，怎么能够放心地把他们无罪释放到社会上去？后来她被一个黑人连开了五枪打成永久性残废，最后自杀身亡。这种疯狂和滑稽在六十年代比比皆是。臭名昭著的暴力分子、黑豹党的创始人休伊·牛顿和博比·西尔竟然从肯尼迪开启的改善穷人和黑人的福利政策那里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和捐款。

美国最高法院在1954年作出了反对种族隔离的学校制度的裁决。此项判决的结果是，平等观念一跃成为判断社会变革的高于一切的价值标准。从此以后，黑人的需求取得了合法地位，辨别是非的主动权转移到了黑人手中。这也相当于最高法院承认了历史上对黑人的不公平待遇。须知，在一个国家公开承认了道德过失以后，再对那些曾受过害的人们说“不”是很困难的。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城，年轻牧师马丁·路德·金组织了一次抵制公共汽车的运动，把反种族隔离的努力扩大到了教育领域之外，其直接行动的战术在六十年代各种花样翻新的戏剧性运动中大放异彩。

1960年，约翰·F·肯尼迪充分利用五十年代后期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形成了一场政治运动。时代风格的变换在民主党的肯尼迪接替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出任总统这一象征性转变上充分体现了出来。作为对苏联在航天技术方面挑衅的回应，他在1961年5月公布了阿波罗登月计划，旨在六十年代结束前发射一艘载人飞船登月。这个计划体现了六十年代的幻想特点：轻视资金，认为资源是无限的。他强调年轻有为、精力充沛、力图变革，强调给予美国黑人的公正的社会待遇，并声称接力棒已经交到了年轻人的手中。这位年轻的总统似乎并不敌视由白兰度、梅勒、詹姆斯·迪安和凯鲁亚克等创造的文化期望，这些期望充满



了愤怒，在性方面则是蠢蠢欲动的。享乐主义思潮在肯尼迪短暂的总统生涯中达到了高潮。白宫的盛宴和舞会从未间断，总统身着泳装出现在加利福尼亚海滨，被美女们包围着，用璀璨迷人的灯光装饰白宫。他和两位好莱坞明星以及白宮女秘书的风流韵事家喻户晓，第一夫人杰奎琳引领服饰时尚，是美国年轻人性幻想的对象。

肯尼迪风格使政府部门和公共义务对年轻人特别具有吸引力，他们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民权运动、和平队和各种各样的公众评论。这届总统收到的年轻人的来信，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总统。据 SDS（“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的早期成员罗伯特·格林布拉特回忆：“促进成立这个组织的唯一最大的影响来自约翰·肯尼迪。”<sup>①</sup> 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为肯尼迪的总统就职演说谱写的诗篇也洋溢着这种生机勃勃的精神：

我们大家心里私下都有预感：  
又是一个光荣的奥古斯都时代；  
力量和自豪将构成权能，  
有为青年的热诚甘受考验。<sup>②</sup>

1960年7月15日，肯尼迪在洛杉矶发表演讲，热情洋溢地号召青年们去开拓新边疆：

这就是60年代的新边疆，它有未知的机遇和危险，  
以及未实现的希望和威胁，我要告诉你们，新边疆就在

---

<sup>①</sup> 保罗·约翰逊：《现代——从1919到2000的世界》（下），李建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65页。

<sup>②</sup> 转引自戴维·伯纳：《约翰·F·肯尼迪和新一代》，立义、明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这里。无论我们是否要寻找它。在这个边疆以外，是没有界标的科学空间的领域，是未曾解决的和平与战争的问题的领域，是尚未征服的无知和偏见的领域，是难以应答的贫穷和富裕问题的领域，要从这里退缩，坐享其成是容易的……但我相信，时代呼唤发明、创新、幻想和果断，我请求诸位做新边疆的先行者，我真心对你们年轻的心发出呼唤，而不论你们的年龄。我对所有那些乐于接受这个信条的人发出呼喊：强壮而充满勇气，不要畏惧，否则你要沮丧。<sup>①</sup>

肯尼迪的“新边疆”唤醒了美国人的集体记忆，在美国人心中构建起了新的“美国梦”。肯尼迪赋予“新边疆”的内容确实是六十年代的时代风潮，“未曾解决的战争与和平的领域”就是越南战争，“难以应答的贫穷和富裕问题的领域”就是约翰逊的“向贫穷宣战”的庞大计划，约翰逊总统将要在教育、医疗、环境保护、住房、反贫困和民权领域全面开花。“没有界标的科学空间的领域”就是耗资巨大的太空探索计划，这几项计划都使美国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造成了七十年代的经济崩溃，这些措施中最要命的就是“向贫穷宣战”的计划，这项计划所花的钱比越南战争还要多。“尚未征服的无知和偏见的领域”在六十年代采取的办法是让绝对的平等观念和无限制的自由理想迅速武装每一个人的头脑，这种做法的后果是种族暴乱和性解放。后来肯尼迪被刺身亡，他的兄弟罗伯特·肯尼迪有志于继承哥哥的遗愿。哥哥肯尼迪总统的被刺杀给他带来了痛苦的回忆，此后他开始读存在主义的作品，试图从像加缪这样的作家的作品中寻找安慰，

---

<sup>①</sup> 转引自许平、朱晓军：《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9~60页。

而加缪也正是广大学生所欢迎的作家，因此，他也建立起了一种与大学生们同仇敌忾的思想联系。他认为大学生和青年应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肯尼迪在他的演讲中频繁地表达了这种情感。1966年10月22日在伯克利的演讲中，他对学生们说：“你们有机会和责任来帮助国家做出选择，这一选择将决定这个国家的伟大……如果你们从斗争中退缩……你们就失去了你们的责任，这是由你们独特的地位所赋予的。”<sup>①</sup> 在动荡不安的1966年，这位政治家还在鼓励学生们继续斗争。在争取总统职位的演讲中，他明白想要得到数量巨大的青年们的支持，就必须支持他们继续闹事。当然他对六十年代的学生风气也是认同的。

此外，肯尼迪政府的“新边疆”、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以及他们所提出的“向贫困宣战”和“实现充分受教育机会”的口号，点燃了美国年青一代的热情。不过实施的效果并不好，这让年轻人很生气。这种眼高手低的做法，会使人民一直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并且把达不到目标的过错全部归于这些目标的提出者和执行者。肯尼迪和约翰逊这两届总统着力改变黑人的不平等地位和穷人的经济状况，力度之大，可以说是保守的五十年代总统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不可望其项背的。肯尼迪被刺杀后，在为纪念肯尼迪而建立的一个肯尼迪—约翰逊联合机构的领导下，一代立法工作在大约三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1964年民权法》的颁布标志着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运动到达胜利的顶峰。民权运动所追求的废除隔离制度、争取选举权等目标都实现了。但是为何五十年代的黑人不闹事，而突然之间那么多问题在六十年代就全面爆发出来了呢？为何在约翰逊总统签署《1964年民权法》两周后，纽约市杰克逊维尔就爆发了种族暴力

---

<sup>①</sup> 转引自王俊勇 2004 年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大学生运动》，28 页，<http://epub.cnki.net/grib2008>。

冲突，拉开了长达五年的城市种族暴力冲突的序幕？1964—1968年每年的夏天，美国许多城市都处于动荡状态。1965年的瓦茨、1966年的芝加哥、1967年的纽瓦克和底特律的种族暴力冲突，都给这些城市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不仅是黑人和学生，还有各种少数民族、妇女、同性恋者、性变态者，都开始提高自己争取权利的声音。这是因为历来的政治动乱总是发生在局势开始松动的时候，革命极少因物质的贫困和暴政而生。历史上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生活得很糟，但他们总是把苦难视为“自然”或是“命”，没有寻找出路的动力。以前的政治文化压制积累了太多的问题，在政治高压下不能循序渐进地释放，在换上了较为温和的领导人，或者是专制君主一旦开始改革时，各种前面积累的问题就会爆发。尤其是政府已经有了改革的意图，但又实施得不够迅速，或改革受到了顽固势力的阻挠，有人利用改革发横财的时候，最容易出事。最迫切盼望改革的人对改革寄予了莫大的希望，而改革的实际进程和效果一般都与这种期望相去甚远。这就是革命或动乱最容易发生在统治链条开始松动的时候的原因。对于改革速度，革命者是永远不会满意的，因为他们是按心中的某个标志来衡量改革的实际进度；而在保守的人看来，改革带来的变化已经是天翻地覆了，因为他是按现在与过去的对照来衡量改革进度的。这就是著名的“托克维尔定律”。1979年，美国的一次了解取消种族隔离的进程是太快还是太慢的民意调查显示，30岁以上的人中认为太快的多出一倍以上，而30岁以下的人普遍认为太慢。<sup>①</sup> 一个长期封闭的社会一旦开始改革，就会把大众的注意力集中到原来并不受重视和并未引起全民关注的问题上，媒体的开禁，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

---

<sup>①</sup> 兰登·琼斯：《美国坎坷的一代——生育高潮后的美国社会》，贾蔼美等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



用，人民就会更加急躁。当情况改善时，反而会觉得情况更不能接受。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辛亥革命都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美国的六十年代动乱不会发生在保守的五十年代，而肇始于试图改革的六十年代，也是这个原因。当时六十年代反贫困法案重拳出击，就好像美国到处都是穷人一样。1960年，美劳工统计局把四口之家的最低生活水平定为年收入3000美元，按照这个标准，就有4000万美国人生活在这个最低水平线之下。<sup>①</sup>但是有谁听说过贫困家庭还有汽车、冰箱和电话，甚至可以喝得上威士忌。在这里，贫困不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许多第三世界的左派非常同情美国的穷人，以为这些穷人缺衣少食，路有冻死骨，这完全搞错了。那些贫困线下的人，如果总是把自己的生活水准与最有钱的富人相比，当然会把自己定义为穷人，就日益心生不满。许多左派思想家都在煽风点火，告诉他们——贫困主要不是和物质有关，而是一种差距和感觉，不能满足于政府和富人的那一点施舍。约翰逊总统在消除贫困方面的不切实际的允诺把大家的愿望吊得过高，他在就职演说中承诺“绝不允许任何一个家庭生活于贫困之中”“绝不允许儿童挨冻受饿”“绝不允许邻人痛苦、死亡而无人问津”。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这些经济上的目标都只可能是一种乌托邦的想象，而真要付诸实践，就有些荒唐了。老百姓信以为真，对政府抱了太高的期望，因此在六七十年代不能忍受任何与这些标准有冲突的现实。总统的目标是要创造“一个伟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只有成功而没有贫困、只有美丽而没有单调、只有天才的创造而没有贫困的平庸”。这充分体现了六十年代的狂想，也是嬉皮士观点的官方版。约翰逊总统和嬉皮士共同认为，以前那些自食其力和卑贱的工作没有多大意

---

<sup>①</sup> 刘绪贻主编：《战后美国史——1945—1986》，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页。

义，他们要的都是“只有美丽而没有单调、只有天才的创造而没有贫困的平庸”的工作。踏实的辛劳遭到了贬斥，而不切实际的、天才的创造工作的理想成为绝大部分年轻人理所当然的想法。因此，他们中的一部分宁肯拿救济也不愿从事“低级的”、没有趣味的、不能体现人生价值的工作。

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五十年代的美国妇女在强硬的麦卡锡主义保守势力的压制下，安于物质消费，满足于做很多个孩子的妈妈和郊区全职家庭太太。肯尼迪总统上任不久，便于1961年成立了一个由已故总统罗斯福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任主席的专门调查妇女性别歧视状况的委员会——“妇女地位总统委员会”。首次把妇女问题列入了联邦政府的议事日程，并且在州一级建立了类似的机构。这个委员会的成立，似乎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总统和政府就是鼓励妇女发现妇女方方面面的不平等情况，并通过政府和广大妇女的共同努力，来纠正这个不正常的情况。六十年代的妇女运动应运而生，要求妇女在就业、教育、宗教、家庭、性、媒体、政治和经济问题上获得平等权利。肯尼迪成立的联邦和州委员会实际上为抗议运动提供了领导骨干和现成的妇女网络组织。<sup>①</sup> 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同酬条例》，禁止私人企业在工资分配上搞性别歧视。1964年，国会批准了《民权法案》，该法案禁止任何以种族、宗教、民族来源和性别为基础的歧视行为。几乎每个州都建立了类似反性别歧视的地方机构。在此基础之上，六七十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地开展了起来。

约翰逊总统在黑人问题上取得的成就越大，花的钱越多，黑人的怒气也就越大。在这种怒气积聚的过程中，刚开始走进千家

---

<sup>①</sup> 王恩铭：《20世纪美国妇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页。



万户的电视起了很大的作用。六十年代的美国连最贫困的贫民窟家庭都拥有一部电视，这是他们瞭望富裕社会的窗口。从黑人和移民聚居区喷涌而出的得寸进尺的革命要求和受到挫折后的愤怒，都大大归因于穷人在电视上看到那些他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每时每刻都在他们眼前炫耀。城市黑人每天都在电视上看到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运动在南方取得了巨大突破，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也陆续被废除。六十年代中后期，电视报道的黑人在骚乱中赤裸裸的暴力、抢劫等镜头无疑对观看者起到很大的心理暗示作用，为黑人参加冲突，甚至参加抢劫创造了生动的例子和便利的条件。当他们看到其他黑人杀人放火都没有被抓时，就纷纷效仿。在冲突过程中，新闻媒体往往大肆报道，事无巨细地描绘暴力和抢劫，冲突的真实情况往往比媒体所渲染的规模小得多，实际破坏力也往往没有媒体报道那么大。新闻媒体夸大其辞，往往使黑人们对冲突有一种不正确的或者是夸大的印象，这误导了社区黑人，对整个冲突的发展起着火上浇油的作用。许多黑人就是在看了电视上的绘声绘色的报道之后，才得知另一个城市在发生黑人骚乱，自己便拿着武器坐车过去参加。<sup>①</sup>

城市的大街上、墙上、报纸上到处都是极具诱惑力的商品，人们总是觉得钱包里的钱增长得不够快，因为他们钱包里的钱的增长速度永远也撵不上商品的生产速度。以前社会的人大多安于自己的社会等级和消费水平，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态来获得平衡，可是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把上层的消费习惯和富裕一再渲染，原来属于上层社会的那些派头、消费档次、度假习惯，都通过媒体传播给了大众。现在如果男方不举办有白色婚纱的豪华婚礼，新娘就不会认为这是一场真正的婚姻。销售商如果仅仅

---

<sup>①</sup> 阿瑟·林克、威廉·卡顿：《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刘绪贻等译，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6页。

让有钱人成为他心中理想的消费者而不理会现在还不够富裕的潜在消费者的话，生意就不会成功，并且风险很大，因为农村女孩也对举行戴安娜王妃那样的豪华婚礼梦寐以求。在阶层流动限制不严、以金钱为等级的商业民主时代，昨天的农村姑娘由于做生意或者是嫁了一个有钱人，马上就会变成贵族，这就意味着有源源不断、数不胜数的潜在消费者。也就是说，消费文化极大地提升了人的愿望，农村女孩不会满足于传统的根据自己和未婚夫的财力量力举行的婚礼。这样，穷人对贫穷的概念就根本改变了。

六十年代的文化使黑人笃信自己是不公正社会的受害者，应通过愤怒而不是个人奋斗来求得补偿。参加城市骚乱的黑人中有90%都受过高中教育，他们比没参加暴乱的黑人受的教育要多，是教育把他们的期望值大为提高了，教育水平更低的从南方来的新黑人移民一般很少受到黑人权力等思想的武装，他们还没有要掌握城市的想法，所以骚乱一般与他们无缘。反之受过高中教育的黑人青年更容易受到崇尚黑人权力思想的鼓动，普遍抱有一种黑人一定要采用暴力手段获得自己的权力、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想法。另外，反文化运动对黑人的奸淫掳掠大加赞赏，称之为“叛逆”或“另类生活方式”。黑人对变革速度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也和国际形势有关，在苏联的帮助下，亚洲和非洲的国家正以喷气机的速度冲向政治独立的目标。美国国内的黑人却看见自己以老牛拉破车的速度在争取与白人一起在同一家便餐店里喝上一杯咖啡的权利……

同样的原因决定了黑人运动在南方是非暴力运动，而北方则是种族暴动。南方权力组织的程度和权力的特征决定了南方民权运动只能采取大规模、有组织的非暴力运动。南方的政客基本上是种族主义分子，由他们制定并执行的政策有许多含有种族歧视的条款。因此，一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对黑人的歧视性隔离遍及南方，充斥于社会各个领域。黑人所面对的敌人是强大的和有组



织的。所以，他们一直处在种族主义的控制中，习惯于逆来顺受，仅在遭受白人暴徒袭击时才被迫自卫，而很少主动采取针对白人的攻击行为。所以，对南方黑人而言，采取非暴力运动这种方式肯定是适当的，因为它一方面符合南方黑人长期形成的性格，另一方面具有更大的道义力量。分散的南方黑人面对有组织的强大的敌人采取暴力，无疑会给南方种族主义者以口实，对黑人进行大规模镇压。

而北方的黑人所面对的种族歧视与南方明显不同。北方人对黑人要温和得多，北方黑人在许多方面与白人是平等的，很少有赤裸裸的暴力歧视。当南方黑人迁入北方城市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对白人的恐惧心理很自然地逐渐减弱。城市黑人的增加以及他们对黑人社区的控制，都使北方城市黑人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权力欲。北方的权力机构对黑人也不如南方政权那样强硬。

《1964年民权法》的签署使北方黑人深感失望，因为民权法取缔的种族隔离制度在北方城市里早已不存在，北方黑人早就享有这些法律上的平等了，他们要的是大把的金钱，他们希望改变的经济不平等并没有在《1964年民权法》中得到丝毫体现。这种失望带来的挫折感使他们因没有得到好处而极为生气，大骂知足的南方黑人是狗奴才。所以，在《1964年民权法案》签署后不久，在北方的黑人聚居区就开始了大规模的黑人暴乱。

六十年代风气的形成与很大一部分教师、律师、牧师、艺术家、批评家、政治家、学者热衷于赶流行文化的时髦有关，他们纷纷对年轻人做出献媚的举动。于是，六十年代人们在各条战线上都造起反来。大学生要求参与大学的决策，士兵要求组建士兵联合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政府的律师组织起来抗议司法部长的决定，教士反对主教的主张，妇女、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同性恋者也都闹起来，儿童、残疾人、精神病人、囚犯、动物的权利纷纷要求实现。人们流行着状告国内税务所，状告国会，把各联

邦机构送上法庭，甚至直接状告总统！由于六十年代流行很左的法律理念，所以，他们大部分都会胜诉。

六十年代后期反战浪潮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的公开报道引起的。以前媒体对战争的报道都谨守一条底线，即不得报道诸如军队行动等具有直接军事意义的事件。六十年代媒体已经成为一种对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影响巨大的产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战相隔的二十年间，美国普及了电视，越战可以现场直播了。大批记者亲赴越南战场，冒着枪林弹雨送回最及时的报道。媒体有权力、有机会、有法律保护的自由、也有狂热的兴趣来报道越南战争。渐渐记者们就越过了以前约定俗成的报道战争的禁忌，热衷于暴露猛料。国内民众看到越共发动的春节攻势的现场直播，越共打到了美国的大使馆，人们也看到了越南的儿童在炮火中丧生。民众是受舆论操纵的，他们对战争的正义性和获胜的前景越来越没有信心，他们感到这场战争很荒谬。其实更荒唐的是，从古至今哪场战争是现场直播的？哪场战争不是血腥的？哪场战争不会死伤无辜？人民不可能忍受得了现场直播的战争中的残暴，而残暴一直都是战争的本质。无怪乎民众会认定这是一场极不正义的战争了。

## 二、文化革命

在文化方面，五十年代出现了更多的不和谐的社会批评，不仅有最得人心的塞林格、厄普代克、凯鲁亚克和金斯伯格，还有纳博科夫、埃利逊、巴斯和耶茨这样的讽刺小说家。加尔布雷斯的《丰裕社会》、梅勒的《我为自己做广告》、W·H·怀特的《组织人》和保罗·古德曼的《荒谬的成长》都对社会进行了辛辣的批判，他们把年轻人的反叛和婚姻的危机四伏都看做是社会痼疾的表面形式，也对懦弱的从众心理很不满。五十年代幸存下



来的作品都不是那些文质彬彬的风俗小说，它们几年以后就被人遗忘了，能够被人记起的作品都带有一种歇斯底里的风格，如索尔·贝娄的《勿失良机》，埃利逊的《看不见的人》，马拉默德的《店员》和《魔桶》。

大卫·里斯曼在1951年发表的《孤独的人群》里指出，美国人的性格正从“内在导向”转为“他人导向”，由受到自我内心继承的美国文化价值观逐渐转变成了受到外在的时尚和大众文化价值观的引导，很多人都很容易附和他人的意识和趣味而失去自我。塞林格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叙述语言、情节结构和人物塑造上都与传统观念离经叛道。塞林格使用了许多粗话，排斥精心斟酌的文雅语言，在小说结构上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随意叙述，情节随着叙述人的经历和思绪漂移，不再强调小说的精心构思和有序的结构。后来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也是采取的这种随意抒怀的结构，是游历的再现。在人物的塑造上，反英雄的形象体现了反文化的心态。怀特在《组织人》中写道，随着巨型公司的兴盛，大组织既诱发又培养某种适宜在这种公司工作的人群，也会在心理和气质上塑造他们。在这些机构中，新教伦理带来的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都退化了，现在强调的是归属感和适应的要求。与此相应的是，高校里选修基础课（人文学科、物理学科）的人数不断减少，而选修工商管理 and 职业教育的学生大为增加了。最后，这些“组织人”都搬到了郊区，落入千篇一律的生活之中。米尔斯在《文化与政治》一书中哀叹道，美国经济的过度发展，公司、国家或军事权利的膨胀，官僚机构扩大以及操纵舆论手段的激增，民主已不复存在，社会具有密谋性质。美国理性已失去控制，分析和计划都已无济于事，选择的可能性都被毁灭了。在《权力精英》一书中，他对由少数大企业家和军界领袖组成的美国统治集团进行了直接的揭露和抨击。在《白领》一书中，他把美国人描述为“高兴的机器人”和“任人摆布的小

人物”。

在《白色黑鬼》中，梅勒首先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的生存困境：或者转瞬之间死于原子弹爆炸和法西斯政权之手，或者听任专制社会的主流文化扼杀自己的创造性和反叛直觉，循规蹈矩地生活，一点点地慢性死亡。梅勒认为，若要在这种处境中与死亡威胁共存并真正复归自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吸收了黑人存在主义染色体的嬉皮精神，做一个美国式存在主义者——嬉皮士。接下来他详尽地论述了嬉皮士的主要特征——反叛、放纵自我、勇气、冒险和暴力。他指出，嬉皮士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死气沉沉的专制文化环境之中，其首要人生目标是摆脱主流文化的种种束缚，四处漂泊，寻找通向反叛传统、复归自我的未知道路。

为此，嬉皮士彻底摈弃了所有传统意义上的道义与责任，恣意妄为，一切行为“只是为了达到自我满足这个目标”。梅勒再三强调勇气、冒险精神与暴力对于在狭隘而保守的政治文化气候下实现嬉皮意义上的复归自我的至关重要性。在他看来，嬉皮精神不仅意味着海明威式的勇气和挑战未知领域的冒险，而且意味着任意宣泄只受自我感觉支配的暴力倾向，以暴力开辟成长道路，实现精神净化。

五十年代初期占据文坛的是新批评派，他们把艾略特等人的理论奉为经典。新批评派不仅用教鞭把“粗制滥造”的大众文学赶出了课堂，而且把威廉斯和史蒂文斯这些上承惠特曼传统下启美国当代诗歌潮流的重要现代主义诗人也打入另册。劳·李普顿把“垮掉的一代”作家戏称为野蛮人，与学院派相对立。他认为学校和保证荣誉的机构似乎仍然掌握在“从英格兰到新英格兰”传统的教师、批评家和编辑手里。他敏感地指出，假如容许“神圣的野蛮人”控制民族文化的话，那么正在形成的新的美国文学传统就不会从属于“从英格兰到新英格兰”的家系了。



1951年，历史学家威廉·威廉斯出版了批判美国外交政策的著作《美俄关系史》，1956年编著了《美国外交的形成》，1959年出版了《美国外交的悲剧》，从而创立了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修正学派”，该学派把冷战的责任完全推给美国，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完全贬低为扩张主义，是受到了历来的扩张传统和掠夺的经济利益的驱使。这种看法渐渐成为左派的固定思维，在对越南战争的批判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小说家厄普代克的《兔子，跑吧》中的“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对毫无生气的中产阶级生活很烦，对妻子和情人的生活困境也不敢负责，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逃跑。在“兔子”逃出憋闷的家庭后，与一个加油站的工人有这么一段对话：

“这条路会把你带向鹤奇镇。”

“那个地方后面是什么？”

“纽荷兰。兰凯斯特。”

“你有地图吗？”

“孩子，你到底要去哪儿？”

“嗯，我真的不知道。”<sup>①</sup>

这种“兔子式”的行为与凯鲁亚克《在路上》里面的迪安·莫里亚蒂很相似，他们对众多女友拒不承担义务，开车流浪，逃避家庭生活的负担。而在五十年代，美国的交通已经相当发达。州际公路系统把越来越漂泊不定的人口从农村输送到城市，从城市输送到郊区，从南方输送到城市黑人区，从中西部输送到加利福尼亚。便利的交通使萨尔·帕拉迪斯西部寻梦成为现实，可以

<sup>①</sup> 转引自金衡山：《厄普代克与当代美国社会——厄普代克十部小说研究》，北京：北大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便捷地在东西海岸来回。这是“兔子”和迪安·莫里亚蒂可以纵情驰骋的前提，也是六十年代的“公路小说”和“公路电影”得以施展的现实条件，“逍遥骑士”们骑着摩托车、开着汽车，漫游在美国又快又好的公路上。“兔子”始终没有能摆脱基督教的原罪感，行动拖泥带水，而迪安·莫里亚蒂则是一个真正的“白种黑人”。当然，在“兔子”那里，宗教不过是染上了沉疴、奄奄一息的虚幻意向，来源于错误的理解，对人的行为不再有多少约束力，也不能在关键时刻输出宝贵的道德和信仰的支持。就好像五十年代中产阶级大多在星期天打扮得衣冠楚楚地上教堂，而这只是星期天早上的兴趣。《兔子，跑吧》里的年轻牧师杰克·埃克斯更像是一个社区工作者，自己也没有信仰。在厄普代克的所有小说中的宗教，也都是这种情况。宗教的黄昏已经到了。

金斯伯格的诗作《嚎叫》中“意向和节奏的令人惊讶的粗鲁足以使整整一代人在他们的艾森豪威尔集体厕所里颤栗不已，或是因为兴奋或是因为恐惧。通常是两者兼而有之”。这种嚎叫，正是五十年代许多人在“含蓄婉转、玩世不恭的喃喃低语中才说出的”。当时的人也许还没有意识到“它把我们所有的艺术和性的壁橱之门炸开了多大”。相对于保守压抑的五十年代，“《嚎叫》这首诗不失为一剂了不起的泻药”。<sup>①</sup>金斯伯格本人也知道，当时民众的大多数是焦虑不安的，他们的不安无法经由政府或媒体来进行清楚的交流，而诗歌却是他们最好的代言人。在追求安稳的五十年代，金斯伯格用诗歌明确地表现了绝对不愿意去当一个没有个性的公务员的决心。

我情愿发疯，沿着神秘的道路去墨西哥，血管里流  
淌着海洛因，

<sup>①</sup> 文楚安主编：《透视美国》，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页。



眼和耳都弥漫着大麻的刺激，  
在边境的泥地小屋地板上吞吃奥佩特碱，  
要么躺在旅馆的床上拥抱被命运捉弄的痛苦的男人  
和女人，  
我情愿老是在公路上颠簸顶着西部太阳在餐桌旁呼  
号流泪；  
……<sup>①</sup>

金斯伯格在《帕特逊》一诗的第二节用了一系列排比的“我情愿……”，就是说，情愿做这些为正人君子所不齿的事也不肯去上班。剪掉长头发又能多挣多少！

要是我在商店前室同那些神态傲慢的主管雇员  
相遇，  
这些老资格的职员如同置身精神病院一个个肥胖难看，  
又蠢又傻可自命不凡，因为他们有钱有权  
可以聘用谁也可叫谁滚蛋叫谁发财叫谁破产而且胡说  
八道大  
言不惭心安理得用他们的怒气和语言对付那已被  
愤慨  
弄得精疲力竭的伙计，  
我将卷入怎样的争斗最终又有何报偿！只会是无所  
不在的困窘针刺般的痛楚，  
夜晚是犹如梦见凶恶老姬般的紧张恐怖，大白天又  
会感受到

---

<sup>①</sup> 金斯伯格《帕特逊》，见《金斯伯格诗选》，文楚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难以忍受的折磨令人窒息愤怒。<sup>①</sup>

在《嚎叫》一诗中，对流浪行为有动人的描写：

他们沿着往日的高速公路风驰电掣前去探望各自  
破车，

新装的殉难地监狱里的孤寂者或是伯明翰爵士乐的  
化身。

他们一连七十二小时驾车穿过田野看我是否看你是  
否看他是否幻想找到永恒。<sup>②</sup>

垮掉派的代表人物巴勒斯在小说《赤裸的午餐》中，塑造了一个“自由之土共和国”的精神操控者本威博士。在本威博士的“纠教中心”里，他统治人的手法已经告别了原始野蛮的集中营和肉体施暴，强调精神控制。他发明了“配电板”，把随时可启动的电钻固定在人的牙齿上，要求这个人操纵一个杂乱无章的配电板，按照铃声与灯光的示意，把一定的插头与插座连接起来。每搞错一次，电钻就会启动二十秒。信号逐渐加快，远超出人的反应速度。不一会儿，这个人的精神就不行了。<sup>③</sup> 这里巴勒斯体现出了奥威尔的《1984》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的传统，却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巴勒斯与福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更相近。本威医生从口袋里摸出一支巧克力棒糖，伸到一个病人面前。那人嗅了一下，下颚开始动弹起来，唾沫从

<sup>①</sup> 金斯伯格《帕特逊》，见《金斯伯格诗选》，文楚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9~60页。

<sup>②</sup> 转引自李斯编著《垮掉的一代》，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sup>③</sup> 威廉·巴勒斯：《赤裸的午餐》，孔小炯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



他的嘴角淌下来，而后又呈线条状从脸上挂下来。他的肚子咕咕作响，整个身体都随着肠蠕动扭动起来。本威医生朝后退了退，手中照旧举着巧克力糖，那男人赶紧跪在地上。本威医生抛出手中的糖，那人扑上来抓，没有抓到，于是一边满地乱爬，一边发出嘟嘟囔囔的声音。他钻到了床下！终于找到了那根糖，马上塞进了嘴里。<sup>①</sup> 这刻画的不就是完全被现代经济控制的现代人形象？资本主义的金钱魔鬼完全占有了人，使之丧失了应有的尊严。这也是对美国的祖先，那些虔诚的清教徒的巨大讽刺，正是他们把发展经济几乎等同于对上帝的虔诚，释放出了撒旦的力量。巴勒斯用来对付本威医生的“纠教中心”的办法是，让那些资本主义囚笼中的青年恶棍们冲出愚弄人、扼杀人的“纠教中心”（像是学校、又像是家庭），冲进卢浮宫，朝着蒙娜丽莎的脸上扔酸液；打开动物园、疯人院、监狱；向着民航客机和公共汽车滥施淫威；闯进医院，拔掉瘫痪病人的人工呼吸器，用自行车打气筒给病人注射，切断人工肾的循环；用一把两人拉的外科手术锯把一个妇女锯成两半；他们还把一大群尖叫着的猪驱赶到证券交易所里；在联合国的地板上拉屎……<sup>②</sup> 总之，这些从疯人院出来的年轻人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这种疯狂的热情就像是欧美六十年代“反正统文化运动”的那些年轻人所拥有的，致力于破坏传统文化和公共设施。巴勒斯就是用这群疯人院里跑出来的人来象征那些被资本主义国家囚禁的年轻人。这些人是六十年代的黑人和大学生、同性恋者、沉迷于身体快感的女权主义者。巴勒斯的理想与福柯的教诲如此相同。福柯的《古代疯癫史》在1968年5月之后被成千上万的大学生阅读，他们挥舞着福柯的

---

① 威廉·巴勒斯：《赤裸的午餐》，孔小炯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② 威廉·巴勒斯：《赤裸的午餐》，孔小炯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这本书，以证明所有体制和学问都是坏的。在之后的几年里，对各种反抗行为的赞扬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正常与病态之间的界限消弭了，疯癫和精神异常者戴上了神圣的受害者的光环。福柯号召妇女、囚犯、部队里的士兵、医院里的患者、同性恋者都要在自己的特定领域里反抗权力、压迫和控制，使每一项特殊的斗争都成为整体斗争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则必须反对一切权力，反对“无辜与有罪”的二元区分。福柯的理论从根本上说是要取消一切性禁忌、性限制和性保留，反对等级秩序，取缔精英们的高级秩序。“垮掉的一代”与福柯是殊途同归，一个是理论学术版，一个是文学版，都抱有亲身实验的共同态度，福柯也因此死于艾滋病。他们看准了资本主义的弊病，但是解决办法则是彻底反文明的，不但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反对一切的文明和政府。而早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诞生十年的朱迪恩·马利纳的先锋戏剧《双桅船》，已经严厉而逼真地控诉了监狱和像监狱一样的社会制度。

巴勒斯想象的大学校园场景可能会很对那些反文化的嬉皮士的胃口：

群群绵羊、山羊以及长角牛奔走于大学生和讲台之间。学生们……穿着牛仔裤，从共济会的壶里喝着威士忌，从锡罐里喝着咖啡，抽着用包装纸和彩票卷成的大麻烟……用安全别针和滴管注射毒品，钻研着赛马消息报、喜剧集、玛雅人的古老抄本……<sup>①</sup>

自大学出现以后，可能很少有人想过大学会出现这样的场

---

<sup>①</sup> 威廉·巴勒斯《赤裸的午餐》，孔小炯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1页。

景，可是它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狂欢的戏剧性场面在六十年代屡见不鲜，文学想象和现实生活没有界限，因为标新立异的“摆酷”也是一种行为艺术。现在这已经成了风靡全球的时尚文化。香港的周星驰和吴孟达演的电影全部都贯彻着这种精神，很受亚洲年轻人的喜欢。

金斯伯格早在1948年就写过一首叫做《一间毫无意义的病院》的短诗，把美国比作是精神病院：

我领到睡觉用品，还被指定了一个床位  
在一间病室偌大无比  
上千人在我周围哭泣，  
这些男男女女全都衰弱疲惫。  
坐在我的小床上，这是三层铺位  
同天花板相邻  
俯视过道幽暗灰蒙。

但见一个个老态龙钟，身体残疾，神色木然  
呆滞。<sup>①</sup>

金斯伯格眼中的美国新教徒全都是“衰弱疲惫”的，“个个老态龙钟，身体残疾，神色木然呆滞”。这也是米尔斯在《白领》和怀特在《组织人》中描写的当代美国人。小白领、公务员和小教师越来越多，他们都是些身体孱弱、五谷不分的小人物，特别喜欢参加大型的愚昧的电视直播娱乐活动，和搞笑的游戏比赛。这些人物不用说从传统的新教伦理，就是从金斯伯格的叛逆标准来看，都是值得批判的。

---

<sup>①</sup> 艾伦·金斯伯格《金斯伯格诗选》，文楚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在1962年出版的另一个“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肯·凯西的《飞越疯人院》也和巴勒斯一样严厉地控诉了精神病院，让人联想起了金斯伯格的长诗《卡迪什》——悼念死于精神病院的母亲娜阿米。精神病院的恐怖和娜阿米受到的精神折磨让人感到震惊。凯西的小说也继承了主题，故事发生在太平洋西北部的一个精神病院里，病院由狡猾、控制欲极强的“大护士”统治着，主人公麦克莫非把病人们联合起来挑战“大护士”的权威，他们赌博、酗酒、同女人约会，等等。当麦克莫非率领大家带着妓女出海钓鱼时，那种反抗体制的感觉就像是肯·凯西亲自带着他的“快活的恶作剧”伙伴环游全国来一次迷幻和摇滚之旅一样：“我全身感到无比的安宁。离岸愈远这种感觉愈强烈。”<sup>①</sup> 麦克莫非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巨人，要把他的朋友们从“康拜因大机器”的手里解救出来。在这个疯人院里，“整个儿都像个卡通世界，人物都是扁平的，用黑线画出来，在一个可笑的故事里跳动着”。<sup>②</sup> 这个“大护士”背后给她撑腰的是压抑人性的“康拜因大机器”，这个机器将整个世界用电线和晶体连接起来。大概这就是凯西眼中的艾森豪威尔统治之下的五十年代美国的写照，这个疯人院里吃得挺好，但是精神压抑，好像是暗讽五十年代的美国物质丰裕，但是其实就是疯人院。这个“大护士”很像是《嚎叫》中的火神“摩洛克”，把一代精英疯狂毁灭，又像是巴勒斯的“本威医生”。在精神病院里不听话的人会被捆在一张十字架形状的桌子上，戴上电子荆棘王冠，在你的两边的太阳穴上接上电线，让你模仿一次基督的受难。1963年企鹅出版社版本封面的中央——精神病院房顶的一角，只见一只布谷鸟昂头站立，

---

① 肯·凯西：《飞越疯人院》，石幼珊、钟杏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60页。

② 肯·凯西：《飞越疯人院》，石幼珊、钟杏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35页。



仿佛在期待呼唤什么，这在那个众所周知的动荡年代里，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1974年，著名制片人道格拉斯父子请捷克籍导演米洛斯·福尔曼把小说拍成了电影。1975年，由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影片夺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五项大奖，在全世界影响甚大。只是影片加上了一个反抗的结尾，因而比小说更乐观和更煽动。受到麦克莫非感染的印第安酋长搬起了那个麦克莫非没有能够搬起的控制台，打烂了窗子，逃出了疯人院，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这个印第安人的父亲是被白人害死的，凯西安排这样的一个印第安人，表现的是一种边缘对抗美国主流的立场，似乎预示了几年以后同样是被白人欺辱过的黑人砸烂美国这座疯人院的冲动。把妓女和酒带进疯人院，组织疯人的狂欢，也是六十年代后期反文化的作战办法。

这种先是对作为社会体制的象征的邪恶精神病院进行曝光然后再开出酗酒、吸毒、无限制的性、暴力之类的药方的文学结构，在反抗的人们中很流行。一个精神病人对付这个恶魔般的世界的方法是：“你逃不出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整个血腥的地球炸平——统统炸光。”<sup>①</sup>

垮掉派文学的精神实质是虚无主义，是世俗存在主义的一种，是现代性的又一表征，且均源于世俗诺斯替，它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原则与精神状态不过是诺斯替主义的又一现代回应。

诺斯替主义作为人类处境的一种独特类型，其思想原则与精神状态，是以基督教的异端面貌出现的，却与现代精神之间有相通之处：宇宙虚无主义。有关诺斯替主义与现代性之关系问题的最著名的权威是政治哲学家伏尔格林（Eric Voegelin）与存在主

---

<sup>①</sup> 肯·凯西：《飞越疯人院》，石幼珊、钟杏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76页。

义哲学家约纳斯（Hans Jonas）。约纳斯认为，在诺斯替主义的诸多特征之中首先要加以强调的，乃是它的极端二元论的情绪。一般的诺斯替主义体系都认为这个世界是由一些人格化的力量所创造的，只是在某些体系中似乎有一个非人格的、黑暗冲动的必然性在创世中发挥了作用。但不论是谁创造了这个世界，人对他的创造者都不敬重。因为这个歪曲的神只留下了盲目的行动力量，没有知识也没有仁慈。它所揭示的是无明的、并因此是邪恶的力量，来源于自以为是的能量的灵，来源于统治与压迫的意志。这个意志的无知就是这个世界的精神本质。宇宙的律法就是这种统治的律法，而不是神圣智慧的律法。与此相对，人的本质是知识——对于自我与神的知识：这决定了他的处境是无知之中的潜在的知，黑暗之中的光明，这种关系乃是它异于这个世界、在这个黑暗无垠的宇宙中没有伙伴的根本原因。它标志着内在自我从这个世界的麻木与沉醉中苏醒过来。对于诺斯替派来说，人与世界之间的这种疏离需要加深并达到极点，才能解放内在自我，如此才能使内在自我获得自己。

诺斯替主义的律法观念导致的伦理上的后果，就是反律法主义。在这个基础上，诺斯替派的反律法主义论证与萨特（Sartre）的论证同样简单。萨特说，这个超验是沉默，由于“他在这个世界中没有迹象”，因此，人，“被抛弃者”就被恢复了自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得不承担这种自由。人“就是”那自由，人“不是别的，只是他自己的设计”，并且“一切于他都是许可的”。而且这种自由是一种绝望的自由，作为一个无方向的任务，它引起的是恐惧，而不是欢欣。

在它们反律法主义的论证中，都认为没有天然善的或天然恶的东西，事物本身是中性的，只是因为人的意见才有行为的善或恶。属灵的人在他的知识的自由中可以漠不关心地运用一切事物。



古代诺斯替主义与现代存在主义思想在宇宙论与反律法主义上具有一致性。然而，诺斯替主义二元论与存在主义二元论之间的一个核心差异不容忽视：诺斯替的人是被扔到一个敌意的、反神明的、因而是反人性的自然之中；而存在主义的人则是被扔到一个漠不关心的自然之中。只有后一种情况才代表了绝对的空虚、真正无底的深渊。在诺斯替的观念中，敌对者、邪灵还是人形的，即使在陌生之中也有几分熟悉；而且，这种对立本身也提供了生存的方向——诚然，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方向。但是它的背后支持着否定性的超验，这个肯定的世界是这种否定性的超验的质的对立者。现代科学中的冷漠的自然甚至于连这种敌对性也没有，从这个自然中根本不能得出任何方向。

这就使得现代虚无主义与诺斯替虚无主义对这个世界的恐惧和对律法的违抗比起来，还要更无限的极端、更无限的绝望。那个自然绝对地冷漠，是一个真正的深渊。人只有忧虑着，在他的有限中没有别的面对，唯有面对死亡。他孤独地忧虑着他的偶然性，忧虑着他的意义设计的客观无意义性，这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处境。

与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的垮掉派文学，常把生活世界说成是一片漆黑，把掌控世界的神灵说成是邪神“莫洛克”。如金斯伯格在1955年写就的一首诗《嚎叫》中描述的那样：

摩洛克的脑袋是纯粹的机械！摩洛克的血液流淌着  
金钱！摩洛克的手指是十支大军！摩洛克的胸膛是一架  
屠杀生灵的发电机！摩洛克的耳朵是一座冒烟的  
坟地！<sup>①</sup>

---

<sup>①</sup> 艾伦·金斯伯格《金斯伯格诗选》，文楚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125页。

然后他们再开出药方，这些药方一般是：在路上、海浪和沙滩、同性恋、群居、吸毒、摇滚乐、暴力，等等。诺曼·梅勒的看法很典型：“面对美国文明的致命后果，唯一的求生之路就是从物质与精神的保障中抽身而出，斩断自己与社会的联系，过一种无根的生活，在自我那不可抗拒的叛逆冲动的驱使下，踏上未知的旅途。”<sup>①</sup>梅勒强调的“无根的”“未知的”精神，根本就是在路上的精神，灵魂出窍的精神，六十年代的时代精神。不管是肯·凯西，还是巴勒斯，或者是金斯伯格和凯鲁亚克，都是这样。而在这些药方中，性又占据着中心地位：

……

温暖的身体  
一同闪耀  
在黑暗中，  
手移向  
肌肤  
中央  
颤动  
在欢悦中  
而灵魂的狂喜  
流溢在眼神中——  
是的，是的，  
这就是  
我的渴望，

---

<sup>①</sup> 转引自迪克·庞坦、大卫·罗宾斯：《酷天下——对一种流行态度的剖析》，吉晓倩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67~68页。



我一直所寻求的，  
我总是热望的，  
回归  
肉体  
我从那儿来到人世。<sup>①</sup>

凯鲁亚克、金斯伯格和巴勒斯都受到过斯宾格勒的影响，感觉到了西方的精神危机。凯鲁亚克受到过哥伦比亚大学的雷蒙德·韦弗教授的影响，后者曾经为凯鲁亚克开了一张诺斯替教派的书单，包括埃及的《死亡之书》、早期诺斯替教派和普罗丁的书。他希望杰克摆脱这个邪恶的、开玩笑式的神创造的世界，因为“对他的崇拜遮住了世人的视线，使人们无法看见被遮盖的微光。”<sup>②</sup> 在《荒凉天使》中，作者反复哀叹道：

上帝怎么会创造一个这样的世界？

上帝是否是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他是否会关注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切？把我们担负起来？还是把我们交给时间？交给出生的恐惧和不可避免的死亡？这一切又有何目的？

世上并没有活羔羊的避难所，只有许多死去羔羊的避难所。<sup>③</sup>

---

① 金斯伯格《歌》，艾伦·金斯伯格《金斯伯格诗选》，文楚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98~99页。

② 巴里·吉福德、劳伦斯·李：《垮掉的行路者——回忆杰克·凯鲁亚克》，华明、韩曦、周晓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

③ 杰克·凯鲁亚克：《荒凉天使》，姬子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263、336页。

当杰克一个人在海上的时候，翻开世界史，满目皆是荒芜，无数男人在战争中被碾碎，无数女人在硝烟中被奸污，孩子们被武装起来，动物们被屠杀，饿殍遍野——愚蠢的国王满嘴流着肉汁，在每个人的头上拉屎，用丝绸擦屁股，历代各国均是如此！集中营、焚尸炉、带刺的铁丝网、原子弹、灾荒、官僚主义、秘密处死……上帝为何要这么做？还是由魔鬼一手来操纵？<sup>①</sup> 他也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下，男女情爱都值得怀疑，宁肯入虎口，也强于落入美丽女子之罗网。魔鬼如是做工，令男女互相爱慕，而得到女人受孕的结果，再堕轮回。<sup>②</sup> 凯鲁亚克的小说《萨克斯医生》也表达了他对灵知主义思想的兴趣。这本书的神话式的幻想描写了撒克斯大夫这个“反罪恶之王”努力把这个世界从“罪恶的世界大蛇”的喷着死亡气息的口中拯救出来。这条蛇“背上覆盖着鳞片，发出嚎叫的声音”，是“难以忘记的罪恶、愤怒和撒旦的来源”；萨克斯医生“耷拉着帽子”在世界各地“寻找植物，他知道有一天他会把它们提炼成有魔力的毒药，他可以让这条蛇跌在地上死掉。”<sup>③</sup>

这种二元论的结构来自于古老的诺斯替教派，不过“垮掉的一代”不会再像古人那样，在看到世界一片漆黑之后，仍然相信另一个世界有一片没有污染过的光明。现代的诺斯替教徒不再信仰天堂，他们要在此世来解决这些问题，拯救他们的都是世俗人，或者是新神。这可以说是无神论存在主义、“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思想的最重要结构。凯西和金斯伯格正是“垮掉的一

---

① 杰克·凯鲁亚克：《荒凉天使》，姬子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页。

② 杰克·凯鲁亚克：《荒凉天使》，姬子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页。

③ 张新樟：《现代文学中的灵知主义》，《国外文学（季刊）》，2004年第1期，第29页。



代”与嬉皮士之间的衔接点，他们把这种反叛的思想结构扩散到了更多的年轻人中去。但是这样的解决方式可能比深受现代化危机困扰的工业文明都还要低劣和成问题，他把人性中最低劣的恶带到了光天化日之下，使之受到赞扬，并成为神圣的，以取代过去上帝的位置。

五十年代是妇女和黑人开始蠢蠢欲动的时期，1952年波伏娃的《第二性》在美国首次出版，随后又出版了专门批判美国妇女生活处境的丹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该书对五十年代妇女的生活面貌非常不满，批评她们读书时候不好好学习、唯一的目标就是嫁人，结婚后搬到郊区的大房子里，整天只知带孩子和侍候丈夫，拼命购物，空虚得要命，社会主流媒体大加吹捧这种生活方式，并且从各个学科出发来论证这是女性的生理和心理条件决定的，是所有可能的生活中最好的一种。弗里丹把这种说法称作是“女性的奥秘”，并且号召所有的女性都不要相信这种鬼话，鼓励妇女创造人的真正价值。《女性的奥秘》是美国女权运动开始的标志。应该说弗里丹的说法合情合理，并不过分，不过她的后继者们就很极端，甚至很低级，带有色情意味了。她们把男性彻底和女性对立了起来，把女权主义运动彻底引向了性解放。1970年被《时代》杂志称为“妇女解放中的毛泽东”的女权运动家米利特出版了《性政治》，号召妇女们团结起来结束传统的性压抑和性禁忌，尤其是男权制的一夫一妻制所反对的那些禁忌，如同性恋、非婚生子女、少年性行为、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

梅勒的散文《白种黑人》描绘了一个新型的人，由于生活在原子弹和纳粹集中营的恐怖之下，他也学会了贫民区黑人的那一套。梅勒号召，大家都应该向贫民区的黑人文化学习，不要再精打细算、细水长流，而要学会及时行乐，跟着身体的感觉走，听从自身叛逆下达的命令。用性高潮和大麻组成的一夜风流取代那

种单一性伴侣、稳定的和令人尊敬的家庭生活。六十年代的造反青年都是这种“白种黑人”，他们丢弃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变成了注重本能的黑人。“白种黑人”理论透露出了一种新的调子，那就是黑人文化完全不是落后的，反而是拯救病入膏肓的白人文化的福音。这是一种没有污染的文化，正是需要白人青年虚心学习的。在《另一个国家》和《下一次将是烈火》中，小说家鲍德温都仿效梅勒的做法，把黑人对于肉欲的追求化为嬉皮士的美德，以此反驳黑人本性淫荡的历来看法。不久以后，这种模式将同提倡黑人暴力的非洲渊源以及种族自尊的辞令联系在一起，成为黑人推崇的主题。

总之，五十年代的知识界倾向于把整个社会说成是枯燥无味、苟且偷安、离心离德、随俗从流、个性泯灭、精神空虚的，到处充满了无聊的厌烦情绪和低级趣味的粗鄙行为。典型的美国人也被描绘成爱德华·阿尔比的戏剧《美国梦》中的那个内心已被掏空、只剩下躯体、象征着美国梦的中产阶级，显示着丰裕社会的自鸣得意和精神贫乏。在《贝西·史密斯之死》中，主人公声嘶力竭地大喊：“我腻透了……我对真理腻透了……我对谎言也腻透了……我对我的皮肤腻透了……我要出去！”整个时代都有一股烦闷感，人们总想扩大新鲜的感觉。这些作家都印证了一种印象，那就是，美国没什么指望了，不可能通过改良而有所改善。1960年，被称为“左派中一个有文化的牛仔”的米尔斯发表了著名的《致新左派的信》，宣布自由主义的内部调整已经失败，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制度的一部分，不会再反抗，只有青年知识分子才是变革不合理制度的可靠力量。这无异于吹响了六十年代青年运动的号角。SDS的纲领新文件《休伦港宣言》受到了米尔斯的“公众参与的民主”理论的很大影响，它运用米尔斯的理论来分析军事—工业复合体对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无所不在的影响，批判了政治、经济和军方的特殊地位和美国公众的无



权无力状况。1963—1966年，这份文件的印数超过了十万份，在六十年代的前半期的学生抗议活动中影响巨大，是行动的纲领。“学生运动的先知”马尔库塞在六十年代更加激进地发展了这个观点。1964年的自由言论运动之后，马尔库塞更为猛烈的社会批判理论就取代了温和的《休伦港宣言》，成为学生运动的主要理论指南。

六十年代大为兴盛的黑色幽默小说用戏剧性的艺术力量和狂放不羁的风格来表现个人受到外部力量的操控，个人命运是凄凉而绝望的。它把一种生机勃勃、肆意狂欢与冷漠反讽结合起来。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在六十年代的大众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因为这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更像是描写越南战争，小说形象地预见了约翰逊政府对民众的欺诈和操纵更大规模的战争的爆发，从东京湾事件到越战秘密升级，约翰逊政府对反战的回答是战争升级，解决轰炸失败的办法是更多的轰炸，把战争升级说成是寻求和平。《第二十二条军规》符合六十年代美国人普遍厌恶军队和政府这些神圣机构的心情，海勒把人们战后对庞大而非人的社会机构带来的痛苦和核毁灭的恐惧都投射到了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字上。黑色幽默中所表现的闹剧、暴力和歇斯底里的混合，同样也存在于越南战争、伯克利和芝加哥的骚乱、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对肯尼迪兄弟和马丁·路德·金的暗杀以及约翰逊和尼克松的阴谋之中。六十年代的小说和现实都有一种历史失去了控制的疯狂感觉。黑色幽默文学就是五十年代的政治批评在六十年代的延续。

六十年代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政治上的好斗和文化上的放荡不羁之间的结合。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结合是“青年造反者的明星和精神之父”马尔库塞在六十年代红得发紫的原因。不过，马克思怎么能和弗洛伊德混合在一起呢？马尔库塞对二者的结合使革命胜利后的前景更明白了。虽然马尔库塞把资本主义技术对人

的异化批判得最厉害，但他并不是反科学的。他讲过，技术的大规模发展，既可造成更广泛的操纵，也可带来更大的自由。自动化减少了人的劳动，人民就有更多的时间来追求性的解放。社会的先进生产力提供了使人们过上富裕日子的好机会。但是，现在这种财富在以一种压制和破坏的方式运用和分配，它也使这种谋求人类最大自由的机会遭到了最有效的压制。马尔库塞对禁欲伦理最大的不满在于，机器生产使得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只需很少的工作时间就可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社会没有必要再处心积虑地压制人的欲望了，因为压抑性文明的成就已创造了废除压抑的前提。应该把工作时间降到最低限度，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爱欲。这也是马尔库塞非常支持学生造反运动和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共同认为，如果说以前所有的社会形态，比如资本主义的积累阶段，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人类需要和严酷的大自然作斗争才能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在那种社会禁欲有合理性。那么在后工业社会生儿育女已经失去经济上的意义之后，还把性仅限制在生殖范围内，就是不必要的了。应该让机器从事一切劳动，让自动装置指挥一切，使人们能够自由地谈情说爱和享福。1968年5月巴黎学生运动的起因很能够说明马尔库塞的爱欲诉求，即要求一劳永逸地打破男女生宿舍不可逾越的界限，由于生产力足够发达，革命已经不再是为了面包，而是为了蔷薇，没有必要再去遵守那些物质匮乏年代的僵化道德准则，唯有性爱和嬉戏才能带来没有异化的满足。

马尔库塞和革命青年对禁欲的看法都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完全抛弃了禁欲的宗教和哲学理由，或者是简单地把宗教、哲学原因看做是一种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欺骗民众、压抑快乐的策略。他们没有充分考虑，为何古代传统的哲人、先知在立法中都把规范民众的欲望作为立法的重中之重，为何要把人的欲求过度发展与罪恶和对城邦基础的腐蚀联系在一起，为何坚持认为不能让民



众肆无忌惮地享乐，为何要抑制经济的发展，重农抑商，为何绝不相信民众的心性能够整日泡在享乐主义的水沟中而不糜烂？

他的现代乌托邦革命并不是要从改变现在的政治经济体制开始，重中之重是要全面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结构。这是一场来自本能深处的、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的意识革命和文化革命，甚至需要不懈地寻找与统治的连续统一体的话语霸权决裂的语言。在这些反叛的方面最有能耐的诗人是彻底的离经叛道者。“垮掉的一代”作品中充斥着食物、吃、消化过程、排泄等生理的现象和各种污言秽语，根本是要用低俗的东西来轰炸彬彬有礼的资产阶级话语体系，进而使道德彻底崩溃。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两具身体》一书中指出了这种污秽的策略就是对礼仪的亵渎。因为“社会交往要求非意识的或与交往无关的（生理）器官的运作应被筛除。所以，社交给自己装备了相关的标准，这些标准构成普遍的纯洁尺度……社会化教会孩子控制那些器官的运行。其中，最不合适最讨厌的是人体废物的排泄。因此一切生理现象如排便、撒尿、呕吐及它们的产物，对正统话语而言，一律背上了贬义的标志”。<sup>①</sup>因此，“垮掉的一代”和六十年代的先锋派就是要用这些污秽的东西来冲击资产阶级的温文尔雅和彬彬有礼。这不仅是语言的冲击，更是伦理道德的冲击。因为一个人对语言的选择是和道德相关的。那些下流的意向和字眼混进了文学、新闻、私人及一切的标准英语中，越聚越多，渐渐成为人类思想和语言不能抹去的一部分，直至有一天发生爆炸，使文明和道德崩溃。苏联人巴赫金在《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中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在苏联的政治高压下，巴赫金如此迷恋狂欢节理论，在美国保守占主流的麦卡锡的时代，金斯伯格、凯鲁

---

<sup>①</sup> 萨利·贝恩斯：《1963年的格林尼治村》，华明等译，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页，注1。

亚克、巴勒斯用下流话语突围，是和巴赫金有异曲同工之处的。他们深谙马尔库塞的反抗方式，这也是“新左派”的拿手好戏。

后来反叛者为了表示自己的异类，竟然吃屎喝尿，带有色情意味的虐恋，就像电影《索多玛一百二十天》里面的反文明场景。美国人的清教精神衰落以后，转而信仰人道主义，任随欲望无限制地扩张，一般的欲望在反复尝试之后变得索然无味，刚开始也许是看电影、郊游，一般的性交往，是健康的，但也是“人性的，太人性的”。当不断地求新求变的愿望和扩展感官刺激的本能把欲望扩展到了人类的排泄物上，并把这当做是新时代的神圣，这也是西方精神衰微之时。人道主义似乎已穷尽了所有的可能，上帝死了，人们只有一头扎进粪坑。以前的“未开化”的人类崇拜上帝，据说这是人类为自己塑造的光辉的偶像，现代的先鋒艺术家们崇拜粪便，据说这有崇高的反叛意义。谁说历史是进步的？

在伯克利的一次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游行中，当游行队伍在奥克兰军用车站与全副武装的警察对垒时，为了防止武装冲突，双方都设立了警戒线。成千上万的游行示威者坐了下来，拿出吉他和口琴，开始拥抱和接吻。<sup>①</sup> 马尔库塞很看好这次游行，称其把政治上的反抗和在性与道德上的反抗结合在了一起，既败坏了资产阶级的道德，又体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反叛。以此类推，萨德就是最伟大的革命家，甚于马克思。

1964年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中，青年对着校园里的扩音器向要逮捕他们的警官朗诵《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性描写，也是符合马尔库塞的心意的。而1967年在华盛顿举行的示威游行中，有示威者冲上五角大楼前的升旗台，升起越共的旗

---

<sup>①</sup> 马尔库塞《暴力与激进的反对派问题》，见《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第四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88~289页。



帜，一对青年男女在草地上当着目瞪口呆的军警做爱。这些行为都极具象征的挑战性。

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的描写意大利 68 份子的小说《内心生活》，也用小说的形式形象地诠释了马尔库塞的反抗原理。女主人公德西黛丽亚为了反对资产阶级道德，身体力行地亵渎宗教、家庭、婚姻、货币、爱情和道德教养，她在教堂做弥撒时撒尿，用尿浸过的手指画十字，和养母乱伦，用钞票作手纸，为了侮辱资产阶级道德而卖淫。她在和一个左派青年私奔的路上，对男友一路大谈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很不耐烦，她打心眼里鄙视这个资产阶级左派青年的那种“只说不练”的革命作风。到了那个男孩的家中，德西黛丽亚以色相来引诱男孩，使他答应在其父母的床上做爱，并且让他对着父母睡的枕头撒尿，还要对父母的合影照吐口水，以此来亵渎资产阶级的道德和家庭的神圣性，并把这种亵渎看做是比政治革命都更深刻得多的文化革命。德西黛丽亚还把象征古典高雅文化的书拿来作手纸，以“粪便学”方面的惯例象征性地侮辱从古至今、所有时期、所有地区的高雅文化，用整个文化擦屁股。可以说德西黛丽亚最符合马尔库塞对青年寄予的“大拒绝”的厚望。马尔库塞看到青年们抗议越战、焚毁征兵卡还嫌不够，进而提倡抵制国家死气沉沉的语言，蓬头垢面，拒绝为资本主义社会服务的教育。<sup>①</sup>

罗莎琳·德雷克斯勒的戏剧《家庭电影》于 1964 年在格林尼治村的贾德森纪念教堂上演，在这一个滑稽剧中，教会和家庭都受到亵渎。父亲失踪后，母亲和女儿就认定他死了，她们快乐地宣泄着彼此间的仇恨。母亲、黑人侍女、未出嫁的女儿都为得到家中吊唁的男人们的宠爱而竞争。而修女和神父则在厨房里

<sup>①</sup>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1966 年政治序言），黄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第 8 页。

调情。该剧似乎以父亲的失踪象征男权的衰落和快乐女权的兴起，和男权文化捆绑在一起的家庭和宗教都色情化了。这种对资本主义男权文化的攻击也是循着马尔库塞的思路的。著名的黑人先锋戏剧家勒鲁伊·琼斯在1964年创作的荒诞派喜剧《洗礼》中对基督教进行了激烈的亵渎。剧中一个要求受洗的15岁男孩，每次向一个荒唐可笑的牧师忏悔、祈祷时都要手淫。一个虚伪信教的老妇人，对男孩予以痛斥，但又在男孩描述其罪孽的色情细节时，兴奋得昏倒在地。一群“格林尼治风格”的年轻女子齐声宣称这个男孩是“复活的基督”，她们的丈夫。<sup>①</sup> 六十年代反家庭、反教会和反社会的模式都是要把性扯进去，充满了色情，如罗斯·赖斯的电影《查拉琴》、《示巴女王会见原子人》，杰克·史密斯的《热血造物》，以及卡罗莉·施内罗的舞蹈表演《肉体的欢乐》中，都是以群交为特征。六十年代的先锋文化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表现自由，随处是淫秽的语言，裸露的身体和刺耳的政治评论。1967年8月，嬉皮士杰瑞·鲁宾和阿比·霍夫曼对纽约股票交易所发起进攻，将美元乱丢在地上，继而点火焚烧，以示对资产阶级货币的侮辱和蔑视。在六十年代的后半期，这种反文化运动蔚然成风。

在瓜塔里和德勒兹合著的《反俄狄浦斯》一书中，二人对精神分裂者作出如下定义：“什么是精神分裂者？他首先是一个不能再忍受‘这一切’——金钱、证券交易所、价值、道德、祖国、宗教和过时的信念的人。”<sup>②</sup> 这种解释很巧妙，哪种人最符合这个定义？“新左派”。年轻的造反者被瓜塔里和德勒兹赋予了道德和先知的意义，这些清新的力量将领导妇女、囚犯、精神病

---

① 萨利·贝恩斯：《1963年的格林尼治村》，华明等译，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

② 让-皮埃尔·勒·戈夫：《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胡尧步、韦东、高璐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第304页。



者、黑人、同性恋战胜邪恶力量，走向快乐的乌托邦。马尔库塞和瓜塔里与德勒兹、福柯等人的学说，都是六十年代的“显学”和时代精神。

马尔库塞的解放不仅是弗洛伊德的，也是马克思的，隶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乌托邦思想。在那个后革命国家中，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马尔库塞对两者的结合使他的学说既充满了马克思崇高的道德义愤色彩，又结合了弗洛伊德的快乐，成为一个既快乐轻松又崇高的学说，自然广为新左派和年轻人欢迎。<sup>①</sup>这样，暴力与性就在马尔库塞那里以哲学的高度结合在了一起，“打砸抢”是革资产阶级的命，无压抑的性快乐既是终极目标又是摧毁资产阶级道德规范的利器。性和暴力，也就成了属于六十年代哲学家马尔库塞的题中之意。他对资本主义的“大拒绝”以及对“快乐原则”的宣扬，使他最符合大学生的胃口，被称为“青年造反之父”和“国际新左派运动的发起人”。就如同旧金山诗歌复兴的诗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斯的写诗目的：“一是为了吸引女人，二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sup>②</sup>吸引女人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就是马尔库塞的“六十年代”哲学方向。

嬉皮士的“群居村”应该说最好地实现了马尔库塞的理想，真正没有了工作的压力，拥有的全是闲暇，不受任何压抑，随时可以享受和各种各样人的性爱。嬉皮士理论家杰里·鲁宾把马尔库塞的性解放理解成今后机器将操纵一切工作，而人们则在他们喜欢的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自由交媾，在办公室、在田间、在工

---

<sup>①</sup> 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方晓光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4~75页。

<sup>②</sup> 比尔·摩根编：《金斯伯格文选——深思熟虑的散文》，文楚安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页。

厂、在国旗下……随心所欲地纵情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

在各地的公社会议上，鲍勃·迪伦  
将把国歌代替  
监狱、法庭和警察将无踪无影。  
白宫将成为一个临时住所  
使华盛顿无家可归者得以栖身。  
世界将变成一个大公社  
免费食物、住房、所有一切人人有份。  
全部钟表都被砸毁。  
理发师将去休养营地  
长长头发沐浴于胜景。  
由于一切物品取用自由  
“偷窃”罪刑警匿迹销声。  
五角大楼将变成一个 LSD 实验农场。  
由于整个世界将变成一个教堂和学校  
众多的学校和教堂将荡然无存。  
人们将耕作于晨，午后作歌，  
时时刻刻皆可随心所欲做爱销魂。<sup>①</sup>

注意这首诗的最后两句，特别符合乌托邦的传统……对照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中对未来的“水晶宫”的描绘就一目了然了。嬉皮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个问题上竟然殊途同归。

群居村的一些思想来源，如新左派观念、公有制经济观、性

---

<sup>①</sup> 转引自吕庆广：《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298页。



自由等，都可以在马尔库塞的“时代精神”中找到。在马尔库塞1979年逝世时，一位前造反派成员深情地缅怀他：“在六十年代，马尔库塞证明我们有理……马尔库塞为我们所有不同的说不清的幻想和爆炸性的主张提供了哲学和历史证明……”<sup>①</sup>这种缅怀类似于现在中国的许多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很怀念以前的火红青春，也怪不得马尔库塞被称为“三M”之一。在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一书末尾，他把无赖游民、下层市民、有色人种中的被剥削者、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视为革命的动力。而这些人确实是在六十年代最活跃的群体。

让人觉得奇怪的是，以马尔库塞为首的法兰克福学派一直在为学生造反制造理论依据，为什么造反的大学生要去他们的巢穴——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捣乱？为什么该派领袖阿多尔诺于1969年发表演说时，SDS的几个女成员赤裸上身冲上讲台，阻止了他的讲话？

诸如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虽然整天都在干唆使年轻人造反的工作，不过他们也许并没有看清把他们的理论运用到大众身上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他们毕竟是老一辈的人，从小在德国耳濡目染地感受过不少高等教育，还不至于彻底反对高等文明，当他们看到大学生的真正文化面目——乱交、摇滚、毒品、同性恋，反文明——之后，也都慌了手脚，有的高喊“法律和秩序”，有的委身于教会的怀抱。阿多尔诺在写给马尔库塞的一封信中，哀悼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被爵士乐和垮掉派取代了。哈贝马斯也大骂这些年轻人是“左派法西斯主义”。他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还没有辨清嬉皮学生的真正动向，大赞其反资产阶级有功，坦率，有自发性，正直；待知道其真正风向

---

<sup>①</sup> 转引自吕庆广：《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后，又大骂他们是虚无主义者，理智上无能。青年学生对这些遗老也不买账了，大呼：“教授，您老了。”虽然这些“老左派”对资产阶级的攻击和揭露唤起了新左派的同感和中产阶级大学生的愧疚感，不过老左派都是站在旧文化的角度去批判资本主义的，而新左派最恨的就是这些使之不得开心颜的“伟大传统”。二者的交恶是不可避免的。<sup>①</sup>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的哲学非常前卫和时髦，迎合和武装了资产阶级的公子哥儿和小姐们，但是这些思想家们严格说来不能算是“新左派”。思想的内容是“新左派”的，但他们的心性还没有跟上他们过于超前的思想，仍然是“老左派”的。在六十年代的后期和七十年代他们也很失落，为工人和学生不能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而感到遗憾和不甘心。他们没有看出这场文化革命的性质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并不是传统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格瓦拉精神不过是被利用而已。法兰克福学派理想还是要把马克思的意义进一步挖掘，“解放”人类。但是他们自身也许都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进一步推论和挖掘的结果，即马克思主义潜在的意义是建立在人本主义哲学之上的。

### 三、性的问题

《爱欲与文明》是马尔库塞在1950—1951年间的一系列讲座的基础上写成的，于1955年出版，而赫夫纳在1953年创办了《花花公子》。这两个同时期产生的著名作品都赞成一夫一妻之外的性爱。不同之处在于，哲学家用的是理论文本，而色情业出版

---

<sup>①</sup> 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3~44、85页。



商用的是图片文本。不过，马尔库塞没有忘记警告人们，肉欲的狂欢可能变成完全没有思想的休闲活动，一种不断复制的盈利式的性自由，甚至可能转化为一种新的奴役力量。其实《花花公子》就是一种不断复制而又花样翻新的盈利式的性自由和没有思想的休闲活动，它欢快地拥抱性的解放，只反对对享乐的压抑。它的直接影响可比《爱欲与文明》大多了。在六十年代身体力行性革命的人群中，大多数都是受《花花公子》的影响。<sup>①</sup> 如同《花花公子》的广告所说：

花花公子是什么人？他仅仅是一个饭桶，一个玩世不恭的爱赶时髦的游民吗？大错特错。他可以是一个精明的年轻经理，一个艺术家，大学教授，建筑师或是工程师，他要想怎么着，他就能怎么着，他必须视生活充满乐趣时光而非泪之溪谷；他必须在生活中寻求乐趣而非视之为生活的末日。他得是这样的人：警觉而明细事理，鉴赏力强，爱好享受，而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我们的花花公子指的就是这群人。<sup>②</sup>

《花花公子》的顾客们即将成为社会的主流人士，其理想是要囊括所有的男性，他们都是快乐的人，一致反对清教伦理的禁欲主义。《花花公子》的广告理念是与五十年代中后期的时代精神完全合拍的。1978年12月，在《花花公子》创刊二十五周年庆典时，其创始人赫夫纳这样回忆当年的创刊宗旨：“它不但反映，而且将影响美国社会在性方面的诸种变化；但是它的主题首

---

① 理查德·凯勒·西蒙：《垃圾文化——通俗文化与伟大传统》，关山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155页。

② 罗素·米勒：《男人王国的兴衰——记世界第一色情杂志〈花花公子〉内幕》，海天译，沈阳：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先是欢乐，我们的清教徒传统是反性意识的，反嬉戏、反娱乐，它压抑人的天性。《花花公子》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sup>①</sup> 由于迎合了时代的欢乐潮流，因此，它的月销量在1960年底的就达百万册，在鼎盛时期达到了七百万册。它对青年学生的性革命影响尤其大，25%的杂志都销往大学校园。

马尔库塞和《花花公子》在知识分子和大众中分别宣扬了性开放的观念，呼唤着六十年代的到来。在麦卡锡主义的鼎盛时期，《花花公子》的出版是不大现实的，当时的读者只能在谈论自然与健康的杂志上看到裸体照，如《日照与健康》《摩登日光浴》等等，而麦卡锡倒霉后，时代马上充满了欢乐，充斥电台的只有不是失恋就是热恋的流行歌曲，1954年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也获得了通过。《花花公子》极大地推动了女人们去除紧身胸罩、穿上三点式、超短裙、袒胸露背。《花花公子》的创刊号封面是玛丽莲·梦露的玉照，整个中心页面是梦露的全裸照。在这以前，美国男人是很难在杂志上看到这种有极度挑逗性的裸照的。到了六十年代的时候，裸照就随处可见了。因此赫夫纳自觉他的杂志对妇女解放功劳最大，对女权主义者来闹事很不解：《花花公子》为女性解放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不论是衣装还是性的革命，都使女人从狭隘的父权家庭中解放出来了，妇女们怎么能够把《花花公子》都付之一炬呢？<sup>②</sup> 赫夫纳相信西方历史上的性压迫就与对妇女的压抑有关，因此他办的《花花公子》也会解放妇女。从赫夫纳的纳闷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妇女解放运动与性解放的密切关系。只有少数的妇女的解放才能够往高级的方面走，大多数妇女是不可能从心智和灵魂上解放自己的，永远都

---

<sup>①</sup> 转引自约翰·霍尔姆斯：《这就是“垮掉一代”》，见文楚安：《“垮掉一代”及其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279页。

<sup>②</sup> 罗素·米勒：《男人王国的兴衰——记世界第一色情杂志〈花花公子〉内幕》，海天译，沈阳：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162页。



是自身的奴隶。她们的解放，不过就是穿得更暴露些和在性方面更开放罢了。实际上妇女杂志也继《花花公子》和《阁楼》之后大办色情刊物，她们也要消费男色，以达到平等。1972年，《世界主义者》登出了第一张裸体男人相片，马上就销售一空。也出现了模仿《花花公子》的《花花少女》和按照《阁楼》风格制作的色情刊物《维娃》。而只要是性方面直露的东西，都会受到市场的欢迎，男人女人都会喜欢。妇女解放运动是一个群众运动，它不是要求众多的妇女都变成男性中的精英——贝多芬和但丁，而是要变成像花花公子一样的花花少女。女嬉皮士弗兰基·戈达尔回想起自己在六七十年代的性开放，把这部分归结为女性主义者教诲的结果：“这就是女性主义者教你的：你自己以为自己是在向男人回击，结果却觉得自己像个娼妇。”“现在的妇女杂志上全是些令人作呕的东西。全是要教给你怎样在床上过得愉快，怎样有一次满意的性交，这种吵吵闹闹的陈词滥调。”<sup>①</sup>

美国人也普遍地把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作为是最科学的论述，并把它改编成了美国版——压抑性冲动不利于身体健康。赖希也是一个力图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家。他认为马克思的政治和经济革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还要顺着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对社会和家庭进行革命。他的家庭革命的观点主要来源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赖希认为，革命的根本目标应该是消除性压抑，因此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性革命。为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消除社会、家庭对人的本能欲求的压抑。这就是他的相对于马克思“宏观革命”的“微观革命论”，微观革命不仅包括性革命，也包括文化革命、教育革命和思想革命。当然，在这些革命中，性革命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革命都必

---

<sup>①</sup> 詹姆士·克利夫德：《从嬉皮到雅皮——昔日嬉皮士自述》，李二仕、梅峰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9页。

须围绕性革命来进行。他认为，只有把马克思的“宏观革命论”与他自己的“微观革命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革命的终极目标。<sup>①</sup> 赖希不仅在思想上提倡性革命，而且积极地领导和参与宣传活动。在1929—1930年间赖希在维也纳发动和领导了“心理—卫生运动”，在柏林领导了“性—政治运动”。在“心理—卫生运动”中，他为人们争取妊娠中断权、避孕权、自由恋爱权。在1930年的“世界性改革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提出了“性改革”的初步纲领，要求男女平等，消除对未婚母亲和非婚生儿童的歧视；废除限制计划生育和人工流产的法律；开展积极的性教育；改革结婚和离婚法。之后赖希到了柏林，展开了历时四年之久的“性—政治运动”。他征得德国共产党的同意，于1931年在柏林成立了“德国无产阶级性政治联盟”，自任总干事，到处接见青年，组织讨论会。他把精神分析学作为是“性—政治运动”的母亲，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是父亲。该运动提倡免费向人们提供避孕工具，完全要求把生育和性行为分开。废除对堕胎的禁止，用治疗取代对性犯罪的惩罚。<sup>②</sup> 可以看出，赖希提倡的这些革命意见对于性解放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他看到了强制性道德的基本因素就是把性行为与生育联系起来，所以，性革命的前提就是把两者分开，而赖希做的主要就是这一点，并且以后全世界的性解放就是循着这条道路来走的。赖希于1957年因为性问题死在了美国的监狱里，当时并没有被传媒当做一件大新闻，因为对他感兴趣的只有赖希派的精神治疗者和一些喜欢披头士的年轻人。他是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才火起来的，他的文章和传记纷纷出版，如《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性格分析》和

<sup>①</sup> 张和平：《论赖希的“性革命”说》，《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3月，第27~28页。

<sup>②</sup> 张和平：《论赖希的“性革命”说》，《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3月，第30~31页。



《性革命》，都被年轻人奉若圣经。

另外以重新诠释弗洛伊德而闻名的还有《生于死的对抗》一书的作者布朗，他对赖希和早期弗洛伊德所提倡的性解放颇有微词，对于布朗来说，性解放应该是多种形式的变态。他书中的弗洛伊德理论，带有了实践高于理论的美国味。马尔库塞、赖希和布朗都攻击性与生殖相联系，性与传统道德和基督教相联系，他们都希望要自由地享受性快乐。

五十年代，《洛丽塔》《赤裸的午餐》《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北回归线》《南回归线》等许多在美国长期遭到禁止的作品纷纷发表。《洛丽塔》（1955年）中的亨伯特与凯鲁亚克《在路上》中的迪安·莫里亚蒂遥相呼应，他们强烈的性冲动不顾道德的约束。纳博科夫在引言里说，亨伯特是“卑鄙的，他是道德堕落闪光的典型，是残暴和机智的混合体……”<sup>①</sup>作家通过亨伯特之口把基督教的婚姻贬低成“有规律的生活，自家烧出的菜香，婚姻的全部协约，能预见疾病的床上活动”——“谁知道呢，一些道德价值或精神替代品，我想，即使不能清楚我下流的欲望，至少也许能帮我将它们控制在平和状态。”<sup>②</sup>亨伯特完全是从性和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待婚姻的，不再有基督教的虔诚。洛丽塔这个小姑娘也是战后流行文化的产物，尤其是在性方面的享受和物欲方面。洛丽塔像典型的美国少女一样，既有一股充满诱惑力的天真，又有一种粗俗放肆的庸俗感，二者结合起来正代表着新文化的暧昧，而这种暧昧正是六七十年代反正统文化的典型特色。这种特色是从笑话书、广告和滑稽片上那些扭捏作态中学来的，她是伴着爵士乐、方块舞、甜腻的奶油冰淇淋长大的，讨厌农村，

---

<sup>①</sup>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引言），于晓丹、廖世奇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sup>②</sup>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于晓丹、廖世奇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对任何程度稍高的文学都很反感。亨伯特认为她将来会成为一名摇滚乐狂。

洛丽塔就读的学校在五十年代就已经强调四个“D”：戏剧、舞蹈、辩论和约会（Dramatics、Dance、Debating、Dating）。这个学校的女校长认为，约会、赴约、约会服装、约会礼节对于小女孩来说意义重大，就如同商业之于商人的意义，或她的学生们的幸福给她带来的收益。这个校长的教育理念完全是商业性质的。学校要求女孩子们“自由地与周围活生生的世界交流，而不是一头扎进发霉的故纸堆里”。这种教育思维纯粹是以生物体和社会学的观点进行思考的，已经清除了传统上赠给女子的大量格言警句，好像这些格言是与将来寻找好的丈夫和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格格不入的。一颗星球的位置固然重要，但冰箱摆在厨房的最佳位置对于未来的家庭主妇更重要。因此，洛丽塔进入这个学校，也就热情地拥抱热狗、麦芽糖、可口可乐、海滨毛毯会和法式观摩会。<sup>①</sup>

现在“洛丽塔”少女文化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的潮流。在我国广州举行的华南地区春季动漫嘉年华活动上，就有许多少女扮“洛丽塔公主”，她们展现着蝴蝶结的甜美，蕾丝的雅致和蓬蓬裙的怀旧。全国有许多商店名字直接就叫“洛丽塔”。

现代政府在电影、电视这样的大众传播媒介上的检查尺度往往要比文学、哲学等通过文字传播的媒介要严得多。因为电视、电影已经是最后一道防线了。人们必须接受严格的学术教育才能理解文字的秘密，这是一个缓慢的、甚至是痛苦的学习过程。在学习的同时，人的自我约束和概念思维的能力也得到了丰富和扩展。看书的怎么也没有看电视的多，书籍没有图像媒体那样形象

---

<sup>①</sup>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于晓丹、廖世奇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204页。



和直观，对一般人也没有那么大的煽动力。比如说，看过《飞越疯人院》和《洛丽塔》的电影的人就比看过书的人多得多，而且电影的画面比书更有煽动性。图像在“海淫海盗”方面天生就比书本要强得多，越是冲动和直观的人就越容易受其影响。因此对影像媒介的审查制度可以保护精神羸弱容易感染的人民。书的开禁要比电视电影的开禁要容易得多，时间上也占先。美国的电影审查制度一直都很严格。不过，1952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在裁决一部被天主教认为是亵渎神圣的意大利影片时，宣布电影也受宪法保护，享有表现自由的权利。这是最高法院第一次在电影的性尺度上开了绿灯。1957年，又改变了对“猥亵”的法律规定。这种新的观点认为，性的镜头只要是出现在一部有价值的作品中，就不算是猥亵。可是，哪部电影都可以说是有意义、有价值的，那不是所有的电影作品中的性表现都不算是猥亵了？在保守的五十年代，制片商们还是对地方政府的更守旧的地方法律有所忌惮，有所收敛。经过了肆无忌惮的、冲破一切禁忌的六十年代，在电影的性表现上搞大动作的时机成熟了。到了1968年，在美国电影协会主席杰克·瓦伦蒂的领导下，好莱坞采取了影片分级制度，从此之后，好莱坞便充分利用这种性表现的自由，大拍标明16岁以下的人不得观看的X级影片，深受观众欢迎。<sup>①</sup> X级影片《我很好奇》，描写妇女与牲畜性交的电影《迷迭香婴儿》，交换妻子的喜剧《鲍罗、卡罗尔和特德、艾丽斯》，《爆炸》《深喉》《调皮姑娘》《呵，加尔各答》《Che!》这些影片全是不折不扣的色情影片，却都获得了公映的机会，深受人们的欢迎。在分级制度出来以后，被评为最健康安全电影却最不叫座，都有亏本的可能。曼哈顿有两百家24小时营业的成人书店，路旁

<sup>①</sup> 刘绪贻主编：《战后美国史——1945—1986》，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8页。

的放映机放映二角五一看的黄色影片。六十年代的民众内心充满狂暴的欲望。《深喉》这部 X 级成人电影，在七十年代掀起新一轮性解放的高潮，它第一次大规模地将中产阶级主妇们吸引到电影院里欣赏这类黄色电影，一向引领时尚的肯尼迪的寡妻杰奎琳·肯尼迪也没有落下。这部投资仅为 2.5 万美元的制作，最后获利 6 亿美元，创造了商业奇迹。不过影片中的女主演 Linda Lovelace 后来称自己拍《深喉》是受到了前夫的催眠和胁迫。真是该为这部电影喝彩，因为其有助于使倡导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权主义者大跌眼镜。

美国的“地下电影”也走向反叛。在四五十年代尚热衷于探索内在美学，属于是具有知性意义的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电影。五十年代末，一种表现表层意义和社会参与的电影兴起了。而六十年代的电影就更进一步，以更激进的方式来表现政治，对性道德、家庭生活以及职业道德进行肆无忌惮的嘲笑和攻击。苏珊·桑塔格对“地下电影”《热血造物》的评论把它带离了地下状态并成为媒体注意的中心。这个六十年代的活跃分子大肆吹捧这个电影把反道德与视觉形象的丰富性紧密结合。表现技术又先进，有意识的原始风格，用的是摇晃的摄影镜头。1963 年 5 月，乔纳斯·梅卡斯在《关于波德莱尔的电影》中宣告了一次电影革命的开始，这些浪荡子也把他们的传统给抬出来撑腰了，波德莱尔、兰波、萨德、巴勒斯，都属于是“超越善恶”的传统。他宣称：

罗思·赖斯的《示巴女王会见原子人》、杰克·史密斯的《热血造物》、肯·雅各布斯的《美中不足》、鲍勃·弗莱斯彻的《金蛇美女》，这四部电影构成了当今真正的戏剧革命。这四部电影让人大开眼界，并直陈了美国艺术中从未记录过的感觉和经历。这是波德莱尔、德·萨德侯爵和兰波一个世纪前赋予美国文学的内容，

也是巴勒斯三年前赋予美国文学的内容。这是一个恶之花的世界，一个启迪精神的世界，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肉体的世界；它又是一部诗集，既美好又可怖，既善良又邪恶，既精美又污秽……<sup>①</sup>

美国的电视也经历了解放的过程。五十年代美国的电视节目还比较健康，家庭喜剧、西部影片、儿童节目、新闻、卡通、戏剧、运动、音乐等，全家老少都可以在一起观看，而六十年代的电视里充斥着大量的流血和恐怖，关于怪诞家庭的公式化喜剧，性虐待和谋杀，更多的暴力和动画片，乡村喜剧和春宫画片似的场面，没完没了的广告节目，充满尖叫和勾引。三大电视广播网都在费尽心思寻找观众最低级的共同趣味，而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开始逃避电视。

五十年代的大学还保留了一些贵族文化的特征，有绅士和淑女风范。以希腊字母命名的兄弟会和姐妹会构成了最基本的校园活动，他们注重门第，讲究男女社交礼仪，热衷于舞会和校内外的体育比赛。当时校园的主流还不是六十年代大行其道的毒品、摇滚和性狂欢。男生身着深色外衣，脚蹬白运动鞋，还是一副很青春的打扮。长期以来，美国女性的穿着打扮一直都很保守，比如说，女裙一直是在尘土里拖曳或低垂到脚踝上。在五十年代的大学校园，女生的普遍装束是卷发、毛衣和齐膝的短裙，尚有淑女气质。这和六十年代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越来越多的人涌入美国，迷恋那里的阳光和沙滩，比基尼也随着他们在美国流行开来。那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流行着一种以性感为中心的海滩文化。到 1964

---

<sup>①</sup> 萨利·贝恩斯：《1963年的格林尼治村》，华明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213页。

年的时候，美国的时装杂志上几乎都是裸露的乳房，1965年迷你裙风靡一时，后来发展到了“遮羞裙”。在纽约的舞台上，女演员们开始表演脱衣动作，电影院门口排着长队买露骨的《我很好奇》的电影票。

#### 四、先锋艺术：“垮掉的一代” 与嬉皮士之间的桥梁

在摇滚乐出现以前，五十年代的主流音乐界是歌舞升平的，经常表现的是单纯的爱情，音乐不带威胁和暴力，《到我家里来》和《别让星星进入你的眼睛》这样的抒情歌曲还可以在成年人中流行。不过，黑人音乐在暗中兴起，并得到了“垮掉的一代”和一批前卫白人青年的大力吹捧。日益成为市场主宰的青少年不是对白人文化而是对落拓不羁的黑人文化越来越感兴趣，一向只面向成年白人的音乐市场也开始转向青少年。黑人音乐，尤其是节奏布鲁斯，在后来演变为摇滚乐。布鲁斯也把黑人音乐的风格带进了摇滚乐，这种音乐里虽然充满了失败和沮丧感，但本质上并不悲观：纯粹的肉欲力量用一种辩证的方式把悲哀与忧伤的重负转化成了对性和快乐的肯定态度。B. B. 金的《可爱的小天使》就流露着这种下层人的快乐精神：

向我的宝贝儿要一角钱，她却给了我一张二十美元的纸币，（两遍）

向她要一小杯酒，她却给我买了满满一瓶威士忌。<sup>①</sup>

---

<sup>①</sup> 转引自迪克·庞坦、大卫·罗宾斯：《酷天下——对一种流行的生活态度的剖析》，吉晓倩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一个传统的白人清教徒，如果自己挣不到钱，要向相好的要钱买酒喝，他一定会无地自容。而黑人们长期处于底层，只要一有钱就去喝酒，进妓院，长期以来尊严感也麻木了，因此这段布鲁斯音乐中流露出的既有一种厚脸皮，又有一种因自己的魅力可以使相好的给自己钱给自己买酒的炫耀，还有一种不讲面子单纯享受酒的快乐。六十年代的嬉皮士们拿着救济金，还照样兴高采烈地狂欢，也就是吸收了这种黑人文化。这也是新教的劳动伦理衰落的结果。白人也丧失了传统的廉耻心，只追求眼前的快乐。

讲述一群青少年强占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影片《黑板丛林》在青少年中获得了巨大成功，片中的摇滚乐曲《昼夜摇滚》也随之走红，这首曲子于1955年7月在流行音乐排行榜上获第一名，标志着摇滚乐时代的开始。比起后来摇滚乐的发展来说，五十年代的摇滚乐算是比较温和的，主要是反映了青少年对家长、老师和学校的反叛，然而在六十年代摇滚乐普遍把整个社会都作为了对立面。这说明，摇滚乐一开始就旗帜鲜明的属于是青少年的反叛文化。日后它成为六十年代的时代音乐，和民权运动与反战抗议步步相随，又与致幻剂LSD相结合，形成“迷幻摇滚乐”，成为嬉皮士的最爱。七十年代青年反叛运动退潮以后，摇滚乐也逐渐淡出，这充分说明了二者的紧密关系。

五十年代末期，理查德·蔡斯预言五十年代不过是一个过渡时代，青年们终有一天会从丰裕的物质财富和温暖的家庭中走出来。同时，蔡斯也极力想把先锋艺术政治化。就算人们从政治退到先锋艺术中去，他也希望这是一种叛逆和对社会敌对的艺术。

先锋艺术也是六十年代青年运动的火种之一。“先锋派”（Avant Garde）是西方现代艺术流派之一，最初用以指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和俄国的带有政治性的激进艺术家，后来指各时期具有革新实践精神的艺术家。奥登（W. H. Auden）把先锋派称为“种族的触角”（The antennae of the race），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泛指最新的，具有反叛性的文学艺术现象。从这种意义上说现代主义也就是“先锋派”。它包括了“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派，意识流派，荒诞派等等”，其倾向就是反映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自我间的畸形的异化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情绪和虚无意识。“先锋派”的艺术特征表现为反对传统文化，刻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及欣赏习惯；片面追求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新奇；坚持艺术超乎一切之上，不承担任何义务；注重发掘内心世界，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其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知觉化，以挖掘人物内心奥秘，意识的流动，让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的特点，难于让众人理解！来自美国马凯特大学的美学教授柯提斯·卡特（Prof. Curtis Carter）在题为“先锋艺术与美国文化”的讲座中指出，作为二十世纪以及以后艺术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先锋艺术以两种方式展开，即挑战和尝试利用传统艺术，同时通过革新来生成新艺术。在其对新颖和过去的艺术形式显得过时的追求中，他与工业产品和时尚产业齐头并进。

因此，先锋艺术就是激进主义的文化形式。<sup>①</sup>其实早在五十年代，垮掉派就已经紧密地结合了四十年代的爵士乐和抽象派的表现主义，预示了六十年代造反运动与先锋艺术的更大规模的结合，先锋艺术更彻底地走进了更广阔的世界。垮掉派作家在他们的诗歌和小说中努力追寻着爵士乐的即兴风格，他们也吸收了在一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占主导地位的抽象派表现主义，在那种绘画的即兴艺术中，绘画被作为一个事件和阅历，而不是一件经

---

<sup>①</sup> 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方晓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3~61、63~64页。



过艺术加工而完成的物体或对一种形象的直接表述。行动绘画派的创始人杰克逊·波洛克 (Jackson Pollock) 摒弃了画架、调色板、画笔等常用工具，将沙、玻璃碎片等掺杂在颜料里，调和成一种黏稠厚实的液体。将画布钉在地上，围着画布走动，用棍棒蘸起油漆，任其在画布上流淌。事先，行为艺术者也不知要画什么，得看情况而定。垮掉派作家就是学习他们把创作过程中的动态、活力及主观性作为创作本身富有意义的因素。巴勒斯是这样作画的：把装油彩的罐子挂在画布前，然后举枪射击，油彩飞溅到画布上，一幅画就画好了。凯鲁亚克在四十年代早期就对查理·帕克、莱斯特·杨、迪西·吉列斯皮和西隆尼亚士·蒙克的疯狂爵士乐很感兴趣，用语言来模仿爵士乐不绝如缕的演奏，被金斯伯格称之为“脱口而出的波普爵士乐诗体”。1951年4月凯鲁亚克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在一卷120英尺长的描图纸上把《在路上》一气呵成，连段也不分，堪与《在路上》中的车神尼尔·卡萨迪的飞车风格相提并论。速度与激情，稿纸在地板上摊开，好像一条路，即兴创造，无拘无束。金斯伯格的《嚎叫》和巴勒斯的《裸露的午餐》也深受《在路上》这种即兴风格的影响，这种风格也深深地影响了鲍勃·迪伦的摇滚乐。金斯伯格很能适应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书写文化向音像文化的转向，他常常选人多的地方配乐朗诵和演讲，运用了夸张的肢体动作来制造噱头，赤身裸体，把诗朗诵、音乐和表演技巧融为一炉，很快就成为“媒体英雄”。金斯伯格和鲍勃·迪伦合作，把英国诗人布莱克的《天真和经验之歌》谱成了乐曲，他们都在通俗文化的天地中找到了立足之地。其作品成为正在发展的反正统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对青少年有很大的吸引力。<sup>①</sup> 当这些先锋艺术不仅在美术馆

---

<sup>①</sup> 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七卷，孙宏主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177页。

与剧院出现，也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学、工作场所、厨房出现，在进入了大街小巷时，它就是六十年代抗议的文化风格了。创作的过程就是展现一种风格的过程，行为艺术越是标新立异，就越受到欢迎。

在当代，没有扎实基础功的“艺术青年”被鼓吹为涂鸦的绘画天才，因为涂鸦是一种民间流行的艺术形式，其价值不亚于米开朗琪罗的作品。这种追求花哨的形式、崇尚灵感即兴创作的风气继承了凯鲁亚克、金斯伯格的随意狂放。他们都是一些坐不住的人，整天就想“在路上”，不可能像米开朗琪罗、但丁、达·芬奇等伟大艺术家那样虔诚地钻研作品，把毕生的精力倾注在精雕细刻的作品中。这些垮掉派艺术家狂饮一气，再吃点致幻剂，就可以在纸上发泄一通。古典的伟大艺术家，如莫扎特，时常也进行即兴创作，不过那是因为他们生于伟大的时代，那还是西方的文化源泉尚未枯竭的时候，这些天才深受传统西方文明的滋养，再加上平日的刻苦学习和良好天赋，伟大的作品自然可以从指尖流出。到了垮掉派生活的二十世纪中叶，西方文明的源泉正是快要枯竭的时候，这些垮掉派成员平时大都是放荡不羁，学养很差。他们的即兴创作，质量颇受怀疑。

这些涂鸦艺术家也不会像那些伟大的艺术家那样，把最美好的人类情感、道德、智慧都凝结在不朽的作品中，在创作的过程中升华自己，剔除自身的缺点。他们最擅长于把个人污秽的想象化在烂醉后的污言秽语中，不断地挑战审查制度和民众道德的防线，以至于最后已经没有禁忌可以被冒犯了，他们已经穷尽了一切淫词秽语和色情幻想。传统的宗教压制这些污秽不堪的想象，斥之为病态的好奇，使人从小就养成有利于超越肉体的好习惯，长大自然地就会排斥这些东西，把精力集中在人的精神方面。而这种努力却被垮掉派说成是虚伪，他们的理由是，怎么犹太教徒、清教徒、天主教徒就不吃饭吗？就没有性吗？为什么不敢说



出来呢？世人却认为他们最真诚。其中以金斯伯格和巴勒斯最污秽最色情。金斯伯格固定的招数是：拿一部分反权威制度的话语，一部分色情的粗俗话，一部分污言秽语和肮脏货色，把它们粗制滥造地搅拌在一块，瞧！——一本诗集。然后古根海姆奖，全国图书奖，当上美国文学艺术学会的会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长期以欧洲艺术为高雅艺术的向导，而传统的美国艺术，如美洲的印第安人艺术、黑人艺术、流行的大众艺术，都被认为是拿不上桌面的低级品。战后美国上升为超级大国，从虚妄的民族自豪感出发，就要求抬升自己的民族艺术地位。使美国艺术区别于欧洲艺术的一个方法是，采用现代先锋派的原始主义策略，把这些民间艺术置身于好像是很独特的美国式传统中。当然，必须给它弄上一层先锋的色彩。另外，六十年代追求平等的时代精神使民俗传统和流行传统拥有了道德和政治价值的色彩。

现在的第三世界国家也纷纷学到了这种策略，到处打出“民俗艺术”的招牌。当他们在强势的欧美文化的挤压下抬不起头时，就伙同西方的那些猎奇的“东方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吹捧那些民间艺术和手工艺品，常常是把一个古镇上刺绣的老太婆说得比贝多芬、达·芬奇还要伟大得多。第三世界的人民找到了虚妄的民族自豪感，而那些猎奇的半瓶醋的学者则俯身关怀了处于文化劣势的人民，显示了自己的正义与平等。当然，这一切都必须弄得很时尚，把古老的东西和时髦的风格混在一起，主要是有利于旅游开发，易于推广。这也是后现代全球化的文化风貌之一。

在“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之间，先锋派艺术起了连接二者的桥梁作用。先锋艺术运动与学生政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逐渐合流。这种合流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完成的：

（一）通过先锋派的作品和表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学生。纽

约和旧金山先锋艺术团体通过街头戏剧、地下电影和书籍来影响学生。除了纽约的格林尼治村街头的咖啡馆、剧院和书店以外，伯克利南边的书店、酒馆、咖啡屋、舞厅林立的电报大街，也用叛逆的内容慢慢吸引着喜欢标新立异的大学生。渐渐地伯克利校园成了反主流文化的圣地。到1969年，嬉皮士、街垒、垃圾作品、《伯克利钩刺》、非盈利的左翼 KPFA 电台、免费诊所、免费教堂、免费学校、研究团体等，充斥着伯克利校园。

(二) 直接支持并参与学生的抗议和游行示威运动，以艺术来为学生营造声势，以艺术形式再现学生的主张和行为，把斗争在艺术作品中保存下来。这些先锋艺术家还是地下报刊和新闻的骨干力量，纽约的《村声》《另一个东村》、旧金山的《伯克利钩刺》等刊物，不是直接由先锋派创办，就是由他们主笔，无不以煽动学生为快事。

(三) 和学生一起采取街头政治，把街头艺术与抗议示威结合起来，以达到宣传新的生活方式的目的，这也展示了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不同于过去的学生运动的独特面貌。从伯克利的自由言论运动到1967年的华盛顿十万人反战大游行再到1968年芝加哥民主代表大会示威，演唱、舞蹈、乐队、戏剧都如影随形，非常夸张。

(四) 在反战运动期间，许多著名的先锋艺术团体纷纷以地方分布的形式加入 SDS，如分别来自西部和东部先锋艺术团的掘地派、操娘派就是代表。先锋运动对学生政治的影响很大。<sup>①</sup>

因此可以说，先锋艺术是连接垮掉派和嬉皮士之间的桥梁。

---

<sup>①</sup> 参见吕庆广：《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273页。



## 五、“垮掉的一代”与嬉皮士

五十年代的美国，难道听不见雷鸣般的怒吼和即将到来的欢乐吗？如同迈克尔·赫尔方在迪克斯坦所著《伊甸园之门》的译本序中所言，美国的六十年代在反文化的意义上从来不是严格按照年代来划分的，它是一个从五十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的时期。<sup>①</sup>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也主张以1972年或1974年来作为美国“六十年代”的终结较为适宜。迪克斯坦借用D·H·劳伦斯的话把五十年代比作六十年代的“勃然萌发并缓缓突破其生命根基的生命新芽”。六十年代相对于五十年代的变化是由支流出人意料地上涨，渐渐地成了主流。这股支流就是“垮掉的一代”以及犯罪和青年反常行为的瘟疫，它们是整个五十年代万事如意气氛的裂缝。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的理论基础存在于五十年代后期离经叛道的著作中。可以确切地把“垮掉的一代”理解成反文化运动的先驱，前者在较为沉寂的五十年代酝酿着惊世骇俗的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叛逆青年们为数不多，就隐藏在昏暗的夜总会和酒吧中，而到了六十年代他们才出现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在貌似保守的社会背后，传统的道德观念早就在瓦解。1982年科罗拉多的纳诺帕学院举行了纪念《在路上》发表二十五周年的庆典，在谈到“垮掉的一代”对六十年代的政治影响时，曾经的嬉皮士领袖阿比·霍夫曼认为：“如果我们是社会变革的勇士，那么‘垮掉的一代’就是预测并指引这场运动的预言家。他们的确功不可没……我用了两年的时间熟记了《嚎叫》这首诗，因为

---

<sup>①</sup> 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译本序言，方晓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它实际上是在号召人们拿起武器……对我来说，《嚎叫》就是召唤。”<sup>①</sup> 与阿比·霍夫曼一样，许多人就是在读了《嚎叫》之后开始变为政治积极分子的，《嚎叫》也包含了六十年代最时兴的绝大部分元素。许多美国青年不像欧洲青年那样喜欢阅读，而是更喜欢运动，学养较差，因此可能认为《嚎叫》就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诗歌了，以至于会花两年时间来读《嚎叫》，并把它付诸行动。

六十年代嬉皮士的疯狂举动，比如嗑药、同性恋和群交，有哪样是“垮掉的一代”没有做过的？六十年代流行嬉皮士的时候，许多人认为“垮掉的一代”已经过时，殊不知这正是“垮掉的一代”的普及革命。嬉皮士几乎继承了他们的一切，包括奇装异服、吸毒、群居、性放纵、禅宗和非暴力。根据丹尼尔·贝尔的看法，“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除了具备现代主义的一些共同点，如崇尚童年、欣赏荒诞、颠倒价值以及讴歌基本冲动、关心幻觉，在此之外，它还有自己的特色：热衷于暴力和残忍，沉溺于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闹，反叛情绪，抹杀艺术与生活的界限，熔艺术与政治于一炉。<sup>②</sup> 金斯伯格和彼得·奥洛夫斯基就是一对著名的同性恋者，凯鲁亚克有时也有同性恋行为。凯鲁亚克、金斯伯格、巴勒斯、尼尔·卡萨迪，不仅是同性恋，而且还是现在最时髦的双性恋——“酷儿”。垮掉派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是瘾君子，乐于尝试各种各样的毒品，他们留下的疯狂文字大都是在吸食了过量的毒品后的带有幻觉的表述。垮掉派的女朋友几乎是大家所共有的，他们对习俗、忌讳、公共法律、道德和艺术标准的故意反抗也是六十年代的前奏，二者都高扬摇滚音乐的精神。值

<sup>①</sup> 文楚安主编：《透视美国——金斯伯格论坛》，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sup>②</sup>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70页。



得注意的是，二者的宗教都是各种注重自我体验和反对严格教规的神秘主义，尤其是禅宗。垮掉派整夜东游西逛、在街角上抽烟打架找姑娘、搭便车旅行、从一个酒吧蹿到另一个酒吧的习性在嬉皮士那里得到了更加放肆的发挥，五十年代的垮掉青年就喜欢过夜生活，突然不见了——进了监狱，或者上了路，又突然冒出来。他们对于老父亲、老母亲、政治、保险、工作、婚姻、严格的宗教、银行、跃层别墅、自动洗碗机等，统统不屑一顾。他们都是“背包革命”的信奉者，喜欢四处漫游，到农村去居住，把文明、工作、政治、权力和习俗远远抛在身后，逃避城市和工业文明，“你在路上吗？”“你在车上吗？”都是五六十年代的流行语。嬉皮士们弄一辆汽车，带上大麻，去寻找大海和森林。尼尔·卡萨迪一生都在路上，最后也死在墨西哥的那条铁路上，真正把人生变成了无目的的旅程，就像浪迹天涯的牛仔，把美国作为他的牧场，汽车作为坐骑。和六十年代的嬉皮士相同，垮掉派也憎恨文明和理智，崇拜原始主义、本能和血腥。他们都是裸体主义者，金斯伯格在1955年“第六画廊”的诗歌朗诵会上全身脱光，依靠他抢镜头的花招，获取了单凭他的诗歌不能得到的知名度。凯鲁亚克幻想赤身裸体地生活在山洞里，尼尔·卡萨迪一丝不挂地死在墨西哥的铁轨旁。到了嬉皮士那里，群居村里就到处都是横陈的裸体了。凯鲁亚克、巴勒斯都有和金斯伯格一样的问题：他们都渴望混乱。他们瞧不起自己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因为这个社会像任何其他非无政府主义社会一样，有法律，有政府；他们认为哥伦比亚大学所提供的古典的、侧重于开发智力的教育毫无意义，令人窒息；他们赞美贫穷、犯罪和浪荡，并且藐视精雕细琢的诗文，就像他们藐视有条理的头脑一样。垮掉派和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共同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从欧洲带来的大学学术传统，1933年后，美国成为欧洲学者的避难所，接纳了一大批欧洲伟大的学者、科学家，然而这些来自异土的柔弱植物

与美国人崇尚实用、快乐的民俗格格不入。六十年代的大学生终于向这些传统发起了最后的进攻，他们一定要把欧洲的悠久传统从他们健康快乐的身体中给逼出去，创造自己国家的文化，他们都有极端反智的倾向。按他们的判断，凭借他们自称的精神不稳定，他们无可比拟地优越于自己生于其中的文明，优越于被派来指导他们的教授，优越于被大家阅读的伟大作家。年轻的金斯伯格曾经预言：

美国本土真格的文学问世之日必是革命之时  
那是性感羔羊的革命  
唯一不流血的奉献出伤感多情的革命<sup>①</sup>

由此可见，这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不仅是反对欧洲传统的革命，更是一场反宗教反道德的“性感革命”，“唯一不流血”的“伤感多情的革命”。

金斯伯格后来也和嬉皮士们一起加入了反对越战的抗议者行列，他和凯鲁亚克的文风启发了后来风靡全球的嬉皮士说唱风格。嬉皮士似乎要把垮掉派的放荡行为扩展为一种常态和普遍的生活模式。如果说垮掉派中的凯鲁亚克还有一些审慎精神和雅致的话，那么嬉皮士则是彻底反文化和反道德的，他们把垮掉派的精神推向了无以复加的极端。干脆兴起了裸体狂欢的摇滚音乐节和性放纵的群居村，一边吸毒一边听着摇滚乐。

“嬉皮士”（hippies）这个词就源于诺曼·梅勒的存在主义英雄“嬉皮斯特”（Hipster），他以反叛的自我通向未知天地的旅程，以此来作为这个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的社会中的生存手

---

<sup>①</sup> 金斯伯格：《凡·高之耳解密》，见艾伦·金斯伯格《金斯伯格诗选》，文楚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页。

段。后来，“嬉皮斯特”（hipster）或“hip”成为“垮掉的一代”用来自我描述的词语。Hip这个词的本义是指人的髋部，后来有人用这个词描述吸鸦片者，因为这些瘾君子们通常是侧躺在床上吸烟，髋部总是高高突起。在“垮掉派”的词典里，Hip通常用来形容那些经常站在流行风潮最前沿的人，或者那些最有魅力的人。Hip后面加上后缀“ie”就是指“小一号的Hip”，也可翻译成“业余垮掉派”。到了六十年代，随着青年群体的形成和反文化运动的发展，媒体将“hipster”演化成“hippie”，用来形容六十年代早期留着长头发、听摇滚音乐、吸毒、“自由恋爱”的年轻人。但这些年轻人开始时对这个别人加之于他们的称号并不买账，他们更愿意被称为“花儿少年”（flower young）。到了1967年以后，随着嬉皮士运动的大规模发展，尤其是在1967年的“爱之夏”运动之后，这个词逐渐为大家所接受。<sup>①</sup>从“嬉皮士”这个词的沿革可以看出嬉皮士与“垮掉的一代”的血缘关系。

另外，嬉皮士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查理·曼森从小的生活经历和垮掉派的尼尔·卡萨迪与格雷戈里·科尔索很相像，曼森是一个未婚妈妈的私生子，从小就在监狱里生活，和尼尔·卡萨迪一样，是偷车的好手和勾引姑娘的行家。他们两人都自称是“哲学家”，属于是自学成才的那种。这样的著名人物还有马尔科姆·X、黑豹党的休伊·牛顿这些危险人物。

还有，“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拥有共同的圣地——旧金山和伯克利的海湾地区。美国的反文化之都旧金山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加利福尼亚淘金潮中诞生，是采矿人、妓女、海盗、拉丁人和亚洲人的乐土。由于居民成分、种族都很混杂，所以思想比较自由，是早期波西米亚人的一个避难所，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

<sup>①</sup> 夏学花：《嬉皮士》，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二十年代，纽约和芝加哥孕育出了波西米亚艺术家的聚居区，纽约的格林尼治村因房租便宜而得到了先锋艺术家和另类生活者的青睐。三十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经济和战争压倒一切的时代，波西米亚的另类青年得不到社会的关注，因为那不是消费时代，也不适合他们的生存。但战争结束后，他们在东西海岸分别向纽约的格林尼治村和旧金山的北滩集中，在五十年代发起了垮掉派运动。金门公园的外面有一个狭长区域，海特—黑什伯里街区，这里的廉租房吸引着大量青年人。这些维多利亚式建筑原本是为一户人修建的，里面隔出了很多小间，住在里面的房客们因为共用一间客厅和厨房迅速打成一片，变成了同一个“公社”的社员。这样一个松散而又亲密的社区，就是嬉皮士运动的摇篮。1954年8月，金斯伯格来到旧金山。当时的旧金山诗歌已逐渐繁盛。1955年11月，金斯伯格在六号画廊朗诵他的《嚎叫》，把纽约的垮掉美学带到了西海岸，并带动了大量年轻诗人的创作，涌现出大量具有垮掉美学的写作、诗歌、绘画作品，形成了闻名的“旧金山文艺复兴”。“垮掉的一代”的影响由此扩大，一个新的文化诞生了，垮掉派生活方式和艺术风格广为传播。凯鲁亚克、金斯伯格等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常在此聚会。另外，诺曼·梅勒的“白种黑人”也在这一带，他们吸收了二十年代哈莱姆黑人文艺复兴的反叛资源，沉迷于布鲁斯和爵士乐，先锋艺术和黑人文化也在此合流。格林尼治村在1963年左右成为极度反叛的先锋文化的代表。196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自由言论运动又发生在这里。1965年，肯·凯西和他的“欢乐的恶作剧者”也来这里进行迷幻实验。旧金山从此以后成为年轻人很向往的地方，青年亚文化的氛围越来越浓，搞运动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好。到处可以看到吸大麻的人，人们在边道上吸，在点心店里吸，坐在停着的车里吸，或躺在金门公园的草地上吸。街上几乎每个20岁的人都是吸毒者，不是吸食大麻，就是吃迷

幻药，或两者都用。从1967年的第一个“聚游会”开始，音乐、毒品、成千上万离家出走的青少年开始大规模集结。1967年6月16日在旧金山举行了蒙特利尔流行音乐节，感恩而死乐队、吉米·亨德里克斯、詹妮斯·乔普林以及杰斐逊都来捧场，这里很快就成为嬉皮士、迷幻药和酸性摇滚的圣地。1970年全美共有200多个群居村，约有四万成员，1971年发展到了3000个。他们的公社主要分布在纽约的东村、旧金山的海特—黑什伯里和洛杉矶的日落带。<sup>①</sup> 精明的商人盯上了这一群零花钱非常多的“肥胖的兔子”，于是策划了轰动的“爱之夏”。在青年中流行着这样的歌谣：“如果你要去旧金山的话，请别忘了在头发上插满鲜花。在旧金山这座城市里，你遇到的人温柔善良。对于那些要去旧金山的人，今年夏天将充满爱的阳光。”海特—黑什伯里区有两个所有嬉皮士都了若指掌的公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金门公园。他们在金门公园举办过一个重要的活动，这个长达一个星期的热闹活动名叫“聚游会”，由此嬉皮士一举成名。所谓“聚游”，指的是服药后灵魂出窍，整个活动就是为了庆祝这样的迷幻药体验。除这个节日以外，其他许多事件也发生在金门公园，有免费音乐会，有嬉皮士政治领袖主持的反战集会。另一公园是布埃纳·维斯塔公园。它之所以闻名是因为嬉皮士们晚上在此睡觉，白天在这里社交。从旧金山成为嬉皮士的活动中心的历程可以看出，它是怎样从五十年代的先锋运动中发展而来的。“垮掉的一代”精神扩展到了普遍的青少年中，在先锋精神转变为大规模的青年亚文化的过程中往往离不开商业的作用。金斯伯格也认同“垮掉的一代”的旧金山诗歌复兴运动是嬉皮士的基础。<sup>②</sup>

<sup>①</sup> 夏学花：《嬉皮士》，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

<sup>②</sup> 《“垮掉一代”、嬉皮士运动及其他——金斯伯格访谈录》（三），见费林盖蒂等著，文楚安主编：《透视美国——金斯伯格论坛》，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

六十年代的青年大规模行动所需要的统一意识也来自于五十年代伴随着不断增长的青年犯罪而产生的、还没有被当时的美国公众预见到的、将是六十年代文化基础的青年亚文化。和共产主义这个美国最公开的敌人比起来，这股日益壮大的地下思潮对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秩序有更大的威胁。直到五十年代后半期，“垮掉的一代”还不是很出名，当金斯伯格的《嚎叫》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成为青年追捧对象时，这股“逆流”才引起公众的充分重视。垮掉派精神的流行说明五十年代这个所谓的青年被从小的“合作训练”和麦卡锡主义弄得来过于呆板、顺从和沉默的时代将要过去，垮掉派已经完成了美国的青年造反所需要的文艺宣传。他们可是天生的宣传家，酷爱流浪，把自己的生活模式带到全国各地，还有他们和广大的下层人物和不法之徒、黑人天生就是朋友。1964年，肯·凯西用《飞越疯人院》的版税组织了一次活动，由《在路上》主人公迪安·莫里亚蒂的原型尼尔·卡萨迪开着命名为“向前”的巴士横跨美国。车上满载自称为“快活的恶作剧者”的青年男女，从加利福尼亚出发到纽约世贸大厦。一路上伴随着吸毒、性爱和摇滚，宣扬了反文化的精神。他们自带致幻剂上路，沿路免费分发，还一边演奏着摇滚，使LSD迅速风靡全国，沿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尾随其后。凯西组织的这次全国宣传旅游连接了五十年代的“垮掉的一代”和六十年代的嬉皮士，他和金斯伯格都在车上，他们两个既是垮掉派成员又是嬉皮士。这次旅行是一次象征事件，把“背包革命”的火种传给了下一代，引发了嬉皮士运动的浪潮。

对于“垮掉的一代”对六十年代文化和政治的影响，金斯伯格并不回避，相反，他为之自豪。他具体谈到过这些“功绩”：

灵魂解放，性“革命”或性“解放”，即同性恋解放，妇女解放，灰豹行动等；摆脱审查机构、审查制度



的话语解放；解除反对用大麻和其他毒品的法律和神秘性并使其具有合法性；节奏与布鲁斯演化为摇滚乐和高雅艺术形式，这明显体现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受BG诗人和作家作品影响的甲壳虫乐队、鲍勃·迪伦以及其他音乐家的作品之中；传播加里·斯奈德和迈克尔·麦克鲁尔早期强调的生态意识，宣传推广“生机勃勃的星球”观；反对军事工业化的机械文明，巴勒斯、亨凯、金斯伯格和凯鲁亚克的作品均突出了这一点；关注先进文化中发展起来的“第二次宗教信仰”——这是凯鲁亚克依据施本格勒的理论命名的；反对国家严格管制以重新重视人的个性特征；像凯鲁亚克在《在路上》宣称的“地球乃印第安人所有”一样，尊重土地、当地人乃至生灵。<sup>①</sup>

这些都是金斯伯格对自己流派的溢美之词，如果换一种视角，这段话等于是承认，六十年代兴起的换妻、未婚妈妈、色情文化泛滥、普遍吸毒、社会丧失最起码的道德规范等也和“垮掉的一代”有重要关系。这段话也说明了禅宗的流行、女权主义运动、生态运动、摇滚乐也都受到了“垮掉的一代”的启发。

凯鲁亚克认为金斯伯格对政治怀有隐秘的兴趣，尽管他会把它隐含在对永恒的幻想的言说之中。但是一个真正瞥见了永恒的人，哪怕只是稍纵即逝的一瞬间，又怎么会流连于自己会不会影响世人？金斯伯格叫嚣道，“是时候了，是人们该影响整个美国文化了！”“我有权力表达自己的观点，去取代那些陈词滥调，那些社会学手册里的胡说八道……”“我要成为一个具有大众影响

---

<sup>①</sup> 比尔·摩根编：《金斯伯格文选——深思熟虑的散文》，文楚安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249页。

力的诗人!”“美国的耶稣将要诞生了!如果美国没有一个先知诗人,怎么能指望东方尊敬你?!羔羊必须诞生!伟大而战栗的俄克拉荷马需要诗人和赤裸!……在办公室那些多愁善感、矫揉造作、磨磨蹭蹭、虚度光阴的人,必须有人给他们带来一点振奋!”全世界将会看到,“嬉皮一代的经典混乱场面将会发生在公共车站、港务局、或者第七大道的厕所、或者洛克太太的东方会客厅里或者别的地方……”<sup>①</sup> 六十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正符合金斯伯格的渴望,充分说明他们将“垮掉的一代”激进化了。出生就是“红巾婴儿”的金斯伯格对于政治怀有天生的兴趣,以“先知诗人”“美国耶稣”自居,急不可待地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影响进而改变美国社会。凯鲁亚克对金斯伯格的批评——未真正瞥见永恒——可以看出垮掉派两大代表人物不同的心性。凯鲁亚克的一生像候鸟一样不停地穿梭于母亲的家和他在曼哈顿区朋友的公寓之间,实则是游走于禁欲主义与享乐主义这两种五十年代尖锐冲突碰撞的文化之间。他一生都在试图调和这两种文化的矛盾,但仍以失败告终,四十七岁就在潦倒与孤寂中酗酒身亡的人生悲剧宣告了这种调和的失败。青少年时代小镇洛厄尔的生活、所受的天主教(詹森教派)学校教育、父母的严格管制奠定了凯鲁亚克以勤俭、克制、信教为核心的美国小镇新教伦理的人生根基,它以“妈妈的厨房”为标志。凯鲁亚克的一生也证明了他像一个系线的风筝,始终没有飞出传统文化的掌控。四十年代以后纽约大都市生活、“在路上”光怪陆离的感官刺激、“消费至上”观念等等给凯鲁亚克极大触动,但是他对这种享乐文化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试图调和这两种文化的矛盾,像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杰克一样发展一种新的劳动伦理。既渴望享受大都市

<sup>①</sup> 杰克·凯鲁亚克:《荒凉天使》,姬子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236页。



的物质文明、感官刺激，又秉承“辛勤劳动荣耀上帝”宗教信念与白手起家的“美国梦”，追求一个传统作家的成功，渴望着靠写作养活母亲，到西部买一座农场，过上一套房子、一个女人、两辆车、两个孩子、一条狗的田园牧歌般的中产阶级生活。并且，对于“垮掉的一代”的极端放纵的生活方式，凯鲁亚克并不能完全遵从，他有着深深的道德顾虑。吸食致幻剂、性滥交、饮酒狂欢、爵士音乐等等“垮掉”的生活方式是都市消费享乐主义的极端表现。但“垮掉的一代之王”凯鲁亚克在这场大狂欢中却表现得非常腼腆，不知所措，他在格林尼治村的表演很怯场，自己也做不出前卫、出格的举动，他的大部分时间就像自己所说的仍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甚至扮演了他的保护人角色，母亲成了凯鲁亚克的门卫、邮件和电话审查员、钱款管理员。与其说凯鲁亚克是“垮掉的一代”，不如说他更有“迷惘的一代”的气质，作恶中总有一种善良的气质，他的酗酒，他的死，他的真诚和孩子气，他的颓唐和对人世间的绝望与厌倦，都让人想起《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诗意般的动人，人生就如梦一样是虚幻一场。凯鲁亚克虽然对六十年代青年影响巨大，但是他却把六十年代最盛行的因素“酷”看做是一种最可怕的东西，把它看做是一种刻板的冷漠的姿态，是反独特个性的，只能用社会学的方式将冷漠麻木变成中产阶级青年当中的流行时尚。杰克对把这种风尚的流行部分归结在自己头上的情况既自嘲又悲愤。<sup>①</sup>

六十年代热衷于政治的嬉皮士在对垮掉派的继承上，更多的是继承了金斯伯格强烈的政治反抗意识，翻开比尔·摩根编的《金斯伯格文选》，可以看见到处都是这个诗人演讲时振臂高呼的

---

<sup>①</sup> 杰克·凯鲁亚克：《荒凉天使》，姬子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299~300页。

照片。这个“垮掉的一代”的桂冠诗人，像一个基督教的老太太碰到人就说——信教好啊，受洗好啊。而他说的是——吃迷幻药好啊，一点害处都没有，大麻好啊，黄色书好啊，凡是一切有利于瓦解美国政府这个“摩洛克神”的玩意儿都好得很。摩洛克，古代迦南人信奉的神，先是吸引了摩西的信徒，接着又感召了所罗门王的妻子们。人们将他塑为一尊巨大的石像，其手臂外伸，四周燃起熊熊烈火。女教徒对孩子的关爱受到嘲笑，在摩洛克的驱使下，她们把自己的孩子投入石像怀中，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活活烧死，以示对摩洛克的虔诚。金斯伯格在《嚎叫》中把美国比喻为摩洛克，意指这个国家残酷无情，专门荼毒青年心智，让人窒息。金斯伯格是惠特曼最好的继承人，他言必称惠特曼，多次撰文说明自己对惠特曼精神的继承。惠特曼的精神，如同理查德·罗蒂所说，对生命力包括性爱的坦率而充满激情的赞美和喜欢在诗歌中运用俗语甚至脏话的爱好，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在青年文化中开始实现。“摇滚、毒品以及不加区别的同性——异性的随意友好的性交都会让惠特曼兴奋。”<sup>①</sup> 所以，金斯伯格和凯鲁亚克的精神资源，还是有些不一样的，金斯伯格分享了六十年代“新左派”的思想资源。他在一次面对公众的演讲中，激愤地控诉了这个“像猪一样贪婪的荒谬世界之后”，开出的药方是提议“美国所有十四岁以上、身体健康的男女老少”都去尝试一下 LSD，再让所有的州来一次“大众性的、永远的情感上的崩溃”“希望在毒品的刺激下，每个人都快乐起来，不管一切是多么短暂”。<sup>②</sup> 不过，全民上下一起吃 LSD，不会产生什么精神超越，只会让这个“像猪一样贪婪的荒谬世界”生产出更

---

<sup>①</sup> 理查德·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黄宗英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0页。

<sup>②</sup> 比尔·摩根编：《金斯伯格文选——深思熟虑的散文》，文楚安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多更蠢的“快乐小猪”。

凯鲁亚克晚年却是反对嬉皮士的，他支持越战，这也是凯鲁亚克不同于其他垮掉派成员的地方。凯鲁亚克与金斯伯格的分歧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就显现出来了，根据对托马斯·沃尔夫的看法，他们之间自己划分了“沃尔夫派”和“非沃尔夫派”。凯鲁亚克和蔡斯是“沃尔夫派”，认同充满男子汉气概的开拓边疆，拥有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金斯伯格和巴勒斯则代表了“非沃尔夫派”，他们是世界主义的、支持同性恋立法、反对战争、反对核武器，对美国持全面批评态度。<sup>①</sup>这种分歧在六十年代更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凯鲁亚克支持越战，反对嬉皮士，而金斯伯格则是反战运动最积极的参与者和嬉皮士的导师。

当然，认为凯鲁亚克对嬉皮士没有影响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嬉皮士也可分为两派，一派热衷于政治，另一派远离政治。虽然他们的语言、服饰、发型没有区别。他们分别受到了“垮掉的一代”中热衷于政治的金斯伯格和实际上是隐遁派的凯鲁亚克的影响。而金斯伯格和凯鲁亚克的共同点，即放浪形骸和反传统的态度，又直接影响了嬉皮士。

## 六、生育高峰期的一代

从四十年代中期开始，在美国出现了长达十多年的生育高峰期。五十年代初，华盛顿的人口统计时钟表示出生的灯光每7秒钟就要闪亮一次。和钢铁工业一样，母亲们以接近100%的努力在生产。1950年，全国共诞生婴儿350万，在此后的十年中，每年出生的婴儿都不少于400万。1946—1961年这15年间，美

---

<sup>①</sup> 张国庆：《“垮掉的一代”与中国当代文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国共有 6300 多万婴儿出生，比在此前的 15 年出生的婴儿总数多出 2200 万左右。生育高峰期间，每对夫妇至少有三个孩子，有的有四个，甚至五个。<sup>①</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这样一个没有被战火摧残、而又拥有无穷的消费力的国家诞生“婴儿潮”是正常的，经济的繁荣使年轻人的成家立业得到了保障，加上士兵法中有关退伍军人福利的规定，政府有放宽贷款、提供抵押和教育费用方面的帮助。结婚对于保守的五十年代还是协调好性成熟和重视婚前贞洁的好办法。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生率也大为提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通行的生育伦理是：（一）结婚比不结婚好；（二）有孩子比没有孩子好；（三）不愿只有一个孩子。不符合生育伦理的夫妇，总给人的一点不正常的感觉，因此有义务说明理由。美国人结婚的年龄普遍提前了，再加上被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耽误了生育的妇女纷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结婚生子，妇女生育总数的增加，种种因素形成了“婴儿潮”。这些大批量出生的孩子相对于社会来说就好像是“怪蛇腹中的猪”，在他们之前和之后婴儿数量都不大，因此会突然形成一个膨胀的巨块。从此以后，这一代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从出生、入学、工作、婚姻、住房，甚至到殡仪馆，都十分拥挤。这一膨胀的巨块缓慢地向前推移，猪和蛇都会不好受。但是商家可以大发其财，从学校到医院、建筑商、婚庆公司，都会因为“婴儿潮”的推进而成为全国最红火的企业。

从教育水平上看生育高峰期的生育率，令人有些吃惊的是，在生育高峰期生育率增长最快的是受过教育的妇女，高中文化的妇女增长了 70%，大学妇女的生育率也大大上升。受过教育的

---

<sup>①</sup> 张友伦、肖军、张聪：《美国社会的悖论——民主、平等与性别、种族歧视》，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68~369 页。

律师、医生这些上等收入家庭生育率上升最快。<sup>①</sup> 这种情况看起来反常，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受教育少的妇女生的孩子已经多得不能再多了，因此生育率无法上涨，受过教育的人不过是在追赶她们。因此，“婴儿潮”中诞生的孩子里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所占比例就空前提高了，这就为六十年代气质埋下了伏笔，他们都是自由派爹妈的孩子。在美国历史上，青年人从来没有被看做是一个单独的问题集团，青年问题只是一个家庭问题。但六十年代改变了这一情况。当六十年代到来的时候，“怪蛇腹中的猪”已经长大，正好涌进扩招扩建了的大学，这些青年在一起形成了叛逆的青年亚文化，而这种放荡不羁的亚文化精神就是直接来自于“垮掉的一代”，五十年代之所以被说成是沉默的，大概是因为垮掉精神毕竟还不是主流，垮掉分子的人数不足以起事。五十年代沉默而恭顺的大多数和六十年代的造反派并不是同一批人，后面这些青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长大的，把经济繁荣视为理所当然，六十年代的造反气氛就是建立在美国经济取之不竭的心理泡沫之上的。在六十年代的十年中，18~24岁的人数增加了855.9万。战后婴儿的多寡直接决定了六十年代这个地区的学生运动面貌。被称为“新大陆中的新大陆”的加州是战后出生婴儿最多的一个州，在三十年代，数百万年轻父母移居到此，战后他们生下了大量的孩子，仅仅十年，4岁以下的孩子增长了58%，5~14岁的孩子增长了一倍，后来加州开始引领全国的时尚和时装新潮，而加州的年轻人仗着群体优势在六十年代最喜欢搞学生运动。<sup>②</sup>

美国战后生的孩子是在本杰明·斯波克医生的新式教育下长

---

<sup>①</sup> 兰登·琼斯：《美国坎坷的一代——生育高潮后的美国社会》，贾蔼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版，第24~25页。

<sup>②</sup> 兰登·琼斯：《美国坎坷的一代——生育高潮后的美国社会》，贾蔼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2~63页。

大的，被称之为“斯波克医生养大的孩子”。在那本广为畅销的《婴儿与儿童抚养读物》中，斯波克医生宣扬家长不能把约定俗成的规范强加给孩子，不能强迫孩子成为家长希望的模型，而应当充分培养孩子的个性和未知的潜力。这本书一发行就卖出400万册。在以后的18年中，每年至少售出100万册，总共发行3000万册，译成了29种语言。斯波克博士是生育高峰一代造就的第一个百万富翁。斯波克博士适应了父权制家庭向子权制家庭的转变，以前的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中重中之重就是用严格的道德标准来培养他们的性格，而现在的“子权制”家庭主要关心的是孩子的快乐和幸福。可是在这种教育理念下长大的孩子，怎么能成为技术社会所需要的没有个性的技术人才？六十年代发生学生运动时，人们普遍认为是斯波克的书惹的祸。1968年，一位著名的天主教牧师强烈地指责斯波克，他认为，“斯波克通过他的著作以及对家长们的教导，将这些当年的婴孩培养成了反对自己的国家、不负责任的、无教养的、无爱国心的年轻人。”<sup>①</sup> 他们的父亲大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英雄，可以从银行得到贷款，在郊区买房子，有钱买孩子想要的玩具。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过于吃苦，都尽力为他们创造很好的条件。退伍归来的父亲利用购房贷款在郊区买了房子，“婴儿潮一代”就是在那里长大的。一首叫做《小盒子》的歌曲这样描写郊区生活：

### 小盒子

山坡上的小盒子，用廉价材料做的小盒子，  
山坡上的小盒子，一模一样的小盒子，

---

<sup>①</sup> 转引自王俊勇 2004 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大学生运动》，<http://epub.cnki.net/grib2008>。



有绿，有红，有蓝，有黄，  
他们全都用廉价材料制成。  
看上去一个样子。

这些房子里的人，  
全都读大学，  
在大学他们住在盒子里，  
结果完全相同。  
有的当医生，有的当律师，  
有的当董事，  
他们都用廉价材料制成，  
看上去一个样子。

他们都打高尔夫球，  
喝无果味马丁尼酒。  
他们都有可爱的孩子，  
孩子们上学，  
孩子们去夏令营，  
然后进大学，  
在大学他们住在盒子里，结果完全相同。

小伙子跨入商界，  
结婚成家立业，  
住在用廉价材料制成的盒子里，  
看上去一个样子。<sup>①</sup>

---

① 戴安娜·拉维奇编《美国读本》(下)，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555~556页。

这种“小盒子”就是战后为解决大批复员军人和他们的小家庭的住房问题而用生产线的流水作业完成的，莱维特父子公司最先开创了这项多快好省的安居工程。莱维特公司和他的仿效者们纷纷在郊区买下土地，生产这种完全一样的“小盒子”，后来中产阶级都搬到这里来住而把城市住房留给了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这些郊区长大的孩子没有多大区别，显然他们的成长环境是高度标准化的。每个孩子都面临特定时期的儿童训练和儿童娱乐方式时尚风潮的冲击。

这些孩子从小生活在顺境之中，这也使他们对生活的期望远远高于出生入死的父辈，对生活的想象就如同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电影《毕业生》里面所描绘的那样：喝咖啡、吃巧克力、弹吉他、议论时政、谈恋爱，因而不能接受劳动与兴趣创造的分离，不能忍受为了除享乐之外的任何目的而工作的劳动伦理。他们不愿意像从大萧条的困境中走过来的父辈那样为了物质上的富足而逆来顺受，他们觉得现在他们享有的生活条件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没有历史感。对于他们来说，长久的学习和高学历却只是找一个枯燥的工作，是不能忍受的。他们悲叹自己沦为经济的工具，这使他们的生活变得不快乐了。而且这个社会只鼓励疯狂赚钱却反对无拘无束的消费，更使他们生气。在富裕社会中出生和成长的这一代人，长大后却面对着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世界：一方面，他们从小被灌输的是美国的繁荣富强、自由与平等，现在却看到了几千万的穷人以及黑人处于悲惨的境地；另一方面，政府宣传的是要维护世界秩序，实现光荣与梦想，实际上却是欺上瞒下，将青年们送到残酷的战场上去屠杀无辜的越南平民。这个反差太大了，使他们不能接受。独特的成长经历造就了这一代人独特的心理特征。他们从小养尊处优，既没有下层孩子那种改变自身环境的冲动，也缺乏上代人坚韧不拔的意志，把富裕看做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状态，而非奋斗而来的未定状态。



社会提供了享乐的物质条件，而其新教伦理却又贬低享乐，这使他们感觉到父辈的压抑。年青一代对于激烈的社会竞争、枯燥的职业、平庸的生活倍感恐惧，难以适应。大学中所教授的人文教育使其同情社会边缘的受压迫者，同情黑人民权运动。于是这些在郊区的富裕生活、进步教育和冷战焦虑中成长起来的儿女成为民权运动、反战抗议、校园叛乱以及性解放的先头部队。1962年的《休伦港宣言》标志着他们作为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开始活跃在六十年代的舞台上，在宣言的开头这样写道：“我们是这一代的人，饮食尚算可意，现住学校，不安地注视着我们继承的这个世界。”“新左派”的宣言开篇就声明，他们的问题不是饮食的问题，这是不同于“老左派”的地方。他们是被宠坏的一代，在未成年时就有这样一种印象，即只要他们坚持，就能得到想要的任何东西。在六十年代的运动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这些学生幻想着，只要他们不让步，政府就会让步。六十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整体都透出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治运动不可能具有的任性、放肆和戏耍的特征。他们相信自己可以登上月球，攻克癌症，结束种族歧视，使第三世界富裕起来，结束贫困和战争。

中国自改革开放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产生了大约9000万独生子女，这些独生子女的文凭比上辈人高得多，对未来充满憧憬，择业期望值也比农村的非独生子女要高。对经济状况较好的上海独生子女的调查情况表明，在处于自由择业状态的独生子女群体中，66.72%的人认为找不到符合自己期望的工作，12.31%认为目前虽然能够找到期望的工作但现在还不想工作，有20.97%的人认为目前根本就找不到工作。<sup>①</sup> 他们与欧美的战后“婴儿潮一代”有许多相似之处，从小受的是“理想主义”教

---

<sup>①</sup> 《沪上“独生子女一代”达140万，学历虽高但依赖性较大》，<http://ld.eastday.com/1/20061019/>。

育，但是长大后却难以理解世界怎么就是这个样子，工作怎么能够那么没有个人价值，工资怎么那么少。当然，欧美的“婴儿潮一代”起点比中国的独生子女一代要高得多，可能他们更不能适应中国的情况。

六十年代对抗主流意识的青年不是来自工人阶级，而是统治阶级的孩子们。相反，没有多少钱的劳动大众及其子弟们不支持甚至反对“新左派”的造反运动。这是一个很蹊跷的现象，因为以前的造反运动总是穷人发起的。换句话说，主要是穷人参加的造反运动才是真正的阶级革命，而主要由公子哥儿参加的反叛行动则是浪漫而时髦的“文化革命”。自罗斯福新政以来，政府在经济上没有亏待过工人阶级，1945—1973年的经济繁荣使他们并不缺钱，政府的一系列有利于工人和下层阶级的充分就业计划和廉价住房建设安抚了他们的心。据格伦·里昂斯对伯克利1965年的大学生的抽样统计，越是家庭贫穷的大学生越不会参加青年革命，反而是比较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在示威学生总人数中所占比例很大。绝大多数穷人子弟只要感觉到读了大学之后能够找到工作，就会忠心耿耿地成为体制的拥护者。他们在读大学填志愿时，基本上会倾向于容易找到工作的理工科专业，还有一类直观地认为，既然读大学就是为了找钱，而专门研究钱的专业就是经济学，所以这门专业也是很热门的。反而来自中产阶级的子弟则有强烈的理想主义，他们不能理解怎么能一生都干一种与自己的兴趣和理想毫无关系的职业，怎么能把找钱和爱好彻底地区分开来？对他们而言，钱只是生活中一个很基础的条件，一辈子都为了找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技术专业也是枯燥、异化的职业，利欲熏心。这些学生们反而会去选择一些人文学科。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气质可以解释他们在青年造反运动中的不同表现。一类大学生只图吃饱，还无暇顾及工作是否称心如意，是否能充分实现自我价值和个体解放。他们从小就经历的窘



迫生活使他们一心只想跳龙门，没有心情来培养可以陪伴自己一生的兴趣。而他们的愿望相对于那些中产阶级出身的孩子们来说，是多么的卑微和基础：只要吃得好，住得好，能够成立一个家庭，工作累了可以到全国各地去走走，何复他求？但这些愿望对于中产阶级大学生来说，根本谈不上理想，生下来这些条件就具备了，他们不会体会到那些出身底层家庭的大学生们的基础愿望。二者根本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穷大学生们也不会理解他们为何吃饱了还要闹事。1968年法国最保守的是理论上最革命的工人、法共以及它所领导的工会团体，在运动的初期他们以敌视的态度对待学生。学生们也鄙视这些工人捡拾到了从华丽而无情的桌子旁掉下来的面包屑就不再有不满足、担心运动搞砸了他们的饭碗的心态。还有许多人没工作呢！工人们入工会不过是为了钱。许多地位低下的贫民区居民刻骨仇恨那些离家出走的嬉皮士们。仇恨的理由是：我们一辈子都渴望的东西，这些人竟如此的不屑一顾，这是对我们的极大侮辱。“这些猫儿想退出来。想一想这对于努力想进入的人是怎么个滋味？”美国的楞树岭是一个工人区，居住的大多是意大利人、黑人、波兰人、犹太人、波多黎各人和乌克兰人。在这类嬉皮士的聚居区，时常发生针对他们的强奸和谋杀。而白人工人阶级是既恨黑人又恨白人自由主义者，前者把他们的好处抢走了，而正是后者把自己的好处分给了黑人，当然会连同这些自由主义者的孩子们一同仇恨了。他们的孩子也反对反文化运动，有限的收入和不确定的前途使这些孩子很小就要面对现实，他们接受了大部分成年人的价值观，不管喜不喜欢他们都必须工作，而那些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家伙却矫揉造作地要回归农村和自然。经常痛打长头发的“流浪汉”就是他们这种情绪的反映。

这也是造反的中产阶级大学生和黑人民权运动者的合作没有维持很长时间的一个原因。后者从来没有怀疑过美国的体制本

身，只是对这种体制没有实现人人平等这个承诺的目标而感到愤怒。造反大学生主要来自于东西海岸发达的地区和大城市郊区的白人中产阶级子弟，他们造反想要的是更大限度的自由，而不是来自于南部地区和城市贫民窟的黑人民权运动者梦寐以求的平等。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于1963年8月28日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发表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他对台下大量的白人中产阶级大学生大谈“为了大家共同的自由而奋斗”，拿自由来说事，是为了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实际上金博士的“梦想”是要黑人也成为美国一等公民的梦，是平等之梦而非自由之梦。

中产阶级白人大学生积极地为黑人民权运动呐喊助威，四处奔走，在一般的非领袖学生身上，有真诚的正义感，而没有太多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在里面，当然不排除游行示威和静坐到底比规规矩矩地读书考试更有趣。而对于反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者却不愿与白人大学生并肩作战。原因可能是，黑人们普遍认为，自身的利益都还没有得到保障，哪有心思去关心远在万里的越南丛林和稻田里的那些村民的人道主义问题！相反，他们在越南战场上一直是奋勇杀敌的，在那时，战争和消灭敌人还是黑人展示自己和提高自己地位的途径。他们不会参加抵制越战征兵的“我们不去”签名运动，更不会冒着进监狱的危险焚烧征兵卡。直到1967年春，马丁·路德·金都没有做出反战的表示，唯恐因为批评了美国政府在国外的行为而影响了政府对黑人平等要求的支持。

黑人民权运动分子对大学生的造反也持极端的怀疑态度，他们实在不理解，这些大学生有钱，有汽车，又漂亮的房子，什么都有，政府和父母难道对不起这些学生？在1964—1965年伯克利校园暴动和1968年芝加哥大学生骚乱中，几乎都看不到黑人的影子。



在妇女运动中的情况也是如此，下层的工人阶级白人妇女和少数民族妇女都不支持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发起的女权运动。因为妇女运动批判的郊区太太生活模式正是下层妇女最高的理想，她们宁愿待在家里服侍丈夫和孩子，而不愿为了一点收入去打工，随时要忍受老板和顾客的呵斥。黑人妇女虽然苦大仇深，感受到了种族歧视和男性霸权这两座大山的压迫，但是她们也对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发起的解放运动兴趣不大，认为这是“休闲阶级”妇女的问题，“吃饱了撑的”，是另一个星球上的问题。相对于性别歧视，黑人妇女更仇视种族歧视，而把性别歧视当做千百年就是如此、不可改变的定律。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也知道，少数民族妇女（如亚裔和拉丁裔美国妇女）的观念太传统了，安于固有的地位，要改变她们的观念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劳工白人妇女和黑人妇女关心的都还是最基础的问题。

一句话，对于那些理性的民权运动分子来说，对抗当局和体制就是对抗自己的利益。白人大学生察觉到黑人的心思以后，从民权运动的组织中部分地退了出来，成立了为自己争取利益的组织。新左派认识到自己的群众基础是那些想改变体制对自由的压抑的中上层中产阶级白人大学生，而不是那些想进入现存体制以实现平等的人。<sup>①</sup> 在革命主体的问题上，这些大学生反叛者们可谓是不折不扣的马尔库塞主义者。后来他们否定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而把知识分子作为革命力量来看待。他们认为，工人阶级无非也就是那些在自己汽车上贴着“支持警察”和“轰炸河内”标语的愚昧无知、凶恶可笑的落后分子。工人阶级大概已经变成国内“最反动”的政治力量了。因此，革命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工人阶级”肩上。大多数学生都是未来

---

<sup>①</sup> 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88~296页。

“新工人阶级”的成员，将成为变革的骨干力量。

以前能够上大学的仅限于有钱、有社会地位、或有非凡才能和雄心的人。美国的传统大学主要是制造美国思想和政治贵族的场所，“常青藤联盟”主要为美国上层社会培养后继力量。在1902年，一项有关密歇根大学的调查显示：在大学生们的父亲中，有30%是商人或企业主，22%是农场主（因为密歇根特别强调农技学科），17%是自由职业者或专业技术工人，在余下的部分中，仅有5.21%是机械工、手艺人、或各类手工劳动。这种情况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发生改变。1920年，所有大学生中仅有2%的学生来自于非技术工人家庭，1940年这个数字也只有5%，进入大学的比例仍是非常小。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比例不断增长。六十年代初，大约有20%的工人阶级上层家庭的孩子能进入大学学习。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中，有25%的男孩、18%的女孩能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这就使下层阶级的大学生从总数上第一次超过了中上层阶级出身的大学生。社会学家贝蒂纳·阿普特克（Bettina Aptheker）认为，大学生数量的增长显示了学生阶级来源上的变化。例如，1966年，加州大学的37%的学生来自于父母年收入低于8000美元的家庭（当时，8000美元是工人阶级年收入与中产阶级的分水岭）。<sup>①</sup>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抛弃了优先录取校友子女和拒绝录取圈外人、特别是犹太人的做法，学习成绩和测验结果成为新生录取的标准。这些大学已不再是这个民主国家内部的贵族情感的最大集中地了。

大学是知识工厂，大学文凭已经大大地贬值了，绝大多数的毕业生不是政府部门的小职员，就是推销员、中小学的老师。高

---

<sup>①</sup> 参王俊勇 2004 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生运动》，<http://epub.cnki.net/grib2008>。



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大学生社会地位的贬值，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将来可能成为社会精英，而绝大多数人将成为新科技革命意义上的工人或者是小办事员。常青藤联盟的学校和一些更小的地区私立学院的学生主修历史、英美文学、哲学、政治学，这些大学的有天分的学生期望成为文化精英和政府部门、工商业部门的管理者，就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然而，这部分学生在学生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大学的扩招一方面产生出比例越来越少的未来的资本家和他的代言人，而另一方面产生出比例越来越大的枯燥的“小资”。巨型的多功能大学首要的功能是训练适应先进工业生产的具备熟练技能的个人。学生们被告知，他们将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但这是一个谎言。事实上，学生们不属于中产阶级，他们是未来的工人、发达工业技术创造的新工作的正在受训者。

现在大学生很不想毕业，逼不得已才读研究生以保证学位的不贬值，可是后来研究生也遍街都是，就只能读博士，即使他们对学术一点兴趣也没有。

到了1960年，对美国青年来说，上大学已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只要你想上。四五十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在六十年代初涌入大学，出现了可以容纳几万甚至十几万学生、由若干分校组成的巨型大学，这种新型大学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独立的巨型校园或是多区校园的并连。学校实行工厂化和流水线化的管理，学校建筑也越来越像厂房和工人宿舍。千篇一律、极端庸俗的大学建筑粗糙难看，只有冷漠的氖气灯管和水泥墙壁，甚至大学教学楼那庞大的水泥建筑像一个机器人，宿舍就像兵营和监狱，没有一丝人气，课堂拥挤不堪。为了便于管理，学校让学生们佩戴上面有压制成的照片、签名和社会保险号码的塑料学生证，统计成绩用的都是机读卡。它向社会源源不断地输出经过“单面化”处理的合格产品，大学也挂起了毫无灵气的火神“莫洛克”的那

副冷冰冰的嘴脸。实际上，学校成了美国最大的企业——毕业文凭制造厂，大学是世俗宗教，能够为社会提供任何专业的人才，包括研究宅地风水的阴阳师。学生运动多发生在那些巨型大学的分校，如1964年“言论自由运动”的发生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个分校在1964年有25454名学生，学生们反对把整个伯克利变成为企业、银行、出版社、军队这些现行体制培养白领技术人员的职业学校。在大学与政府和大企业关系的紧密度、学校教育理念的僵化、学校管理体制的臃肿和官僚化以及对待学生的家长制作风的严重程度，伯克利是非常突出的。在教育理念上，伯克利坚持陈旧的“替代父母”原则，维护学校在学生面前的父权式家长权威。还有如1968年法国的巴黎大学南泰尔分校也是这样，这些学校都是因为生源好而设立的，基础设施跟不上，管理也不正规，兴建工作仓促，各种设施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需要，学生挤在简陋的校区内，而且该学院远离市区，成为一个隔离的区域，学生的文化生活异常单调，但校方仍然维持僵化严格的教条式管理，学生最不能接受的是学校对男女生之间的交往进行严格的限制，这对于生性浪漫的法国青年来说不能不是一种痛苦。学生们对这种分校尤其不满。这是因为很多综合性大学不断产生数量众多的二级学院，除了医学、法律、工程和农业这些老的专业性学院外，又增加了企业管理、旅游、新闻学院等。六十年代的美国基本上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不过，教育专门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同一个大学的两个毕业生有可能最多只有一两门课是共同的。主修化学的学生可能不知道梭罗的名字；主修法语的可能不知道原子和分子之间的区别；主修经济的可能从未听说过约翰·济慈。教育的实用化倾向很严重，应用科学受到推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沦入边缘地带。在经费上，每年的科研补助金绝大部分都分配给了理、工、医等学科，社会科学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钱，而若干人文科学则被完全忽略掉了。



1963年，加州大学校长著名高等教育家克拉克·科尔前往哈佛校园，发表了轰动全国的“巨型大学”宣言。在宣言里，他自豪地描述了加州大学当时的变化：“……加利福尼亚大学去年从所有方面的事业费中支出近5亿美元和另外近一亿美元用于基本建设。学校雇员达40000人以上，比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还多，并且在更多的方面进行着种种努力。在100多个地方，包括校园、实验中心、农业和城市推广中心，以及在50多个国家的国外科研项目中开展业务活动。开设的课程将近10000门，几乎同当地各行各业、各级政府，以及所有个人都有某种形式的接触。大量贵重装置需要启用和保养。有4000多婴儿在它的医院里降生。它等于世界上小白鼠的最大粮仓。它不久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大主教侨居地。它很快还将拥有100000名大学生，其中有30000人是研究生……”<sup>①</sup>加州大学只是当时崛起的美国众多巨型大学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六十年代美国的大学无论在数量、组织、成员、活动还是职能等各方面，都已经与昔日的大学无法同日而语了。在六十年代，知识产业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将近三分之一，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知识产业起到了铁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汽车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作用，而大学又是知识产业的核心，大学起的作用相当于过去大企业所起的作用，因此学生也相当于以前的工人。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29天后，又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朝野大为震惊，美国人的自信心开始动摇：为什么苏联人控制了太空？矛头转向教育界。公众舆论认为，以前的教育过多地强调公民教育，忽视技术教育。于是，在婴儿潮这代人很小的时候就被鼓励学习数理化，目的是与前苏联展开军备竞争。国家突然

---

<sup>①</sup> 克拉克·科尔：《大学的功用》，陈学飞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意识到对科技的急切需求直接导致了大学中对纯科学研究的过分强调，这同时也导致了对大学生群体的忽视。

美国社会越来越重视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你必须把自己的文凭亮出来，否则就不能适应社会运转的需要，也难以找到一份体面工作。这种现实情况就成为教育工业发展的催化剂。法国教育家伊万·伊利什认为，学校已变成现代化的世界性宗教，他向技术时代的穷人许下空头的救世诺言。国家强迫人们加入以文凭为标志的教育纲领，恢复了昔日的人教仪式和等级制度。“学校是一部散发预制的知识和文凭的机器，是一种宗教礼仪，其目的是造就适应现状的人。”“通过实施这一计划，使公民相信科学知识会使官僚机构提高效率的神论。”经过规训的工业社会成员有纪律，专业化，“无条件地忠于经济增长的意识形态”。<sup>①</sup>

1960年到1975年间，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从2040所增加到3055所，几乎每个星期就产生一所新高校。<sup>②</sup>从学生人数的上升来看更直观，到1960年的时候，美国四年制大学里的人数是战前的两倍，1965年接近550万，1968年超过700万，1971年50%的适龄青年接受了高等教育。<sup>③</sup>1960年在校大学生数首次超过了务农人数。美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学生这股力量一直没有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根本原因就是学生的人数太少，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而现在不同了，单单是大学生人数的剧增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般的情况是，上过大学的人对政治、两性关系、生育和宗教的态度都更自由化。在1968年快要到来的头一年，美国有600万大学生，西欧有250万，日本

---

① 让-皮埃尔·勒·戈夫：《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胡尧步、韦东、高璐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页。

② 保罗·约翰逊：《现代——从1919到2000的世界》（下），李建波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65页。

③ 夏学花：《嬉皮士》，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



有150万。那么，1968年在这些地区发生大规模的学生造反也就不奇怪了。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只要有一些偶发事件，就会造成不好收拾的事端，罢课和占领学校成了家常便饭。在大学里他们可以彻夜不眠地谈哲学，获得性方面的经验，发展个人的特长和创造力。他们不能接受那些对学生生活的传统约束、对宿舍的监视、对学生刊物的检查、言论的禁制，他们也不能像以前的大学生那样，把大学生所特有的自由、探讨及试验的角色区分开来，大学的学术传统要求既要有学术的自由交流，又要像学徒一样严谨和依规则办事，这种自由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是获得知识和真理的必不可少的自由，并不是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所理解的可以为所欲为的自由。社会并不支持学生把在大学里的自由扩展到毕业以后的岁月和校外的人群中去，只有少数愿意投身于学术的严谨和自我限制的人，才可以一辈子都享有这种自由。大学生们认为既有的文化体系和思想观念是极端落伍的，因而不愿大学体制限制他们的自由。这些出身白人中产阶级的学生大都是在郊区长大，接受了一种围绕着运动、约会及“乐趣”的亚文化，这种亚文化是围绕着反权威、反父母、反老师的默契建立起来的。

以往的任何时代都没有像现代国家这样，出现这么多的超过十六岁却仍然在学校里读书的青年。传统上，在世界各地都是只有占据了政治经济优势阶层所产生的后代（还有少数非优越阶层出身但符合继续受教育的条件的青年），才能够在生理成熟之后仍然不去劳动，继续享受受教育的权利。而现在，几乎每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权利。以前，学生少的时候，势力单薄的学生就会依附拥有父亲式权威的老师，以成年人的行为为榜样。而青年学生的数量激增后，就容易在大学里互相影响，形成共同的文化。父母和兄长的传统道德的管教对他们的影响往往不及同学和流行文化的魅力，老师和行政人员就有可能被作为对立面。这也是青年运动容易发生在大学里的原因。

另外，大学生被纳入了技术知识阶层，专业化程度很高，分工越来越细，他们有一种被利用的感觉，好像是把活生生的人变成了大公司找钱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与其成为标准化的、可随意替换的、可有可无的人，不如死去！”这句话最为鲜明地表达了他们的态度。大学也成为研制武器和制定战略的主要场所之一，学校和军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大学中的自然科学，甚至像数学这样抽象的学科都已被直接应用于生产和军事。自然科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依赖于政府和基金会的财政支持，大学日益成为现行制度的一部分。这也是现代工业国家对大学自由的侵蚀，伴随着的是关心人的健全的传统人文学科不断地萎缩，教育的实用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这些大学生的不满可以说是对这种工业社会弊病的一种歪曲的、引向时髦方向的愤怒。他们看准了毛病，却开出了更错误的解决方法，即以狂欢的享乐生活来反抗这种对人的整全的分割。这是法兰克福学派最喜欢谈的东西，使青年们在现代国家的泥潭中陷得越来越深。

教育的大规模“扩招”也发生在了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不管你成绩再差，总能捞到一个大学来读。而在以前，尤其是在那些大学不多而又人口众多的省份，大学生是非常罕见的。中国似乎只用了短短二十年就走完了欧美国家需要若干个世纪的大学普及化之路。教育产业化的问题在中国也很突出。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1998年提出建议：扩大大学教育是一个可以拉动内需的消费点。如果高校每年扩招30万学生，按一年一个学生消费1万元计算，30万学生实际消费将近30亿元。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增加学生在学校中的消费，二是缓解就业问题。此建议引起了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中国大学扩招就在这以后开始。1998年中国高校招生规模仅为108万人，2006年就达到了540万，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扩大了五倍。十年之后，记者采访被称为“中国扩招之父”的汤敏，他这样谈到扩招的实际



结果与他先前的预料之间的差距：“我主张好学校多扩，差学校少扩，但结果却并不是这样。”<sup>①</sup>

2007年，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称，到2010年在校普通本专科将达到2000万人，这两年还要扩招438万人。<sup>②</sup>这样，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大学生最多、大学生群体最庞大的国家。

言归正传，回到美国的大学。学生人数的暴涨本来就是一个麻烦因素，再加上美国的教育理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就使大批的学生和时髦的教育观点的结合成为可能。二十世纪以前，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教育观念是要素主义和永恒主义。前者认为，教育的首要目标是欧美文明最优秀的传统，智力的培养非常重要。小学课程的核心要素是读、写、说、拼、算、史、地，高中和大学则可以把知识和技能、欧美文明的价值观进一步推向纵深。永恒主义坚持认为，伟大作家及其经典作品、作品产生的时代都是无可比拟的。人性永恒，因此古代作家的探讨永远不会过时，做一个有教养的人就必须珍视传统文化。永恒主义很推崇古典教育。要素主义，特别是永恒主义，都对提高学生的教养、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有重大意义，也是唯一可以有效抵制现代化危机的良方。但是它只适用于精英教育而不是大众教育，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二十世纪也就再也无用武之地。国家工业化要求教育要把尽可能多的国民都吸纳进去，经过单面化的处理后，能够为国家的工业建设派上用场。教养、纯粹的智慧没有经济上的意义，自然会衰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流行的是进步主义的教育思想，其代表人物约翰·杜威认为，生活即学习，学习即生活，个人经验是学习的基础，不

---

<sup>①</sup> 新华网2007年8月27日《扩招之父：不后悔谏言大学扩招 认为利大于弊》，<http://learning.sohu.com/20070827/>。

<sup>②</sup> 博杰：《高校扩招要走出急功近利》，<http://business.sohu.com/20070606/>。

必再以传统的价值和文明为准绳，生活和实践才永远都是绿色的。进步主义后来又派生出了改造主义，主张学校要成为社会变革的排头兵，成为实现社会价值和理念的领导力量。改造主义要求师生都应放弃不切实际的沉思，要马上行动起来。美国教育理念的变革，<sup>①</sup> 进步主义和改造主义都是反对传统的，他们提倡的生活、实践和行动都不会以传统为准绳，那么，用什么理念去指导行动呢？当然是时代流行的那些意见，让人觉得快乐的东西……可以想象，从小就喝着可口可乐、吃着肯德基长大的“婴儿潮”一代，一进学校就遇上这两大主义，会怎样听从时代主流“民主和自由”的呼唤，会领导时代潮流和社会价值产生怎样的变革。前面介绍过的洛丽塔读的那个中学就是以这种进步主义教育思想为准则的。据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大学生中有 81% 对大学院校的行政当局不满，另一个民意测验报告显示，50% 以上的大学生对美国国内外政策有重大保留和异议。<sup>②</sup> 可见六十年代的青年运动有很强大的学生基础。把进步主义和改造主义翻译成为六十年代的语言就是：别想那么多，去抽大麻吧，去听摇滚吧，住进群居村，像黑人一样快乐，快行动起来吧。实际上学生们正是这么做的，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公布的数据表明：“婴儿潮”一代中有 40% 的人吸过大麻，27% 曾效仿嬉皮士的装扮，10% 练瑜伽、迷信东方的宗教，5% 过群居生活。<sup>③</sup>

主要由大学生组成的 SDS 于 1962 年 6 月召开了休仑港会议，并通过了纲领性文件《休仑港宣言》，自此开始了开展实际活动的

---

① 参见吕庆广：《60 年代美国的学生运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 46~47 页。

②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 年美国社会实录》（下），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组、朱协译，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120 页。

③ 史晓玲 2001 苏州大学硕士论文《美国六十年代反文化运动透析》<http://epub.cnki.net/grib2008>。



成长期，同时 SDS 也发展成为六十年代美国大学生激进运动的领导核心。在这个阶段里，大学生们采用的是扶贫济困的策略。他们受民权运动的影响，在北方积极开展募款活动，帮助穷人，还深入到黑人社区做义务家教，组织人员前往南方支持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实施“经济研究与行动计划”（ERAP），其宗旨是组织一批 SDS 成员，深入到居住在贫民区的黑人 and 白人群众中，“协调基层社区的各种计划”，并“通过自上而下的社区组织活动”，使社区人自己控制社区，“形成社区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有的进行和平宣传，有的提供法律咨询，有的致力于改善住房条件，有的投身于反对种族隔离，有的帮助失业者找工作，有的帮助贫困者申请救济金。大多数学生初次从事这类工作，缺乏经验，与穷人相处时在沟通上也困难重重。而贫民区的人们对这些乳臭未干的大学生态度往往较为冷淡，他们宁愿与地方政府官员打交道。因此，SDS 虽然在“经济研究与行动计划”上花了不少精力，但收效甚微。于是，他们在 1964 年撤出基层社会，返回校园开展运动。

1964—1965 年的加州大学分校伯克利校园造反是第一个阶段性的事件，此次“言论自由运动”是六十年代大学生与政府的第一次对抗。事件的起因是 1964 年 9 月伯克利校区的教务处长卡瑟琳·陶尔于 16 日宣布，校门前约 26 英尺长的空地属学校财产，在这一地段上的任何行动都必须遵守校规。学校的这个宣布就是要把这块地纳进校规校纪的严厉管束中。学生们和部分老师非常生气，提出对校规进行重大改革，校规必须保障学生基本的政治活动权利，校规不能违反宪法。他们成立了一个跨团体的组织“自由言论运动”（FSM），就是这个组织和以分校校长爱德华·斯特朗为核心的校方展开了一场长达几个月的斗争。

1965 年 1 月 2 日校董事会换下了强硬的伯克利分校校长斯特朗，任命较为温和的马丁·梅耶逊为“执行校长”。梅耶逊上

任后，一改斯特朗独断专行的不商量态度，与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举行了一系列的会面和讨论，通过了一些很开通和宽容的新规定，给予了学生政治活动的自由，使得许多学生的要求以校规的形式合法化了。学生领袖萨维奥在新校规颁发后的第一次集会上对梅耶逊伸过来的橄榄枝表示接受。这样1964—1965年的伯克利校园的学生造反事件算是结束了。<sup>①</sup>此时，约翰逊政府在公众中出现了信任危机，约翰逊就是靠许诺不会扩大越战只会尽快结束而上台的，但是上台后他的行为却背道而驰。他扩大了越战，不断地把美国兵送进去。青年们失去了对总统的尊重，因为他使美国深陷战争的泥潭；也不信任国会，因为它持续不断地对战争拨出巨款，他们甚至怀疑民主制度本身。政府的行政权威、学校、大学、报界、教会、家庭都被贬低。美国的年轻人，尤其是中产阶级青年，在电视中看到了越战的现场直播和大量纪实的新闻报道，对越战的正义性和胜利的可能性产生了严重怀疑，并且感到极端的恐惧。那种极端恶劣的环境怎么适合美国人生存？他们经常看到，一个美国兵在茂密的热带丛林里拿着枪走着走着，突然就被打死了，这比恐怖片还要让人心惊肉跳。电视里到处是被汽油弹烧焦的孩子，伤残的士兵，堆积的尸首，冒烟的残垣断壁，日复一日，活灵活现，渐渐引起青年们的关注。1968年春节攻势期间，美国电视网播放了以往从未播放过的战争场面。国家广播公司当时播映的电视新闻中剪辑了几幅照片，从这些电视画面中，人们可以亲眼目睹尸体倒在地上，血从头部喷涌而出的可怖场景。看着这些残酷的死亡画面，许多美国人不禁对他们国家进行这场战争的目的与行动提出质疑——照此下去，怎么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呢？对于大学生来说，征兵卡已经发在手上

<sup>①</sup> 1964—1965年伯克利分校的造反情况，参见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02~314页。



了，毕了业就得上战场，不去就只有坐牢。学生们觉得不能坐以待毙，准备发动民众一起抵制征兵。他们这次看准了，城里的非大学生青年比他们还要着急，因为他们马上就会到越南去，而不是像大学生那样还可以等两年。随着美国在越南的大规模的军事介入，学生运动从1965年起也大大增强了它的反叛程度。静坐、罢课、游行成为这一时期他们的主要斗争手段。SDS采取的第一个反战行动是于1965年4月17日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示威大游行，参加者近25000人。这次集会游行初次显示了“学生权力”（Student Power）的力量，同年11月27日，在SDS的领导下，全国大学生中的新左派组织举行了震惊全美的“向华盛顿进军”反战大游行。1967年4月15日在纽约绵阳草坪上举行的焚烧征兵卡示威活动就是一次大规模的大学生和市民的联合行动。为了逃避征兵，大学生们在体检前先吸足毒品，飘飘然。在几个星期前就用普通针头把胳膊刺得满是针眼，扮成一副老手的样子。还有许多大学生逃到加拿大、瑞典和美国的北部森林，过起了隐居生活。

1968年在充满火药味和不好的预感中到来了。4月，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引起了城市骚乱的浪潮；5月，巴黎大学生筑起街垒与警察对抗；6月，已经被暗杀的前总统肯尼迪的弟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的罗伯特·肯尼迪也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杀死。金博士和罗伯特·肯尼迪的死亡使黑人民权运动和大学生造反的方向发生了逆转，那就是温和派的失势，主张暴力斗争的极端派开始占据上风。“黑豹党”把黑人解放运动完全引向暴力，他们不同意金博士温和和节制的斗争策略，甚至批评这种和平的请愿活动是奴颜婢膝，以牺牲“黑人性”来换取本来就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在大学生方面，SDS让位于更加激进的“结束越战全国动员”（MOB）和“青年国际党”（Yippie）。对美国大学生运动刺激最大的是1968年5月法国巴黎的学生大暴动，法国学生运动给美

国学生运动的启示是：学生运动可能失败，但它可以改变政府，甚至推翻一个政权。学生领袖汤姆·海顿讲道：“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正在向权力靠近，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国家机器人不人道的話，我们就将它废除掉！”<sup>①</sup>

1968年正好是美国总统选举年，也是不得人心的约翰逊政府的最后时光。民主党不够审慎地把代表大会的地址定在了民主党总部所在地芝加哥。在大会召开之前，激进组织 SDS、MOB、Yippie 纷纷到来，垮掉派的金斯伯格和巴勒斯也赶来助阵，金斯伯格是光着脚来的。这么多不甘寂寞的青年齐聚芝加哥，总会有什么事发生的。果然，在民主党代表大会期间，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青年们学着巴黎大学生的样子，用桌子筑起街垒，但这些孩子们都是不堪一击的，他们被防暴警察打得落花流水。金斯伯格因为摆酷没有穿鞋，在满是碎石和瓦斯气体的街道上跑不快，受了伤，喉咙粘膜也被瓦斯毒气灼伤了。

1968年的芝加哥骚乱并没有人死亡，被抓的学生也很快就被放了出来，但是1970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5月4日，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学的大学生就被国民警卫队打死了四个，警察是在对峙中突然开枪的，大学生猝不及防。5月14日密西西比州的国民警卫队在杰克逊州立大学枪杀了两名大学生，另有十二人被枪打伤。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十二名黑人被枪杀，二十名受伤。学生的造反运动没有再继续下去。<sup>②</sup>

---

① 转引自王俊勇 2004 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生运动》，第7页，<http://epub.cnki.net/grib2008>。

② 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02~325页。



## 七、黑人青年的暴力问题

那些没有读到大学的贫苦青年，如果又因体格和心理上的原因不能参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就不能找到像样的工作。现在已经有了那么多大学生，高中生就更加不容易找到好的工作了。在这些穷人青年中，黑人的问题特别突出。

美国内战后的最初十年，城市中的黑人和白人还是混居的。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黑人社会地位的部分改善和南方经济结构的变更，首次出现大批黑人移居城市的浪潮。在城市中，为防范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暴力骚扰并彼此照应，黑人倾向于聚居，再加上富有的白人不断外迁，市中心区逐渐成为黑人聚居的地方。从总体上看，二十世纪初的黑人社区虽然不如六十年代那样明确、固定，但在北部已具雏形。随着黑人的城市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城市整体上的居住区隔离现象逐步显现。白人把一些黑人居多数的居民区视为黑人社区，相继迁出，而黑人在此类社区之外找住房日益困难，很快黑人和白人之间形成了一条明显的界限。这类界限在芝加哥于1915年前后渐趋明朗，到了二十年代便成为固定模式，并被社会所认可。

美国的城市人口和产业的分布开始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汽车的广泛普及，给了人们更多迁徙的自由。美国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加速修建州际高速公路，形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再加之美国联邦政府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和解决住房问题，执行了一系列推动郊区化的政策，如住宅抵押贷款制度、住宅补贴制度和社区评估制度等，促进了郊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前发展。十九世纪末，美国城市郊区化就开始了，大城市中心市区人口占全市比例逐渐下降。1920年，大城市郊区的人口增长第一次超过了中心市区；在四十年代，郊区人

口的增长几乎是中心城市的 2.5 倍；到了 1960 年，城市、乡村、郊区人口各占三分之一；到六十年代末，郊区人口已经超过了城市和乡村。<sup>①</sup> 白人把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留在了城市中心，黑人聚居区成为脏乱差的代名词。

继白人中产阶级大规模地迁到郊区之后，黑人中产阶级也不愿在城市里待下去了。尽管他们在郊区所占的比例小，但他们作为黑人中的精英，其郊区化使黑人社区失去了原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下层黑人由此失去道德与行为上可以效仿的典范。黑人社区日渐陷入无序状态。

城市黑人社区大发展是伴随着美国黑人的大迁徙而进行的。1915—1970 年间，美国出现了两次黑人大迁徙。第一次大迁徙发生于 1915—1929 年，共有约 150 万黑人从南方农村迁移到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全国性的城市黑人社区由此形成。第二次大迁徙发生在 1940—1970 年，有近 450 万的黑人由南方农村，迁到全国各地大城市。城市黑人社区规模日益扩大并进一步发展，有些城市还出现了多个有规模的黑人社区。<sup>②</sup> 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90% 的美国黑人都居住在南方，75% 的黑人都在农村。在 1940 年的时候，也仍然有 75% 的黑人定居在南方。而 1960 年以后，有半数的黑人都移居到了北方，四分之三的黑人已经搬进城市了。五十年代中产阶级分子纷纷迁往郊区，而黑人则聚居在大城市里。数量也在大量增加，黑人迅速城市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黑人占城市人口的比例从 14% 上升到 21%，芝加哥的这一比例从 23% 上升到 33%，洛杉矶从 14% 上升到 18%。亚特兰大人口的 50% 为黑人，而华盛顿 71% 的人是黑人，华盛顿哥伦比

---

<sup>①</sup> 叶志伟 2002 年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64—1968 年美国城市种族暴力冲突及其原因》，第 20 页，<http://dlib.cnki.net>。

<sup>②</sup> 胡锦涛：《美国黑人第二次大迁徙及其影响》，《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 年第 2 期，第 7 页。



亚特区和纽瓦克黑人都占多数，克里夫兰、巴尔的摩、圣路易和底特律，黑人也占三分之一以上。这种社会力量的集中为黑人带来了施加政治影响的可能。据1970统计，美国黑人人口为2250万，占全国人口的11%，其中80%住在城市黑人社区里。在南方的1192万黑人中，有742万住在城市。北部和西部的黑人几乎全都住在城市。<sup>①</sup>“婴儿潮”中太平洋沿岸各州五十年代的黑人人口增长了184%，在六十年代又增长了113%，黑人的出生率要比白人高40%。这么多黑人聚集在城市，致使工作越来越不好找，这一时间正是黑人适应的制造业工作迁到郊区的时候，黑人们又只能适应这些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因此失业的问题更加严重。黑人也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低素质人群一样，有一个因大量生育而致贫的问题，他们对教育也不像同样是边缘群体的犹太人那么重视。犹太人的命运可以说比黑人更悲惨，但是犹太民族却产生了众多的伟人，看来这还是一个民族的素质、文化、宗教问题而不是处境问题。

这些因素就决定了1964—1968年种族暴力冲突主要发生在美国北部城市的黑人社区里。而1964以前的种族冲突，往往不是发生在北方的黑人社区。以前的冲突并不主要发生在北方，私刑和暴力骚乱在全国各地都有，既包括北方也包括南方，既包括城市也包括农村。但1964—1968年冲突则有其鲜明的特点，其无一例外地发生在北方城市的黑人社区。就是因为大迁徙之后城市里面的黑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很大的势力。而在北方的大城市里，死硬的白人保守主义者力量已经衰微，种族主义在开放的大都市站不住脚。

年轻的黑人要比他们的前辈好斗得多，不会再如他们的前辈

---

<sup>①</sup>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3页。

那样，为了一点利益而忍气吞声。对底特律黑人暴力冲突的调查表明，在自称参与冲突的人中，有 61.3% 年龄在 15~24 之间，86.3% 年龄在 15~35 之间。有 74.4% 自称参与冲突的人出生在北方，本地长期居民占 59.4%，而纽瓦克分别为 74% 和 53.5%。<sup>①</sup> 总之，他们不是传统的逆来顺受的汤姆叔叔，他们不是从南方迁移过来的，而是出生并长期生活在冲突频发的黑人社区，其经济地位与没有参加冲突的黑人并没有多大区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学历比黑人的平均学历高，主要是靠体力谋生的低收入的非熟练工，并常处于半失业状态。这种新型黑人认为阻碍自己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的原因不是自己缺少训练、能力和信心，而是雇主的种族歧视；他们为自己是黑人而自豪，认为黑人至少在某些方面比白人强；他们非常仇恨白人，但同时也憎恨黑人中产阶级。

五十年代以前的种族隔离制度将黑人世代固定在低收入的工作岗位上，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许多勤劳本分的黑人创造了真实的尊严和正直。他们信奉白人中产阶级的价值，并把它世代传给子女。现在他们的子女不干了。六十年代并不只是白人青年反对他们父母的价值观，同时代的黑人青少年也在反叛父母勤劳正直的价值观。黑人青年的这种变化就体现在民权运动的方向转变上。支持马丁·路德·金的多是父辈，他们希望通过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实现在就业、受教育等方面的种族平等来实现他们跻身中产阶级的梦想，因此他们的抗议是有纪律有秩序的，这就奠定了六十年代前半期民权运动的温和克制的风格。待到他们的孩子长大以后，民权运动的风向就变了。这些“婴儿潮”一代在六十年代后半期正值青年，他们不喜欢金博士的“我有一个梦

---

<sup>①</sup> 叶志伟 2002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64—1968 年美国城市种族暴力冲突及其原因》，第 14 页，<http://dlib.cnki.net/>。



想”。在哈莱姆黑人聚居区，金博士被黑人青年用臭鸡蛋打得满头是蛋清。只有马尔科姆·X、休伊·牛顿、博比·希尔、艾尔德里奇·克利弗的暴力情绪才是他们需要的，他们认同黑豹党领袖休伊·牛顿吸收的阿尔及利亚革命者弗朗兹·范农在《地球上的不幸者》里面鼓吹的政治暴力。和马克思不同，范农排斥工人，倾向于把马克思鄙视的流氓无产阶级组织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流氓无产者视为“危险的阶级”，是最危险和最堕落的分子。年轻黑人们感到格瓦拉和胡志明更亲切。于是，他们喊出了“黑人权力”的口号，叫嚣着“凡是黑的就是美的”，战斗口号是：“用火烧，孩子们，用火烧！”马尔科姆·X声称：“革命从来就不是用左脸也送上去挨打的办法来进行战斗的。革命从来也不是以爱你的仇敌以及为那些恶意利用你的人祈祷等等为基础的。革命从来不只是空喊‘我们将征服敌人’就行的。革命只能立足于流血的战斗。”<sup>①</sup> 这也就决定了黑人运动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南方，提出的是一些中产阶级“软绵绵”的要求，如在小吃店和公共汽车上能与白人同吃同坐，能够和白人用同一个厕所，和白人的孩子一起读书，等等，都是关于社会地位的问题；第二个阶段则是“无产阶级”和“真刀真枪”的革命。1960年成立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后来也不赞同只采用非暴力行动和融合，主张黑人民族主义和黑人的自我武装及自卫。1966年，新任主席托克利·卡迈克尔提出了战斗性的口号：“黑人权力”。这个口号强调黑人的民族自豪感，提倡在没有白人干涉的情况下取得黑人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发展。在政治上就是要求黑人作为一个集团来显示自己的力量。在经济上，黑人权力意味着自给自足的黑人企业制度，让黑人的钱流到黑人社会里。同时，卡

---

<sup>①</sup> 罗伯特·艾伦：《美国黑人在觉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5~37页。

迈克尔也强调黑人可以用枪来保卫自己，甚至可以开展游击战。1964年，马尔科姆·X成立黑人民族党，主张以暴力解决问题。1967年，更激进的黑豹党成立，同年一群黑豹党成员带着自动武器冲进了加州议会抵制“技术控制法案”。在他们居住的社区，他们全副武装地巡逻，戴着墨镜，穿着皮夹克，提着AK-47，经常耀武扬威，袭击白人警察。黑豹党的分支“黑人解放军”在七十年代更善于制造恐怖事件。

斩钉截铁的种族主义又强调黑人的种族优越性，把黑人青年团结在了一起，骚乱者往往都有比一般黑人更为强烈的种族自豪感。由于整个白人中产阶级社会觉得有愧于他们，所以他们的发泄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相反还会得到更大的报酬，所以年轻人更易走极端。在全国，黑人总人口的一半都不到22岁，绝大多数都没有父母管教。在大城市中，有30%的黑人家庭的户主是没有丈夫的妇女，仅在纽约市，1964年黑人私生子就不下10万人。这些年轻人很倾向于暴力。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以后，民权运动非暴力战略就彻底终结了，他已经是非暴力的最后希望。黑人青年们集聚在城市的贫民窟里，也形成了一种常常与犯罪和混乱相连的贫民窟青年亚文化，以吸毒、摇滚、滥交、重度刑事犯罪为特征。他们聚居的地区性病发生率和犯罪率都是全国最高的，那里到处弥漫着悲观、绝望、怨愤和不满。六十年代的黑人骚乱就发生在这些地区，一般都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他们脾气也和天气一样火爆。黑人社区的恶劣环境使黑人根本无法在家里待，他们往往在傍晚聚集在街头。由于长期对白人警察和零售商不满，所以他们往往会因警察的某一个正常的执法行为而把这种不满全部发泄出来，事件发生后所有纳凉的人们都会围拢过来，就容易导致种族冲突。出生在战后“婴儿潮”一代的年轻黑人在六十年代的犯罪率是最高的，再加之参加骚乱的人多数都是单身，和父母的关系也不好，他们没有家庭的束缚。由于他们没



有可担心的人，非常容易随便使用暴力。大量精力旺盛的黑人青年整天无所事事，游荡在相对狭窄的黑人社区，必然会对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

现在在我国，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田地大片荒芜，农民工的城市身份合法化问题被激烈地讨论着，应不应该让农民工大规模地成为城市居民？怎样妥善处理好农民工子女在暂时居住的城市的入学问题？应不应该为农民工修建成片的“廉租房”？都是一些很值得商榷的问题。希望对美国六十年代城市危机的讨论能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个比较的视角。

上面提到的青年大学生、流浪汉、嬉皮士、有色人种，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新的革命星座”：

无论如何，在保守的大众基础之下，有一些亚阶层，如被遗弃者和被排斥在外者，被剥削被压迫的其他种族和有色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他们全都是在民主过程之外存在的；他们的生活最直接最现实地要求结束不可容忍的条件和制度，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也是革命的。<sup>①</sup>

在这一时期，由于冷战和越战的需要，美国维持着一支至少三百万的军队，一大群心怀不满的青年又聚集在了一起。六十年代初期，美国人口的半数都在30岁以下，随后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总人口的一半。<sup>②</sup>

---

①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页。

②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下），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3页。

## 八、青年亚文化

普遍的大学教育、大规模征兵、贫民窟青年文化的崛起，使得一个独特的青年文化形成了，大量不满时事的青年汇集在一起，冤屈、力量、不满都得到了放大，使他们倾向于集体行动。根据“法不责众”的民主社会惯例，“集体闯红灯，就不用害怕”。当然，不只是这些制度上的原因，电视、唱片、录音机、收音机这些大众传播媒介使得青年文化的流行内容变得更加一致，那些女孩和男孩，都喜好同样的音乐、衣服、饰物，怀着同样的思想，流行着同样的趣味，他们逐渐产生了“我这一代”的心理，他们在学会唱国歌之前就会唱“百事可乐，令人满意，整整十二英两，可不少啊”。他们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和一样的问题，在六十年代他们追求友爱、性解放、致幻剂、摇滚乐、禅宗和流浪。而且这种广泛的青年亚文化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广告商小心翼翼，生怕得罪青年的审美。甚至儿童被当做消费者来对待的年龄也越来越小了。商业和广告业紧跟叛逆青年的步伐，追捕着这群零花钱很多的“肥胖的兔子”。青少年每年的零花钱就有120亿美元，如果算上父母用在他们身上的钱，整个市场销售额就有250亿美元。青少年是不会买那些耐用品的，不过是跟风罢了，他们消费了全部电影票的53%，全部唱片的43%，全部化妆品的20%，每五名高中生就有一名拥有自己的汽车。<sup>①</sup>很明显的是，六十年代初经济连续五年的高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青少年的疯狂消费带来的刺激，因此一定得预先捕捉到“胖兔子们”的心理。他们不再声嘶力竭地鼓吹某种产品既经济又实惠，而是代

---

<sup>①</sup> 兰登·琼斯：《坎坷的一代——生育高潮后的美国社会》，贾滢美等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之以独特的创意风格，幽默、滑稽、完全出人意料，不会和你谈这个产品需要多少钱，因为这样太庸俗了。

六十年代初期，美国人口的半数都在30岁以下，随后半数都在27岁以下，再以后则半数都在25岁以下。美国在六十年代是一个青春化的国家，青春变成了一种崇拜对象，大家都想享受它，在商业上迎合它。在六十年代中期，广告业迷恋上了反文化的图景，他们的目光主要不再放在成年人身上，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摇滚一代。因为传统的美国人只把钱花在这些质量过硬的基本产品上，有时在这方面也舍不得花钱，而“婴儿潮”一代的年轻人则喜欢赶时髦，不断地扔掉过时的东西。这批年轻人是最好的主顾，他们渴望即时的快感，对时髦的东西充满洛丽塔式的渴望，对于节俭、匮乏，和老土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因此广告人一定要鼓励他们传统的清教主义表示公然的蔑视，不屑于根深蒂固的社会规则。年轻人常被告知，自己刚买两个月的走在最前面的手机，功能已经很不够用了。在无数次的会议上，广告人不断地探讨着嬉皮俚语的方方面面，各种摇滚乐流派的气质变化，以及服用了致幻剂后的生动效果，根本目的是想要从这里吸取灵感，好为广告创意服务。他们努力抓住LSD的色彩和类似毒品诱惑而造成的意乱神迷的心态，以获取最大的戏剧效果。为了练习广告创意，每天都对日常生活的简单规则进行故意的违抗和超越。因为只有走到时代的前头，年轻人才会买账。麦迪逊大街从事商业文化的男子脱下了他的灰色法兰绒上衣，欢快地扎进青春文化中去了。<sup>①</sup>

到了1968年，广告业中普遍认为，只有反叛性的青年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广告设计人，许多嬉皮士后来当上了那些大型代理

---

<sup>①</sup> 托马斯·弗兰克：《酷之征服：嬉皮消费主义与青春文化的创造力》，见包亚明主编：《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382页。

机构的头头。威尔斯、瑞奇、格雷尼这三个创意天才于1966年组建WRG，他们是最早的用嬉皮士风格创造奇迹的发迹者。在仅仅五年之内就获得了一亿美元的汇单，被《广告时代》称为“广告史上最令人吃惊的增长纪录”。他们制作嬉皮风格的狂欢广告，其代表作成为六十年代后期时代特征的代言人。在他们商店的门厅里，贴着“爱”牌致幻剂的海报，椅子上放着婴儿用的蓝色枕头。开票员来自海地，口音很重，做侍应的小姑娘眼镜有四英寸厚，上面还有烟嘴。1969年，WRG为曼雷和詹姆斯这家医药公司的一系列化妆品设计了一个名字、一个包装以及市场销售战略和广告制作，所有的化妆品都叫“爱”牌。明眼人一看就知这是在迎合嬉皮士的著名口号“要做爱，不要作战”。它的包装和商场展示如梦如幻，有美丽的鸟与花朵，显示出逃离主流社会的迷幻色彩。<sup>①</sup>

很快，主流文化就学会了如何通过迎合青年人的口味来获利，从蓝色牛仔服和反文化的“珠宝”，到更高级的录音带和立体声装备，录音公司发了财。电子乐器的商家发现有无穷的方式来诱惑年轻人，迷幻商店出售抽大麻用的卷烟纸、烟斗直到嗅可卡烟粉的天平、量具和微型药匙等工具，应有尽有。从“迷惘的一代”到“垮掉的一代”再到嬉皮士，商家总是尾随其后，他们都发了大财。

在整个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亚文化中都弥漫着一股“白种黑人”的核心气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极力推崇黑人边缘群体，从大麻烟、性自由到爵士乐，都引起了白人青年的追捧。在六十年代初，美国文化总体上经历了非洲化的根本变革，尤其是音乐和

---

<sup>①</sup> WRG公司的销售奇迹，参托马斯·弗兰克：《酷之征服：嬉皮消费主义与青春文化的创造力》，见包亚明主编《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11~414、419~440页。



舞蹈。勒鲁伊·琼斯在有关黑人音乐历史的著作《布鲁斯人》(1963)中,支持了梅勒的“白种黑人”的观点:

美国青年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四五十年代波西米亚分子,他们和黑人一起取得的,正是这样一种横向、互补的认同,他们努力从他们在美国社会地位的相似性中获取某种情感利益,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年轻的黑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许多情况下和白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一样,从“正统”的中产阶级的境况中逃离出来。<sup>①</sup>

那些崇尚黑人文化的人和那些仇恨、害怕黑人文化的人一样,都把黑人看做是更贴近自然、拥有不受束缚的身体的快乐人。而白人文化的那些现实感、对宗教和道德的错误理解的严格要求使人感到很累,一个白人男子到了二十几岁就感到很疲惫,被不断地要求压制自己,以适应社会化的需求,千篇一律地读书和成家立业,苟延残喘,身体反应慢,意识也僵化,产生了一大批只会坐在办公室、操作电脑、呆板享乐的白领。这确实是现代工业文明对人整体本质的损伤和机械利用。黑人文化赋予了身体和冲动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力量和价值,而白人的高雅文化长期虚化了身体。黑人舞蹈弯曲的肘和膝、此起彼伏的身体、重音力度及其直露的性感,在传统欧美标准看来就是不雅和淫荡。黑人音乐的口头传统、强调节奏甚于旋律,强调身体,也被欧美传统看做是令人厌烦和粗糙的。在“呼啦圈”的帮助下,白人也学习将臀部和上半身分开扭动。白人青少年、甚至第一夫人杰奎琳都

<sup>①</sup> 转引自萨利·贝恩斯:《1963年的格林尼治村》,华明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274页。

跳摇摆舞，一种被青少年的父母们批评为色情的黑人舞。这种舞蹈中有一种身体动作，摒弃了欧美舞蹈的传统模式，向欧美文化发出了挑战。在黑人和白人的文化联姻中，是黑人带来了文化嫁妆。

小时候，这些养尊处优、家教很严格的孩子就对那些贫穷的、整日在巷子里面滚铁环、打群架的孩子们有一种羡慕感，他们可以在外面玩到很晚才回家，可以无节制地打电子游戏，只要身上的钱够，可以下河洗澡，晒得很黑，甚至可以偷东西和搞恶作剧。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则必须保持干净的衣裳，并且不骂脏话，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作业。稍微大些的时候，穷孩子就可以找自己的女朋友了，并且可以公开地把她大大方方地领回家来过夜，过一段时间又换一个，晚上把摇滚的声音放得很大，时常都可以和朋友们一起抽烟喝酒打牌。而这对于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孩子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笼子里的白孩子会比较温暖和富足，而贫民窟的黑孩子虽然显得比较肮脏和粗暴，但却是更自由和快乐的。

还有就是对体力工人的肉体羡慕，即在头脑中把他们想象成肌肉发达、敢作敢为的力量，在学生运动中甘愿接受他们的领导。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也喜欢下层孩子们的文化，自由、叛逆、放肆、疯狂、带有犯罪的气息、粗俗和耿直、讲义气。这些东西有两个共同特征：身体性和群体性，两者加起来就是一种超级狂欢，两者都有一种反智主义的倾向。六十年代大学生的各种运动也有这些特征。这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和人人平等的民主体制造成的极端反智倾向，过于注重在日常生活中的于生活和享受有益的各种技能和资源，而反对建立在文化等级制之上的文化精英

主义，反对那些艰深而没有生活实用性的理论。<sup>①</sup> 黑豹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爱尔德里奇·克里弗在其畅销书《冰上的灵魂》中这样论述黑人与白人的关系，在他看来，白人是“头脑”的代表，而黑人是“身体”的代表。在《在路上》一书中，凯鲁亚克的代言人萨尔就很羡慕那些生活在黑人聚居区的自由自在的黑人，梦想着和那些愉快、坦诚的黑人们换一下位置。他们代表的生命力、自发感是他求之而不得的东西。书中他写到了他的一个愿望：“能够与丹佛的黑人聚居区里的黑人交换地方……希望我是一个黑人，觉得即便把白人世界最好的东西给我也无法让我兴奋，没有足够的生活，欢乐，抱怨，黑暗，音乐，没有足够的夜……我希望我是一个丹佛的墨西哥人，或者一个穷困劳顿的日本人，任何人只要不是这乏味的、心灰意冷的白人……我穿过黑人和墨西哥人黑漆漆的门廊；那里有柔和的声音，偶尔有女孩性感的黑黝黝的膝盖；玫瑰丛后男人暗色的脸。小孩坐在小石凳上，如同智者。”这也表现在他对“白种黑人”尼尔·卡萨迪的羡慕上，卡萨迪的性格也是萨尔或者是凯鲁亚克的人格的一部分，是凯鲁亚克关于美国“西部”的所有幻想。“西部”是美国人心目中一个非常独特的意象。美国十九世纪的西进运动中，西部拓荒者留下了敢于打拼和闯荡的“加利福尼亚精神”，美国西部牛仔就是美国早期开发西部时所涌现的一批具有强烈冒险精神及开拓意识的拓荒者代表。对西部边疆的向往，对牛仔英雄的崇拜，使无数美国人具有浓烈的“西部情结”，凯鲁亚克就更是如此，对这种自己的家庭背景里没有的流浪精神特别向往。不受传统道德束缚、追求冒险刺激、过吉卜赛式流浪生活、相貌英俊、讨女孩子喜欢的尼尔·卡萨迪就是凯鲁亚克眼中完全理想的牛仔形象，

---

<sup>①</sup> 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0、283页。

凯鲁亚克是多么渴望成为一个不受基督教伦理束缚的黑人或者是西部牛仔。尼尔·卡萨迪在丹佛长大，跟酗酒的父亲一起住在贫民区的旅馆里。他从小缺乏亲情呵护与良好的教育，小小年纪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机警圆滑、能够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讨取欢心；他擅长偷车，青少年时代曾偷过二百多辆车，并且驾驶技术高超；道德底线低、生活轻浮放纵。他那满不在乎的言行、粗野的举止以及充满性诱惑的健壮的身体，体现出一种罕见于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性格的独特性。因此不仅是凯鲁亚克喜欢他，而且六十年代的中产阶级大学生普遍都把他作为偶像。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的第二部《兔子回家》中塑造的白人“兔子”和黑人斯基特的关系也非常暧昧，象征了六十年代美国白人主流对黑人的本能和理智上的厌恶，以及同样是本能的对黑人强健身体和没有约束的自由的羡慕，被黑人文化所蛊惑，对虐待黑人的历史的良心不安。作家厄普代克在一个访谈中说：“事实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黑人。”<sup>①</sup> 摇滚歌星麦当娜在小时候也希望自己是一个黑人。黑人暴力团伙对所有未参加黑人解放运动的人，甚至对所有的白人都持批评态度，却视嬉皮士为盟友。大概因为嬉皮士是快乐的“白种黑人”吧。

德勒兹和瓜塔里干脆把欲望等同于黑人。他们反对拉康将欲望与匮乏相联系、欲望由上帝和天道决定的论点，因为这样就会重新得出欲望使人产生永久罪恶感的结论。在他们看来，欲望不仅不是匮乏，而且是一种充分、完全的实证性，它是“孤儿、无政府主义者和无宗教信仰者”，它“无目的地活着”，灌溉着社会。它没有祖国，不受任何道德和宗教的限制，“是所有人种中的下等种，是禽兽黑鬼”。它是“唯一”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是

---

<sup>①</sup> 金衡山：《厄普代克与当代美国社会——厄普代克十部小说研究》，北京：北大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页。



泛滥的河流，把社会碾成碎片。德勒兹和瓜塔里也推翻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即认为欲是死的本能体现。<sup>①</sup>可以说，他们二人真正说清楚了“白种黑人”的深层意思。

在这种对比中，就产生了对自己阶层的弱不禁风、油头滑脑、独立生活能力弱的鄙视。等他们进了大学后，盘踞在大学里的左派知识分子又给他们灌输资产阶级的罪恶历史，意图是要说明，你们富他们穷并不是天生的和正当的，而是你们的祖宗奴役和剥削了他们的祖宗，人的命运就从此改变了，因此你们这些孩子今天的锦衣玉食，是罪恶的。这些左派教授掌握了大量资产阶级罪恶史的材料。这样穷人自然就成了被侮辱被损害的象征，进而又成为正义的化身。黑人和穷人往往是精瘦的，长期的辛劳让他们脸上显得饱经风霜，有神圣而苦难的光泽，因此一看那张脸，就有一种道德的感觉。而再看自己的中产阶级父母呢？父亲白白胖胖，一副养尊处优的样子，每天不知在有空调的什么局里倒腾些什么，看起来没有创造财富啊，那工作对社会可能也真没有多少用，这些公务员依靠一堆电脑、收支平衡表、公司报表这些玩意儿光明正大地统治着那些一头雾水的社会阶级。还不如三轮车夫和农民，他们的血汗钱才真的是该拿的。不过父亲拿的钱要比他们多几十倍！想到这里你就会有一种直观的感觉，那就是：父亲真虚伪，没有道德感，真坑人。再看看母亲，穿着打扮都很入时，就是没有理想，生活空虚而厌倦，不知道她每天活着为什么。如此一来，正义的青年人就对自己的生活和父母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其实，许多资产阶级父母们也有罪恶感，尤其是那些制造业、采矿业、纺织业等第二产业的资本家，这些传统工业属于血

---

<sup>①</sup> 让-皮埃尔·勒·戈夫：《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胡尧步、韦东、高璐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第304~305页。

汗工厂，对工人的剥削是毫不掩饰的。这些资本家往往不惜巨资赞助公益事业。在1964到1968年间，美国国会通过的有利于下层阶级的立法比任何时候都多，如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住房法和选举权法、1966年通过的都市发展法以及1968年通过的民权保护法，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政府对黑人的骚乱在总体上持过于宽容的态度，大概就是这种愧疚感在作怪。1964和1965年通过的“民权法案”和“赞助行动”，表明美国白人政府对黑人种族的历史犯罪感的供认和补偿。资产阶级父辈的这种潜在的内疚感很明显会影响他们的孩子们，并在孩子们那里被夸张，被赋予戏剧性和表演性。

不过，那些学生领袖会利用这些真诚的、涉世不深的青年们所产生的怀疑，引诱他们去同情黑人、第三世界的人、越南人民和全世界受苦的人。而这些领袖把自己打扮成道德圣人，炫耀自己的道德感，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们往往打着胡志明、卡斯特罗、列宁、格瓦拉的旗号，吸引那些真诚地感到不满的年轻人，去干一些和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民毫无关系的事。大学生处在一个最慷慨忘我、同时也是最轻率的年龄，崇尚决不妥协，一些觊觎权力的野心家便笼络他们、蛊惑他们、牺牲他们……

总之，后现代文化和黑人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也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全世界的青少年都喜欢这种经过了美国文化包装的“白种黑人”文化。最流行的辣妹组合、迈克尔·杰克逊和麦当娜、黑人篮球明星把这种文化传播给了青少年。通过电视机和互联网，已经传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镇上，就快要到农村了。

在以前的传统社会中，个人的成长更多地受到传统文化和家族价值的塑造，子承父愿，女儿则在未婚前受到母亲和姐姐的保护和管束，以得到好名声。传统社会的家长制享有极大的权威。家庭不仅具有生产、生育和消费功能，还集教育、娱乐和养老于一身。现代社会家庭的功能被削弱了，年轻人不愿和“老土”的

父母一起娱乐，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事业也将保障功能从家庭中分离了出去。在高度流动、人生前途极不稳定的现代工业都市里，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要求青年不断学习极为复杂的专业技术，才能在城市里有一个立足之地。社会分工的细化使父兄和母亲已经几乎不能进行这样的教育，学生们必须长期在学校里度过漫长的学习现代知识的时光，尤其是大学，父母几乎是管不了的。于是，父母对子女的控制减弱了，父母与子女在价值观、态度和行为上的联系也减弱了。长辈的权威不可避免地失落，他们的经验知识和处理人事关系的办法在子女看来早已过时，年轻人习惯服从青年人的规矩和价值，他们有自己的偶像、暗语和关于美的流行规则，同辈的互相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传统家庭的教育。<sup>①</sup> 这样，同辈人之间联系的重要性就提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而由长辈传下来的道德规范则不可避免地被抛弃。不仅父辈已不再是人生的向导，而且根本不再存在向导，无论是在自己的祖国还是在整个世界，人们都无法找到指引人生的导师。没有任何一位长者能够知晓现在的青年一代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有何了解。这对传统道德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现在的孩子只管合群和逃避孤独，并不会管自己行为本身是否符合道德。一个人如果不能协调好与他人的关系，不知要比违背了内在的道德还严重多少倍。个人的道德感被群体的强调玩乐的功能代替了，以前维系青年之间关系的礼仪也被共同的消费好恶所替代。

六十年代，一大家人围在一张大桌子旁边吃饭的情况已经很少了，每个家庭成员都开着车到处跑。六十年代的社会运动都不是以家庭和血缘为单位的，或以种族、或以性别、或以年龄。这种变换条件的组合使群体具备了爆发性的力量。在先锋派的舞蹈

---

<sup>①</sup> 理查德·弗拉克斯：《青年与社会变迁》，李青、何非鲁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

《我们要跑》中，十二个人不断地奔跑着，变换着姿势，组合，再组合，如此表演七分钟，直到柏辽兹的音乐响起。没有一贯的领舞者，变换的平面布置保证了每一次新的朝向都产生一个新的领舞者，创造了一种臆想中的平等主义集体形象。这种新的组合打破了旧的家庭、教会、军队、传统企业的组合，释放出新的能量。电视的普及同时极大地降低了学校和家庭在传播信仰及价值观方面的作用。“婴儿潮”一代从小就是在电视图像中泡大的。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他们花在电视上的时间逐渐增多，看电视的习惯逐渐养成。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一般每天要看电视4至5小时，超过了在学校里和老师、在家里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

与此同时，年纪大的人也非常不理解这些标新立异的年轻人，甚至对他们产生了一种从肺腑中冒出来的愤慨，对于他们的长头发、印染的工装裤、喧闹的音乐和烈性毒品、越共的旗子、到处张贴的幻境画，老一辈人都看不惯。那些靠着含辛茹苦的劳动和苦苦积攒好不容易才跻身办公室人员的中产阶级希望把子女送到大学去出人头地，但他们看到大学已经被“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课也不上，老师差点被打，还吸大麻；自己的女儿刚进学校没多久就打扮得像妓女一样，男朋友多得很；警察们本来不愿在女士面前使用糟糕的语言，在白人女士面前还是比较克制的，可是大学女生却对他们竖起中指。一些已无升迁希望的中层管理人员，不大用得来计算机，年纪大了也不愿接受新事物，而这玩意儿正是那些花花公子们的强项，越是成绩不好的大学生，一般情况下电脑玩得越熟，公司里面的那点电脑操作对他们来说是小菜一碟。如此一来，这些老职员就对有可能被这些伴着电脑长大的小青年所淘汰的前景感到非常恐慌，他们当然不会找自己的原因。后来的情形也证实了这一点，战后出生的美国青年比他们的父辈所受的科学教育要多得多，因此他们在八十年代美国以微电子技术改造整个工业部门的过程中发挥了



决定性的作用，昔日的嬉皮士都成了IT业的精英。有的农场主的庄稼被歌舞狂欢的年轻人踩得一塌糊涂；辛勤的纳税人眼巴巴地看着颓废青年们靠着政府发的食品券过日子，一些头发蓬乱的大学生拿着救济却把奖学金浪费在购买色情唱片上；老一代的人都在抱怨世风日下和新生一代人的傲慢无礼。许多饭馆的门口都挂上了“嬉皮士不得入内”的牌子。在J·H·齐斯的小说《公路嬉皮士》中，很能体现公众对嬉皮士的恐惧和憎恨，而嬉皮士们也是一路上恶行不断，时常偷鸡摸狗和打砸抢，破坏当地的民风。1969年拍摄的电影《逍遥骑士》讲述了两个嬉皮士被保守的民众仇视的故事。他们留着长发，骑着涂有稀奇古怪图案的摩托车，一路上都遇到怀疑和敌视的目光，甚至旅馆也不让他们留宿。他们只好风餐露宿，过着“浪人”的生活。最后两个乡村劳工阶层射杀了嬉皮士主人公。本片上映后，受到好莱坞传统制片人的冷遇，不过学生、嬉皮士和艺术家们却大为赞赏，尤其是在戛纳电影节上，雷鸣般的掌声把它送上了最佳处女作的领奖台，以至于多年后，它的宣传海报还贴在巴黎大学学生区街上显著的位置。

而年轻人似乎专门反对老一辈的道德意识和思维习惯，他们叫嚣“不要相信任何三十岁以上的人”，嘲弄老一辈人把教育作为通向成功的最好途径，蔑视庸庸碌碌的父辈为了挣口饭吃而丧失个性、循规蹈矩，嘲笑婚姻、工作、家庭、爱国主义、民主、竞争这些传统美国人最珍视的东西，贬低五十年代的“美国梦”——追求更多的金钱，受到更多的教育。他们认为父母很虚伪，背地里性生活比我们还要开放，却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整日念着民主和人道主义，却残忍地对待黑人，跑到亚洲的农田里用直升机去杀农民。英国摩登派《我们这一代》里的一首歌词很能代表两代人的隔阂之深：

他们做的事实令人寒心，但愿我死在衰老之前。

据估计，到1972年，每年离家出走的孩子达到了50到100万人。<sup>①</sup>在谈到父子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一个学生这样说道：

我父亲便曾是这一制度的组成部分，他现在也是，他说一幢14间屋子的老式房子、用精致的烤牛肉代替粗茶淡饭、让孩子上大学等等便决定了他不去干他想干的一切，而去干制度要他干的一切。

而在我想要的世界里，人人都是对自己的生活做主，人们不会限于独断专权者所制造的无休无止的繁琐事物中……我渴望一个没有剥削的制度，在那儿不能从别人的劳动中诈取财富，我还希望人们快乐。除此之外，我还希望这个世界人人彼此都是自由之身。<sup>②</sup>

可见，儿子眼中的父亲是那么的窝囊、“低级”、物质。

金斯伯格对待老一辈守旧人物的态度在年轻人中很典型，即不再无条件和“盲目地”尊敬老人，不把尊敬长辈作为义务，尊重的前提是这个老人必须平静安详，不讨人嫌，尊重青年人的生活习惯。可是，金斯伯格认为，许多“老东西们”只把国家的残杀、原子弹和人与人之间冰冷的接触才看做是现实的，而年轻人“精神上的探索”则是不成熟的表现。这样的“老家伙”就肯定

---

① 戴维·斯泰格沃德：《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周朗、新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74~375页。

② 郝舫：《伤花怒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得不到他的尊重。<sup>①</sup> 鲍勃·迪伦在 1964 年的《时代在改变》中敏锐地抓住了老一代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孩子们在文化上的巨大矛盾：

来吧众议员、参议院们  
请聆听那呼声  
不要挡在门口  
不要阻碍道路  
因为受伤的  
将是那些挡路的人  
外面有场大战  
正在火热  
它很快就会震动你的窗棂  
动摇你的高墙  
因为时代在改变  
来吧，天下的母亲与父亲们  
不要批评  
你不懂的事  
你的儿子与女儿们  
已经不受你控制  
你的旧道路  
迅疾衰逝  
请别挡住新路  
如果你不能帮忙  
因为时代在改变

---

<sup>①</sup> 比尔·摩根编，《金斯伯格文选——深思熟虑的散文》，文楚安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25 页。

.....

鲍勃·迪伦告诉“老人们”，文化革命要来了，这就是外面的那场大战，“老人们”信奉的勤俭禁欲的新教伦理不过是“旧道路”，你们以前学的经验知识在即将到来的信息时代将成为文盲，老套的道德信条让人讨厌。

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打出了这样的标语：

爸爸臭不可闻。

妈妈，把自己解放出来吧，你首先是个女人。

同学们向前跑吧，旧世界就在你们的后头。

1951年首次出版的塞林格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给人的第一印象不过是一本青春期小说，但随着“婴儿潮”以来青年人口的激增，青春期问题就成为一个更强有力、意义更深远的主题，这本很能反映年轻人心声的小说就不容小觑了。小说主人公霍尔顿对成年人的生活全盘否定，认定学校生活和家庭生活都是虚假伪善和没有趣味的，充斥着无聊的说教。塞林格是第一个从情感角度对青年文化进行发掘的人，在他的笔下，秩序井然的成人世界显得荒唐可笑。有个性的年轻人不能适应社会，把离家出走作为表现对社会不满的流行形式，日后的反正统文化运动就直接发展了这些因素。《麦田里的守望者》开头部分有这么一段针对学校的，体现了小说的典型风格，就是当霍尔顿看到自己上过的潘西中学的跑马图广告时，他自言自语道：

在这幅跑马图底下，总是这样写着：“自从一八八八年起，我们就把孩子培养成优秀的、有脑子的年轻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在潘西也像在别的学校一样，



根本没培养什么人才。而且在那里我没有见过任何优秀的、有脑子的人。<sup>①</sup>

这种反叛在金斯伯格那里得到了响应：“我看见我的时代里最聪明的头脑已被疯狂摧毁……”

霍尔顿的风衣和反戴的鸭舌帽与电影《无因的反抗》里的牛仔褲和T恤衫一起成了五十年代青年人的标准服。对于青年们来说，汽车电影院是幽会的好去处，“汽车—酒精—性行为”是标准的社会教科书。以好莱坞的明星约翰·韦恩为代表的那种美国西部的吃苦耐劳、强壮粗犷的个人主义者和狂热的爱国主义者被詹姆斯·迪安和马龙·白兰度替代了。五十年代的好莱坞青少年电影中充斥着这些元素：学校储物箱旁的谈话，舞会，拉拉队队长，超市，青少年帮派，敏感、疏离的主人公。他们通常是天真的，理想主义的，幽默的，厌弃传统的，性冲动的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一方面是青年人的疯狂通过他们肆无忌惮的享乐来发泄：性、药物、摇滚乐、暴力；另一方面是纯真、简单的人际关系，不成熟的、近乎不可能的对于未来美好世界的梦想。青年电影不断地把新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时尚，以及行为方式通过大银幕传递给年轻观众。马龙·白兰度在《男子汉》《欲望号街车》中的演出把男性的阳刚和被挫伤的敏感情绪完美地结合了起来，迅速地成为年轻人的偶像。1953年的影片《野性的一群》中，白兰度扮演了一个骑摩托车穿皮夹克、胡作非为的团伙头目约翰尼，演绎了赞扬青少年反叛的颂歌。女主角凯希问他：“你离开这里后要到哪里去？你知道吗？”他却一脸嘲讽地答道：“啊，伙计，我们只是跑。”“我们只是跑”——他们就是要如同

---

<sup>①</sup> 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施咸容译，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垮掉的一代”那样，不停流浪。当被问到“约翰尼，你究竟反对什么”时，马龙·白兰度反唇相讥：“你又得到了什么？”这句话说的是你们中产阶级和公务员的郊区住宅和老婆孩子那一套东西都是狗屎，我不稀罕。他和他的那帮兄弟只想走，不管去哪里。不知道将去往何方，只是想离开，走，在他看来这是很酷的。电影里的摩托车都很酷，诺顿、BSA、凯旋、哈雷、雷鸟……还有包括皮夹克、手套等在内的一整套的行头，带铆钉的黑色皮衣、墨镜、络腮胡、牛仔靴、金属挂件、酒杯、钥匙扣等是哈雷族的经典道具。吸引了剧中所有角色的注意，六十年代的青年电影《邦妮和克莱德》与《逍遥骑士》更加有力地扩展了这一偶像化的、主题性的元素。同时，那些住在小城镇和郊区的老一代人发现，他们的想法已不再被年轻人视为理所当然，孩子们瞧不起父辈生活的平淡乏味。美国人长久以来以核心家庭为骄傲，在那里仍保留着传统的父慈子孝的理想。不过在尼古拉斯·雷伊导演的影片《无因的反抗》（1955年）中，却暴露出了这样的家庭不能理解青年一代最简单的需要，父子之间矛盾很大，父亲很没有出息和大男子气。这些都使性爱自由、奇装异服、吸毒、摇滚、流浪、凯鲁亚克和披头士、玛丽莲·梦露、“猫王”普莱斯利、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安很容易地成为青年人的偶像，白兰度和梦露分别是暴力和性的人格化象征。“猫王”代表了流行艺术中对传统的挑战，他梳着油腻的鸭尾发式，喜欢猫着腰，把腿叉得很开，用屁股撞击吊在身后的吉他。在美国的流行音乐史上，他率先把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加进了表演中，成为美国音乐全面走向大众的转折点，把一种新的、充满世俗气的音乐带给了美国社会。十几岁的少女用铅笔刀把他的名字刻在手臂上，在1954年佛罗里达的一次演出中，“猫王”被发疯的少女们拖下舞台，剥去衣服，把他的夹克衫撕成碎片，互相分抢。詹姆斯·迪恩则体现了青年一代由于传统价值观的破灭而产生的彷徨无助和



反抗行为。他们都象征了人们对纸醉金迷和极度奢华的渴望，崇尚的是享乐主义而不是责任。“猫王”、玛丽莲·梦露、白兰度、詹姆斯·迪安都在银幕上穿着牛仔裤，梦露穿上牛仔裤强调“不做作”和“自然”，创造了“新性感”的形象，白兰度赋予了牛仔裤攻击性和性欲的力量。牛仔裤的流行迎合了五十年代开始追求的性感倾向。凯鲁亚克导致了“公路电影”的发展，漫无目的的旅行也变成了新文化的一部分。披头士乐队一直扣到颈部的无领衣服、内穿白衬衫、头发剃成圆圆的刘海式样、穿长筒皮靴的流行样式，也迅速在青年中流行起来，1978年披头士售出了一亿张专辑和一亿张单曲唱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大众明星的崇拜占据了青年文化的重要部分，这种明星文化的出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是社会的民主化，其次是宗教组织的衰落，再次是日常生活的商品化。明星填补了皇族的没落与上帝之死造成的信仰空缺。五十年代的美国，以上三个条件都具备了。在每一次的造反运动中，这些准宗教的明星崇拜都起到了形成共同的青年文化、团结兄弟情谊的作用，并且带有节日的气氛。它往往采取感性文化的形式，利用某种使成人社会无法理解其意义的样式。六十年代的父母们应该怀念五十年代，因为五十年代的孩子还仅仅是崇拜白兰度、猫王、詹姆斯·迪安、凯鲁亚克和玛丽莲·梦露，六十年代孩子们崇拜的是杀人如麻的色情嬉皮士曼森，他被捕入狱之后，《自由之声报》把他列为“本年度新闻人物”，刊载他带十字架的照片，商场出售“曼森牌”衬衫和纽扣，生意特别火爆，很多姑娘都给他写情书。在他的嬉皮士群居村里，姑娘们把他看做是慈父和耶稣基督，他的命令都是圣旨。

美国六十年代的“反主流文化”就是一种特别反叛的青年亚文化，主要体现为服装、音乐、毒品和性，以及“另类生活方式”。因此，五十年代的时尚界被认为是“高级时装”的最后十年，也是雅致、精巧服装设计的最后十年，克里斯汀·迪奥作为

时装设计界的领袖和大师被人们所推崇，而六十年代的时装设计，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一改往昔，夏奈尔、迪奥等典雅的设计被青年人所抛弃。新教伦理强调“整洁近于虔诚”的服饰，而叛逆青年则故意用邋遢来抵制被他们看做是虚伪、物质和邪恶的文化，嬉皮士有意识地把自己弄得来面目污秽，以此说明，父亲们，母亲们，你们生活其中的世界那么肮脏，怎么能够熟视无睹？你们那么爱卫生，不是故意绕开问题吗？他们的衣服上有禁止原子弹的标识，配上念珠、花朵和束发带，印第安式的夹克衫，老太婆服装，穿拖鞋。在六十年代后期，受年青人欢迎的英国时装设计师玛丽·奎恩特在她的设计中率先采用塑料的白色雏菊，于是，这种塑料花便很快成了自称为“花之子”的嬉皮士的一个常用标志。他们将塑料花戴在头上或广泛用于游行、集会中，甚至成立各种以花朵为标志的组织，如“花朵力量运动”等，他们主张“无限的爱和无限的自由”。渐渐地，长发、念珠、色彩鲜艳的服装代替了五十年代保守的“灰色法兰绒上衣”。扎染的T恤、配花饰品、牛仔裤以及在对东方宗教的崇拜作用下，年轻人穿类似佛袍的服装、佩戴念珠等。牛仔裤成为嬉皮们的最爱，他们拿它来任意搭配从跳蚤市场买来的二手服饰，如：印第安流苏、皮衣、民俗风味的大披肩等。为了追求新异，文身和刺青也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他们喜欢模仿印第安、吉卜赛、印度、阿富汗等非西方中心的弱势群体的穿着，喜爱那些未被工业化淹没的传统手工艺。这些生活方式都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反叛：拒绝接受传统的行为方式和原则，代之以重视自发性和自我表达；对感情的自我公开和直接满足压抑；用贬低功利主义、寻求自我实现的工作来取代传统的职业、成功和金钱观念；拒绝使用



化妆品、香水，接受裸体，食用有机食物，以表达对自然的崇尚。<sup>①</sup> 嬉皮士的美学革命之一是消瘦美。身体消瘦、胸部平坦的模特代替了身材丰满、富有女人韵味的传统美女。后来普遍流行像小女孩一样的模特。这种风尚的流行意味着回归童年，拒绝做传统女性。许多男嬉皮士则认为男性气质本身就有问题，它是富于侵略性的，是战争根深蒂固的原因，它不能远离施虐心理。加上女青年中出现的男性化的趋势，于是男的蓄长发、着花衣、施粉黛；女的穿长裤、系皮带、留短发。七十年代的金属、朋克文化作为嬉皮文化的一个延续，在服饰上有着鲜明的反叛特点。金属朋克风格主要宣扬性与暴力，它比嬉皮更显激进。文身、刺青、金属挂链、铆钉、身体部位的穿孔等等充满反叛、暴虐的装饰效果都是朋克风格的代表。朋克们喜欢穿不合体的破烂的牛仔裤，喜欢带有铆钉及各种金属挂件做装饰的皮夹克，喜欢在T恤上用手写满反政府的涂鸦文字或图案。发型上，各种朋克头争相流行，如鸡冠头、莫西干头等等，头发颜色也是五彩缤纷。反文化运动的嬉皮士不过是把大众传媒发出的信息按照自己的口味重新组合，并在小范围内形成气候，最终把这些小圈子的信息又反馈给大众传媒，把嬉皮风格传播得更远，使之成为时代风貌。素食、粗加工食品和长寿食品、糙米和其他神秘物品、家织布以及手工饰品在全球范围内都受到了热捧。中国的“90后”也将牛仔或T恤故意弄出破洞或拉成条，打扮成像乞丐的效果，在T恤上别上别针或缝上拉链或减去袖口，以挖洞、拼贴等手法来凸显自己与众不同的风格特点。

---

<sup>①</sup> 理伯卡·E·卡拉奇：《分裂的一代》，覃文珍、蒋凯、胡元梓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 小 结

美国五十年代对主流精神的异议被严格局限于理论范围。人们所乐于接受的占主导的仍是中产阶级传统保守思想，电子传播媒体（电影、电视和广播）十分自觉地追随保守主义路线。“垮掉的一代”的“垮掉的”反抗方式难以为大多数美国普通群众（特别是内陆的）、倾向保守的媒体在道德上认同。《在路上》出版以后，新闻媒体对凯鲁亚克以及他的朋友进行了大量报道，旧金山闲话专栏作家赫布·凯恩发明了一个诙谐的羞辱性新词“beatnik”，而《时代》周刊则称其为“一群赞美狂饮、吸毒、乱交和绝望的怪人”。评论界、新闻传媒乃至大多数读者是以一种猎奇心态、蔑视眼光看待“垮掉的一代”。如果说五十年代“垮掉的一代”面对的还主要是那些快乐地享受着幸福时光的人们，那么到了六十年代，垮掉派精神的烈火遇到了数量众多的正感到压抑的青年，于是六十年代就不再沉默。“垮掉的一代”的代表威廉·巴勒斯后来回忆到：“1957年，《在路上》出版后，美国售出了亿万条牛仔裤和百万台煮咖啡机，并且促使无数青年人踏上了漫游之路。当然，有一部分要归因于传媒，那些头号机会主义者。他们善于发现可供炒作的题材，‘垮掉分子’运动就是题材，并且是可供大肆炒作的题材……‘垮掉分子’的文学运动来得正是时候，说出了全世界各民族的千百万人盼望听到的东西。你不可能向别人灌输他不了解的东西。当凯鲁亚克指出出路时，异化、不安、不满早已等在那里了。”<sup>①</sup> 在遍布全国的咖啡馆和学生会里，在邻座的桌子旁，人们听到他们喋喋不休地进行

---

<sup>①</sup> 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XXVI页。



垮掉派风格的谈话、伪垮掉派风格的谈话、先锋派风格的谈话以及关于政治、性、文学和艺术的谈话。当然，如果不是遇到了民权运动和越战，学生们也许不会有那么强的政治意识，他们仍然是消极自由的、标新立异的、以放荡的生活方式来反抗社会的陈规旧俗，仍然是垮掉的一代，而不是愤怒的一代。五十年代的反抗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政治、法律和官方政策，詹姆斯·迪安主演的电影形象地概括了这一特征——“无因的反抗”，而六十年代的激进运动就有了反越战、反种族歧视的明确内容。没有明确内容的反抗不能形成对社会构成极大威胁的社会运动。大多数 SDS（学生争取民主社会）成员就是在第一次目睹黑人民权运动时对自己是白人而感到羞愧，“非暴力不合作”的抗议运动唤起了白人的道德和正义感，使他们的政治意识开始强化起来。真诚的大学生认为，既然大家都是人，就应该是平等的，为什么要分黑人车厢和白人车厢，“平等但隔离”难道不是政治谎言？<sup>①</sup>著名的学生领袖汤姆·海登在他起草的《休伦港宣言》中写道，“在南方及北方大城市中的黑人生活的现实面前，‘人人生而平等……’的宣言显得何等虚伪。”<sup>②</sup>黑人民权运动点燃了六十年代对抗政治的第一阶段，为反对种族隔离而进行的自由乘车、和平静坐激起了新的社会觉悟、抗议和觉醒的精神，此种精神很快就被用于越战和国内争端。参加反战运动的学生比参加民权运动的第一批学生要更加激进，就像 SDS 的前期领袖汤姆·海登和后期领袖马里奥·萨维奥之间的区别，前期的学生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犹太人占了相当的比例；后期学生运动的主体力量来自于西部和西南部地区，身上带有西部草原的自由味道。1965 年之

---

① 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北京：三联书店，2006 年版，第 114、260～261 页。

② 戴安娜·拉维奇编：《美国读本》（下），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 年版，第 555～556 页。

前的学生运动主要受东部传统的影响，属于是体制内的改革，而六十年代后期的运动则更多地受到了西部自由精神的支配，更加凶猛和倾向于文化对抗，学生的政治激进分子开始和嬉皮士结盟。后来妇女和同性恋也学着黑人和学生的样子开始争权利。当一种通过风格化方式挑战正统或主流文化以便建立集体认同的亚文化具有组织实体的时候，它的能量不可低估。1968年以前的学生运动主要以和平的形式出现，1968年主张罢课和占领大学、采取暴力行动的极左派占了上风。这是因为几年来学生们的和平抗议没有取得什么显著的成绩，而因烧毁征兵卡被逮捕的学生却越来越多。极左派的得势也与 SDS 这个组织越来越被控制在年龄较大的研究生和校外的人之手有关，这些人往往是行动主义者，不像中产阶级大学生那样语言远远多于行动，雷声大，雨点小，噱头太多，过于花哨。<sup>①</sup>

---

<sup>①</sup> 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02~306页。



## 第四章 法国和英国的文化革命

### 一、法国“五月风暴”

法国的1968年学生运动也是战后“婴儿潮一代”所为。法国的生育高峰来得比美国还要早，从1942年战俘开始遣返回国就开始了。婴儿出生率从1938年的14.6%上升到1945年的20.8%，到了1968年，青年人的数量急剧膨胀。再加上他们的父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人口损失，以及老人数量过多，这就使20岁以下的人占了33.9%的高比例，他们的力量显得非常突出。<sup>①</sup> 他们的成长经历与美国青年很有类似之处，也有共同的亚文化，这也是法国1968年学生运动与美国极其类似的原因，运动的气质、力图达到的目标、方式、前景都是相同的。在1968年，法国人的生活水平与1950年相比提高了两倍多，国内生产总值从1958年的2447亿法郎上升到了1967年的5150亿法郎。六十年代中期法国货币坚挺，上个世纪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已得到解决，福利国家的财富再分配体系使工人待遇得到了全面改善。熟练人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比重增大，工会和左翼集团斗争的任务已经不再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转化成了从经

---

<sup>①</sup> 洛朗·若弗兰：《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万家星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140页。

经济增长的果实中争得更大更公平的份额，工人们围绕工资、工时和带薪假期的要求开始得到满足。各阶层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被各社会阶层之间半和平的对立方式所取代。现在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自由和享乐的渴求与相对保守落后的文化和体制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农村人口纷纷涌入城市。对农村家庭模式的眷恋、平衡的价值观、传统显贵的地位，都受到冲击。以族性为归宿的初级共同体让位给了不分姓氏的大城市。各种情况表明法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解体不过是迟早的事。但1968年以前的法国仍沿袭着十九世纪的伦理道德和家长式统治，查禁一切有伤风化的东西。年迈的戴高乐将军把纪念抵抗运动制度化，没完没了地进行，他的夫人是狂热的天主教徒，拒绝与离婚的人同桌进餐，电视台甚至解雇了一名露出膝盖的女播音员。戴高乐政府想要把经济现代化与传统的秩序调和起来，经济上开放，政治、文化上保守，如同一个家庭主妇，喜欢用吸尘器、小轿车，但不愿丈夫到处寻欢作乐，女儿彻夜不归。这能做到吗？青年人是既要小轿车，又想彻夜不归的。

学生、工人竟然会在法国如此繁荣的情况下起来革命，戴高乐颇为愤愤不平。他在辞职后写道：“老实说，在1969年4月，很少人能回忆起——他们能否知道呢？——11年前我重新执政时法国经济、财政和货币是什么情况……除了盲目的，拥有成见的人以外，世界上没有人否认法国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甚至只是看看图片也会得到的深刻印象。法国的生产、建设、教育从来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程度。法国人的生活从来没有达到现在的水平。世界上任何地方没有像我们的失业人数这样少。我们的货币和信用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巩固，以致我国已由向外借债变成贷款给那些最富裕的国家……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看到成就的时候，反而灰心丧气呢？这等于仿效莎士比亚描写的那个渔夫，当他找到了一颗珍珠，看到它是如此美丽时反而感



到恐惧，终于把它扔回海里。”<sup>①</sup>这一段话是戴高乐在回忆录里写自己在1962年提醒人民注意自己国家的进步时的用语。这何尝不是1968年戴高乐心态的真实写照呢。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对戴高乐的打击非常巨大。总理蓬皮杜在回忆1968年5月28日见到戴高乐的情景时说：“我走的时候并不了解将军是何等疲乏，何等气馁。他不明白，在经济重新蓬勃发展、各方面的形势都得到好转的繁荣昌盛的法国，竟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失望情绪和突如其来的要求变革的愿望。”<sup>②</sup>看来，法国领导人还没有明白这场富裕社会的“文化革命”的独特性质。游行高喊：“戴高乐进博物馆吧！戴高乐进修道院吧！”他们并不是谴责戴高乐搞经济不行，而是说他太死板，挡道了，这号“古董”应该被送到博物馆和修道院里面去。年轻人需要享受地中海的阳光和沙滩。

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年迈的戴高乐打击很大，他放弃执政后一直在思考这场政治风波。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认为，心理的不平衡是导致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人们的欲望却增长得更快。消费社会不能满足人们日益膨胀的各种欲望。“虽然在各个家庭的餐桌上摆着各种各样的食物，人们都有衣穿，住宅里家庭用品都有增长，路上有汽车，屋顶有电视天线，但是每个人对所缺少的东西的需要程度甚于超过对已占有东西的欣赏。”<sup>③</sup>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享受现代社会给他们带来种种好处时，却更加难以餍足，一旦遇到合适的环境，不满就演变成革命。这也同样是

---

①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68~169页。

② 乔治·蓬皮杜：《恢复事实真相——蓬皮杜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页。

③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2页。

美国六十年代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本书在第二章已经分析过了。甚至可以说，六十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动乱都有这个原因在里面。

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造成了学生的不满。在五月街垒发生的第二天，戴高乐就对一位来访者说：“只有那些怕考试的坏学生才聚众闹事……”<sup>①</sup>当时，戴高乐以为是法国极其严格的考试制度促使学生起来革命。后来在回忆录里他总结得更彻底：“我们过去使用的一套，如有关学生的录取、教师的任命、教材、课程考试、文凭等的规定，今天差不多都成了问题。”<sup>②</sup>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教育虽然进行了多次改革，但到1968年时大学里仍然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教育管理模式。全国高等学校都由中央教育行政部门统一集中领导与管理，有关大学教育的内容、方法、规章制度及教师人事等，均由中央主管部门或其派出的专门机构负责，地方机构则无权问津。结果是，法国高校课程设置落后，授课制度僵化，但考试制度却极其严格。在1968年5月学生运动之前，学生就经常抵制考试，在5月学生运动中和5月学生运动之后它仍然被作为学生反抗的一种手段。

可能戴高乐还没有料到的是，性问题才是学生造反的最主要原因和直接动机。“五月风暴”的导火索就是性问题。六十年代，在法国大学生中“爱的运动”普遍展开，斗争焦点是追求性自由。教育部只允许21岁以上的女生可以访问男生宿舍，而男生则不准进入女生宿舍。不少同学都反对这一决定，男女生都要求自由进入异性的宿舍。1965年法国掀起了第一次反对男女生宿舍分离的斗争。同年秋，巴黎安东尼区的学生宿舍区发生了

---

<sup>①</sup> 让·拉古都尔：《戴高乐全传》，允道、卓殊、雷军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3页。

<sup>②</sup>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0页。



1700 名学生强力阻止工人在女生宿舍前建造看门传达室的事件。校长让警察日夜看守，直至传达室建成。在建传达室的三个月间，学生的示威、混战不断。学校做出了让步，撤销督导。1966 年，新督导允许 21 岁以上的男女青年在宿舍里与异性约会，21 岁以下的学生则要得到父母的书面同意。但学生们仍不满意。1967 年春，南泰尔学院因宿舍问题而发生了骚乱，男生进入女生宿舍走廊，校方招来了警察。1968 年法国的青年和体育部长在南泰尔学院遭到学生围攻，原因是在该部长起草的青年报告中没有关心学生们的性问题。2 月 14 日的情人节，“法国学生全国联盟”因自由进出女生宿舍的问题引发了大规模骚乱，骚乱迅速蔓延到了整个法国。大多数学院的院长都不知所措。一周后法国政府做出了让步，教育部部长佩雷菲特宣布了全国大学都适用的新规定：21 岁女生可以在男生宿舍呆到晚上十一点，但不准男生到女生宿舍。学生们抗议这项规定不符合宪法规定的男女平等精神，仍不肯罢休。

1968 年 3 月 18 日，驻巴黎的美国曼哈顿银行和美国航空公司的分支机构发生爆炸事件。3 月 22 日，巴黎警方抓捕了 6 名嫌疑人，其中有一个是南泰尔学院的学生。当天晚上，该校的 100 多名学生占领了行政大楼，通过投票的方式建立了“3·22 运动”小组。从此，他们把对大学宿舍制度的抗议扩展到了反对整个教育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sup>①</sup>

总之，戴高乐的执政思路和青年们完全不对路，最明显的是其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上，戴高乐主张通过积累黄金储备，保持法郎的坚挺，挑战美元的地位，从而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但以法国的综合国力挑战美元的地位实在是勉为其难。在他辞职后

---

<sup>①</sup> 张红：《从禁忌到解放——20 世纪西方性观念的演变》，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36~138 页。

不久，蓬皮杜就务实地让法郎贬值了。戴高乐总统一心想着的是法国的大国形象和国际地位，而年轻的“败家子”们却对这些荣誉丝毫不感兴趣，他们怀抱世界一家的幻想，嘲笑这种对抗和荣耀的心态。戴高乐主义无休止地唠叨一些对于他们完全陌生的事情：民族独立，独立核打击力量的重要性，宪法的职责，这些事情对年轻人来说没有任何人会感兴趣。他们只关心及时的享乐，不愿意为国家的荣誉吃一点苦。再如法国的核政策，戴高乐将军亲身体会过做亡国奴的滋味，因此把国家安全看得高于一切。在原子弹时代，为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坚持发展核武器，进而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生的法国青年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不懂政治，不知道战争的严酷，只是空喊和平，不加区别地反对原子弹。从1958年到1966年，法国用于核研究的费用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2%增加到2.44%，原子能局1992年的预算高达44.44亿法郎。许多青年因不满政府发展核武器的政策而走上街头。

## 二、英国的文化革命

五十年代末的英国，尽管早就丧失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但它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社会服务等方面仍然实现了现代化：1955至1969年这段时期，英国工人的平均收入增长了130%，一些以往属于高消费的商品如汽车、电视机等价格大幅度下降。五十年代初，英国拥有电视机的人口为10%左右，到了七十年代初，只有10%的人口未拥有电视机。<sup>①</sup>这个时期的英国人远离了大萧条的威胁。渐渐地人们开始对保守的制度与价值

<sup>①</sup> 周学麟：《英国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见《现代汉语》1996年第3期，第21页。



感到不满。这种担忧和不满逐渐扩展到文化和社会领域，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英国传统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过于保守、狭隘、平淡、缺乏冒险精神；他们渴望以快乐的思想、风格和行为来替代陈旧过去。传统制度、传统价值、传统道德、传统习俗，几乎一切传统的东西都受到了鄙视、排斥和抛弃。五十年代的英国也诞生了反叛的青年亚文化，核心和美国一样，是摩托车、摇摆舞、摇滚乐、毒品和性。美国电影《黑板丛林》公映，主题歌《昼夜摇滚》也随之流行开来，标志着英国开始其“摇滚革命”的时代，不久英国人就有了自己的摇滚巨星“披头士”和“滚石”，这些最时髦的摇滚乐传回美国，又激发了美国新一轮的摇滚浪潮。

在1964年的英国大选中，保守党结束了它连续十三年统治。新上台的工党在议会里提出一系列改革议案。这些议案涉及了住房、土地、就业、劳资关系和种族关系等方面的改革。在此之前，他们还向国民许下宏愿，要在英国发动一场科学技术革命，以改造英国工业，提高其竞争能力。此时的工党成了改革、进步、无阶级的代名词，成了青年的代言人。英国工党就相当于美国的民主党，在六十年代的文化激进主义中起了相同的作用。在英美国家，工党和民主党与保守党和共和党相比较在观念上要开放和跟得上时代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六十年代在英美国家就是工党和民主党在执政。他们的执政风格也是六十年代英美动乱的重要原因。政府对社会和经济提出的改革计划导致了叛逆的青年文化的诞生，导致了伦敦成为世界娱乐的中心。整个国家为莫名的兴奋和激动所笼罩，追求刺激、新奇和立刻的满足成了时尚，人们崇尚放纵无羁的生活方式和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

这场“文化革命”的另一后果是“绅士”一词从英国文化中的消失。六十年代以前，英国国人的“绅士风度”举世闻名，那些温文尔雅、循规蹈矩、着现代服饰的骑士们，带有强烈的英国

本土气息，为世人津津乐道。到了六十年代，受文化革命的影响，一些反传统的英雄形象变得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些与“绅士”形象截然不同的人物如詹姆斯·邦德，其特征是永远从容不迫潇洒不羁，享尽荣华富贵，永远香车美人，风度翩翩。对于他们来讲，生活的目的就在于永远的无责任心和永远的玩耍。而七十年代的“足球流氓”成为全国性的问题，甚至成了当代英国国际形象的一个阴影。

法国和英国的文化革命与美国一样，都是发生在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有提高的时期，动因主要是青年反对传统的道德和宗教文化，要求无拘无束的享乐主义。



## 第五章 “垮掉的一代” 和嬉皮士的共同点

五六十年代美国兴起的以“垮掉的一代”、嬉皮士为代表的“反文化运动”主要是以禅宗、致幻剂、摇滚乐、性解放等为主要特征。它们取代了基督教成为新的集团宗教，以后出现的青年亚文化运动都染上了这些色彩。下面将简要介绍这些特点。

### 一、禅宗

传统基督教势力的衰微并不是说人们就不再需要宗教，对宗教的需要也许是人类根深蒂固、不可移易的渴求。基督教空缺的心灵位置只会由其他的东西来填充。美国人越来越崇拜奇怪的图腾。美国有1万个专职和17.5万个兼职的占星术家，社会上也流行用电子计算机来制作十美元一张的天宫图，南卡罗纳州大学有2500名学生学习巫术课程。<sup>①</sup>最令人注意的是杂牌教徒从1950年的14万人增加到1968年的218万人。<sup>②</sup>五六十年代禅宗这类更注重体验的神秘宗教的兴起，就与反基督教的宗教势力增长有关。

---

①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下），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0页。

② 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杨晓东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7页。

新教势力的衰落，为其他宗教的流行让出了位置，时髦青年普遍信奉禅宗。“垮掉的一代”成员凯鲁亚克、金斯伯格、加里·斯奈德在五十年代就开始去东方游历，修行禅定，静坐默想，以求得毫无约束的精神解脱和超越思想、社会结构，获得与广阔无垠的宇宙完全融合的修身养性的自由。沉沦就是解放，堕落就是解脱、涅槃，最终达到极乐世界。早期垮掉派成员在相互独立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地开始接触禅宗，巴勒斯在见到金斯伯格、凯鲁亚克之前就开始对禅宗感兴趣，并练习瑜伽。1940年哥伦比亚大学的雷蒙德·韦弗教授就建议金斯伯格学习埃及诺斯替教和禅宗方面的书。四十年代中期，巴勒斯、金斯伯格和凯鲁亚克通过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接触到了东方思想。与此同时，旧金山复兴运动的诗人们如斯耐德、沃伦、威尔奇、雷克斯罗斯等都对禅宗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六十年代的嬉皮士继承了这种宗教倾向，纷纷来到东方。

这些西方青年为何不信仰他们传统的基督教？他们把基督教看做是不可救药地墨守成规和拥护既有权力体制的宗教，是资本主义集权的一部分。这也许只是表面的说法，真正的理由可能是：基督教很不好玩。这种正经的宗教，有极其严格的教义和传统，是一个建立在“十诫”的明确教义之上的严肃信仰，其核心内容是不容置疑的，历代护教大师在其经典著作中对《圣经》和教义的阐述都殚精竭虑地防止感官和神秘主义的倾向诋毁基本教义。它不是禅宗那样的可以自己参悟的宗教，在道德方面有非常高的要求，要求把上帝和基督的教诲不打折扣地运用到自己和邻人身上，它还有一整套为归正信仰所必需的宗教仪式。这些传统宗教的反叛者一定是要信奉一种极端崇尚自由、不会求全责备其酗酒、群交、吸毒的宗教。这也就是凯鲁亚克在《荒凉天使》中所描写的那种宗教，他从荒凉峰上参禅下来就去看脱衣舞表演，和三个男人一起分享一个叫潘妮的女人……在凯鲁亚克的《金色



永恒经文》一书中，他认为上帝就是自我，“上帝不在我们身外，而就是我们自己”，世界不存在道德规范，“做你想做的”，可以找到与神沟通的极乐状态。<sup>①</sup> 凯鲁亚克的上帝观把人和神之间的距离消弭了，而禅宗正是不主张神与人绝对区分的宗教，基督教被认为是一种理性的二元世界观，而禅宗则圆融无碍，可以用感官直接把握。在厄普代克的小说《S》中，因追求女性解放而离家出走的萨拉加入了一个建立在荒漠中的东方宗教公社，她厌恶“欧洲的、基督教的、西方的”对女性管制的传统，就连西方的心理治疗也总是联系着社会和道德，“而东方则只是和身体、生理学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是更好的方式，更适合我”。实际上她加入的这个宗教公社就是一个主张身体解放的组织。<sup>②</sup>

这种要求在正统的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佛教那里是得不到响应的。最离经叛道的摇滚明星麦当娜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她对天主教的想法很能说明问题：

一旦你成为一名天主教徒，那么在罪恶感、自责感和你是否有罪问题上，你就永远是一个天主教徒。有时，我会被莫须有的罪恶所包围，这些都是我接受的天主教式的教育遗留给我的。因为在天主教中，你生下来是罪人，就永远是罪人，无论你怎样试着去摆脱它，这种罪恶都将伴随你一生。

天主教不是一种可以抚慰心灵的宗教。它是一个让

---

① 张国庆：《“垮掉的一代”与中国当代文学》，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页。

② 金衡山：《厄普代克与当代美国社会——厄普代克十部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208页。

人痛苦的宗教，我们都是对惩罚无所畏惧的人。<sup>①</sup>

当然，麦当娜也是一个最大的亵渎宗教者——“我们都是对惩罚无所畏惧的人”。1990年麦当娜在日本东京开演唱会时，以圣母玛丽亚的形象在燃烧的十字架下与黑人扮演的上帝搂抱接吻。“十字架非常性感，因为上面有个裸体男人。”看来，她也正处于传统与反抗之间斗争的“过渡”阶段。她代表的是一种性感快乐的宗教，这种宗教即将成为全世界新的福音，而残存的天主教观念仍然使她的反叛存在于痛苦之中。

凯鲁亚克之所以终生郁郁寡欢，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他从小就在一个天主教家庭里长大，家乡小镇洛厄尔则是韦伯1904年访美时所发现的那种以勤俭为核心的小城镇新教经济伦理的典型代表。凯鲁亚克最终没有能够完全接受禅宗，始终不能摆脱天主教和新教的影响，晚年又重新信仰天主教，卧室的床头一直挂着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凯鲁亚克一家是从加拿大移民到美国的法兰西后裔，准确说来其宗教信仰为天主教的詹森教派。詹森教派出现于十七世纪法国天主教会内部，是根据西属尼德兰伊培斯主教高乃依·奥托·詹森的理论建立的，该教派以奥古斯丁的思想为据解释原始正义、原罪和预定论等概念，主张严格律己，反对奢华，虔诚地严守教会法规。詹森教派遵从一种恩宠论学说，主张人只有得到上帝的恩宠才能得救，至于何人得到上帝的恩惠则是先定的，宗教活动不起任何作用。詹森教派与新教的相似性大于相异性，具有浓重的新教色彩，曾被称为“加尔文派半新教徒团体”，甚至可以被看做是广义上的新教。

首先，詹森教派与新教一样，也推崇禁欲主义。社会学家大

---

<sup>①</sup> 米克·圣迈克尔：《麦当娜口述实录》，闫卫建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卫·里斯曼曾将詹森教派与新教共同看做是内在导向性格的典型代表。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把社会性格分为三种典型：传统导向、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在西方历史上，中世纪可被称为传统导向的时代，存在于早期资本主义兴起前的欧洲人中；以内在导向为主要顺承方式的社会类型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开始出现，这一类型的社会以人口流动的增加，资本原始积累伴随着技术的创新以及几乎连续不断的商品生产和人口的增长、探险、殖民地以及帝国主义扩张为特征；他人导向的性格自二十世纪初期才开始出现。“内在导向的过程在新教、詹森派、加尔文教和虔信新派国家表现得十分明显。”内在导向型性格所表现的主要特征是：“对自己的生活有控制意识”“能吃苦耐劳具有冒险进取精神”，有很强的独立性，追求名利或善行，在事业失败时产生“罪恶感”。在生产方面，内在导向者把工作转变为信仰，为了信仰而工作，把内心的冷漠变为事业中的积极心态。大量财富的积累完全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而来，努力工作，不断与“倦怠的恶魔搏斗”，克制人的惰性。在消费方面，内在导向者体现出一种禁欲的倾向，把“娱乐和消费居于从属地位”，压抑克制自己的放纵冲动。因此，詹森教派的这种“内在导向性格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成关系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动力”。<sup>①</sup>

其次，詹森教派也有与新教加尔文派相似的“预定论”教义。加尔文新教主张个人的命运为上帝所预定，人能以信仰直面上帝，上帝召唤着个人成就其世俗事业，个人尽其天职归根结底是为了荣耀上帝。“预定论”是加尔文派的主要特征之一。詹森教派在十九世纪爱尔兰移民融入美国社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新教色彩使得移民美国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找到了本民族

---

<sup>①</sup> 燕奉青，山东大学 2008 硕士论文《虚假的反叛者与被操纵的文化符号》，10 页，<http://epub.cnki.net/grib2008>。

宗教伦理同清教思想以及加尔文主义的契合点。

凯鲁亚克一家基于自身融入美国社会需要，努力淡化自身的天主教色彩，主动趋同美国清教主流。凯鲁亚克的故乡位于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靠近美加边境的小镇洛厄尔，马萨诸塞州做为美国的老工业基地，最早的清教徒殖民地，文化以清教伦理占主导。对于新教主流，凯鲁亚克一家主动趋同。母亲要求他努力结交美国社会的主流群体中的规矩青年，凯鲁亚克自身也对被排斥于社会之外有着深深的恐惧感。

因此我们可以从新教伦理的角度解读凯鲁亚克。凯鲁亚克的詹森教派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被新教同化。不管是詹森教派还是加尔文教派，都是属于基督教传统，和东方的禅宗比起来，完全是不同的宗教，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在禅宗面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在五十年代美国新教与垮掉派代表的自由主义的交锋过程中，凯鲁亚克始终是矛盾和疏离的，远没有“红巾婴儿”金斯伯格那样热情，根本的原因就是两人的宗教背景不一样。凯鲁亚克的受过基督教影响的禅宗也就远没有金斯伯格放荡不羁的禅宗那样快乐和搞笑，始终充满了忧虑和死亡的气息。

禅宗对西欧乃至全球青年有很大的影响，为了更深入了解年轻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我们必须了解禅宗是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他们的。

禅宗，是对释迦牟尼佛教的心法与中国文化精神结合后形成的中国佛教宗派的称呼。印度佛教的传播途径有三：一是南传原始佛教，如泰国、柬埔寨、老挝、斯里兰卡和缅甸，其存续主要依赖政府与民间信仰，今天，虽然已非旧时面目，但它多少还存有一些原始方式；二是北传佛教，如我国西藏，它具有神秘色彩，千余年来，政教合一的存续形式类同西洋教会和教皇的权威；三是禅宗，它通过丛林制度存续至今，是佛教传来中国后经过中国文化的融化而产生的佛教的革新派。



严格地说来，佛教经过与中国文化的交流，足以影响佛教后来命运的有两件大事：第一，是对佛学学理的整理；第二，在行为仪式方面，就是丛林制度的建立，它融合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如儒家以礼乐为主的制度、道家乐于自然的思想等。

由于禅遵从“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因此对它的理解领悟各有不同。对禅的不同理解大致有六种：

第一，是由禅学名词的成立。禅宗本来是注重于身心行为的实证，工夫、见地并重，自从一变而为禅学以后，禅宗便成为一种学术思想，可以与行为及工夫的实证脱离关系，于是谈禅的“口头禅”之风，便大为流行，典型的如两晋的“玄谈”现象。

第二，由于东方学者们偏爱老子、庄子思想哲学的境界，便认为禅宗亦是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换言之，所谓禅宗，就是融会老庄思想的道家佛学而已。

第三，受宗教授法中的机锋转语影响，凡是出言吐语模棱两可、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的语句，认为便是禅句。

第四，认为冥心闭目的静坐（俗名打坐）或沉思默想便是禅宗。

第五，在当代的美国，青年流行服用一种 LSD 的幻想药，服药后会产生种种疯狂浪漫不检行为及虚玄思想，他们把这种药视为与禅宗中有同等效力的禅定之药。

第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印度的瑜伽术普遍传播到欧美各国。瑜伽强身工夫，也很注重打坐（静坐），于是把催眠术的自我催眠与瑜伽练气练脉的功夫交错，便认为这也是禅。

美国青年中流行的对禅的理解显然更接近上述第五种。为什么禅和道家如此吸引西方青年，因为他们希望从禅和道家中去寻找那个使他们烦恼的东西。他们已厌倦那些既定的观念以及传统的宗教信条。传统的禅学对他们来说，好像几何学一样，只强调

那些可以传达的，而完全忽略了那些不能传达的。这个不能传达的东西就是禅和道家探讨的天地。禅和道家并不是真能传达那个不能传达的东西，而是他们有方法把它引出来，使我们的心境开阔，有更多呼吸的空间。

寒山在中国和日本、西方的不同命运，也可以作为禅学在西渐中如何变化的典型事例。作为中国唐代少有的几位白话诗人之一，寒山在中国古代一直默默无闻，但二十世纪以来却受到了日本学者的推重。自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起，寒山诗就在日本一版再版，并且有十多位学者对他的诗作了大量研究、注释及翻译工作。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寒山诗远涉重洋传入美国，美国的年轻人奉寒山为偶像，其诗一时之间风靡欧洲。寒山诗被翻译成英语和法语为众多的读者所接受，在那里，他赢得了比李白、杜甫还要高的声誉。

寒山对于嬉皮士们的感召力最直接地来自其外貌行为，然后才是内在精神。嬉皮士们以长发赤足、奇装异服以示对社会的反抗，桦冠木屐、布裘破弊的寒山引起他们的共鸣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思想上说，寒山诗有两点契合了“垮掉的一代”内心深处的渴望，其一是其遗世独立的精神，寒山游离于一切社会成规与秩序之外，“独居寒山，自乐其志”，世俗的权威不再能干扰和制约他，这对嬉皮士们特立独行、标榜自我的价值追求是一种刺激和鼓励。第二点与第一点紧密相关，那就是回归自然的意识，嬉皮士们鄙视社会、摒弃社会，于是只能走向旷野的自然。而在寒山诗中，他们惊喜地听到了灵魂呼唤大地与山峦的深沉回响——浑然天成的寒岩美景，坐拥青山白云的东方诗人，一切洋溢着安宁、祥和的气氛和禅的生机，抚慰了他们充满动荡感、空虚感的心灵。

显然，西方人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理解禅宗的，在他们看



来，禅宗和基督教不同，他的教义支持把许多放浪的行为作为追求解脱和自由的手段。“若心常清净，离诸取著，于有差别境中能常人无差别定，则酒肆淫房，遍历道场，鼓乐音声，皆谈般若。”<sup>①</sup>于是，一切荒唐、淫乱的行为都可以被垮掉青年当作超凡入圣的举动。比如加里·斯奈德在长诗《当我沉思时我在想什么》中写到：

噢，我可以告诉你：我能告诉你  
但你不会理解的，不过我不愿意  
你会理解的，但我不能，我是指理解  
这把吉他已经裂了  
我讨厌盘膝而坐  
我的膝盖发麻我的鼻涕直流我要  
上厕所  
真该死那只闹钟不肯响  
当我沉思时，我想的那件事是空幻  
我记得很清楚  
空洞的脑袋鞭炮砰砰直响  
可是我实际上想的是性爱  
性爱的种种样式<sup>②</sup>

他们沉思的是空幻还是性爱？或者是如同韩国电影《色即是空》讲的那种通俗色情？也许就是猥琐和无聊的枯坐，坐得来“膝盖发麻”。

---

<sup>①</sup> 《居士传》卷三十一，转引自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20页。

<sup>②</sup> 陈绮，2005西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垮掉一代”文学与“另类文学”》，第21页，<http://lsg.cnki.net/grid20/>。

布鲁斯在《新时代与世俗化》中对新时代的宗教特征的归纳有两点：其一，相信自我的神圣性和无罪感，人人可以成佛。其二，没有比个人的自我更高的权威。这样的自我意识犹如宣称“真理就在你的脚下”。如果你想了解为什么大批心理自助或者自我治疗类的出版物十分流行，那么根源就在于此。大致来看，以上两点其实都是东方思想影响的结果。从叔本华到荣格，从高更到毕加索，十九至二十世纪思想史上的东学西渐，可以称之为“东方转向”。<sup>①</sup>

就算垮掉派青年和嬉皮士能够接受基督教，那种基督教也必须是经过重大改造后的基督教。他们挂着耶稣受难像，穿着耶稣受难式的短袖圆领汗衫，把耶稣印在面具上，模仿百事可乐广告上的打油诗，“耶稣的恩情没有底，你自会越活越有趣。”他们建立“上帝之爱”、“天国旅店”和“灵魂旅店”的群居村，参加耶稣摇滚音乐会和基督徒夜总会，他们成立“耶稣的子民”（耶稣迷、马路基督徒）的群体，口号是“耶稣，我曾为耶稣沉醉”。父母们都沉默了，甚至很怀念过去孩子们沉溺于老式大麻的时代。<sup>②</sup>黑人音乐家喜欢把布鲁斯和福音音乐相结合，采用福音音乐形式而删掉宗教歌词。他把《当我孤独时就与耶稣交谈》改编成《我有过一个女人》，把《上帝，只有您》改编成关于男女关系的《只有你》。这就把福音音乐关于灵魂升华的主题换成了主要在戏院、酒吧、妓院和夜总会演奏的性爱和膳食。<sup>③</sup>女权主义者宣布，耶稣其实是一个女人，黑人权力团体紧接着宣布耶稣是

<sup>①</sup> 叶舒宪：《西方文化寻根思潮的跨世纪演化——透视“新时代运动”》，见《文史哲》2003年第1期，第33页。

<sup>②</sup>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下），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5~1286页。

<sup>③</sup> 谢为群、洛秦：《美国摇滚历程五十年》，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一个黑人，黑人女权主义者最后宣布耶稣是一个黑皮肤的女人。可见，只有迎合了他们的感官解放和嬉戏要求、跟得上时代的宗教才会受到时髦青年的追捧，它必须让人感到快乐，更重要的是不能老土。

禅宗看起来是否定操作主义的，不过，叛逆青年的领袖马尔库塞也嘲笑禅宗和颓废生活方式不过是为发达资本主义装点门面的东西，很快就会被当做“它的一部分有助于健康的饮食而消化掉”。<sup>①</sup> 马尔库塞预料到了，“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热衷的禅宗不久就会被新的资本主义社会主流“雅皮士”“布波族”继续发扬光大，成为一种很酷的流行时尚，现在这些“背包族”正牵着女朋友，戴着念珠，到处参禅念佛。他们强调先验论和超自然的神秘主义、魔术、占星术、巫术以及各种东西方注重神秘体验的原始宗教。拥有这些原始道具的现代人似乎想以时髦的姿态借用这些器物所承载的魔法力量去解脱沉陷于消费社会物质主义枷锁中不能自救的灵魂，抵抗由“现代性”负面效应所导致的种种心理失衡和精神危机。这种现象很容易令人想起分析心理学家荣格对西方的患者的一个忠告：必须从内部而不是外部去吸取东方的价值，必须从自己的内心去寻求它们：“人们对这些问题必须格外谨慎，因为模仿的冲动和主动的病态，渴望把异国风味的羽毛据为己有，并用这些异国情调的羽毛装饰他们自己外表的贪婪，会把许多人引入歧途，使他们只知攫取这些‘有奇异魔力’的观念，并把它们运用于外部，就像涂用药膏一样。”<sup>②</sup>

如果说不同的宗教信仰能够更深刻地代表着不同的信仰者的内在气质，那么，宗教信仰的变更，也标志着信仰者精神气质的

---

<sup>①</sup>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吕世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sup>②</sup> 荣格：《心理学与炼金术》，见莫拉卡宁：《荣格心理学与西藏佛教》，北京：商务版印书馆，1994年版，第137页。

重大改变。美国人抛弃了世代信奉的基督新教，改信禅宗，是一件值得深思的精神事件。因为只有是禅宗而不是新教，才能和大麻、摇滚乐和性放纵相匹配。

中国的青年一代也热衷于像垮掉派一样来欣赏禅宗，下面以卫慧的《我的禅》为例，来分析这种信仰的精神实质。

《我的禅》一书在叙述女主人公的恋爱故事中夹杂了几章讲述她回出生地普陀山遇到性空法师的感悟，分别是第十五章“在法雨寺”，第二十章“性空法师与慧光”，第二十六章“太阳下的香气”和第二十八章“法师说：微笑！微笑！”。在小说开篇的前面两章，女主人公从纽约回到上海，原因是和男友 Muju 不欢而散。她的心情很难受，于是决定离开上海一阵子，坐上了去“海天佛国”普陀山的海轮。从第三章开始，小说开始追忆在纽约和 Muju 的热恋。纽约记忆和普陀山悟道是夹杂着来写的。一边是纽约的性爱生活，一边是普陀山的清幽与禅意、平静与自由。从小说的篇章结构看它们好像两条并行不悖的线索，但实际上是纽约生活在前，普陀山悟道在后。从第二十九章到最后，女主人公从普陀山回到了上海，此时已结束了对纽约生活的回忆，以后就都是发生在上海的事。又一个极富魅力的男子出现了，女人被他迷住了，与他发生了性关系。接着她的纽约男友 Muju 也来到了上海。等两个男人都走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但不能确定这是谁的孩子。

也许有人会问，她的禅和感情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要解答这个问题需要理清女主人公在普陀山都参悟到了些什么，需要把那几章叙述普陀山经历的文字连起来看。第十五章“在法雨寺”紧接第二章，卫慧来到了法雨寺，她二十多年前出生于此。她先找了个旅馆住下，一个当地渔民开的小旅馆——“悦来旅馆”，房价出奇的便宜。在这里可以听海涛声和风吹过山林的哗哗声，任何黑色的记忆都消失得没了踪影。法雨寺幽深的庭院，



有几棵五六百年树龄的菩提古树，树下一老一少两个和尚在下围棋。卫慧告诉老和尚自己出生于此地。和尚沉吟片刻，说：“法雨寺曾经降生过一个女婴，似由一位远道而来的女施主仓促间提早产下。”他的目光仿佛一瞬间就看到了这个女子这二十多年发生的所有事情，还说出了这个女婴的法名。霎时，女子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这个老和尚就是性空法师，出生于旧上海的一个名望世家，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在法雨寺落籍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女子向他讲述那些困扰自己的事，突然在接触到了他的深邃宁静的目光后停顿了下来，瞬间物我两忘，已无言。临走时法师送给她一本《大悲咒》，浮躁是有助于心智镇定，临别赠言是：生活的秘密就在微笑里面，要抱一颗嬉戏之心！

这些禅意与卫慧的感情生活有何联系呢？她从普陀山回到上海后，不是变本加厉地浮躁了？还是悟到了禅更加逍遥了？如果说卫慧的禅与她的感情生活是统一的，那么她所体会到的禅就是逍遥的本性，是一种快乐禅；如果是分裂的，普陀山之行就仅仅是一次无足轻重的旅游。从性空法师的临别赠言来看，卫慧最后领悟的宗教很可能是一种将来可以在年轻的时尚男女中大为推广的逍遥禅。禅宗也很有可能取代基督教成为世界性的第一宗教。

不光是年轻人把禅宗作为一种时尚，现在打开电视看到的少林寺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少林寺了。少林寺的主持释永信被称为少林寺的CEO，成天提着笔记本电脑，坐100多万的豪华越野车，奔波于各种时髦的社交场合，每天要会晤企业老总、政府官员、国际友人等各类社会人士。他坐喷气式飞机往返于各国之间，频频接受美女主持的采访，还在少林的淘宝网站上叫卖标价9999元一本的武功秘籍。他把少林寺历史上秘传的武功秘籍整理成礼品书，送给外国政要，做对外交流用。他的手机当时很时尚，翻盖的，手机尾号是6688，戴的是“新新人类”的运动腕

表。时常念叨少林寺的“全球化”问题。他还提出了一套“武术禅”的概念，要使之成为像“东方学”一样的显学。少林寺大雄宝殿前面的香龕里，最细的一炷香比胳膊粗，最粗的一炷香比碗口粗，长都在一米二左右，最粗的六千一炷，最便宜的六百。他发明了一种素饼，作为有少林特色的宗教食品，他看到了全球有两千万素食主义者，自嬉皮士之后素食主义就成为时尚。“食品就像迪斯尼的动漫形象唐老鸭、米老鼠，与可口可乐和麦当劳一样，是用产品来传递文化。这是国际上非常成熟的做法，代表了国家的软实力。”释永信吸收了一些美国的宗教学说，认为商业时代的宗教就是要提供信仰这种产品。释永信很赞同这种说法，“在走过了官府供给、农产并重之后，商业服务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大趋势。少林寺也应该有企业的观念，给社会提供一种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只有坚持这个理念，少林寺才能更好地生存。”在他的成功经营下，少林寺成为登封市旅游经济的支柱。从登封到少林寺的半个小时车程里，可以看到一路上都是武术学校。2006年，少林寺和深圳广电集团共同主办了商业味浓郁的武术比赛——首届中国功夫之星全球电视大赛。河南卫视发起的为999对新人祈福的祈福会，也被安排在少林寺。自从1982年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一炮走红之后，少林寺的小和尚都想长大以后拍电影，成为大明星。2008年湖南卫视主持人李湘穿着透明的黑丝袜与释永信坐在千年古刹嵩山少林寺门口做了一期节目。正在采访之际，方丈的手机响了。李湘笑问，方丈又有接待任务了？方丈很尴尬，面红耳赤地谎称看看时间。李湘马上抓住了大师的脸红，嘻嘻笑，称大师很害羞，蛮可爱。早在2006年释永信就联合谭盾和易中天搞了一个极端时髦的“禅宗少林·音乐大典”的大型实景演出。115名“国际旅游小姐”跑到少林寺去学五行拳，旅客们看花了眼，说：“洋妞儿打拳还怪好看呢。”

这样的禅宗可以说已经和国际接轨了。



## 二、致幻剂

西方“药品文化”所体现出来的科学主义思潮也是毒品泛滥的又一个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吸毒在英语中叫做“drug abuse”或“drug addict”，意思是“滥用药品”或“吃药成瘾”。滥用药品或吃药成瘾之所以会在西方成为一个不可收拾的社会问题，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西方社会是一个崇尚和迷信药物的社会，“药品文化”深入人心。众所周知，在西方，毒品有非法毒品和合法毒品之分。人们通常所提到的鸦片、海洛因、可卡因等都是典型的非法毒品。除这些毒品之外，还有一些所谓“合法毒品”，如各种精神剂。这些合法毒品其实都是各种“抗抑郁”和“抗忧虑”的精神药物。这些药之所以被称之为合法毒品，是因为其合法性在于只要能从有资格开药的医生那里得到一张合法的处方，就可以取得这种药物。这些精神性药物的毒品性就在于其极易使人上瘾，达到类似非法毒品所拥有的某种自感效应。尤其是在当今这样一个使人精神高度紧张、心灵极端痛苦的社会，用药物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以缓解精神压力，已经是很流行的事情，因此毒品问题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病”。使用者企望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所造成的化学药物来医治他们心灵的创伤，以达到一种精神的安适。使用化学药品治疗精神疾病在西方是一种十分流行的做法。很多医生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失业及由此引起的焦躁不安、人生没有目的而形成的彷徨无归的感觉、对社会的适应能力不强等这些精神问题都归结为化学问题，因为人被看做是一个化学构成物。这种“药品文化”的实质是近代西方科学主义在生理医学领域的具体体现。这种深刻的文化价值观是导致毒品在西方发达国家泛滥的深刻原因之一。毒品泛滥问题是现代性社会中人类的必然命运，是技术理性主宰下的工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

果。1959年，美国医生开出的镇静剂处方超过了579吨。这也预示着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在美国的全面登场。

“垮掉青年”基本都沉迷于毒品和迷幻药LSD。这种迷幻药最早是由瑞士巴塞尔的桑道兹制药厂的艾伯特·霍夫曼博士在1938年离析出来的，当时并不知道它有致幻的作用。直到1943年的一天，霍夫曼的手指皮肤吸收了一点LSD，开始产生各种幻觉。于是他试着服用了一粒细盐大小的量，就经历了一次幻游。LSD的首度大众娱乐化，是在五十年代流行于一小群心理健康专家（比如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和一些政治与社会上的重要人士之间。六十年代开始的时候，哈佛大学的两个老师，蒂莫西·利里和理查德·阿尔伯特开始给他们的同事、作家、艺术家、教士和自愿的囚犯做实验。LSD使利里体验了肉体的复活，他说：“思想飞走了，你只剩下了上帝和生活，生活就是性。”他在《花花公子》上宣称LSD有助于增加性狂喜。LSD是“一种强有力的春药，可能是人们所知道的最强有力的性释放剂……”<sup>①</sup>到1966年的时候，LSD就已经家喻户晓了。经过有“旧金山非官方市长”之称的大毒贩奥斯利提纯后批量生产，任何人只要花上两美元就可以到幻觉世界去旅游一趟。

金斯伯格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尝试致幻剂，而且常常不遗余力地宣讲LSD和大麻的好处，使之合法化。他在纽约听证会上对司法委员会下属委员会的发言中，极力叙述致幻剂的好处，隐瞒它的危害，力图使美国参议院不要制定管制LSD的严厉法律。他告诉委员会，服用迷幻药可能出现“宗教的、先验的或是庄重幸福的经历”。只要花上两块钱，买一粒优质的LSD药剂，就能够听到上帝颂唱、圣灵打鼓的宇宙交响乐。服用致幻剂竟然对青

---

<sup>①</sup> 转引自史晓玲，苏州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美国六十年代反文化运动透析》，第16页，见<http://epub.cnki.net/grib2008>。



少年很不喜欢而又对社会稳定有重要作用的宗教有好处？是不是嬉皮士们在幻觉中看到神，抵达极乐世界，就会皈依基督教？

当我把针头刺向我的血管，我成了耶稣之子……

——杰斐逊飞机《白兔》

金斯伯格希望议员们看到致幻剂的这一重要作用，“能明知考虑这一点，仁慈和尊重地对待 LSD 的使用”。<sup>①</sup> 不过，LSD 和宗教的结合，情况可能并不是金斯伯格宣传的那样。会不会不仅没有看见上帝，反而天天看见撒旦呢，或者把邪灵当做是天使呢？纯粹非理性的感知，完全失去判断能力，廉价的幻想，不需要任何努力和克己，这不是基督教，而是狂禅。服用 LSD 之后，万事万物，色彩异常鲜明，棱角异常突出，纹理异常分明，移动着的物体后面拖着一条艳丽的彩带，静物也会浮动起来。城墙上的斑点好像是人的眼睛，周围的面孔也随着自己的好恶变得美丽或狰狞。只要闭上眼睛，就会看见瑰丽的几何图案，像万花筒那样变幻莫测。时间变得慢吞吞地，甚至可以停下来。“如果感情欣快，时间缓慢的感觉使人愉快而惊奇；如果当时被焦虑主宰，对‘度日如年’就会有深刻的体验。”甚至能在水上走，天上飞，又好像在开航空母舰……<sup>②</sup>很明显不能指望这种幻觉能够使一个人有虔诚的信仰。而且，LSD 也不是如金斯伯格鼓吹的那样，对人没有害处。单次服用大剂量的 LSD，能引起真正的恐怖性幻觉和迫害妄想，丧失自知力，使人不堪压力而疯狂逃跑，甚至自杀。长期服用 LSD 的人，会有对药物的依赖，在遭受精神刺

---

① 比尔·摩根编：《金斯伯格文选——深思熟虑的散文》，文楚安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② 万文鹏《麦角酸二乙胺（LSD）》，《国际精神病学杂志》1979年第4期，207页。

激或者是体力劳累的情况下，虽然此时并未服用致幻剂，也会出现以前有过的幻觉症状，这就是“重现反应”。这种反应可持续数周之久，可以使人发疯，陷入严重的焦虑和忧郁，引起慢性精神病和自杀。<sup>①</sup>但是，金斯伯格从来没有谈到过致幻剂的害处，他这样的“诗人”真正是在蛊惑和败坏青年，以把他们引向放荡的生活方式为乐。另一垮掉派成员肯·凯西对致幻剂的普及也起了巨大作用，前面已经提到过他的“快乐的恶作剧者”之旅，就是一路为致幻剂打广告，为另类生活打广告；回到旧金山附近的家中，他又举办迷幻药大会，一般有数百人参加，免费分发LSD，再配上产生迷幻效果的灯光，还有迷幻摇滚乐队来营造气氛。

而在视觉艺术中，波普艺术（POP）和欧普艺术（OP）等现代艺术形式也与迷幻相结合。这种波普或欧普风格的图案运用在各种图案设计中，在服饰设计上，更是如此。在嬉皮们的着装上充分体现着这种带迷幻色彩的服饰图案，如：黑白对比强烈的条纹、布满小圆点或花朵、几何图形等色彩浓烈的抽象图案。

到了六十年代末，吸毒的美国人已经很多了。据美国公共卫生署估计，六十年代末有大约两千万人在吸毒。《花花公子》调查报告统计有47%的大学生承认吸食大麻烟卷。<sup>②</sup>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初中女生也会吞下大把大把的安眠药，为的是找感觉以摆脱生活的痛苦和无聊。全世界非法毒品的生产和销售已经跻身为全球五大工业之一，全球每年毒品的销售额可达8000~10000亿美元，占世界贸易额的10%。

青年们的格言是“听摇滚乐、吸大麻、辍学”，信奉的口号

---

① 万文鹏：《麦角酸二乙胺（LSD）》，《国际精神病学杂志》1979年第4期，208页。

②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下），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8页。



是“爱你自己，做你自己想做的事”，而享乐主义的内容是“凡是心灵中出现的欲念都试图去加以满足”。反过来，任何压抑情绪、不以感官之乐为主旨的人，都被认为是落后的，没有超脱自我的。毒品不仅与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完全吻合，而且，通过毒品吸毒者可以去探索心灵的奥秘，体验各种神奇的力量，“看”声音，“听”颜色，经历一次次美妙的幻游。因此，追求享乐主义的嬉皮们都将毒品视为打开享乐大门的金钥匙，通过吸毒去体现美妙的感觉。

无休止地寻找感觉是后现代人的一个典型特征。据皮特·巴克曼在《抗议的限度》一书中总结到，大麻能够改变一个人对世界的感知方式，距离感、深度感都得到了不可预知的随意性地延伸。它带来一种难以言表的巨大自由感，个性也得到了扩展。<sup>①</sup> 他们要寻找一种短暂的、享乐的、抛弃一切负担的感觉，而致幻剂恰恰就能满足他们，使他们不再感到自己是社会这台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而是一种真真切切的动物赤脚在地上走。金斯伯格在谈到吸食大麻后的体验时说道，意识的重心将从习惯上的浅薄、简单、口头陈述以及对体验反复进行的二手意识形态的阐述转化为更直接、渐进、有趣、精微、充满敏感现象的巅峰时期。而吸食了安非他命之后，吸食者就会将梦与现实混乱，错把无意识的幻觉当做人们熟悉的感官现实，达到逃避丑陋现实的目的。<sup>②</sup> 威廉·巴勒斯的《裸体的午餐》主题是沉湎海洛因和其他名目繁多的药物。金斯伯格对他的评价是：“……在使用迷幻药时充满想象力的场景下，像巴勒斯会做的那样，把迷幻药当做反作用媒介，作对伊甸园的一瞥，或是当做对还未被神权和政府权

① 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10页。

② 比尔·摩根编：《金斯伯格文选——深思熟虑的散文》，文楚安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89、101页。

威干扰前的自然状态下的思想的一瞥。这个场景就是为了精神探索，为了想象力的扩张，为了对国家政权进行再思考而用药。”<sup>①</sup>

金斯伯格和六十年代的“新左派”看待问题的典型方式是，把大麻和致幻剂看做是改变思想观念的催化剂，吸食之后可以反对美国政府对越南穷兵黩武的独裁政策，也可以诋毁政府的权威。吃了致幻剂，就可以瞥见伊甸园，那是一个尚未被基督教和政府干扰的世界。最终还可以把人从科技禁锢中解救出来，因此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城市里排水沟臭气熏天，天空下着黑雨，到处是化学食品，动物都吃了激素，人口爆炸折磨着整个地球……假如说 LSD 愚弄人，那么金钱呢？越南战争呢？大众传媒又算什么呢？差得远呢！吸食鸦片带来的幻觉性质和看电影差不多，不过就是发生了相同程度的正常意识的改变而已。于是，垮掉青年和嬉皮士理直气壮地吸食毒品和致幻剂。这种思维方式是六十年代的典型思维方式，一种存在主义的变种，即只要认定大的现实污秽不堪，自己干一点相对小的罪恶来消解和反抗，何罪之有？杀人狂嬉皮士曼森在报纸上嘲笑尼克松总统在未审判之前就宣布“曼森有罪”，尼克松这样一个在越南战场全身都沾满血的屠夫，怎么可以指控一个才杀了八个人的抗议者？曼森根据的也是这样一种理直气壮的“道理”。

后来 LSD 被摇头丸和冰毒所替代，成为少男少女的新宠。摇头丸（MDMA）是从亚甲二氧基苯丙胺（MDA）演变过来的。MDA 在六十年代是致幻剂 LSD 的替代药物，到七十年代，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把 MDA 列入禁用药行列。当时策划药的制造者设法合成一种合法药物，而作用又与 MDA 相似，这样就制出了摇头丸，直到 1985 年，摇头丸一直保持着合法性。它的

<sup>①</sup> 费林格蒂等著，文楚安主编《透视美国——金斯伯格论坛》，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第 315 页。



兴奋作用比可卡因或苯丙胺要低。它的被利用主要是由于它的致幻性而不是兴奋性。滥用者说它能加深对别人的设身处地的同情，使人愿与他人交谈，提高感觉，加强对自身的关心。摇头丸不是十足的经典致幻剂，它不会产生 LSD 那种令人震惊的感觉，所以它有时被认为是一种驯化的致幻剂。据中新网华盛顿 8 月 2 日消息：美国反毒品署署长巴里·麦克卡菲里称，1998 年至 1999 年，美国摇头丸的消费量猛增了 450%。摇头丸已成为今日美国最主要的毒品问题，摇头丸的滥用目前正呈爆炸性的增长。当美国当局近年来全力打击来自拉丁美洲的海洛因和可卡因时，制作工艺非常简单的摇头丸乘机席卷了整个美国市场。美国海关当局表示他们预计今年查获的摇头丸将比去年增加 1500%，今年以来海关已查获了 6 百万片摇头丸。年轻人多在迪斯科舞厅和重金属演唱会上食用，据称它可增加舞蹈时的快感和感观刺激。

摇头丸在 1996 年传入我国后，逐渐取代了传统毒品海洛因而成为少男少女们的新宠。喜欢摇头丸的人都是一些最喜欢追逐时髦的年轻人，单纯贩卖海洛因的涉毒案件呈大幅下降趋势，而以摇头丸、K 粉等新型毒品为主的涉毒案件则呈多发趋势。在他们中间流行着这样的行话：“包房开好，吸纸摆好，冰壶备齐。火在烤，冰在跑，咕噜咕噜好不好？”形容的就是“溜冰”（吸食冰毒）的情景。“嗨（high）大了以后，就上了另外一个空间，那个世界好像比我们这个世界美好得不得了，漂亮得不得了……也许是现在的人太假了，在这种境界中，感觉人比平时亲切。”<sup>①</sup>这些失落的年轻人渴望的友谊和纯真真的只有在幻觉世界中才能找到吗？

摇头丸的消费过程就是一个很时髦的消费。吃摇头丸的人通常是一群人伴着“的士高”一起“high”，伴随着狂热的性狂欢。

---

<sup>①</sup> 韩丹：《吸毒人群调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4 页。

以前单纯从事性服务的“小姐”现在变成了“陪 high 妹”。她们会选择一些高档娱乐场所，她们先与娱乐场所的负责人联系好，当有男性吸毒人员以吃饭或者唱歌为名包租全封闭的包房时，娱乐场所的负责人就会将“陪 high 妹”推荐给吸毒者，他们选定“陪 high 妹”后，集体用啤酒、可乐服下摇头丸，十分钟后，吸毒者与“陪 high 妹”随着快节奏的“的士高”音乐乱舞狂欢。由于冰毒、摇头丸都属于兴奋剂型的精神药品，服用后十分容易导致性冲动。因此，“陪 high 妹”们陪“high”过后就会与“客人”进行性交易。这种服用摇头丸过后的性狂欢颇有欧美六十年代的遗风，不过是摇头丸和冰毒代替了 LSD，电子合成音乐取代了摇滚。性的狂乱还是不变的，只是九十年代的青年们不再像六十年代的中产阶级大学生那样还要政治反抗。音乐、性和致幻剂早已经扭结在一起，这是青少年亚文化的一种固定模式。

### 三、摇滚乐

在六十年代，毒品是离不开摇滚乐的。大量摇滚乐的素材包括陌生的城市、艰难的旅途和随意的性关系。吸饱了毒品，再加上迷幻的色彩和震耳欲聋的音乐，一个完全的虚幻空间就出来了。“甲壳虫”摇滚乐队在一首关于吸毒涅槃的歌曲中唱到：

摒弃杂念  
放松精神  
顺流而下  
这不是死亡……

所有参加音乐会的人，从歌手、乐手到听众都服用 LSD，在狂欢中忘记了终止，时间变得毫无意义，“迷幻摇滚”充满了



神秘主义、色情、毒品和虐待的内容。

摇滚乐演奏会的现场有一种性的互感，存在着占有和失控的气氛，还有世界末日般的毁灭意味。摇滚乐是一种张扬群体性和身体性的黑人音乐，配上大功率的电子乐器和扩音器后，可以为逃避者提供一个随时可以进入的幻觉世界，在逃避和享乐中渗透着末世感。“猫王”、鲍勃·迪伦、西蒙·加芳凯尔、披头士、滚石乐队成了五六十年代青年们狂热追捧的偶像。1969年8月16—19日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艺术大会”有千里迢迢赶来的三十多万白种青年参加，他们在纽约州贝瑟尔的卡茨基山度过了四天极乐时光，吸大麻，奇装异服，赤身露体，听摇滚，狂歌劲舞，欢乐了三天，这场摇滚音乐会可以说是六十年代最后的高潮。在巨大的演出台上，音乐和诗歌朗诵通宵达旦，“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响彻整个会场，几十万人共同分享食物、饮料、毒品、帐篷。他们吸食着毒品，在泥浆里的湿睡袋中性交，或者当众做爱。当吉他手用奇怪的腔调哼唱美国国歌时，音乐会达到了高潮，疯狂的人们和着节奏把星条旗撕得粉碎。每个人都可以赤裸着在湖中游泳，药丸比早饭更容易找到，警察只是站在一边微笑着。这次摇滚音乐会可以看做是嬉皮士的顶峰，因为它汇集了嬉皮士的所有重要元素，如致幻剂、性解放、“友爱”。在摇滚中特别表现出来的是对社会的不满，他们把国旗制成T恤衫，在演出高潮时砸烂乐器，用吉他戮扬声器。伍德斯托克的组织人之一的迈克尔·兰回忆道：“这儿有一种你能在几英里外就实实在在感觉到的活力，空中弥漫着的电流是无法描述和复制的……”它所叙述的文词似乎是实现了马尔库塞关于“新社会”的预言：

新的社会，将是这样的，青年人的憎恨会突然爆发  
在笑声和歌曲中，混杂着……舞池，性爱游戏，和英雄

主义。

几乎正在林登·约翰逊开始轰炸北越和在南越战争升级的时候，鲍勃·迪伦开始使用电子乐器。他的作品中日益增长的暴力和强度与国内日益扩大的暴力交相辉映。

六十年代后期，出现了以毒品和性为主题的迷幻摇滚，这是嬉皮士最喜爱的摇滚。在“甲壳虫”和迪伦的音乐里可以感到致幻剂 LSD 的影响，比如前者的《明天永不知道》（《Tomorrow Never Knows》）和《她说过，她说过》（《she said she said》），后者的《金发碧眼的女人》（《Blonde on Blonde》）。

大部分摇滚中乐性的色彩都很强。前国王唱片公司行政人员迈克尔·罗森布拉特在谈到摇滚女星麦当娜出卖色相时说：“性和摇滚结合得如此完美，在这个行业里人人都出卖色相。乔治男孩，甲壳虫，埃尔维斯·普莱斯利，范·海伦，王子——谁不出卖色相？”<sup>①</sup> 摇滚歌手林赛·哈尼回忆说：“我当初参加摇滚乐队，主要的原因就是要占据一个有魅力的位置，让许多妇女羡慕，然后就可以不用费什么劲儿地跟她们混在一起。因为在一个摇滚乐队中，无论你长得多么丑，也不管你在乐队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都会有女人为你倾倒，愿意向你奉献出自己的一切。”<sup>②</sup> 滚石乐队的明星贾格尔在描述自己的表演时说：“我诱惑观众……我做了我能想到的每一个动作，我能做的就是与性有关的动作。我跳舞，所有的舞蹈都是性的替代物……我所做的与一个脱衣舞女是一样的，我脱掉我的夹克，有时脱掉我的衬衫……”<sup>③</sup>

① 米克·圣迈克尔：《麦当娜口述实录》，闫卫建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② 詹姆士·克利夫德：《从嬉皮到雅皮》，李二仕、梅峰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③ 夏学花：《嬉皮士》，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这些明星看似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实际上对自己形象的关注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他们靠艰苦的饮食控制和整容手术来维持对摇滚歌迷的性吸引力。摇滚乐明星与他们的崇拜者之间的关系很耐人寻味，著名摇滚明星伊基·波普喜欢引用希特勒的名言——“去争取那些最低级最普通的无名大众吧”来阐释他对歌迷的征服。他清楚地知道，只有这些有残缺的人才真正追捧他的破坏与混乱的欲望，他把他的歌迷比作是早期的基督徒，是一群最丑陋的妓女和目不识丁的家伙——有皮肤问题的、有性生活问题的、有体重问题的、有失业问题的、有精神问题的。<sup>①</sup> 这样看来，摇滚乐对青年的吸引不过是用下流的东西，比如说狂热、色情、暴力、萎靡不振，来吸引品味不高、空虚的人群。甚至可以在歌词里直接描写性，W·A·S·P演唱组（我们是性堕落者）唱的《欺骗像一只野兽，亲爱的尼科》全是由四个词的语言伴着沉重的呼吸演唱的，它讲述的是一个女孩子在宾馆的门廊里用杂志在手淫。音乐成为毒品、性和舞蹈的枢纽。甲壳虫乐队的《我们生活在一艘黄色的潜水艇中》和《露西带着钻石在空中飞翔》最为有名，前者宣扬群居生活，后者表现了一种迷幻色彩。米格·贾格尔被中产阶级的父母们称为“恶魔”和“色狼”。在他的表演中，他既是男性，又是女性，既是同性恋者，又是异性恋者，然而他更是无数青少年心目中的英雄和偶像。1985年，摇滚巨星麦当娜推出了第一张唱片《宛如处女》，无情地嘲讽了传统的贞洁妇女，认为屈从使女人沦为男人的附庸品。这张唱片在全球销售了1400万张，刷新了美国历史上唱片销售的最高纪录。这一年，她的另一首名曲《物质女孩》也荣登榜首。在演唱会上，麦当娜往往把性的吸引力与放荡的黑人舞蹈相结合，歌曲《为我的

---

<sup>①</sup> 莱格斯·麦克尼尔、吉里安·麦凯恩编著：《请宰了我》，郝舫等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爱情担保》具有明显的色情挑逗意味，带有很多的叹息和喘气。另外，她反抗父亲的方式随着《爸爸别说教》的流行也被全球少女所效仿，即是用身体、用性的叛逆来反对父亲古板的道德权威，麦当娜甚至当着父亲的面在演唱会上脱衣服。<sup>①</sup>“辣妹”组合是英国自“甲壳虫”后在全球最有影响的乐队之一，她们的口号是：“女孩力量！”以闹哄哄的说唱、吃了摇头丸似的舞蹈动作以及即兴做爱式的尖叫，爆发出火辣的世界。而麦当娜和辣妹对全世界的青少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嬉皮士曼森家族在杀了人后往往会在现场用被害者的血写下“猪”“战争”“暴动”“起来，起来”的字样，熟悉摇滚乐的青年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些意象来自于披头士的音乐，他写有《暴动》《小猪》和《黑鸟》，在《黑鸟》一曲中，经常唱到“起来，起来”。可见摇滚乐也有诱发暴力情绪的嫌疑。曼森声称，他已经从披头士的歌曲中寻找到了对他的观点的完全支持。有的摇滚乐队甚至直接就表演暴力，例如W·A·S·P（我们是性堕落者）演唱组的布莱金·劳利斯演奏时让鲜血流过脸和胸脯，把生肉抛向人群，让血溅向第一排的歌迷。他咬下活鸟或蝙蝠的头，用剑攻击或肢解婴儿玩偶，用斧子砍去女模特模型的腿，剖腹取出孩子等。

摇滚乐是六十年代的集团宗教，是舞蹈、性、暴力和毒品的枢纽，金斯伯格在演讲中时常倡导把药物、性欲、音乐和原始魔力合起来作为一种宗教的崇拜仪式与教育工具。而且他还一再援引柏拉图对音乐精神的看法，“当音乐风格改变的时候，也是城墙动摇的时候。”并自称是“未被承认的立法者”。金斯伯格和垮掉派就是要用放荡不羁的音乐精神来腐蚀国家的基础，他们就是柏拉图要赶出理想国的“诗人”。试想一个崇拜摇滚乐的国家

---

<sup>①</sup> 红曼、洪亮编著：《疯狂摇滚》，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



一个崇尚巴赫、贝多芬的国家之间，会有多大的差别？老资产阶级流连于古典管弦乐，他们坐在音乐厅里，四周坐满了人，但每人都感到自己是单独坐在那里聆听音乐——这是资产阶级的隐私权、私有制、社会礼仪的一种变相表达，但中产阶级孩子们却为摇滚乐表面的野性和喧闹所吸引，在露天摇滚音乐会上，台上台下全在唱，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在一个热情的群体中，不再是一个个彼此分离的孩子。更重要的是，古典音乐的节制和文雅都被粗野与狂暴替代了。

六十年代的摇滚乐不仅反映性、LSD 感觉，还日益和美国的现实政治纠结在一起，尤其是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它始终是和青年们走在一起的。鲍勃·迪伦谱写了反映民权运动的《答案在风中飘》，这首摇滚民谣成为马丁·路德·金领导的伯明翰和华盛顿和平运动的主题歌，随着黑人民权运动的展开而传遍全国。歌曲号召黑人为赢得自由而继续斗争，或许通过这首歌白人和政府官员们不大好使的耳朵能够听得到黑人内心的呼唤，不知冥顽不灵的白人何时良心才会觉醒。

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会被当人称呼  
白鸽要飞过多少海洋，才会眠于沙滩上  
炮弹纷飞还要多少次，才会被永远禁止  
我的朋友，答案就在风中飘，答案就在风中飘

一个人要多少次昂头，才能看到天空  
一个人要长多少耳朵，才能听到人民的哭声  
多少死亡才能让他明白，牺牲的人已经太多  
我的朋友，答案就在风中飘，答案就在风中飘

山峦存在多少年，才会被冲入海洋

有些人要存在多少年，才会被赐予自由  
有人还要背过脸多少次，假装他看不见  
我的朋友，答案就在风中飘，答案就在风中飘  
——鲍勃·迪伦《答案在风中飘》

鲍勃·迪伦的摇滚一直在尽力捕捉着六十年代的时代精神。1962年创造的《大雨将至》成为关于不久以后越南战争不祥的预言，这也是六十年代最著名的反战歌曲之一。

.....

噢，我那蓝眼睛的孩子，你看到了什么  
噢，我那年轻的情人，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见了成群的野狼包围了一个新生的婴儿  
我看见了一条人迹罕至铺满宝石的公路  
我看见了一根黑色的树干鲜血淋漓，我看见满屋拥  
挤的人群

他们个个手拿流血的斧子  
我看见一架白色的梯子上面被水覆盖  
我看见无数个饶舌者  
他们每一个人的舌头都已溃烂  
我看见无数少年手握钢枪，恶语相向  
啊，大雨，大雨，大雨  
那可怕地大雨即将来临  
(《大雨将至》第二段)

.....

我要在大雨降临之前回家去  
我要走进最密的黑暗丛林深处  
那里人丁繁重



可都一贫如洗  
那里毒弹充斥着他们的水域  
那里山谷中的家园紧挨着潮湿肮脏的监狱  
那里刽子手的面孔总是深藏不露  
那里饥饿难忍  
那里灵魂被弃  
那里黑是唯一的颜色  
那里无是唯一的数字……  
(《大雨将至》最后一段)

后来他还创作了一首更激进的反战歌曲《战争能手》，更直接地抒发了年轻人的愤怒，这首歌成为嬉皮士反战游行的主题歌。

……

当死亡的代价很高时  
你就藏在你的公寓里  
年轻人的鲜血流出身体  
他们的尸体就埋在泥土里

……

让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的钱足够赎回人们对你的谅解吗  
你认为你能吗  
我想你会发现  
当你的生命走到尽头  
所有的钱  
都不能赎回你的灵魂

迪伦也直接诅咒这个军事帝国的“战争能手”：

我希望你死  
你的死期就要到了  
我将把你放在棺材里  
在一个灰暗的下午  
我将看着你被埋葬  
躺在你的墓穴里  
我将站在你的坟头上  
直到我确定你已经死了

鲍勃·迪伦的《重访 61 号公路》把美国描绘成通往战争之路的废旧汽车厂；《玛吉农庄》以隐居者的蔑视态度来告别刻板的现实世界；《像块滚石》将物质名利弃如粪土。“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没有家，就像完全默默无闻，就像一块滚动的石头。”这些歌曲组合起来构成了一副腐败与混乱的美国场景。迪伦的生活循着这样的路线，从政治抗议到文化大拒绝再到田园生活，恰好是六十年代的许多反叛者的心路历程。

除鲍勃·迪伦以外许多摇滚巨星也写了反战歌曲，约翰·列侬创作于 1969 年圣诞节前夕的《圣诞快乐》唱到：“如果你想要和平，战争就会结束，约翰·列侬祝大家圣诞快乐。”他还写了著名的《给和平一个机会》呼吁和平，《想象》《我不想当兵》等，直接反映了大学生反对战争、逃避兵役的愿望。

音乐是一种你可以与你的朋友谈论，但不可能与你的长辈谈论的东西。它给人们一种在他们这一代内部团结的感觉，而且让他们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这样，在某种意义上是独特的、被祝福的音乐也使他们觉得自己似

乎处于斗争之中，或者……被认为是边缘人、该受谴责的人乃至坏人。<sup>①</sup>

马尔库塞准确地把握了摇滚乐与青年文化的密切联系以及摇滚乐的群体性，披头士的到来说明摇滚一代正在作为一种国际青年现象出现，它为青年一代提供了共通的世界语，从加利福尼亚到西柏林，从欧美到日本，全是狂热的“摇滚一代”。在青年人中存在着一种新的以共同体验和独特行为为基础的休戚与共的关系，一种以音乐而不是言语相互沟通的关系。吸食毒品也是有的青年团体接纳你入会的资格，如果你连“丸子”都不吃，他们就不会相信你。同样，在服饰和语言、性的态度上，也要符合小圈子的时尚。比如说，在中国，在“90后”的QQ群里，“火星文”成了交谈的主流，看不懂火星文就不知道交谈的内容，不会用火星文更可能被直接踢出群。

摇滚乐中透出强烈的社团渴望情绪，狂热的摇滚乐迷往往也会追逐嬉皮士的群居村。青年们要在家庭生活以外，在公共生活中寻找亲密无间的友爱。这样可以一举多得，既能够把社团主张、平等主义和解放统一在一起，又可以把群体性和身体性结合在一起。先锋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工厂”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人们在这里吸毒、听音乐、做爱、谈天、会客。传统资产阶级的的工作、性和对意识的控制，都被轻蔑，统治这里的是闲暇和快乐。年轻人喜欢的社团绝不是清教徒的那种小规模、被共有的宗教、工作、家庭的绳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社团，这种社团在五六十年代已经被不断增长的城市化、工业化和官僚化瓦解的差不多了。现在流行的社团不是那种礼俗社会的社团，它建立在

---

<sup>①</sup> 马尔库塞语，转引自理伯卡·E·卡拉奇《分裂的一代》，覃文珍、蒋凯、胡元梓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嬉戏、性放纵、毒品、先锋艺术之上，人们厮混着，跳舞、吃喝、抽烟、四处游荡，打破了工作与玩乐、生产与再生产、公共生活与个人隐私的泾渭分明的界限，快乐悠闲取代了职业道德。对于青年们来说，从家庭、社会、宗教中都无法得到的归属感，在 LSD 中找到了，只有在 LSD 中才发觉自己是这个浩瀚宇宙的一部分。他们在群体中个人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可以理直气壮地逃避现实中禁欲传统的压抑。“垮掉的一代”的那种放荡的小群体和格林尼治村的先锋艺术团体酝酿着伍德斯托克摇滚音乐节、神秘宗教团体和嬉皮士群居村的氛围。“婴儿潮”的一代表面上常常显得很独立，实际上比任何一代人都更孤独，或者说更不能忍受寂寞，许多富裕的中产阶级的子女离家出走，加入到群居村和神秘宗教团体之中，他们害怕被集体抛弃，不断地放弃自我。学生们纷纷建立“共享会”“共在会”和“共爱会”。后来这些社团转向政治，转向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示威游行，反对核武器、争取世界和平和生态运动，仍然是为了获得一种可怜的、虚假的团结感。吃摇头丸和 K 粉的时候，人越多越好，开一个大包间，放迷幻音乐，赤身裸体，大家一起“裸嗨（high）”。

在 1955 年摇滚乐问世之前，美国唱片的总销量只有 2.77 亿美元，1959 年到了 6 亿美元，1973 年则上升到了 20 亿美元。5~19 岁的青年人中，可以说每个人，在 1970 年花在购买唱片上面的钱，至少是 1955 年的 5 倍。瑞典、联邦德国、荷兰、英国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少年花在摇滚上面的钱都多得吓人。<sup>①</sup> 甲壳虫乐队导致了六十年代后期的长发、连鬓胡子、念珠、镶饰边和绣花的服装大流行。

对于摇滚乐这种与性解放相生相伴的文化现象，美国的“新

---

<sup>①</sup> 霍布斯保姆：《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496 页。



左派”却很喜欢。他们把它作为一种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人民艺术。在他们眼里，这种艺术很有信仰，渴望打破一切秩序约束的世界，瓦解了资本主义社会正常运行所必需的信仰和道德，定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号角声。不过，艾伦·布鲁姆认为左派与摇滚的融洽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摇滚诱发人的不成熟的狂热情绪，是和同它联手的致幻剂一样的，摇滚乐与性狂欢的关系使人记起左派领袖马尔库塞对自由性爱的追捧。<sup>①</sup>

## 四、性解放

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性病传播到了惊人的地步，淋病成为全国范围的流行病，但却没有预防感染的疫苗，花柳病严重威胁着女大学生的健康。换妻游戏也极为流行，男人们把他们的房间钥匙扔在一张桌子上，妻子们便过去随便抓一个，抓着谁的钥匙就和谁睡觉。<sup>②</sup> 据估计，换妻的数量超过了一百万对。在伯克利的“自由大学”的刊物上，公开出现了这样的小广告，“征求志同道合者6男6女，希望刺激我们所拥有的全部肉体感官和精神感官，能提供场所者优先考虑。”“健康的通奸”和“天体运动”经“权威”专家论证，居然是对身体和心灵健康很有好处的。当时的流行歌曲唱道：

如若有人爱你，  
就要用一切方式去爱。

---

<sup>①</sup> 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缪青、宋丽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sup>②</sup>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组、朱协合译，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0、1133~1134页。

美国的性在六十年代发生了三大转变：首先是性的世俗化。性与宗教价值观相分离，这是随着新教伦理和其他主要宗教的衰落而来的。人们的注意力不再被宗教吸引，必然就会被世俗的快乐所吸引。世俗的快乐，对于一般人来说，主要就是性和食物，美国人早就解决了温饱问题，现在迫切的就需要在性方面实现在食物方面一样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当然，暴饮暴食也是一个现代性的疾病，在女性中间更常见。她们心情不好、空虚的时候太多了，只有依靠食物和性、逛街购物来打发自己，狂吃狂喝之后再引发呕吐、服用轻泻剂、利尿剂或灌肠剂来保持身材，否则就会得肥胖症。比较一下但丁的《神曲》对饕餮者和淫荡者的宗教诅咒，就可以知道现代社会是怎样在食和性方面世俗化的。其次，和性的世俗化相生相伴的是性的自由化。因为传统的法律和教诲都是建立在宗教信条之上的，计划生育、人工流产、离婚、婚前性行为都被传统宗教严厉谴责，而现在，人们不会再考虑这些行为的宗教禁忌，仅是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即以每个人有权支配自己的身体的看法来反对《圣经》和教会传统对这些行为的禁止。在现代社会中，饮酒、吸烟、毒品、性病，人们讨论它们时，已经不再考虑道德，而只是考虑健康问题。在中国，女性吸烟在很长时间都被看做是“不守妇道”的表现，而现在许多女孩不知出于何种科学依据把大量吸烟看做是减肥的有效手段。再次则是出现了家庭危机，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同居者的合约婚姻部分地取代了传统家庭，传统婚姻也被严重的婚外恋所困扰。自工业化以来，家庭逐渐失去了原来农业时代的经济意义，性逐渐从繁殖中解放了出来，家庭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以前因为社会风气，怕丢脸，担心染上性病或怀孕，人们对所有的非婚性关系存有高度的戒心，越轨者在东西方社会都会受到极端严厉的惩罚。不过哲学思潮中的自由主义把社会舆论的责



备斥为愚昧，揭露道学家内心深处的阴暗狭隘心理，婚外性行为获得了堂而皇之的地位。这里需要区分古代政治家和哲学家与普通大众在禁止婚外性行为上面的不同动机。也许前者利用了大众把妇女作为婚后男子汉的私有财产的想法，在整个社会文化方面构建处女和婚姻贞洁的重要意义，以保持社会不出大的乱子。金赛的《人类男性性行为》一书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四十年代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中的积极虔诚者的“性释放”频率都是最低的，原因是他们都信奉性只为生殖的哲学，禁止手淫，非常看重贞操的价值。出于对人性软弱的深刻理解，传统的基督教文明贬低性与饕餮的地位。也许古代政治家、神学家和哲学家别无选择，只有依靠如此脆弱的习俗和教化来维持社会基本的道德，除非人民素质在整体上有大的飞跃。启蒙思想家对传统妇女道德贬斥得太厉害了，他们从来不会严肃探讨贞洁本身的、非习俗的意义和价值，以至于在今日谁要是再提倡妇女不能有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恋，一定会遭到绝大多数女性的痛骂。受过女权主义熏陶的女性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和男人睡上一觉，就是他的人了。著名的女权主义运动家凯特·米利特曾在1979年到神权政治国家伊朗去解放妇女，她想把她美国的那一套带给“苦难深重”的伊朗妇女。伊朗妇女在街上都必须把脸蒙住，以免被男人看见，这在女权主义运动者看来是极其不人道的，因为在美国，她们都是穿超短裙上街的。结果米利特被伊朗驱逐出境。这一冲突昭示了现代女权运动与宗教之间冲突的本质。从上个世纪以来，性学家们就仅仅从“纯粹科学”的角度来研究性，并且把研究调查成果公之于众，使性学日益成为显学。所谓“纯粹科学”的角度，不过就是把人进当做是一种动物来研究其性行为。美国性学家金赛的名著《人类的性行为》摒弃了新教传统对婚姻的看法，仅从生理的角度把婚姻看做是肉体的机能，他是用研究黄蜂的“纯粹科学”的手段来分析人类的性行为的。约翰逊夫妇在1966年发表

的《人类的性反应》竟然采用现代化的实验技术，用心电图、脑电图来记录性刺激和性反应，用与透明阴茎相连接的摄像机来拍摄性交中阴道的变化。并且通过实验量化证明，女性潜在的性能力远远高于男性，但一直以来女性都受到宗教和道德的约束，很少享受到性高潮的快乐。这就使古代宗教人士和政治家蓄意编造的“压抑女性自由的”谎言再也没有容身之地。六十年代青年的哲学偶像马尔库塞以为一夫一妻制是一种额外压抑；马斯洛把人类的性欲和性行为构建为最基本、最强烈的需求；性心理学家霭理斯提出不生育的性与社会无关，仅是男女二人的事，社会不得干涉。而且，这些性启蒙思想家的观念在任何时候都得到了科学家的响应，避孕科学的极大发展使性神不知鬼不觉。1960年春，首批避孕药投入市场之后，女人就从闺房里走出来了，在性方面，他们也像男人一样了，再也不会受到怀孕的束缚。<sup>①</sup> 在以前的美国，避孕技术是非法的，1832年一个医生查尔斯·诺尔顿博士出版了美国第一部透露避孕秘密的著作——《已婚年轻人的秘密伴侣》（又名《哲学的果实》），阐明了用明矾和某种植物性收敛物质（如绿茶的叶子）做成的混合液体就可以避孕的道理。后来诺尔顿因出售此书而被罚款和判刑。现代人肯定会说，避孕使妇女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不要计划外的怀孕，对妇女更人道。这个说法不错，但是，避孕技术一发展起来，社会就失去了对性的控制。虽然这种控制千百年来都建立在对女人极不公平的基础上，甚至长期靠的是愚众的狭隘阴暗心理。人类在道德和自由之间的平衡很不容易把握。宗教提防的是，有朝一日性一旦摆脱了生殖的沉重负担，变成了一种为了性本身的快感和身体游戏，社会上必然会淫风日盛。性的唯生殖论也许正如尼采所说，

---

<sup>①</sup> 詹姆士·克利夫德：《从嬉皮到雅皮——昔日嬉皮士自述》，李二仕、梅峰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是基督教撒下的弥天大谎，以阻止人们对身体的过分关注。但是到了现代，这个谎言就无法再维持了，因为这个谎言只有可能蒙蔽那些生活在农业社会和初期工业社会这种人口数量有经济价值的社会的民众，一旦科学技术的水平大幅提高，人口太多就会妨碍科技的进步。到了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婴儿死亡率极低、粮食不成问题、医疗水平很高的后工业社会，人口过量就变成了灾难。这个时候再把性等同于生殖就很不合时宜了。这个时候，宗教的教条就不会再产生效应。犹太教、新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只有在农业社会才有可能发展成一种有约束力的民众宗教，追求经济无限增长的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传统宗教伦理被冲垮就是迟早的事。

美国宗教的最尴尬的事情发生在教皇身上。1969年7月29日教皇保罗以题为《关于人类的生命》的一篇7500字的通谕否定了避孕在宗教上的合法性，这个问题他已经反复思考了五年之久。教皇的看法令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天主教徒非常愤怒，有142人联名给他们的大主教管区为首的枢密主教送去了一份抗议书。当这位枢密主教在圣马太总教堂劝说众教徒要服从教会时，教堂里有200人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昂首阔步地走了出去。性享乐需要彻底抛弃宗教，此时已经不再需要遮遮掩掩了，这件事也能够说明基督教在当代社会的尴尬处境。

过去女人们直接从父母的家中嫁给男人，马上就受到丈夫的监管，而她们现在独自住在大学或城市中，又可以去工作挣钱，在结婚前有漫长的自由时光，再没有传统的势力来约束他们的自由。汽车走进了千家万户，男女青年轻而易举就逃脱了小城镇公众的保守视野，把清教伦理甩在了后面。处女膜的修补技术把那些在新婚之夜在床上垫白布的习俗解构了。“只要这事舒服，我就愿意干。”一幅在美国大学生中流行的墙画这样写。在传统社会，一个少女的婚前性行为为社会所不容，当事者往往面临莫大

的压力。而现在的美国，如果是哪个中学生怀孕了，政府会彬彬有礼地发钱给她，请她回去把孩子生下来，这些钱足够这个孩子好好生活了。国家应该把纳税人的钱用于非婚生子的“少女母亲”提供收入、将她们安顿在公寓里的做法，在美国的历史上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于未婚生子，这种政策不仅不惩罚，而且可以说是一种纵容和鼓励，难怪美国会出现那么多的未婚妈妈。

《花花公子》对习俗冲击最大的狠招是，找来拍裸照的姑娘一眼看去并不是夜总会里面的风尘女子，而是你周围的普普通通的邻家女孩，她是面带微笑的女秘书，是空中小姐，是你的同学，是售货员，是护士。杂志上还附有她们小时候的照片，在学校里的生活照，然后才是裸照。姑娘们的名声完全被玷污了。一般的美国少女在以前是不愿意也不敢拍裸照的，但是当五十年代正派姑娘为《花花公子》拍裸照并未被社交界摒弃反而大受欢迎后，《花花公子》的办公室门槛都要被姑娘们踩断了。1963年的时候，《花花公子》编辑部平均每周收到50封年轻妇女的申请书，希望把她们的裸照刊登在它的折叠扉页里。<sup>①</sup>由此可见习俗是很脆弱的，维护它不容易，但败坏起来很快，而且难以恢复。那些先锋艺术家们大批进驻格林尼治村之后，他们的放荡行为和价值观念很快就把这个小地方的传统道德败坏了，当地的年轻人很快就纷纷效仿这些先锋艺术家的行为，保守的人只有远走他乡。艺术家们嘲笑那些意大利和爱尔兰邻居们的政党核心政治和保守的家庭观念以及教育孩子跻身中产阶级的陈腐理念，腐蚀当地人建立在亲属、种族和宗教联系上的社会网络。艺术家们吸引那些当地人的女儿，带来了未婚同居、单身、同性恋和群交的生活。脆弱的习俗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格林尼治村成为全美最开放

---

<sup>①</sup> 罗素·米勒：《男人王国的兴衰——记世界第一色情杂志〈花花公子〉内幕》，海天译，沈阳：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第48~49页。



的地方。和格林尼治村的情况类似，巴黎的左岸、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伦敦索霍区的酒吧，也在六十年代成为先锋艺术家和另类青年的快乐之地。

大学生的口号之一是“要做爱，不要作战”。这是一种被认为是快乐无穷、符合本能的聪明道德。不需要自我克服，善与快乐从来没有以这种奇妙的方式结合，以前所熟悉的善都是带有苦味的。除了性，还伴有大麻、LSD和摇滚，他们乃被“新左派”认为是道德意识最强的大学生。八十年代的性感摇滚巨星麦当娜重复了六十年代大学生的名言：“要会造爱，而不是战争——这就是一切。”<sup>①</sup> 共同的语言显示了他们的共同理想和宣传目标。

据女嬉皮士卡罗莱娜·斯坦蒂斯回忆说，六七十年代简直就是专门的性爱时代，她和一个女友相互比赛男友的数量：“嘿，七十个啦！”“噢，天哪，你超过我三个。”他们还制作一种卡片，上面列着男友的身高、体重、生殖器的长短。<sup>②</sup> 有时她也会有把自己贱卖了的感觉，但是她马上就会调整过来：“如果我是被男人占便宜，那么同时我也占了他们的便宜。”<sup>③</sup> 卡罗莱娜的心态充分体现了妇女解放和性解放的革命成果。二者在很多时候是密不可分。和她睡过觉的男人总共有一百多个，而她的一个女友，十五岁的时候就和五百多个人睡过觉了。“向完全陌生的路人伸出双手，拥抱他们。我喜欢那种共同分享式的道德观……人们都希望和不同的人性交。”而且卡罗莱娜喜欢在半公开的地方和男友性交，在大学的楼梯上，在公共汽车的角落里，或是商店

---

① 米克·圣迈克尔：《麦当娜口述实录》，闫卫建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

② 詹姆士·克利夫德：《从嬉皮到雅皮——昔日嬉皮士自述》，李二仕、梅峰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③ 詹姆士·克利夫德：《从嬉皮到雅皮——昔日嬉皮士自述》，李二仕、梅峰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的门后。<sup>①</sup>也可以了解到，嬉皮士的性观念也和六十年代流行的遮天盖地的民主、反资产阶级正统道德息息相关。卡罗莱娜喜欢的生活方式是，领着失业救济金，背着吉他，到处闲逛的生活，遇到迷路的美国南方小伙子，就和他一起在树丛后做爱。<sup>②</sup>同时性解放也是建立在对六十年代美国经济无限制增长的幻想之上的，那是一个救济金、免费食品券满天飞的时代。人们好像从此以后都脱离了艰苦劳动的束缚，可以像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甚至和任何人发生性关系，简直就是“因为我存在，所以我要性交”。

青年人的性解放也迅速扩散到了三十岁以上的人，也就是那些在五十年代被称作是“沉默的一代”的穿“灰色法兰绒上衣”的中产阶级。他们在五十年代没有能够充分享受自己的青春期，直接从少年就过渡到了成年，现在他们要把这段黄金岁月找回来。当那些五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在十年后回母校参加联谊会时，看到现在的年轻人吃了避孕药就自由同居在一起，很是羡慕。五十年代的大学可没有这么开放和好玩。于是他们也想如年轻人那样好好地享受青春，六十年代是青春的时代。中年人也学着披头士的样子留起了长发，跳其瓦图西舞、滑行舞和村舍乳酪舞，玩飞盘游戏，飙车。美容院也火爆起来了，有的抽脂，有的隆胸，还有的做面部修整手术。白皮肤、中产阶级的已婚男子则热衷于购买色情杂志、光顾按摩院、看色情电影。当然，男女都感兴趣的是通奸和换妻。

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只会造就一批只关心身体的动物，因为在虚无中，唯一可以把握的就是身体了。特雷·伊格尔顿告诫人

---

① 詹姆士·克利夫德：《从嬉皮到雅皮——昔日嬉皮士自述》，李二仕、梅峰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2页。

② 詹姆士·克利夫德：《从嬉皮到雅皮——昔日嬉皮士自述》，李二仕、梅峰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们，在不久的将来，文学批评、文化批评中的身体就会比滑铁卢战场上的尸体还要多。伊格尔顿在《历史的政治、哲学、爱欲》一书中有言：“性话题开始于六十年代，本来是激进政治向它曾经非常遗憾地忽视了的领域拓展的一种行为，但是随着革命的活力逐渐消退，对身体的关注取而代之并越来越突出了。”<sup>①</sup> 六十年代的欧美有阶级斗争问题、种族问题和性问题，然而七八十年代就只有性问题了。七十年代被称之为“唯我的十年”，流行着自我意识的实现，但是自我意识基本上等同于物质和身体，诺曼·梅勒也认为七十年代是一个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皮肤上的时代。金斯伯格这样问道：“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什么才是可以获得的满足？那就是满足他们对爱、对肉体的欲望。”性成为主流社会中产阶级男女的宗教，人们互相形成教堂，就如同厄普代克在许多描写换妻的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格瓦拉让位于拉康和福柯，新的社会准则可以消除对自己身体的恐惧和对自己身体的排斥。没有了精神的人瘫痪在床，“就只剩下身体可以自娱了”。<sup>②</sup> 所有的性活动方式，无论目的是什么，形式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对象是什么，只要在生理上能够实行的，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真是应了金西的名言“唯一不自然的性活动就是不能实行的性活动”。

八十年代随着艾滋病的出现、保守力量撒切尔和里根的相继上台、传统势力的复苏，把人们从六十年代的性解放中拉回了一点。艾滋病刚开始出现于男同性恋的群体之中，而且男同性恋者也是最容易传染艾滋病的，在英国，90%的艾滋病患者都是同性恋者。九十年代中期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最易受艾滋病感染的

---

① 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② 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2~23页。

是25~44岁之间的人群，他们都是在战后出生的人，也是生活方式最放荡的人群，滥交、同性恋、静脉注射毒品使他们成为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在这一年龄人群中，艾滋病成为男性死亡的主要原因和女性死亡的第三大原因。不过，艾滋病的威胁并没有让他们放弃性享乐，而是促使已经尝过禁果的人们选择一些更加夸张但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性体验方式。人们考虑的问题是，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更为安全的性行为而不是回复以前保守的性观念。捆绑、束缚、施虐、受虐、身体的穿刺，等等，开始风行于世。人们更愿意花钱在色情酒吧里看表演以代替实质的肉体关系。九十年代，美国的这类酒吧生意异常兴隆，色情电话服务和网络的色情表演也很受欢迎。

中国自1978年以后也面临着在性方面逐渐开放的现实。1980年中国公布的《婚姻法》中，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第一，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第二，经调解无效。从此，中国人拥有了一系列现在已经很普及的观念：爱情是婚姻的灵魂，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用卫慧的话来形容就是：“时代巨轮滚滚向前，人们在优化组合中丧失的只是旧规范之绳索，得到的是扑头盖脸的自由。”<sup>①</sup>

中国人不仅把爱情作为是婚姻的灵魂，在爱情中，性开始逐渐占据了核心地位。1980年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千百年来东西方社会一直坚持的性只是为了传宗接代的观念崩溃了。从此之后，性不仅是为了生儿育女，把生儿育女和性完全等同是犯法的。生完一个孩子，为什么还要过性生活？用避孕工具来性交，不是寻欢作乐又是什么？于是，渐渐地，有没有快乐（而不是有没有子女）开始成为夫妻衡量自己的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准，甚至

---

<sup>①</sup> 卫慧：《纸戒指》，见“七十年代后”小说选《纸戒指》，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



是唯一标准。夫妻性生活是否和谐在婚姻关系中的地位也越发重要。九十年代以来，因性生活不和谐而导致离婚的案例明显增加，目前约占全国离婚人数的三分之一。<sup>①</sup>

性在中国开始独立发挥与爱情相反的作用，这是性革命的表现之一。据调查，在婚内性生活越频繁、性高潮越多的人，婚外性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反过来也一样，越是有婚外性行为的人，对配偶感情就越淡漠，可是婚内性生活频率和自己获得性高潮的频率就越高。<sup>②</sup> 因此，中国性观念的变革呈现出了以下特点：“异性与生殖的相对分离为基础，以婚姻承认性的价值为起点，以爱情高于婚姻为旗帜，以性爱挣脱爱情为助力。”<sup>③</sup>

避孕与人工流产不仅成了合法的，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了。由于女性没有了对怀孕的恐惧和顾虑，再加上青春期提前，更年期推迟，中国的“80后”一代独生子女女性可能有空前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性生活。

《婚姻法》的出台和独生子女政策是性开放的前奏。“文化大革命”把传统一扫而光，传统的性教育也被破除了。自古以来，东西方的文明社会都极力预防性放纵冲垮社会道德最起码的规范，使国家败亡。防止性放纵的办法主要是以教育和惩罚女性为主的。立法者、教育者和政治家们都知道，要教育和防止男性抵御女性的性诱惑是极端困难的，男人不会怀孕，不会承担生殖的痛苦。抵制性的泛滥的唯一办法就是教育和控制女性，让她们对非婚姻的性怀有极大恐惧。母亲和姐姐言传身教，还让整个小镇

---

① 庄平、毕伟玉：《当代社会问题与青少年教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

② 潘绥铭、(美)白维廉、王爱丽、(美)劳曼：《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 and 性关系》，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19页。

③ 潘绥铭、(美)白维廉、王爱丽、(美)劳曼：《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 and 性关系》，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20页。

上的三姑六婆严厉的“口碑”来监督他们，婚后又受到丈夫的严格管束。预防性泛滥的最根本办法是，严禁人工避孕与流产，通过产生私生子的恐慌来防止性快乐与生殖相分离，也就是通过给已婚女子带来巨大麻烦和恐惧或者给未婚女性与“通奸者”带来巨大的耻辱来发动女人来制止约束男性的性行为。这种办法对女性来说也许是不公平的，甚至“不人道”，也是最受女权主义者的猛烈批判的。

以前的传统文化都是靠法制来控制性行为，唯道德论，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夜闯民宅“捉奸拿双”。可是随着现代法治力量的兴起，私人民宅是要搜查证的，因此“居民委员会”这样的基层组织以及其惯用手段就无法施展了。人口大规模的流动也是性革命的基础，农民大批进入城市，城里人也走出大杂院和单位家属区，住进了“门一关就自由”的单元房。以前的中国人从没有这样独处过。这是性革命首先发生在城市的主要原因。<sup>①</sup>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社会控制逐步放松。单位制度瓦解，结婚无须再开具单位证明。而随着城市经济的大幅度增长，国内人口的流动急速加剧，居住方式也随即发生变化，形成了所谓的“陌生人社会”。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人们的私人空间已经相当大并且独立，人们对彼此的生活互不了解也互不干涉。

用羊肠子等物再造处女膜在六十年代的日本兴起过一阵。那时日本的性革命刚开始，还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期，许多既要性自由又要贞洁的女性就普遍使用这种处女膜再生术。大约从1994年起，这种技术传到了中国，越来越兴盛。这是不是说明中国已处于性解放的预备阶段，贞操观念仍有很大的势力，但已挡不住年轻人品尝禁果的热情了？在中国，形成了一种“只要这

---

<sup>①</sup> 潘绥铭、(美)白维廉、王爱丽、(美)劳曼：《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 and 性关系》，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个膜没有破，其他什么性活动都可以做”的观念。据1991、1995、1997和2001年全国大学生做的调查显示，真正处女膜破裂的只有10%左右，但发生过种种不包括接吻在内的爱抚行为的却高达30%。<sup>①</sup>中日两国都是传统上特别注重女性贞操的国度，这种处女膜技术在当代美国就不会有市场，因为他们不稀罕处女，反而认为一个女孩成年后仍是处女是没有魅力的表现。这就是处女膜修补技术在中国兴起而不会在美国流行的原因。

目前，上海女性的婚前性行为已经达到了69%，广州女性更是高达86%。仅婚前性行为这一项，上海和广州的女性并不输与西方。1974年的美国，25岁以下有97%的男性和81%的女性都有过婚前性行为。法国1972年的调查表明，到29岁，有75%的男性和55%的女性有婚前性行为。<sup>②</sup>据潘绥铭统计，2000年，国人多个性伴侣的发生率仅为16.8%，到2006年，发生率已达25.3%，就是说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性伴侣。

对于婚前性行为，李银河认为至少有三种规范：第一种是传统的规范，坚决反对任何婚前性行为；第二种是浪漫主义的性规范，提倡只要有爱情，就可以接受性，而没有爱情的性则是很低级的；第三种属于是自由主义的性规范，信奉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处理自己的身体，因此婚前性行为不受任何约束，只要自己愿意。<sup>③</sup>据李银河的判断，中国的现状是，正在从第一种规范经由第二种规范向第三种规范发展。信奉第一种规范的快要灭绝，而

---

① 潘绥铭、(美)白维廉、王爱丽、(美)劳曼：《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 and 性关系》，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12页。

② 李银河：《李银河说性》，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7~38页。

③ 李银河：《李银河说性》，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最终会发展到自由主义的规范上面去。<sup>①</sup>不可否认的是，现在青年们的婚前性规范已经被李银河说中了。浪漫主义的第二种规范正在被抛弃，逃避爱，追求身体本身的快乐已经成为了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只是为了爱的性会被嘲笑，会被视为老古董，更没有上一代人的绝对抵制婚前性行为的固执态度。传统保守的性道德在偏远的农村也没有生存的地方，因为农村也是家家户户都通了电视，在乡镇上还有网吧，里面全是清一色的少男少女，他们的父母都去大城市打工去了。而网吧、手机普及的地方，往往就是一夜情适合生长的地方。

李银河认为：“搞性的研究有点像当年革命者搞地下工作，有一点冒险犯难的挑战感觉；有一点越轨犯规的淘气感觉；外加一点先锋前卫的叛逆感觉。”<sup>②</sup>这应该是李银河不遗余力地提倡性解放的根本原因，在她那里，就像是在欧美六十年代的学生那里一样，性既是一种革命，又是对意识形态的挑战，是时髦的叛逆。她的理想是，看到中国的十三亿人民吃饱了，又满足性的需要，真正符合古训“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sup>③</sup>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已经出现了数量不少的换妻聚会、虐恋俱乐部和一夜情网站，裸聊大为流行。现在中国的父母又多了一个任务，就是防止儿女变成同性恋者。

轰动 2008 年的“艳照门事件”就是性革命的一个明显标志。一项抽样调查显示，香港约有 4 成中小学生在接触过“艳照门”事件中的色情照片，而在广州中小学生在中，这个比例还要更高。“90 后”一代从小就是吃“饲料猪”“饲料鸡”长大的，因此性成熟也比前人大大提前了。有些 13 岁以下的小学生，身高都长

① 李银河：《李银河说性》，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 年版，第 40 页。

② 李银河：《李银河说性》，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0 页。

③ 李银河：《李银河说性》，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4 页。



到了170多厘米，不少小学女生看起来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这种情况很类似于美国，以前的美国姑娘17岁才会有月经初潮，现在12岁就有了，原因就是吃了大量含有激素的肉制品。

八十年代当西方正陷入性解放的噩梦——艾滋病而人人自危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却正兴高采烈地开放生活方式。中国人知道艾滋病，已经是九十年代的事了。

年轻的美女作家纷纷以性开放的姿态亮相登台。卫慧自述：“我热衷于一切时尚而且前卫的食物，也有足够的兴趣和能力，可能的话，我努力做一条虫子，像钻进苹果一样钻进年轻孩子的时髦头脑里，钻进欲望一代的躁动而疯狂的下肢，我为他们歌唱。”<sup>①</sup>这与当年麦当娜的想法何其相似：“我想我代表一切在她们的教育中不许做的事，所以我可能会给她们提供一点鼓励。”<sup>②</sup>现在全世界的发达国家的城市里面，不满街都是麦当娜、辣妹和卫慧的弟子们？

在“90后”作家春树眼中，理想的性爱关系应效仿美国的自由性爱俱乐部，每个人的性都是自由的，只要不攻击他人，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而纯洁是狗屎。<sup>③</sup>再看一度最红火的作家木子美的自述：

我过着很自得的生活，  
有一份可以把自己弄得好像很忙的工作，  
工作之余又有非常人性化的爱好——做爱  
而且做爱对象有得选择，有得更换，资源充足，

---

① 卫慧创作谈：《公共的玫瑰》，见《纸戒指》，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页。

② 米克·圣迈克尔：《麦当娜口述实录》，闫卫建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③ 春树：《北京娃娃》，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页。

我不需要对他们负任何责任，  
也不需要付出感情，  
更不会对我造成干扰，像一张 CD，想听就听，不  
想听就一声不出。<sup>①</sup>

木子美说得非常坦诚，现在许多白领过的就是这种生活，工作和性，是他们最重要的部分，而且摆脱了传统道德的束缚。“我喜欢的词就是褒义词，比如淫乱，放荡；我不喜欢的词就是贬义词，比如忠贞——这个词充满虚伪。”<sup>②</sup>有人把木子美说成是女的切·格瓦拉，站在女性的角度，消费了一把男色。她的爱就像一把米，东撒一把，西撒一把。木子美像到超市去买一瓶水那样到酒吧、网络、party、office，轻易地就找到一个男人，然后，一饮而尽，再把空壳丢进垃圾桶。年轻人在享乐，性学家李银河对此所抱的态度是：“观察在如此短暂的历史时期之内，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道德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人们行为模式所发生的如此剧烈的变迁，应当说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sup>③</sup>

## 五、对弱者的同情和对第三世界 无产阶级领袖的崇拜

六十年代的学生们出于一种逆反心理，对世界上敢于和美国作对的人肃然起敬。1966年，英译本的《毛泽东语录》在美国的大学广为流行。对弱者的同情要超过一切价值，英雄、圣徒、艺术家、政治家都比不上一个一无所长、同情黑人和妇女的大学

---

① 木子美《遗情书》，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② 木子美《遗情书》，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页。

③ 木子美《遗情书》，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页。



生。他们也幻想和毛泽东、格瓦拉、胡志明和卡斯特罗这些伟大的领袖一样，同情弱者。他们专门为美国和第三世界国家中受苦受难的妇女、黑人、无产阶级辩护，这些人可能是不敌视他们的优越感、在想象中可能会接受他们领导的人。你看，妇女受到了几千年男权文化的压迫！农民和工人被地主和资本家剥削得来只剩下皮包骨头！这些在政治上有雄心的大学生最不喜欢美国的中产阶级——教授、白领、蓝领、农场主——他们不需要学生领袖的同情，并且认为自己和学生是平等的，甚至常和学生们唱反调。这也许是学生领袖对这些弱势群体有不正常的、令人吃惊的同情心的原因。

任何民主社会，都意图消除任何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感觉，不管它是世俗的还是自然的。然而在任何社会中，都有一些不甘平等的青年，拥有极大的政治抱负，急切地想实现自己的统治的天赋。在基督教出现以前的社会里，有政治天赋的青年可以不带罪恶感地希望甚至直接去追求政治上的荣光。基督教部分地改变了这一切。在上帝和被诅咒的傲慢面前，政治上的野心受到了压制。现代西方政治哲学使政治平等成为西方国家唯一合理的政治制度。在美国那样的实行联邦制的国家里，国家的绝对声望、组织构造和稳定性使这些野心勃勃的青年没有多少机会。

尽管得不到支持，人类心灵中的这个部分还存活着，偶尔会以欺骗的形式展示出来。在美国大学生的运动中，便以同情弱者的表面民主形式展现出来，以此获得政治上的筹码。“暴虐的冲动掩护在民主式的怜悯面具之后，并且以热爱平等的名义追求显赫”。<sup>①</sup>

---

<sup>①</sup> 艾伦·布卢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缪青、宋丽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353页。

## 小 结

摇滚乐是六十年代的集团宗教，是性和毒品的枢纽，药物、性欲、音乐和原始魔力合起来成为一种宗教的崇拜仪式与教育工具。学生们以浅薄的大杂烩的形式把印度教、禅宗、马克思、红宝书、瑜伽、甘地、《易经》、卡斯特罗、胡志明、摇滚乐、格瓦拉、大麻混合在一起，成为波西米亚风格和落拓不羁的标志。

禅宗和吸毒、幻觉剂、群交、黑灯舞会、摇滚一样，都可以给青年们带来类似经过长时期的艰苦磨炼、因要求灵性而无法广泛推广的哲学和宗教的极乐快感。金斯伯格把吸食 LSD 的经历比作是，“如同华兹华斯描述的自然统一，如同性交流带来的完全自我，如同托尔斯泰笔下视线越过拿破仑直望向天空的垂死士兵，如同失去童贞后出现的陌生世界，如同在溺水时眼前闪过的一生的画面”。<sup>①</sup>平等的理念要求每一个人都可以不加区别地享受高峰体验，而无视绝大部分人的生命之平庸、懒惰和注定的机会不公，以只有甜味没有苦涩的廉价快乐予以代替。这里没有伟大的战争，不朽的作品，荡气回肠的爱情，宗教精神的超越和哲学推理的自由。以前的杰出人物在历尽千辛万苦爬上人迹罕至的最高山峰之后，方能见到世间罕有的奇景，畅快地呼吸夹杂着雪的寒冷又清新的空气，他们似乎看到了神在宇宙万物中的体现，扩大的自我仿佛成为神抑或自然的一部分……1991年，大卫·克罗南伯格把《赤裸的午餐》拍成了电影。影片中李的妻子琼注射“杀虫粉”之后抛出的那句“像卡夫卡那样 high”，几乎是全片对药物最明显的一处描述了。可是他们的“high”和卡夫卡的

---

<sup>①</sup> 比尔·摩根编：《金斯伯格文选——深思熟虑的散文》，文楚安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写作升华从根本上是不一样的，巴勒斯的《赤裸的午餐》与卡夫卡的作品几乎没有可比性。现在的垮掉青年不会再去攀登人类精神的高峰，也无力承担伟大作品将要完成之前的混沌。他们脸色苍白，枯瘦如柴的胳膊上满是撒旦留下的针眼，在永远昏暗的地窖里，横七竖八地躺着躯体。他们甚至不用吃饭，用互相的身体和毒品就可以达到极乐世界，通过分离下丘脑这个心理能量和力比多的中心，使人摆脱了全部生命过程的重负。在药物作用下随着摇滚身体摇摆，眼光虚无、迷离，像是一群真正的魔鬼。在他们戒毒后，也难以有生活的热情和宏大的希望，生活失去了缤纷的色彩，因为他们再也找不到更强烈的快感的标杆。后现代的感觉就像中国作家卫慧在《说吧说吧》中的描述：女主人公同一个酒吧邂逅的男人一起躺在一只绿色而奢华的大浴缸里，往对方身上撩水。没有挑逗，也没有燃烧，什么也没有。平静而疲倦地给对方洗澡，像两个没有性别的人，这是纵欲之后生命感觉的枯萎。<sup>①</sup>

---

<sup>①</sup> 卫慧：《水中的处女》，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 第六章 六十年代的创痛

相对主义把以前一直上不了台面的、低贱的、歪门邪道的东西都捧红了。因为各有各的生存理由，所以一切都是合理的。进一步说凡是不被社会所容的、遭到了压抑的、处于边缘的、另类的，肯定就都是好东西。相对主义使文化获得了蓬勃发展、喜气洋洋的局面，就连虐恋、乱伦和换妻也受到了文化专家和某些女权主义者的大力歌颂。各种处于不利地位的集团，不管他们共同的特性是民族血统、种族、性别还是特殊的爱好，都开始重新为自己定位，并向社会的其他人群提出自己的要求。黑人、激进分子、女权主义者、其他所有感觉一贯受到社会欺骗的人都蠢蠢欲动。

六十年代过后，青年犯罪已经成为了全球的严重问题。这是六十年代青年数量的剧增所带来的力量感以及对犯罪的歌颂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 一、女权主义运动

六十年代末，当以男性为主的学生运动、反文化的嬉皮士运动都失去锋芒的时候，女权主义运动却蓬勃地发展了起来，并且至今不衰。六十年代的学生造反运动对既存秩序和传统的攻击，有助于形成反抗的气氛和思想结构，提供榜样、经验和战术。那些读过大学的妇女们可以把这些经验也运用到妇女的组织上来。



但是，造反运动和反文化运动只是开了一个头，并没有把妇女的问题提出来。这就是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地发展在六十年代各种以男性为主导的运动之后的原因。现在女权主义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开来，年轻女孩往往是其积极响应者，她们一听到女权主义的理论马上就心领神会，并且迅速把它转化为时尚、性感、符合社会流行趋势的符号来接受。现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报纸杂志和网站都在倡导“女孩力量”，提供让女性更快乐的建议。

由于男女平等的风气，更多的妇女染上了男人的恶习：当众酗酒、少年犯罪、聚众殴打。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外表端庄的妇女几乎已经绝迹了，她们的下流话让男孩都不好意思。女人们也对男人进行性骚扰，男妓应运而生，夜总会里甚至有男人跳脱衣舞和肚皮舞供女人取乐。于是平等使罪恶一下子就翻了一番。中国八十年代流行“女强人”，九十年代流行“坏女孩”。“女强人”的出现是女人在追求男女平等方面在事业能力上的一次社会解放，“坏女孩”的出现则是女人在性和张扬个性方面追求男女平等的一次自我解放。新女孩的口头禅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我无所谓！》——这是张惠妹的一首主打歌。

二十一世纪流行的已经不再是“女强人”和“坏女孩”，网络视频中流传着少女暴力和色情，拍裸体写真并传到网上，一夜情，裸聊，网婚，摇头丸……如今中国网络上频繁出现少女群殴少女、少女当街侮辱另一少女的视频，其残忍性，恐怕堪与传统的男性暴力犯罪相提并论。

法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著名口号——“女人万岁！不必再一本正经！”——差不多已经是全世界青年女性的信仰。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女人应回归自己的身体，掌握、安排、充分使用它……她们在堕胎和避孕上的口号是：“不能安置自己的身体和

不能决定如何运转者乃奴隶。”<sup>①</sup>这一口号是对传统的颠覆——不能安置自己精神和不能决定如何运转者乃奴隶。这是古希腊哲学和《圣经》的共同传统。它们共同认为，不能把握安置自己的精神，又怎么能决定肉体呢？哪里有属于奴隶的自由？至多是听从肉体的贪婪规律罢了。

在十九世纪女权主义运动刚兴起的时候，在实现男女平等方面的主张是规范男性的欲望、提倡男性的纯洁，是想要让男人和女人都变好，而不是都变坏。十九世纪末，英国女性主义者霍普金斯领导的白十字军运动提倡：尊重女性，尽力保护她们不受罪恶的侵害；尽力避免粗俗的用语和玩笑；在维护贞洁法律方面坚持男女平等；保持自己的纯洁。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社会运动中，女性团体和宗教界人士联合起来，反对卖淫，反对社会不道德现象。<sup>②</sup>可见十九世纪的妇女运动的主流还是纯洁和提倡道德的，不过随着二十世纪宗教的进一步衰落和时代风气的巨变，妇女运动的方向也发生了转变。二十世纪的女权主义运动主流是提倡抛弃宗教、提倡肉体快乐、反对道德和家庭约束。

二十世纪尤其是后半期的女权运动一般是和性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女权运动号召女人不要羞涩，应大胆享受性快乐。其实性革命的基础就是女人在性观念上的开放。正如李银河所说：“一个社会女性的权力与男性的权力越接近，女性就享有越多的性自由；一个社会中女性权力越小，她们的性行为就越受到禁制。因此，女性的性自由是女性权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女性主义性政治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扩大女性的性自由权利。”<sup>③</sup>这段话非常清

---

<sup>①</sup> 让-皮埃尔·勒·戈夫：《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胡尧步、韦东、高璐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页。

<sup>②</sup> 十九世纪的女性主义运动，见李银河：《李银河说性》，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

<sup>③</sup> 李银河：《李银河说性》，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页。



楚地说明了妇女运动与性解放之间的密切关系。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女性运动在倾向上有如此巨大的不同，主要是因为十九世纪的宗教和传统道德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要强大得多，十九世纪的女性还不是反宗教的，也不是一味提倡身体快乐。二十世纪现代性的危机已经发展到了顶峰，身体快感甚至成为衡量女性地位的最主要标准。不过，由于性解放反对以前的保守和节制与温文尔雅的传统，男人和女人都不再讲究这些，因此对女性的保护就减弱了。在色情文学、色情电影等这些色情传媒对人的想象力产生的巨大作用下，女性的地位似乎更加屈辱，生活中的女性不得不迎合被这些色情传媒塑造的性伙伴的邪恶想象。社会上的性犯罪也受到了这些思想的鼓励，或者说，长期浸淫于色情文化的男性受到过量的“力比多”的驱使，即使明知自己会受到法律的严惩，仍然要去实施性犯罪。还有就是，由于色情文化甚至在大众文化中发展出了一种受虐美学，很多新女性也喜欢上了这种色情文化，并且乐于在生活中实践，这也是“虐恋”大行其道的原因。种种迹象表明，很多女性虽然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但是尊严却比以前更低了。女权运动的著名口号“要性高潮，不要性虐待”落实得并不好。

嬉皮士的口号强调“爱与和平”，特别彰显男女平等，但是实际上却大多视女嬉皮士为玩物。在许多嬉皮士的群居村中，女人们幻想的解放并没有实现，她们在劳动分工上负责烧煮、清洁和洗刷，还要从事农田劳动，而男人们则在一旁清谈。对于那些亲身实践性解放的女性，嬉皮士可以与她同居，然后突然离开她，或许会再度回来，而她则依然接受他。她从不生气抱怨，并且包揽所有的家务。此类女性包括献身于摇滚明星们的“果肉皮”，出现于女权主义运动高涨的六十年代，让人寻思。一方面，她们冲破传统伦理和道德的束缚，解放自己的身体；另一方面，她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把从旧道德中解放出来的身体又献身于五

花八门的“艺术家”和“革命家”。其中的大多数最终成为时代流变的傀儡和玩偶。这种情况也成为女性解放的一种常态，时下闹得沸沸扬扬的陈冠希和那些女明星也是这种情形，人数众多的疯狂女歌迷就更是如此了。她们充分印证了解放身体并不能等同于解放心智、“不能安置自己精神和不能决定如何运转者乃奴隶”的论断。

有些嬉皮士群居村最后发展成了一个家长制的大家庭，这个家长一般都是男的，通过神秘宗教和个人魅力主宰着女嬉皮士。曼森家族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许多抱有新观念的年轻女孩从家庭里逃出来，到了曼森的群居村里，曼森首先做的工作就是“解编”这些孩子，以消除家长、学术、社会对他们的影响。甚至还要求她们抛弃自我，忘记过去的一切约束。然后，再接受曼森的重编，成为忠实的奴隶。“曼森家族”的女孩们很多都是从很有钱的家庭里面跑出来的，但是却心甘情愿听从曼森的命令去捡超市扔的蔬菜、鸡蛋和过期的奶酪，甚至上街要饭，偷东西，还要服从曼森的一切命令，包括杀人。<sup>①</sup> 在学生组织 SDS 和民权运动中，也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SDS 前活动家马吉·皮厄西认为那些学生领袖是在利用妇女，他们只安排妇女做打字、登记、做饭的工作，还有就是提供性服务。<sup>②</sup>

后来的女权主义普遍谴责这些男人掌权的组织。她们倾向于独立于男性自己办组织，甚至激进地认为凡是由理性和秩序控制的组织就是有男性法西斯气质的。在她们的会场，众多妇女围坐在一起，没有主次先后之分，畅所欲言，激烈控诉男性霸权。结果最后就是比谁的嗓门大，因为根本就听不清。她们大闹 1968

---

<sup>①</sup> 陈昌文、吕登山、倪云鸽：《曼森案件纪实——一个嬉皮士家族的命运》，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sup>②</sup> 塔里克·阿里、苏珊·沃特金斯：《1968年反叛的年代》，范昌龙、李宏、王彦兴、李尚杰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89~90页。



年的亚特兰大“美国小姐”选美现场，大喊：“要爱，不要做妓女！”在电视直播中突然发出恐怖的尖叫，一副写着“妇女解放”的大旗从楼厅旗杆上挂了下来。女权主义者认为选美活动选出的美女是“没有头脑、只供泄欲”的工具形象。选美还是种族主义的，因为没有黑人妇女参加。获胜的美女被派到越南去慰问部队，也可以帮助赞助商把东西卖出去。因此，选美大会集中了对女性的压迫、种族主义、帝国军事主义和资本主义所有的弊端。所以她们决定要集体抗议选美。她们还把所有象征妇女驯顺和卑谦的东西都丢进了垃圾，包括办公室的速记本，干家务的抹布以及假睫毛和装有衬垫的胸罩。这带有六十年代典型的狂欢特征。后来的女权主义者组成的团体不仅致力于消除男权，也要进一步消除性别区别本身。于是，同性恋、双性恋、泛性恋都普遍得到了提倡。可以说，性解放的第二次浪潮正是女权主义者发起的，它把性革命推向纵深发展。他们激进地反对男性，却并不提倡禁欲主义。反而是主张打破一切禁忌，最大限度地解放身体。

许多女人因为反对男性而走向同性恋，不过，在两个女人的同性恋中，也总是一个扮演男角，另一个扮女角，而那个扮男角的女性情人往往有比男性更强烈的占有欲和控制欲。

女权主义论是伴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女权运动的高涨而发展起来的，迅速扩展到了全球，成为世界范围内文学评论的主流之一。八十年代初女权主义文论传入我国，现在已经是许多重点大学中很受欢迎的一门固定学科了。法国女权批评家艾莱娜·西苏对中国女性写作的影响非常大，西苏的观点在许多女作家中已成为常识，即女性的写作就是要让人们听到身体的歌唱。简而言之，就是身体写作。该理论认为，写作不仅能使女性的身体产生快感，而且还能激起反对男权专制的力量。在菲勒斯中心社会里，妇女没有自己的语言，她只有身体，因此，“身体写作”就回到了没有被菲勒斯中心的象征秩序所污染的前俄狄浦斯的想

象界。在该理论的影响下，陈染、林白的身体写作开始兴起，接着是卫慧，然后是木子美。“用身体检阅男人，用皮肤思考”是她们共同的信念。无疑，女性主义者提倡的“身体写作”是书商发财、作者成名的最佳途径。

## 二、种族问题

六十年代大学争取种族平等运动的特点是，要求更多的黑人学生、教授和行政管理人员，要求设置更多的黑人历史和文化课程以及课外自修，为了显示其独特性，要求在学校里重新设置单独餐室和社交活动设施。

美国的大学为了证明自己是不会歧视黑人的，破格录取了很多特贫黑人学生。可是由于他们不是按照正常的分数考进来的，就难以理解授课的内容。学校面临的困境是：要么让大多数人不及格，要么让他们及格。怎样解决这个困境呢？办法是设立黑人研究、黑人英语等黑人专修科。设立这些课程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是，白人大学讲的传统内容都是支持白人神话的，黑人大学生之所以成绩不好，不是因为他们坐不住，好吃懒做，而是因为他们被迫模仿白人文化。知识的相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这种说法的理论支撑。这样黑人大学生就容易及格了。在康奈尔大学，当黑人学生知道他们能够胁迫学校、又知道他们是可以决定办什么教育的谈判伙伴时，情况就比较麻烦了，校方不得不制定出各种安抚办法。比如说，不管怎么样，每年都要招齐数量巨大的黑人学生，招聘老师也要考虑一定比例的黑人，还要建立让黑人发泄不满和委屈的组织。<sup>①</sup>

<sup>①</sup> 艾伦·布卢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缪青、宋丽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3~96页。



《一九〇〇年以后的美国史》的作者阿瑟·林克和威廉·卡顿很袒护六十年代的学生和少数民族的造反运动，但他们还是承认，大学为了息事宁人，减少了对黑人学生的要求，实行一种及格不及格无所谓评分制度，开设了很多学术价值未定的“特殊”课程，等等。这严重损害了关于高等教育智育的信念，使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有明显的下降。美国大学的大扩招使文凭贬值得很厉害，教育程度与工资之间的比率急剧下降。美国大学似乎成了吸毒的、性生活糜烂的、性倒错的、疯狂和无鉴别能力的造反的人的庇护所。家长、校友、州和联邦的立法者以及富裕捐献人士对这样的大学不再慷慨解囊。<sup>①</sup>

许多资产阶级自由派以及他们的大学生子女虽然在六七十年代吸毒、滥交、周游世界，不过他们仍受到残存的资产阶级传统道德的保护，如工作、敬业、雄心、竞争和远见，等等。七十年代的“雅皮士”学会了把六十年代的嬉戏与传统的工作伦理调和起来，照样是社会的成功人士。而黑人和许多底层穷人却没有这些品质。他们之所以长期在“底层”，主要是一种文化状态而不是经济条件，是一种心境和生活方式，是一种道德和精神上的贫穷，这种贫穷可以世代相传。这类穷人往往好吃懒做，虚荣心极强，不能忍受低薪的工作，不习惯节制自己的欲望而有所储蓄，也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雄心。一贯享受政府福利的人一般没有抓住机会的内在动力，他们向子女传授一套自暴自弃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往往三四代人都重复着辍学、不工作、依赖福利、犯罪、吸毒的命运。运动的高潮在七十年代就过去了，可是他们还沉迷于其中，随着国内经济状况的恶化，保守政策的兴起，福利救助的缩减，他们的情况比五十年代更加悲惨。

---

<sup>①</sup> 阿瑟·林克和威廉·卡顿：《一九〇〇年以后的美国史》，刘绪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80~381页。

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劳动的黑人、白人比例是一样的，但到了全民福利和“文化革命”的六十年代，黑人不劳动而获利的速度猛增了。到七十年代晚期，黑人工作的比例要比白人低8.4%，16~24岁的年轻人中，黑人、白人工作比例的差距更是达到了15.4%。即使是到了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八十年代，黑人工作的比例也未上升。<sup>①</sup>许多左派为黑人这样辩护：黑人工作比例的下降是因为工作机会的不足和种族歧视造成的。这种说法难以成立，为何黑人大规模的不工作出现在经济繁荣、工作机会充足的六十年代？这也正是民权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废除了种族隔离和招工上的歧视，怎么黑人反而不工作了？这无疑是六十年代的福利政策和文化摧毁了黑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工作改变命运的心理。他们宁肯偷和抢，贩卖毒品，也不肯上班。其中一个原因是，六十年代整个社会对不劳而获的靠福利生活的人表达了太多的怜悯与同情，赋予了他们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神圣地位，甚至将穷人的状况作为整个社会公正的标准，而不是综合国家财富、自由、品德、艺术成就和真正的民主来评估。人人都可以不劳而获，低薪但正派的穷人被流行文化贬为“没有出息的人”。另一个原因是，民权运动过分渲染的白人罪行使黑人的牺牲成了榨取利益的工具，黑人得到了一种作为团体的集体力量感，他们喜欢集体抗议和骚乱。不过他们仍面临着许多必须依靠自己去面对的真实问题，比如说工作。已经对他们开放的主流社会会基于个人的优点或缺点来决定和他们相处的态度。这样造成的对黑人的拒绝就比因肤色的拒绝要正常和深刻得多，也对黑人的心理造成了更大的打击。出于这种担心和自我保护，黑人往往会抢先拒绝白人。这也是他们不工作的一个原因。

---

<sup>①</sup> 麦隆·马格尼特：《梦想与梦魇——六十年代给下层阶级留下的遗产》，北京：文津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1989年6~7月的调查结果显示,平均每四个黑人成年男子中就有一个在坐牢或缓刑,1991年每天在华盛顿都有41%的18~35岁的黑人要么在监狱里,要么在缓刑或假释中,要么在等待庭审,要么被警察追捕。<sup>①</sup>这也决定了他们的孩子和女人的悲惨命运,可能又要延续生活的混乱和贫穷。

1950年,大约有六分之一的黑人孩子是非婚生子,到了1981年,数字是57%,而到了1989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三分之二。许多母亲还是十几岁的孩子。八十年代末,当时年近三十一岁的凯文·沃特金斯对记者炫耀说,他自己和4个女人生下了19个孩子,其中两个女人带着9个孩子跟他一起生活在一个福利院里。<sup>②</sup>当然,这里面带着一种极端荒唐的性质,他和他的女人,还有养他的政府,无疑都是非常愚蠢的。政府的法律有漏洞,单亲母亲生得越多,她所享有的社会福利享受金也会随着孩子数目而增加。而且十三岁以上的女孩怀孕就可以享受成人的福利待遇了,并且可以合法退学。孩子的父亲也不会受到惩罚,他跑了就不必支付孩子的抚养费。然而这种情况在实行普遍福利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是非常常见的。英国的一对巴基斯坦移民夫妇生了11个孩子,全部靠社会福利,他们夫妇都不去上班。许多人只要说自己有“慢性疲劳综合征”“腰酸背疼”,就可以领病残救济,大白天喝啤酒。可以说,整个欧洲都背上了沉重的福利负担,英国的福利开支占GDP比例的21%,意大利为24%,德国27%,法国29%,丹麦28%。<sup>③</sup>

只有现代社会才会出现那么多的私生子,这在古代社会是不

---

① 麦隆·马格尼特:《梦想与梦魇——六十年代给下层阶级留下的遗产》,北京:文津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② 麦隆·马格尼特:《梦想与梦魇——六十年代给下层阶级留下的遗产》,北京:文津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③ 刘瑜:《福利国家的限度》,《南方周末》2008年7月31日。



可想象的。他们长大后对社会又会产生巨大的威胁。因此低素质的人群一代代地重复着混乱和贫穷的命运，重复着无节制的性、疾病、暴力、毒品和福利……

虽然大量的白人和工业在六十年代前迁到了郊区，但是，在黑人社区里，还有少量的白人。他们往往控制着黑人社区的政治、经济等资源。1964—1968年的种族冲突使这些白人损失巨大。在冲突中，他们的财产是黑人攻击的主要目标。所以在冲突之后，这部分白人也迁到郊区去了。白人零售商不敢再在黑人社区经营，白人房东舍弃了被烧毁的房子。比如说在底特律骚乱之后，白人纷纷弃家逃往郊区，底特律逐渐变成一个黑人占绝大多数、黑人掌握其政治权力的城市。1967年，在夏天骚乱过后的不到半年的时间里，6.7万人离开了底特律，1965年达8万人，1969年为4.6万人。1960—1980年间，底特律的白人由超过110万减少到36万，少了差不多三分之二。<sup>①</sup>在20年的时间里，底特律由一个原本白人为主的城市变为一个黑人占多数的城市。1990年的时候，底特律大多市区中每10个白人中有9个都居住在郊区。底特律流失了大量人口。随着这些白人的外迁，他们掌握的经济资源也离开了黑人社区，加速了黑人社区的衰败。九十年代的底特律是一个被繁荣富裕的郊区包围着的贫穷的孤岛，拥有一个巨大的黑色、贫穷、犯罪的核心，这些地区被主要由白人组成的高收入的郊区所包围。

此外，黑人中产阶级也不敢再在黑人聚居区住下去了，老婆和孩子的安全完全得不到保障。这些进入白人郊区的黑人中上层比白人中产阶级更了解他们贫穷的黑人弟兄，也就实施了比白人更严厉的抵制措施。禁止黑人中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的家庭进

---

<sup>①</sup> 见杨自保，华东师范大学2006硕士论文《论20世纪60年代美国城市危机》，第58页，<http://lsg.cnki.net/grid20/>。



人，目的是消除他们对自己生活方式和住房财产方面构成的威胁。他们要把自己和家人同好吃懒做、把抢劫和强奸看做是自己的神圣权利的黑人隔离开来。

### 三、犯罪问题

程巍认为，六十年代学生造反运动较为狡猾的地方在于，它有效地利用了民主社会在非极端境况下法不责众的执法宽严度。青年以群体的方式集体侵犯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但是严格说来又没怎么犯法，即使是犯法，也只是犯了那些拘留几天几个月的小法。当时严重刑事犯罪的多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sup>①</sup>

暴力犯罪数字在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间每年增长10%，谋杀事件在这十年间从9000起上升到了15700起。报案的强奸事件从1967年的15100起上升到了1977年的63000起，抢劫案在1965—1970的五年中每年增加18%。在1960年以后的15年中，严重犯罪行为上升了232%。在逮捕人数中，几乎有半数是在14~24岁之间的。他们在恶性犯罪被捕的人数中占65%，虽然这个年龄段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仅为15%。与25岁以上的人比较，这个年龄组的杀人犯要多出一倍，暴力强奸要多出4倍，抢劫犯多5倍，盗窃犯多八倍。美国的严重犯罪最多的是18岁的人。<sup>②</sup>

1970年的时候，一个出生并成长于大城市的孩子，被人谋杀的几率远远超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士兵在战场上牺牲的几率。一名年轻黑人在贫民窟被杀的概率大于一名士兵在越南

---

<sup>①</sup> 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65~366页。

<sup>②</sup> 兰登·琼斯：《美国坎坷的一代——生育高潮后的美国社会》，贾蔼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121页。

丛林中被杀的概率。贫民窟简直是自由射击区，屋顶上有许多狙击手，如果再加上几块稻田，就像是越南战场了。都市里被犯罪吓坏了的年轻人对老人们回忆起的四五十年代的晚上坐在公园里避暑纳凉的往事完全不相信。“怪蛇腹中的猪”继续在蛇腹中向前拱，只是它这回是使监狱而不是产房或学校拥挤起来了。当这一代人过了犯罪率高的青春期后，犯罪就少了，他们已人到中年，不再从事危险的暴力活动，但是贪污却来了，侵吞公款的人从银行弄走的钱是抢劫损失的好几倍。

1968年3月英国人林德赛·安德森拍摄了抨击英国公学制度的超现实主义影片《假如……》，其中有一个场面是，高年级的男孩在小教堂的屋顶用轻机枪扫射，而下面的老嬷嬷们、唱诗班的男孩则进行着反击。后来这种荒诞和疯狂就不再是超现实主义的，而变成了地道的现实主义。五六十年代对犯罪英雄的歌颂、校园反叛文化的发展导致了美国九十年代举世震惊的校园枪击潮，以及全球化的令人瞠目结舌的青少年暴力。枪击潮的基本模式是，一个青少年为了一点小事，拿着枪进学校，见人就打，直到自己被制服。这些青少年平时就很焦虑，父母、学校和老师使他既难堪又愤怒，性的问题使他焦虑不安，他的同学使他备受屈辱。当他看到电视电影中的暴力场面时，感觉就像是巫师用针插到蜡人身上一样解恨，他也可以体会到那种复仇的快感。一旦他们弄到真枪，就可能按照他们被电视电影所塑造的想象来行事。而枪在美国并不是很难搞到手。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近二十年青少年犯罪一直就是中国刑事犯罪的主体，它在整个犯罪中所占的比例大约为60%，有的年份这一比例甚至会达到80%。<sup>①</sup>

<sup>①</sup> 庄平、毕伟玉：《当代社会问题与青少年教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待到美国“婴儿潮”一代做了父母之后，他们虐待儿童的案例明显增长。单身父亲和单身母亲比其他人更容易虐待孩子，十八岁的小母亲比年龄大的母亲更容易虐待孩子。五分之四有虐待儿童的家庭都是靠福利为生的。在七十年代，估计有200万儿童受过虐待。<sup>①</sup>

“婴儿潮”一代在七十年代步入成年，六十年代是他们的青春期。他们中的许多人重返学校，学习谋生之术，社会责任感突然就淡漠了，七十年代被称之为“唯我的十年”。青年的状况又有些五十年代“沉默的一代”的那种感觉了。但是，1970年和1971年，15~19岁的人的自杀率上升幅度最大。几年以后，20~24岁的人自杀率激增。又过了几年，自杀最多的人是25~29岁的人。据统计，在1953—1957年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自杀率最高。<sup>②</sup>“婴儿潮”一代的愿望被提得太高了，以至于在幻想破灭后不能从梦中回到现实里来，只有无尽的失落，他们转而又变成了“自私的一代”，只忠实于自我，而且那些曾经有过火红岁月的活跃分子和改革家对未来最没有信心。许多人都感到幻灭，这可能是自杀频繁发生在他们这代人身上的原因。七十年代流行的音乐不再是要人参与的摇滚乐，而是要人逃避的迪斯科。

---

① 兰登·琼斯：《美国坎坷的一代——生育高潮后的美国社会》，贾蔼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182页。

② 兰登·琼斯：《美国坎坷的一代——生育高潮后的美国社会》，贾蔼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页。



## 结 语

在美国的“垮掉的一代”之后所兴起的全球青年亚文化，并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文化事件，它对人类的精神气质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还是决定未来人类精神气质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因素。这就不仅仅是“垮掉的一代”几个不良青年的街头文化了。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最终好像是解散了，但是他们的文化革命却带来了难以抹去的深刻影响。

借助全球化的浪潮，这种文化正在渗透到世界各地，包括那些处于前现代的土著民族也开始分享现代化的成果。而昔日的嬉皮士精神被主流文化吸收，演变成为上层“布波族”精英的“雅皮士”精神，崇尚“工作时拼命工作，玩的时候纵情玩”的工作伦理。布尔乔亚和波西米亚各退了一步，新教的劳动伦理和无限享乐的嬉皮士精神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达成了和解，八十年代的雅皮士们白天在全球自由经济中自由工作，晚上和周末则沉浸在六十年代塑造成形的道德和文化世界中。随着嬉皮士进入中年，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社会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英国首相布莱尔中学时是个几乎被开除的嬉皮士。美国总统克林顿曾是反越战的逃兵，而德国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六十年代可是风云人物，还与警察交过手。克林顿总统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属于“婴儿潮”一代，他的副总统阿尔·戈尔也是战后出生者。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克林顿也“嬉皮”了一把，戴着墨镜，在脱口秀节目中演奏了“猫王”艾尔维斯·普莱斯利的成名曲《伤心



旅店》。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和好莱坞影星克里斯·罗克则吹捧他是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克林顿对下层人民的夸张同情以及他与莱温斯基举世闻名的性丑闻都是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和性革命的精神遗风，他在精神气质上酷似肯尼迪，他们在性方面都是蠢蠢欲动的，又都很年轻英俊，特别对青年人的胃口。而“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巴勒斯在电视上为耐克运动鞋做广告，金斯伯格的诗集《美国的衰落》于1974年获全国图书奖，他也被评为美国艺术文学院院长。金斯伯格研究俨然成为美国的“学院派”。金斯伯格曾经奋力鼓吹的同性恋已基本被公众所接受，根据1996年美国一项调查，有80%以上的受访者支持同性恋在就业和居住上拥有平等权利，道德谴责已经很少了。<sup>①</sup> 根据肯·凯西的小说《飞越疯人院》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得了奥斯卡金奖。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成为时尚标志。价格昂贵的精装本《在路上》成为寄托某种情思、怀旧的“小资类读物”。1997年《在路上》出版四十周年，维金出版社出版纪念性豪华本。企鹅出版社出版了简装本，售价高达12美元。2001年5月凯鲁亚克《在路上》长卷手稿以220万美元拍卖。此外，《在路上》还被大导演科波拉搬上荧幕。凯鲁亚克如今也已经是家乡小镇洛厄尔的光荣，每年十月（凯鲁亚克诞生月）都会举行“洛厄尔纪念凯鲁亚克节”，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人，成为旅游开发的成功范例。2007年《在路上》出版五十周年之际，美国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凯鲁亚克的作品作为美国以及西方文学的“现代经典”而被选人多种美国文学选集，进入大学课堂。在哈佛大学的成人教育中心，就专门开设有“垮掉的一代”文学课程。1994—1995年纽约大学曾连续举行两次规模颇大的凯鲁亚克研讨会。在1999年美国现代图书馆提出的20世纪100

<sup>①</sup> 李银河：《李银河说性》，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

部世界小说佳作中《在路上》名列第 27 位。

这些，都是主流了。

不久的将来，世界上是否有可能只存在着一种单一的文化，各个民族独特的文化都成为一种无关痛痒的点缀？就只剩下可乐、吃了激素长大的鸡和 mp3。

这一切都在告诫我们：也许我们没有未来了！

这绝非危言耸听，我们真的应该彻底地反思了。



## 参考文献

- [1] 比尔·摩根编. 金斯伯格文选——深思熟虑的散文. 文楚安等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5
- [2] 千石保. “认真”的崩溃——新日本人论. 何培忠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3] 詹姆士·克利夫德. 从嬉皮到雅皮. 李二仕, 梅峰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4] 红曼, 洪亮编著. 疯狂摇滚.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7
- [5] 霍布斯保姆. 极端的年代. 郑明萱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 [6] 艾伦·布鲁姆. 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 缪青, 宋丽娜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 [7] 詹姆士·克利夫德. 从嬉皮到雅皮——昔日嬉皮士自述. 李二仕, 梅峰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8] 特里·伊格尔顿. 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9] 米克·圣迈克尔. 麦当娜口述实录. 闫卫建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
- [10] 塔里克·阿里, 苏珊·沃特金斯. 1968年反叛的年代. 范昌龙, 李宏, 王彦兴, 李尚杰译.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
- [11] 阿瑟·林克, 威廉·卡顿. 一九〇〇年以后的美国史. 刘绪贻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 [12] 安德烈·莫鲁瓦. 美国史——从威尔逊到肯尼迪. 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组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 [13] 兰登·琼斯. 美国坎坷的一代——生育高潮后的美国社会. 贾蔼美、纪胆武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9
- [14] 莫里斯·迪克斯坦. 伊甸园之门: 六十年代美国文化. 方晓光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5
- [15] 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赵一凡, 蒲隆, 任晓晋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9
- [16] 杰克·凯鲁亚克. 孤独旅者. 赵元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
- [17] 萨克文·伯科维奇.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七卷). 孙宏, 主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 [18] 威廉·曼彻斯特. 光荣与梦想. 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组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19] 塞缪尔·亨廷顿. 失衡的承诺. 周端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5
- [20] 彼得·科利尔, 戴维·霍洛维茨. 破坏性的一代——对六十年代的再思考. 北京: 文津出版社, 2004
- [21] 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 (1966 年政治序言). 黄勇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22] 萨利·贝恩斯. 1963 年的格林尼治村. 华明等译. 桂林: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1
- [23] 皮埃尔·勒·戈夫. 1968 年 5 月, 无奈的遗产. 胡尧步, 韦东, 高璐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
- [24] 莫里斯·迪克斯坦. 伊甸园之门: 六十年代美国文化. 方晓光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5
- [25] 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赵一凡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 [26] 戴安娜·拉维奇编. 美国读本.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社, 2005
- [27] 克拉克·科尔. 大学的功用. 陈学飞等译.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 [28] 让-皮埃尔·勒·戈夫. 1968年5月, 无奈的遗产. 胡尧步, 韦东, 高璐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
- [29] 南开大学历史系. 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简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
- [30]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张峰译. 庆: 重庆出版社, 1988
- [31] 包亚明主编. 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380~382
- [32] 金斯伯格. 凡·高之耳解密. 文楚安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0.
- [33] 理查德·弗拉克斯. 青年与社会变迁. 李青, 何非鲁译.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 [34] 戴维·斯泰格沃德. 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 周朗, 新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35] 理伯卡·E·卡拉奇. 分裂的一代. 覃文珍, 蒋凯, 胡元梓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36] 米克·圣迈克尔. 麦当娜口述实录. 闫卫建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
- [37] 塔里克·阿里, 苏珊·沃特金斯. 1968年反叛的年代. 范昌龙, 李宏, 王彦兴, 李尚杰译.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
- [38] 杰克·凯鲁亚克. 在路上. 王永年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39] 洛朗·若弗兰. 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 万家星译.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

- [40] C·赖特·米尔斯.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 杨晓东等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 [41] 吕庆广. 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 [42] 夏学花. 嬉皮士.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 [43] 张友伦, 肖军, 张聪. 美国社会的悖论——民主、平等与性别、种族歧视. 北京: 中国社科出版社, 1999
- [44] 张国庆. “垮掉的一代”与中国当代文学. 武昌: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 [45] 韩丹. 吸毒人群调查.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 [46] 庄平, 毕伟玉. 当代社会问题与青少年教育.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
- [47] 程巍. 中产阶级的孩子们.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
- [48] 刘绪贻主编. 战后美国史——1945—1986.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9
- [49] 许平, 朱晓军. 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50] 王恩铭. 20世纪美国妇女研究. 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51] 文楚安. 透视美国.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2
- [52] 张国庆. “垮掉的一代”与中国当代文学.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 [53] 潘绥铭, (美) 白维廉, 王爱丽, (美) 劳曼. 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 and 性关系.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4
- [54] 李银河. 李银河说性.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6
- [55] 张红. 从禁忌到解放——20世纪西方性观念的演变.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